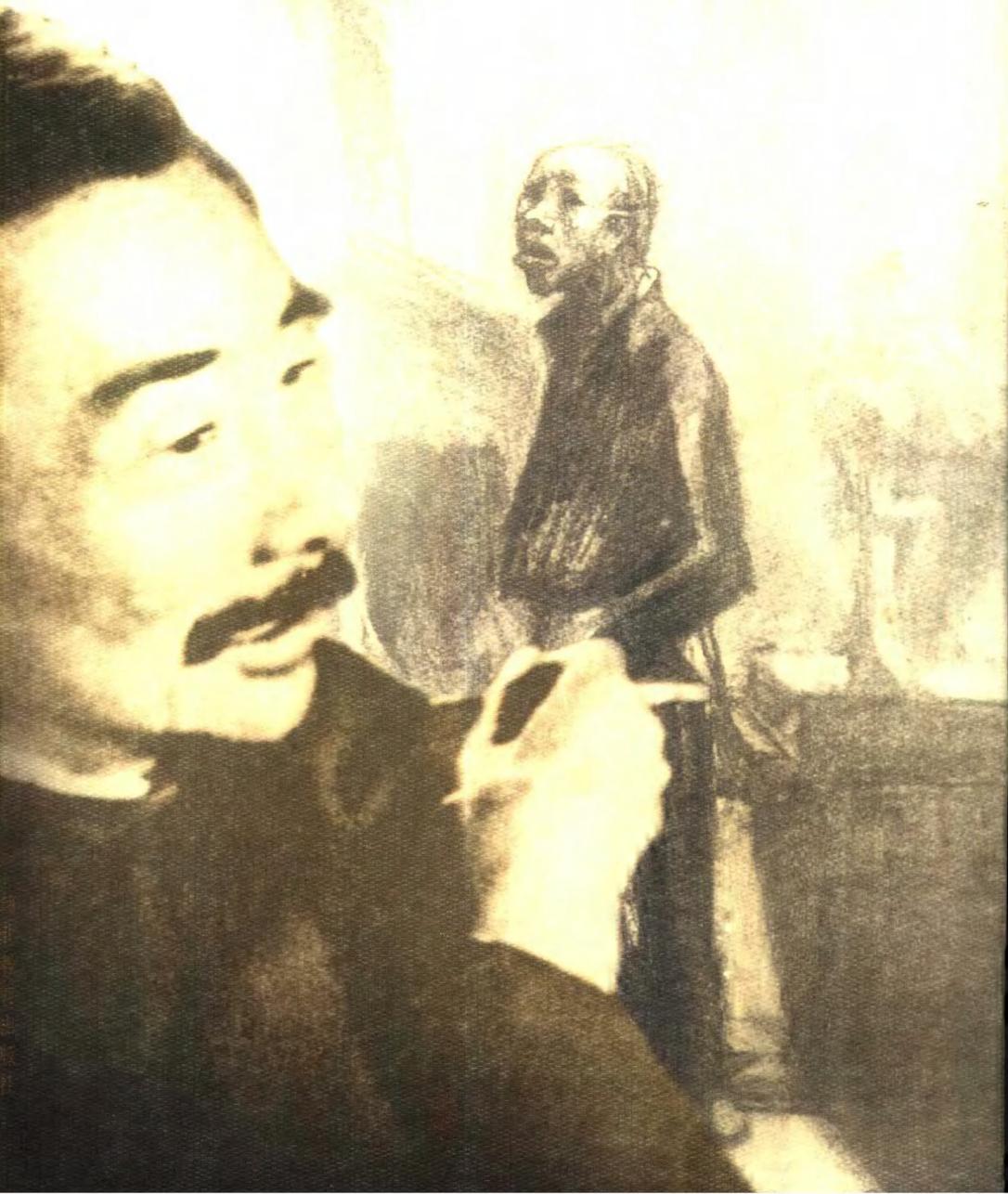


回望鲁迅

鲁迅 海外回响

——国际友人忆鲁迅

史沫特莱等著



回憶魯迅

海外回響

——國際友人憶魯迅

史沫特萊等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史沫特莱等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4011-3

I. 海… II. ①孙…②黄… III. 鲁迅 (1881~1936)-生平事迹-纪念文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8271 号

回望鲁迅 海外回响 ——国际友人忆鲁迅 史沫特莱等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125 印张 259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000 定价：22.30 元

ISBN 7-5434-4011-3/K · 137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要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改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缺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content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完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 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目 录

美 国

- | | | |
|----|-------------------------|--------|
| 1 | 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
——关于鲁迅和我 | 巴特莱特 |
| 3 | 忆 鲁 迅 | 史沫特莱 |
| 13 | 追 念 鲁 迅 | 史沫特莱 |
| 18 | 鲁迅是一把宝剑 | 史沫特莱 |
| 22 | 向鲁迅致敬 | 埃德加·斯诺 |
| 28 | 鲁迅印象记 | 埃德加·斯诺 |
| 31 | 中国的伏尔泰
——一个异邦人的赞辞 | 埃德加·斯诺 |

日 本

- | | | |
|----|------------|-------|
| 33 | 鲁迅的事情 | 本间久雄 |
| 35 | 会见鲁迅的夜晚 | 长与善郎 |
| 40 | 回 想 鲁 迅 | 长与善郎 |
| 47 | 与鲁迅谈话 | 野口米次郎 |
| 50 | 紧邻鲁迅先生 | 原 胜 |
| 60 | 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 须藤五百三 |
| 66 | 最后一天的鲁迅 | 池田幸子 |

71	我们最后的谈话	奥田杏花
74	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	山本实彦
78	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
80	鲁迅访问记	鹿地亘
87	鲁迅的回忆	鹿地亘
91	鲁迅和我	鹿地亘
100	鲁迅魂	鹿地亘
107	会见鲁迅的前前后后	高良富子
111	鲁迅先生	内山完造
119	思念鲁迅先生	内山完造
124	内山完造《花甲录》中 有关鲁迅的资料	内山完造
132	鲁迅追忆	林芙美子
133	我的回忆	内山嘉吉
136	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	长尾景和
144	回记鲁迅	河野樱
150	鲁迅的追念	仓石武四郎
154	鲁迅和我	镰田寿
161	在上海的鲁迅	木村重
167	鲁迅印象记(节选)	增田涉
188	我的恩师鲁迅先生	增田涉
200	回忆鲁迅	辛岛骁
207	我怀念鲁迅	清水安三
210	未被了解的鲁迅	儿岛亨
219	漫谈鲁迅	内山嘉吉等
231	鲁迅的死和广州的回忆	林守仁

234	谈 鲁 迅	山上正义
241	与鲁迅谈话	圆谷弘
	朝 鲜	
247	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	申彦俊
	新 西 兰	
251	鲁迅回忆片断	路易·艾黎
	捷 克	
255	回首当年忆鲁迅	普实克
259	编选后记	黄乔生

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

——关于鲁迅和我

[美国]巴特莱特

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里的健将。周树人氏(鲁迅是他的别名)曾在日本留学至10年之久。他虽对于医学很有兴趣，但是他的时间大部分是花在研究俄国文学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上了。他的兄弟周作人氏几乎和他齐名，并且是散文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们弟兄二人在日本留学时，便翻译一些俄罗斯、波兰及南欧其他各国的小说。他们回国后，完全在文学方面努力。鲁迅和 Chekhov, Schaitzler, Oliver, Wendell, Holmes^① 一样，抛弃了医业，以致力于文艺的创造。他现在47岁，一般人认他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写实大家和短篇小说的名手。

我会见鲁迅，在1926年夏天他还未从北京到厦门以前。他是个激进派，对于张作霖统治下摧残思想的手段深表不满，所以不能不设法离开。当时从北京南下的风气很盛，把北京多数的文人都吸引走了，鲁迅便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俄国文化比其他外洋文化都要丰富，”他对我说。“中俄两国间好像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关系。柴可夫^② 是我顶喜欢的作者。此外如哥可儿、屠格尼夫、多斯托

① 通译契诃夫、切兹勒、奥利维埃、温德尔、霍尔姆斯。

② 通译契诃夫。

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安特列夫、辛克微支、尼采，和希列^①等，我也特别喜欢。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国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现时社会里的奋斗，正是以前俄国小说家所遇着的奋斗……。”《新青年》杂志里，常有鲁迅的小说。中国短篇小说的开始，即在1918年他的《狂人日记》出版的时候。

鲁迅注重写实，敢于描写平常事件。他不问诗词，他的着重点在乡村和农民生活。他曾说：“我的生活里没有爱，也没有诗。”他的小说很像多斯托夫斯基和高尔基二人的作品，极富于同情心和热烈的情绪。最著名的《阿Q正传》已经译成了法、俄、英、德四国文字。法国文学大家罗兰氏读完这篇小说后曾说：“这一篇写实作品，里面很多讥讽言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这是鲁迅小说中惟一已经译成西文的作品。鲁迅用写实方法描写一个农民——阿Q——的思想，把阿Q那种无知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阿Q不识革命为何物，不解新时代的意义，这都历历说了出来。在《风波》里，他描写乡村生活，并且用滑稽和讽刺笔调，叙述农民怎样不受社会改革的影响。《狂人日记》是一部对于旧文化的讽刺作品。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于1923年出版，以后还陆续有其他小说集和论文集。有人说，鲁迅作品里充满了人生悲剧中种种极平庸的事件。他是一个天生的激进派，一无所惧的批评家和讽刺家，有独立的精神，并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话写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敌人，笃信科学，鼓吹新思想。他曾对我说：“孔教和佛教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我不信上帝，只信科学和道德。中国人今日最大的毛病是懒，他们一旦努力起来，内战马上就会停止，那时中国也就强盛了。工作和科学二者是中国的救星。”

石孚 译

（美国《Current History》第10期，译文载《当代》1927年
10月第1卷第1编）

^① 通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安德烈耶夫、显克微支、尼采，和席勒。

忆鲁迅

[美国]史沫特莱

—

1930年仲秋一个炎热的下午,一对当教员的夫妇前来看我,向我提出两点要求:一要我为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的新刊物《大道》贡献和撰写有关印度的论文稿件;二要我租一家外国小餐馆,作为庆贺鲁迅50寿辰开茶话会和晚餐宴会的场所。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有些中国人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在我的心中他实在是中国的伏尔泰^①。

第一个要求,我欣然答应尽力而为。第二个要求,颇费踌躇,因为这里面充满着危险,成百的男女宾客尽是思想界危险分子的代表人物,但两个朋友向我提出保证,所有前来祝寿的宾客均系口头邀请并相约不生事故,而且从街头到餐馆的交叉路口都布置有“岗哨”。

祝寿的这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西餐室的花园门口。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长街上过来的客人。我前面的十字路口处有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国人,一目了然,他正在候车,在他附近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另一个长衫客人。

鲁迅在他的夫人和小儿子的陪伴下来得很早。他是我在中国若干

^① 伏尔泰(1694~1778),18世纪法国作家、思想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岁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有幸和他见面。他的个子矮、身体弱，穿一件乳白色绸衫，着软底布鞋，不戴帽子，平头短发，整齐直立，像一把刷子似的。脸型和一般中国人的脸一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副表情丰富、机灵生动、为我生平仅见的一张面孔。因他不会英语，能说德语，我们就用德语交谈。他的举止，他的谈话，他的每一个手势，无不显示出难以言表的和谐和他那人格完善的动人处。在他的面前，我不禁自惭形秽、粗鲁鄙野、如同木偶。

就在同时，宾客川流而至。鲁迅步入园内。我一再盯住他的背影，他那纤瘦的手作出的手势把我吸引住了。

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的两个朋友告诉我，宾客中间有作家、艺术家、教授、学生、演员、学者、新闻记者，甚至还有两个政府要人。这一对权贵之所以也来祝寿，并非他们同情鲁迅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尊敬鲁迅的人品——言行一致、大智大勇、学识出众。

这是一次人材荟萃、场面激动的盛会，一次思想界革命先驱者济济一堂的集会。一个衣着寒酸的团体引人注目，他们作为现代美学戏剧界代表的一批新人物，试图演一些社会戏剧。洪深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剧艺社这个团体看来比较得意，他们演出了易卜生写的一些戏剧和洪深教授编的一两个剧本。洪深教授也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之一。第三个团体是左翼青年作家、艺人和翻译家组成的剧艺社，他们演出罗曼·罗兰、高尔基和雷马克等作家的剧本。后来晚些时候，他们演出《卡门》时受到警察的袭击，人被逮捕、戏被禁演了。因为观众里面的特务密探很不喜欢《卡门》剧本的最后一幕，在最后一场里卡门把她的戒指朝她遗弃的爱人唐·乔希扔出并念念有词地说：“要记住国共两党的决裂。”这时，唐·乔希刺死了她而得罪了警察暗探！

这时我见到花园门口许多人渐渐走近。一个身高体瘦、走路如飞的青年不停地打量四周的动静，边走边看，一眼就知他是一个学生。他刚走过，我的朋友就悄悄地对我说，他就是共产党机关报搞党的宣传报道的《上海报》的编辑。接着又过来了一个西装有皱褶、头发蓬乱、坐牢几个月刚刚出狱的人。他因“红军协会”中国代表的嫌疑被捕，他的家人给警方贿赂了一大批款项才把他买了回来。

花园里挤满了宾客，再无人来了。我和我的朋友仍在放哨。夜色

来临时,客人半数已经离去。另外有人站岗,我们和其他宾客进入餐室。

晚餐过后,讲话开始,我的朋友充当我的翻译。荷兰西餐室的主人不懂中国话,因而不用我们担心。中国侍者服务员们则站在一旁谛听人们的讲话。我们一边听那蓬头乱发的人报告狱中的生活状况,一边密切注视那些侍者服务员的每个动作。接着那个《上海报》编辑作了红军的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后加入红军的报告。这,我虽然听说过,但他的报告具体生动,为我首次听到。

一个身材矮胖,剪着短头发的青年妇女开头讲到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必要,她的讲话最后要求鲁迅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艺术家联盟的保护人和“导师”。这两个新的联盟团体后来成为中国文联。

鲁迅一直对每个人特别是对新的讲演者从头到尾用心倾听,食指扣着茶碗的边沿。他继大家讲演之后,站起来平平静静地讲了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混乱的故事。他的一生就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历史的见证。

他出生于一个清朝破落士大夫的家庭。成长于西学东渐思想渗入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由于贫困不能前往欧美各国留学,他以官费留学生资格到日本学医,对国民革命运动持同情态度。他在学医的同时,还读了日文,最初翻译了托尔斯泰著作。托尔斯泰向他灌输了社会革命思想和当代艺术的功能。

他回国后行过医,同欧美许多医生一样,他很快发现多种病根在于贫困和随贫困而至的无知。惟有富人有钱就医。于是他拿起文艺这个武器同封建思想进行搏斗,在俄国经典作家影响下,用俄国古典小说的风格创作短篇小说,弃医执笔,五四运动时期,他在北京各院校讲中国小说史略。

以后他钻研德国、俄国的文学,翻译了很多俄国文学名著和文章。他说目的在于把当代社会文艺最优秀的作品向中国青年推荐。他还搜集西方古典和现代的美术作品,为青年艺术家出版了很多卷版画木刻集。

他说,现在要他来领导一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些青年朋友也劝说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出自农村,立足于农民和学者的生活

之中。他并不相信对工农的痛苦生活毫无体验的知识青年能够创作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活力来自实践,并不出于理论。

尽管如此,他将继续努力把西方的最优秀的文艺作品整理介绍给中国青年,并乐意充当青年的指导,或者说如青年们要求他充当他们的所谓“导师”。谈到保护青年,在这样一个把最温和的文艺当作政治犯罪的国土里谁能保护谁呢?从所谓“导师”的身份来说,他劝有教养的青年去体验工农的生活,从生活中搜集题材,学习研究西方的文艺形式。

集会快结束时,一个青年面对着我悲伤地摇头说:“真叫人失望,我是说鲁迅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态度真叫人失望。他的话真叫青年人泄气!”

我生平对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抱有一种对立态度。他这样说,使我的对立情绪油然而生。中国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从来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作品多半是无病呻吟、没有经验的虚构。讲到“青年”这个词儿对他们来说,就是学生,惟有学生才是青年。对于工人和农民,他们保持一种悲天悯人、寄予同情,但自我超然、鄙视群众的态度。这一时期他们创作出的许多号称“无产阶级文艺”的作品多半是一些东施效颦、粗制滥造的俄国式作品。我对这个青年批评家回答道:“我是完全同意鲁迅的看法的。”

我的生活同鲁迅和他的密友、中国知名的小说家之一的茅盾的生活联结在一起。我们三人共同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国民间艺人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版画集;我们三人一起为欧美新闻界写稿,对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政治迫害发出抨击的呼声。茅盾和我经常在某条街头的角落里碰头,仔细观察鲁迅住处那条街道的动静,然后走进他的家和他一起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一家饭馆叫来饭菜一谈几个小时。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为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上光荣的事。

鲁迅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处于中国青年知识界的先驱或“导师”的地位。青年中间有很多集团,每个集团都争取他站在自己的集团或路线一边。他对青年一视同仁,拒绝参加他们这个那个阵线组成的联盟,对各方面的意见广泛采纳,讨论青年提出的问题,修改青年作家的

创作,鼓励青年努力上进。他的名字在青年创办的刊物上登在前面。

他常对我讲到他要写一部以他的生活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的计划,但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动乱使他没有工夫动笔。他对“无辜者遭到的屠杀”与人权的粗暴破坏是如此强烈憎恨,以致旋即把他的笔当作惟一的武器,一把名副其实的锋利匕首来使用,对之进行政治上的讽刺。

中国的作家都和本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和历史结成不解之缘,看来他是这方面造诣最深、关系最密的一个。要把他的政治杂文译成英文是很难的。由于不能公开抨击反动派,他的作品只能是对中国历代黑暗时期的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的精心雕琢,把当代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专制相提并论,明眼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他那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政治小品、杂文里面表达出中西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传统和画龙点睛之笔。他向公众经常介绍这家那家文艺杂志,只是眼见那些刊物遭受镇压封禁而已。他的那些结构严谨、文风简洁的推荐文章写得流畅生动,有如迎风飘扬的旗帜傲视一切。在他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乃是人类成就的精神实质所在。他的独具一格的文风是那样与众不同,以致他用任何化名都会被人识破,检查官员把他的文章删砍斧削得不成体统。和他联系往来的作家、编辑、艺术家相继失踪、不明下落了,惟有他因年岁和盛名而幸免被捕。多年间,他的那些没有删改的手稿只有日本左翼知识界人物敢于给以发表。在日本知识界人士的眼里,他是中国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作家。

鲁迅的追随者、朋辈、学生的陆续失踪和被迫害致死,如同腐蚀剂侵蚀他的身体和心灵,因而他病了,有时病重起不了床。他感到心脏衰弱,同意让上海最好的西医治他的病。医生检查过后把我拉到一边说:“他的肺病很重了,只有清凉干燥的气候,病情才能停止恶化,延长寿命。”医生还加了一句话,说道:“他当然不会听医生劝告的,这些古板固执、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是并不相信现代医学的。”

很难说鲁迅古板固执,也难说鲁迅愚昧无知,可是鲁迅并没有听西医的劝告。“当别人正在战斗不息或是宁死不屈的时候,你们让我卧床一年做什么?”他指责我们说。我们以种种理由进行说服,但他提醒我们说,他穷,无钱就医。于是我们设法筹集一笔医药费,他仍然拒绝。高尔基邀请他作为他的客人到苏联暂住一年,他谢绝了邀请。他说,国

民党会向全国大肆宣传叫嚷他接受“莫斯科卢布”的。

“随他们怎么去说吧！”我和他争辩。

“他们胡说不了！”他大声说道：“人人知道他们靠造谣过日子，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去！中国需要我。”

我们百般劝说，总是徒然。他说：“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开小差！轻伤不下火线！总得有人坚持战斗！”

1930年年底，我去菲律宾休养数周。动身前夕，鲁迅和三个青年作家前来看我，消磨了一个晚上。其中一个柔石，他过去当过教师，是鲁迅最有才华和最心爱的学生兼朋友。当我于1931年3月间回到上海时，我的中文秘书冯达给我带来了24个青年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被捕遇难的不幸消息。他们于2月21日夜里被提出牢房，强迫自掘坟墓，遭到杀害，有几个惨被活埋。柔石是被活埋的一个。

我急忙赶到鲁迅家里，在他书房里，我发现他面目黧黑，没有梳头，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森森，锋棱逼射。语调中充满愤恨，令人生畏。

“这是那天夜里我写的一篇文章。”他把一篇签有他的化名的手稿交给我说道：“我称之为《写于深夜里》，请把它的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吧！”

他把文章的大意说明后，我提出警告说，文章如果发表，你会遭到杀害的。

“有什么要紧？”他很愤慨地说：“总得有人出来讲话！”

离开他以前，我们俩人拟好了一个就屠杀作家、艺术家的事件告西方作家的声明。我把手稿带给茅盾，由他作了润色并协助我把手稿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引起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反应是，有五十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这使国民党大为震惊。

鲁迅的《写于深夜里》这篇手稿甚至在国外也未发表过，我一直把它保留在我的身边。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个夜里用血泪写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呐喊。文章开头写道：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画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在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他这里说的“野地的纸灰”，指的是为死者灵魂焚化纸钱的中国丧葬习俗。接下去他写珂勒惠支夫人的连环木刻画中有一副木刻《牺牲》刻画出一个面容憔悴、无限哀伤的普通母亲把垂死的孩子作为供献交给死神。木刻中牺牲的那个孩子就象征着24个烈士。文章继续写道：

“在中国的过去，一个死囚临刑，照例走完一个过场，准他喊冤枉，让他说无罪，由他骂昏官，听他摆业绩，任他表白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上杀场临刑前，观众会喝采，他勇敢的死讯会传播开去。在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些作法是既野蛮又残酷的，而今我看过去的统治者们让死囚这样做是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满有自信和勇气的证据，让死囚开口的做法多少是含有一点仁慈、一点恩惠的。”

然后他把笔锋转向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上铢堂写的一篇《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文章，那文章说什么“对死囚的喝采还是同情，理想不算崇高，然而对于社会实在要不得。因为这种做法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鲁迅以辛辣的讽刺对他作了回答，他论述了凶手的残酷：

“今天我每当听到一个朋友或一个学生的死并且知道了谁也不知道的死法，我感到比听到他怎么死去更加悲哀。我能想像得到在暗室中被屠夫们杀害的寂寞比当众处死更令人心胆发寒。当我第一次阅读但丁的《神曲》第一部“地狱篇”的时候，就惊异于书中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我看但丁的设想还是过于仁厚的了。他的设想并没有达到今日极平常的残酷的深度。”

文章末尾他附了一封信可能是自《坐牢略记》的摘录。寄信人是一个18岁的青年和两个上海大学参加鲁迅创办的木刻研究会的学生。他们因共产主义思想罪名被捕。指控他们的罪证有一条是查出他们有一幅卢那卡斯基的木刻版画。给木刻打上共产党罪名的烙印真是荒唐透顶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不敢逮捕鲁迅，把他的学生抓起来了。

这个青年的《坐牢略记》，以“敬爱的大师”开头，叙述他从客西马尾果园被捕蒙难那一天到贿赂一个看守转信给鲁迅的那天夜里为止的全

部经历。特别提到一个农民被告被拷问他是红军司令员的苦楚，十个指头的指甲被拔掉，鲜血淋漓直淌，面色死白，僵直无声，像一个鬼魂伏在地上。“我敬爱的大师啊！每当我一想起他的时候，我的心冰凉发寒，毛发直立！”狱中书简呼喊道。

我和茅盾翻译到这里时，茅盾搁笔，语调低沉，细声说道：“这的确是深夜里写的。”

“是的，深夜里。”我说。

二

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遇到一个刚从西北来的作家。他是工农红军的代表，参加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朱、毛红军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行程二万五千里路，时经冬夏春秋，走过平原村庄，跨过千山万水。

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是一副充满了艰险苦难和百折不回的画卷。人们难以相信，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当他讲到在那雪海茫茫，风雪交加的川康藏边的大山丛中漫步前进时，他这样说：

“人们精疲力竭，渐渐支持不住了，自自然然地蹲下来，那样软弱再起不来。几千人冻死了。我们几个月只吃青稞，许多人消化不了它，拉出来的青稞，别人捡起来，洗干净，又吃它。过一次肠道再排泄它一次。

“当我们这些幸存者终于出现在甘肃草原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贫苦的当地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们伸开手臂，团团把他们抱住，又哭又笑又欢乐，又打又闹又歌舞。有的穿着羊毛捻的毛线衣，有的披着羊皮剪的老羊皮，破破烂烂，奇奇怪怪瘦得像个鬼，几千人有病，夜里的咳嗽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发出回音。甘肃是那样的苦，我们总是吃狗、猫和老鼠肉。甘肃是那样的穷，妇女藏在寒窝里，一家人往往仅有一条裤子，男人穿了女人就没穿头。民国以来二三十年的兵荒马乱，干旱饥荒，天灾人祸，加上苛捐杂税，老百姓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连衣服都没有。最遭殃的是军阀的队伍还带来梅毒病菌，许多妇女不生育，有些地方看不见15岁以下的儿童。”

这个作家跟我说，红军部队的医药物资非常奇缺。自此之后，我同两个外国医生开始为红军筹集资金购买药品，可以这样说吧，我们成了红军采购药品的“走私商人”。

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惟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方，所以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少帅自从当上东北王以来在性格上发生了许多变化。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打破了他过去对法西斯主义五体投地佩服的迷信。他受到司令部里一批青年军官的影响，成为一个作风民主的军人。他戒掉了抽大烟的习惯，并且极力克制改掉青少年时代耳濡目染的封建军阀的习气和影响。全国各地民族救亡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省市地方受到取缔，但在他的地盘内得到保护。他无视国民党政府的训令指责，许可全国各界联合救亡爱国运动委员会在西安召开，他反抗国民党政府对到达陕北的红军继续围剿的命令，当日寇占领东北入侵绥远、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和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打内战、残杀自己同胞的想法。

有一个红军代表在少帅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他为我在西安 15 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池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大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摇篮，许多伟大的朝代在这里兴起，交替成长，西安是大西北的中心，我希望在西安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

有些消息扰乱了我隐居生活的平静。10月20日，一个同住华清池庙内，看来不问政治的女友来到我的房间里没精打采地说：“我们中国人损失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又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来了，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逝世了。”

我在不久前才得到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我悲伤，深感遗憾。鲁迅的死，对我说来不仅是个人的悲伤，且也是民族的不幸。他活着奋发有为，并非漫无目的地活着，也不想争权求名，发家致富，财权位根本不在他的眼里。在中国知识界中，他对知识青年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共同的善良美德，忧国忧民、刻苦奋斗、积劳成疾是他短命的原因。而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死亡本身。

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方面发表了鲁迅逝世的电讯，这是对他惟一解

除禁令的报道。上海举行了安葬鲁迅的殡仪。学校的师生走出课堂，商店的店员走出店铺，工人们走出工厂，贫寒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参加了他的葬礼。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在送殡的行列里，送他到最后的安息地。

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共产党人士无不尊敬他的渊博学识和斗争精神。后来共产党圣地延安成立了第一个鲁迅图书馆。我做过外文图书管理员并把我在中国搜集到的图书赠给该馆。稍后共产党人士又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由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指导学习，这是创作生动活泼战斗作品的艺术学院。

西安的朋友们在鲁迅逝世第二天来到临潼的时候，华清池庙的长老也走进房来同西安来人坐在一起议论鲁迅。这个长老是一个四大皆空、接待方外的办事员。听他谈话可以看出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方丈也熟悉鲁迅的生平和鲁迅作品。“检查制度能起什么作用呢？”我想。

（《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

追念鲁迅

[美国]史沫特莱

当鲁迅的名字被提起的时候，或者当我想起他的时候——那是常有的事——我的心就要唤起一幅图画来。那幅图画老是那个样子，不会有变化，至于为什么如此，我也不知道。我老是看见鲁迅那个脆弱却有活力的身影，进出走动在上海虹口区的他的那间房里，他的面孔一径燃点着一种强作幽默的表情，那就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

从这幅图画里面，又透露出一些有定形的特殊事迹来，曾经在我的记忆上留着一个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关于杀戮一些革命青年的抗议。他们把这篇抗议交给我拿到一个美国报纸上去发表。当时我想这份抗议也许会招致他们的逮捕、监禁或处死，就问他们，把他们的名字签在上面是否妥当。鲁迅略略一抬他的下颚，用平静的声音说：“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拿去发表吧。”我还是怀疑地询问着。“不要紧的，”他回答。“发表去吧。”他带着坚强的信心说。

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个反动的编辑，正在着手翻译鲁迅的一部分小说，陆续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目的无非要借这为中国的青年们所尊崇敬仰的一个名字来号召而已。鲁迅想要制止这件事，我就替他写了一个给出版家和一般读众的公告。我的公告的措辞太温和。而鲁迅一谈起那个编辑，便愤怒得连声音也发抖了。他对我说：

“在那公告里你替我补上一层意思，说我讨厌并且憎恨那个人，和他的所有的作品！”

鲁迅的绝笔之一,是一篇题为《深夜作》^①的文章,他把它交给我,要我译成英文。这篇文章,不但他写时一点没有顾到对于他自己会有什么后果,并且还是一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这实在是一篇壮丽的作品,一面是表现他对中国一般创造的革命青年的至深的爱,同时又充满着他对于当时一般反动势力的强烈的憎恨,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正在断送中国大多数优秀青年的生命。

我说这是一件显示着天才迹象的作品。因为照我的想法,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惟一具有我们所谓“天才”的那种奇异和稀有的品格的人。中国原有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作家,但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就是他在《申报》文艺栏或其他刊物发表的那些“小评论”^②,也表现着这种品性。为了这种品性,他虽是用着一大串的笔名,也终于瞒不了人。人们总知道是谁写的,那些给反动势力为钱而服务的作家们,也都能够明明白白地看出来,那一行,那一句,那一节,那一篇是谁写的。

当我去看他时,我常常看见他蓬松着头发,穿着一件旧汗衫,踏着卧室的拖鞋坐在那里。在这样的时侯,我总想起俄国革命以前的那些作家。因为据人们所描写,那些作家也是同样憔悴而严肃的人,并且在和鲁迅所生活所工作的同样荒凉的房间里工作的。他们也同鲁迅一样,或是藏匿起来,或是过着半公开的生活,一径面对着被拘捕被监禁的可能。

我认识鲁迅已有好几年,而他是生平最珍贵的朋友之一。在这许多年中,我想不起来他曾经表示过一次恐惧。他似乎并不知道怎样叫做恐惧。他具有一种极深的轻蔑心,那是难以形容的。他对于反动、对于不进步的、反革命的组织、个人和制度,都憎恨。他又擅于讥嘲和讽刺。可是我想他甚至连“恐惧”这词的意义也不懂得的。

我第一次会见他,是在他50岁生辰的庆祝席上。我想那是1929年吧。^③

① 应为《写于深夜里》。

② 指杂文。

③ 史沫特莱第一次和鲁迅相见,是1929年12月27日,而鲁迅50岁生辰的庆祝席是在1930年9月17日举行的。

有一些青年作家要我去租一个外国小饭店，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开一个下午的茶会，并且吃一顿晚餐。中国人要有这样一个集会，是危险的。我是个外国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来请我的客。不过等到客人都来齐了，那外国饭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国人，又大多是贫穷的，并且中国的侍者们也要听到我们的谈话和演说，于是就要发生危险了。

在鲁迅生日的那天下午，客人陆续来到那小饭店的花园中。他们有单独来的，有成群来的。有许多没有钱，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饭。鲁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进园来的向他们致敬的客人。那天鲁迅真是神采奕奕，——因为当他快乐的时候，或是对于什么东西发生兴味的时候，他总是神采奕奕的。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丰采，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

我在中国的时间不久，这种景象使我惊异了。在那个时代，就是少数人集合在一处地方，也是有危险的。我们的周围一径都有侦探，有许多集会他们似乎都知道。可是那一天，来给鲁迅致敬的不下200人，而且其中有许多人，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的脑袋都要难保。可是200人来了，并没有一个侦探知道。我还记得有一群贫苦演剧家，站在那里和鲁迅谈话。不知为什么，他们似乎比其余的客人都要穷些。在当时，有许多革命团体正在组织之中，因为有许多小剧团也正在组织成一种全中国的组织。此外客人之中，有许多左翼的或革命的作家、许多艺术家、少数新闻记者，有一些教员、学生和从各大学来的教授。还有一个是红军协助会的代表，一个刚刚出狱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个当时上海共产党党报的编辑。我还记得有一个守旧的哲学教授也来参加鲁迅生辰的庆祝。

整个下午，客人不断地来来去去，到晚上只有50个人留下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我看着那外国店主在房间里不住走动，亲自照料一切，每一回那个侍者走出房去的时候，我都注视着，倾听着，留心着他是否去打电话给警察。因为当时在场诸人的演说，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是大可以引得他们带着机关枪和捕人车而来的。并非那些演说是“狂

妄的”或是“凶险的”。不，他们不过是谈着近代的思想，谈着中国的解放，谈着文化团体的组织，谈着鲁迅的领导的必要。他们谈到了鲁迅的可宝贵的50年生活，而仍旧还是年轻而健壮，成为一个青年和革命思想的领导人。他们请求他出来切切实实地做个领导。

我那天晚上第一次听见鲁迅演说。我的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着警察的捕人车的可能的隆隆声的到来，一面却仍倾听着一个翻译替他译出来的话。不久，我忘了有关捕人车的顾虑因为鲁迅正在那里讲他生平的故事。他站着，一个平静而严肃的形象，从容而平静地说着话，说得所有的侍者都静听着他的每一个字，有时竟至客人也忘记侍候了。

鲁迅讲到他在前清时的青年生活，他在一个半封建的小乡村里的青年生活。他讲到他起先怎样在日本学医，后来怎样认明了今日的医学只是替富人服务。只有富人能够给得起医生的诊费，而中国的问题，他以为，并不是由替富人医肚痛可以解决的。因此，鲁迅弃医从文，试图通过文学来唤醒青年。他倾向于俄国的革命作家，并且向他们学习。

最后，鲁迅讲到了世界各国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而且我以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这一天晚上，他把他对于世界文学的知识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展示出来了。但是，鲁迅说，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普罗列塔利亚作家。他的根底，他的创作生活，开始在一个半封建的乡村里，他除了那个乡村和知识阶级之外，对于其他任何的知识集团知道得很少。可是，他一直是和学生及其他知识者思想中的封建主义奋斗的，而这件事，他仍然还在做，而且能够继续做下去。关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正在把许多苏联作家的重要作品译为中文，还有许许多多他也预备要译，这些作品，他说，应该用作中国青年作家的指导。同样，在艺术上，他要把西方近代刻绘艺术家的第一流作品搜集起来，在中国刊布，中国青年艺术家可以从中学习。他用这样的方法教导中国的青年。

我们知道，在后来几年里面，鲁迅已经不止实践了他的约诺。他已是一般革命作家和艺术家的拥护中心了。他已搜集了许多优美的刻绘艺术品，是一切国家都包括的。他已出版了许多册各国刻绘艺术家的作品。这一项工作，他是用着一种热爱，甚至于迷恋的心情去进行的。

他爱好书,和有活力的健劲艺术。他爱好创造的和进步的一切,至于腐败的、愚蠢的,他一概都憎恨鄙薄。他的作品就是这态度的活的证据。他的笔蘸着无情的批评的汁液,许多人都感觉到它的刺。可是他所有的作品里,是从来没有一处地方不袒护着青年的。他爱青年,他了解青年的烦闷,了解青年对于一种新的生活和一个新的世界的奋斗。

在他的一生的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夫人和朋友曾劝他出国,但他总是不肯离开中国。他说,他不能在中国这种危急的历史关头离开。他知道他自己病已很深,可是他不能离开他所爱的这片国土。他说中国需要每一个人。我们回答他说,除非他出去休息一年,否则他是不能帮助中国了。但是他希望能够好起来,而他这人是很执拗的。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执笔的战斗者,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太执拗了。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情愿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当报上传来他的去世的消息时,我在西安。一时每个人都谈起这件事来。我的同伴们是在一个荒僻小市镇里的最最守旧的人物,而甚至于他们也在谈鲁迅的去世了。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死了。当时我正卧病在床。人们拿了几本杂志给我看,上面印着他的葬仪的照片。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伟大的精神,一个以笔为刀而不知何谓恐惧的人物,与世长辞了。我曾经以做他的朋友为荣誉。所以,也同在上海和不远处地方的数千万人一样,我掩着面哭了。

傅东华 译

(《文学》1937年11月10日第9卷第4号)

鲁迅是一把宝剑

[美国]史沫特莱

我知道鲁迅有好多年了。他的许多事情使我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首先,他具有人类中非凡的发展——天才——的各种标志。据我知道,他是中国近百年,也许是好几百年以来所产生的仅有的文学天才。别的作家尽管有天赋有才能,还有少数作家有很高的天赋,然而鲁迅却是一个天才。他具有罕见的深入于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观察力;这一稀有的深刻的观察赋予他的以描画其所见所知的才能。只消三言两语这么一来,就像一把宝剑似的锋利而且分明,他的作品往往像一把宝剑。他的观察是那样分明,他的作品是那样锋利和辉煌,他的见地是那样革命,这使我相信中国将来的史家倘不研究他的著作,决不能真实地绘出这一伟大的时代。我对于他的一般的看法是:他是这一历史时代中文化素养最精湛的人。

鲁迅的作品一般可以从几点来了解。第一,他与各种各样的封建制度、风习和观念作斗争。第二,他与政治上的反动作斗争。第三,他与各种贪污腐化作斗争。当他运用他的笔像一把宝剑似的去摧毁它们的时候,他另一方面提供与此相反的中国的新兴力量:他提供以革命的民主主义代替封建制度与政治的反动;以诚实廉洁代替贪污腐化。他用他的笔来保卫这些新兴力量,同时,他努力去打定新兴文学、新兴艺术和现代科学的基础。他翻译并且推动许多作家去翻译现代西洋的现实主义文学,给中国的青年研究、学习,并知道现实主义文学和革命文学究竟是什么。他搜集了各种样式的版画木刻,他藏有现代艺术品最

完整的套数，这，我从未见于个人的手中。他收藏这些，并非为他和亲友们个人享受；恰好相反，他特为编印了好多现代绘画艺术，尤其是木刻，对于中国是最有价值的艺术，因为它能廉价地制作和广泛地翻印，所以能够影响民众的多数。他又编印了些西洋绘画名作的书，纯粹作为学习的借鉴。他希望新中国去探讨全世界的文化，藉使本国的文化充满活力并且丰富起来。

当我从欧洲来到中国，发现中国竟有一个对西洋文学知识了解这样渊博深湛的人，我老实吃了一惊。他知道的现代欧洲作家比我了解得还多，虽说我来自他们中间。他通晓日本语文，说得一点德语，可是他能够阅读和理解德文，因此他能够直接从德文翻译。他研究俄文，无论他翻译俄国文学或德国文学的时候，他便把原文放在面前，并将日译和任何或有的中译收集来和原文比照。从他的翻译得极其精确的外国书籍和散篇文章中间，我们读到很多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事实上，他的全集里面关涉到他对翻译态度的部分，足有一卷之多，他坚决反对误译与错译。对付生活与工作那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他认为是一个敌人。

其次谈到科学，他过去在日本研究医学。他用笔和舌去鼓舞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他只相信科学的现代医学，却不相信中国陈腐的医学。不过他，好像现代医学界的人士所倡导，主张从事于中国药草的探究，看中究竟可以提炼多少现代药品出来。因为中国的医学向来落后，甚至堕落到成为迷信的程度了。他就是由于这医学的研究与实习，才最初感受写作的刺激的。我在上海庆祝他50岁的生辰，那天他在致辞中曾谈到这件事。他说他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是一个医生。然而他不久便看到，中国的疾病大半是由于贫穷所致，而大多数医生仅只花掉他们的时间去治疗富人的身心不适，穷人呢，他们是太穷也许是过于无知，无法去延聘科学的医生，他不情愿为了个人赚钱而用毕生精力去治疗富人的小病痛。他希望出一把力，去改造祖国的基础，而他以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做一个新思想的传播者。他选中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去发表他初期的思想，因为阅读短篇小说的人总要比阅读冠冕堂皇的长篇大论的人要来得多。由此，短篇小说便成为他与堕落、腐化以及反动思想战斗的手段，成为他贡献新的思想的手段，成为他接近一切新的课题

的手段。

鲁迅逝世的前几年,他创立和发展了一种政治短评即“杂感”这一写作形式。在这方面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宗匠,因此许多外国人士把他比作伏尔泰——法国大革命时代伟大的政治讽刺家和评论家。还有一些人努力寻找其他的名堂安在他头上,某些中国人莫名其妙地把他叫做“中国的高尔基”或者叫作“中国的萧伯纳”。他不像萧,也不像高尔基;他是道地的中国货色。他与高尔基相像,只在高尔基成为一个反对西欧政治上文化上的反动这一点。纵然如此,相像的限度也止于内容,而不是形式。鲁迅那些锋利、深刻的精短批评文章,使一事物好像阳光下的宝剑那般耀眼。高尔基则写作较长的、更理智的文章。

我们从鲁迅的许多作品和言论中间知道他是一个新女性的卫护者。他认为今天中国妇女的地位不自然而且低下。他编印的他和他夫人的书简那本小册子(《两地书》——译者)呈现着中国新女性的姿态。因为他的夫人(许广平,笔名“景宋”——译者)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她写给他的信里洋溢着思想与斗争。她不是一个接受妇女的被动和安分守己地位的女性。但她并不是一个作家,因此也不曾沿着这条路线发展。她结婚以后,有了一个孩子和一个需要照管的家,她却绝未陷于被动与愚蠢。她经常读书,她做了许多积极的组织工作,这种工作对于鲁迅衰弱的体质是太吃力了,他尊敬她,他承受下来的每一件工作几乎都要经他们俩讨论过,而她坦诚的进言实是他主要的支援之一。无论是谁,凡知道他们的人——就知道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深深的爱和同志情谊之上的。他的夫人决不是卧室里一件安适的家具,她乃是他的共同工作者。在某些地方她还是他的左右手。如果离开她,他的生命便不可想像。他在病中和面对死亡的时候,除非有她作伴,他拒绝到任何地方去诊治。他出席一切聚谈集会几乎都与她相偕,如果人们想见到鲁迅,他们必得跟她接头。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很少或几乎不曾见过男女之间有这样真挚的爱和这样可敬的同志之谊,他们的孩子,被当作宝贝似的,是他们彼此间爱情更深一层的维系。

在我,仿佛鲁迅并不曾死,那是因为他的著作不仅有几小时或者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的价值而已,他的著作是纵垂久远横被世界的。

他的著作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而斗争和再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间毫不宽容,不知道惧怕。无畏的斗争成为他的性格的凸出的因素。那就是他的作品为什么在今天和过去一样的真实生动,为什么在未来的若干年间对于进步力量永远是活生生的有权威的前驱,和为什么人们难于相信他真的已经死了的缘故。中国的史家,倘不阅读他的著作,决不能了解从“五四”到现在,从现在以至未来的若干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因为他著作中间,用美和有力的言辞,表现了新中国的伟大创造的革命力量。鲁迅之所以成为一个天才,而不仅是一个有特长有能力如像我辈者,就因为他具有这纵垂久远横被世界的普遍性和创造的才能。

(《文化月刊》1939年10月20日第3期)

向鲁迅致敬

[美国]埃德加·斯诺

鲁迅是当代中国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文学家。他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使自己成为整个民族历史组成部分的作家之一。他生活于中国革命之中，毕生的经历就是描述那个伟大而又激烈的运动的一部史诗。1917年，他为中国的_{新文化}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直到1936年10月19日，他55岁在上海逝世止，他在思想领域中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

在使鲁迅成名的那些现代寓言性质的精短小说一杂文中，有一篇题为《一件小事》。在这则故事中，鲁迅讲述了自己在乘坐人力车撞倒了一个老女人时的一段经历。他承认自己在人力车夫停下车去搀扶被撞者时，曾感到烦躁和愠怒，并怎样命令车夫快走。鲁迅肯定那个女人根本没有受伤。使他觉得惊诧的是那个车夫拒绝往前赶路，陪着那个老女人去警察局投案了。他注视着这两个人走进了警察局的大门，那个车夫是自愿走进这扇大门的，鲁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自首行动的伟大意义，他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去年5月在上海的一次访问中，当我看到鲁迅时，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因为当鲁迅出来迎接我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个儿真的很小，只有5英尺多一点。然而，自从4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起，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身材相当魁伟的人。我真怀疑自己竟会有这样一个糊涂的、错误的记忆。但是我很快就忘掉了这一点，直到几小时后，我告辞时，

他站起来,我才又一次看到他的确非常矮小。

事实是,当鲁迅在场时,你会忘掉有关他身材的一切,而只注意他那雕塑精致的头部曲线,刚毅的面容和眼睛里射出的深沉的光芒。正如他说自己“必须仰视着”去追随那个人力车夫那样,和鲁迅在一起时,你必须仰视着去领会他那崇高的思想。我认为鲁迅确实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虽然他的外表很虚弱,他的躯壳只是一张被他内心的炽热的烈火燃烧着的褪色的羊皮纸,但他所具有的迷人的魅力,使你无法区分出这一精神和肉体的差别。

然而使鲁迅的形象显示出无上高贵和尊严的并不是他那颗硕大的,带有两道粗黑浓眉的杰出的头颅,也不是他那双深邃的眼睛,而是人民倾注给他的巨大的爱。自从我来到中国,七年中从未感到一个中国人的死,像鲁迅那样真正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

一个国民党元老最近被人暗杀了,没有人为此哭泣。当胡汉民逝世时,他获得了所有官方的礼遇,在官方资助的报刊上也按照习俗发表了一些颂扬他的文章,但除了他的亲朋至友外,多数人是出于礼貌才掉下几滴虚假的眼泪,恐怕没有一个年轻人会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包括可怜的黄郛和中国前总理,昏庸的段祺瑞在内都是如此。尽管官方在他们的棺柩上堆满了花圈和言过其实的挽联,却丝毫也蒙骗不了人民群众,恰恰相反,这一切使人们感到耻辱,他们转过头去,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去鞭挞一具僵尸。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这样问道:“某某人死了,你知道吗?”

“是吗?”听的人回答道,“这对他的家庭是一个不幸,但对中国却是一件好事。”然后,人人都给予他一个最后的宽恕的微笑。

但是对于鲁迅的死,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事情发生在我刚刚结束了和中国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的旅行回到苏区边界时,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我遇到了由八个学生组成的一个小队,他们是到苏区来为“共匪”工作的。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知道吗?鲁迅去世了。”

“啊?”和我在一起的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叫道,然后他难受得只说了声“唉呀!”我从未听他谈起过鲁迅,此时,我惊讶地看到他的眼里满含着泪珠,这八个学生是这样的生气勃勃,滔滔不绝,但有好几分钟

他们都默然无言,你无法不感受到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悲痛。

“你认识他吗?”最后,我问那位年轻的军官。

“有谁会不知道鲁迅呢?我从未见过他,但大家都知道鲁迅是人民的朋友。我们共产党人都非常爱戴他。”

后来,消息传到了保安(在陕北的红色“首都”),一定引起了大量的同样的反响。我听说在整个红色中国都为鲁迅召开了追悼会。不久前,我读到了《红色中华日报》发行的一份特刊,专门纪念自革命开始以来,中国产生的两名真正的伟大作家之一的鲁迅。

最近,当鲁迅在上海安葬时,人们看到了一个在私人葬礼中罕见的场面。无数衣衫褴褛的男人、女人和童工——他们的双手由于在缫丝厂、纺织厂和喧闹的都市中昏暗的车间里辛勤劳动变得粗糙了,他们和成千上万个双手柔软、受过教育的人们——作家、编辑、记者、科学家、教师及大批虔诚的学生汇集在一起,伴随着鲁迅的遗体来到他的墓穴。穷人热爱他,因为他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学生热爱他,因为他是他们在文化知识上的良师;知识分子喜爱他卓越的领导,甚至一些银行家也对他才气横溢,辛辣的笔锋表示敬意。上海有名的金融家章乃器因而赞扬他说:

“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替被压迫者说话,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写作并不是为了泄私愤,也不是为了使有闲的人们欣赏,他只是写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整个世界都在哀悼鲁迅,在他的墓前,来自各国的人民——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的民众聚集在一起,鲁迅的精神将永存……”^①

作家、编辑、教员、教授和科学家们在各个城市举行追悼会,由衷地写下了颂词,赞扬鲁迅作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的崇高品德。许多人远道而来,只是为了能谦恭地加入行进的行列,这个行列弯弯曲曲地通过了那些能目睹这一葬礼的拥挤的街道。这是一个使长期被压抑的感情大迸发的时刻,哀悼鲁迅具有双重的意义,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动。每本杂志,每份报纸都开辟专栏公开赞美鲁迅,而当他活着时,

^① 原文引自章乃器《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载1936年10月12日《大晚报》,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第1辑。英译有改动。

却只有少数编辑才敢于发表署他自己名字的文章。

鲁迅的去世最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的青年,他们深深体会到这一巨大的损失。他们哀悼鲁迅,因为他是他们的导师,是惟一能够理解他们的人。从广东到北平,从上海到遥远的成都,在苏区,在白区,学生们举行群众集会,宣誓要发扬鲁迅的精神。毫无疑问,鲁迅是最受他们爱戴和尊敬的一位文化领袖。在北平,学生联合会发表了一篇特别献辞赞颂鲁迅,并向全国散发了一本纪念册。在上海,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这样向鲁迅致词:

“先生,你竟真的离我们而去,我们竟真的丢掉你的领导了,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大声地呼号,但任凭我们喊破了宇宙,终于也听不到一个字的回响!我们再也禁不住嚎啕大哭了,我们情愿把我们千百万人炽热的血来重暖你那冰冷了的躯体!

“先生,我们听到你的回答了:‘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是的,你已经建了这塔的基础,我们将去建造它。‘咬定了真理,辨明了是非,铁一般顽强地战斗前进!’先生,你那贯串在全生涯的那一条泼辣的直线,将成为我们民族列车的轨道,将成为我们历史工程的指针!”^①

为什么鲁迅会如此深受人民的爱戴?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偶尔会出现这样一类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代表,他的一生如同一座大桥,跨越了两个世界,鲁迅就是这样的人,伏尔泰也是如此。我认为雪莱、托尔斯泰、沃特·惠特曼、马克·吐温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他所处的时代都是这样的一些代表人物。只是因为时代接近的关系,人们才随口把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不过,鲁迅远远超出了这个称号。也许,更确切地说,应称他为“中国的伏尔泰”。但事实清楚地表明,最恰如其分的称呼应是“中国的鲁迅”,因为鲁迅这个名字本身在史册上就占有着光辉的一页。

鲁迅的祖父是一位翰林,这是大清帝国授予的最高学位。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一个学者,也是一名官员。由于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决心把鲁迅培养成一名学者,因此,直到清朝垮台,鲁迅一直受着青

^① 引自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哭鲁迅先生》,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第3辑,英译略有改动。

年人所能得到的那种传统教育。不过,也许是由于在青少年时代曾度过一段贫苦的生活,当鲁迅在政府部门就职时,他从未利用自己的职权去榨取人民的任何财富,而是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只是利用自己的职位去抨击那些贪官污吏,因而也就失去了这一职位。

几乎像林肯·斯蒂芬斯作出一项社会决策那样,鲁迅在社会革命中慢慢地,一步一步发展了他那激进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只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的观点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而这些作品又大都用笔名发表,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有许多人认为鲁迅的死是一个醒悟者的死的原因。他很早就抛弃了幼时受到的封建王朝的教育,几年后摆脱了愤世嫉俗的思想,几年后,又进而超出了怀疑主义——一直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几乎全都怀疑,甚至“怀疑于自己的失望”。他不停地写着,表达自己日趋成熟的感情、知识和洞察力,使批评的锋芒更尖锐有力。最后,当他快 50 岁时,支配他的则是一种取代不了的恨,痛恨一切在生活中他认为“违背社会准则”的事。

最初,他恨封建主义,恨虚假伪善,恨贪污腐化,恨欺骗撒谎,鄙视资产阶级的傲气,鄙视任何形式的奴役。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邪恶,就如第一次读但丁的书时,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异端”。他恨残暴和不公正,恨愚昧无知,恨折衷妥协,但是使他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把所有这些社会的罪恶归咎为“自然”的宽恕和容忍。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有一次说道,他爱耶稣,但是憎恨基督教,他相信耶稣和列宁一样不能容忍邪恶,而基督教会比魔鬼本身还会宽容罪恶。

没有什么能比他留给自己妻儿的遗言更能显示出他的个性:“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根据这条准则,我们能探索出许多鲁迅的创作动机。他要“建造一座新的塔”的决心来自于他对过去一切无用的习俗的极端憎恨,他的工具就是“白话”,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使白话成为国语。鲁迅把锋利的笔蘸入了取之不尽的“无情”的井内,写下了讽刺性的“随笔”。那些有力的杂文奇特地激起了读者辛辣的笑声和对腐化、虚伪、野蛮的义愤。

鲁迅早期学到的医道并未完全荒废掉,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他给中国文学施加了手术刀带来的那种新的解放的影响。像外科医生那样冷酷无情,当他一旦在对社会的剖析中发现了坏死的肌肉和毒瘤时,就用

医生那干净、利索的动作,迅速地把它们剃掉。

当然,在他的性格和作品中有不少缺点,从批评的角度看,这种冷酷无情很可能是他主要的弱点,无疑地,这给他的思想和作品带来偏见,也严重地阻碍了他的才华的发挥,但他完全意识到这些偏见,对此深信不疑,他还能向你追溯出它们的历史背景。他确实从心灵深处信服他所爱、所鄙视的一切。我无法告诉你这在一个天才的中国人身上是一种多么罕见的品德。由此,他深信他是在为世界上的一切好事而奋斗,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目的,这给他的内心带来了安宁。我相信,他正是在这种安宁中死去的。

有人曾说过:从一个人结交的朋友中可知道他的为人,但他与那些人为敌却能赢得人们的爱戴。我有一种感觉,鲁迅对此将会报以赞同的微笑——即使在他的例子中,历史也许会推翻这一警句,因为现世的敌人早晚要死去,而鲁迅对他们的抨击将永存。

梅琪 译

(《民主》杂志 1937 年 6 月 8 日第 1 卷第 3 期)

鲁迅印象记

[美国]埃德加·斯诺

当我还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就开始同一位姓姚的合作,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而我到了北京以后,就邀请姚北上,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姚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从来没有出过国,但他精通英语。此外,他也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这在基督教学校出身的中国人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像那时候所有的中国作家一样,他的创作报酬少得可怜,因此他基本上是靠把外国书籍翻译成中文为生——甚至是鲁迅,情况也是这样。

在上海,姚和我同鲁迅多次见面,那时候,我们计划把一些现代的白话短篇小说翻译成为英文,结集出版,对此,鲁迅热情地给予支持。

我会见鲁迅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问家和伟大的作家了。鲁迅那时候五十多岁,身材不高,皮肤带浅黑色,目光明亮而温煦;他正患着医不好的肺结核病,看样子不久于人世了。使人惊奇的是,他要避居法国“租界”,而他所写的大部分著作,也为国民党政府所查禁。

“阿Q”的故事,通过阿Q在第一次革命(译按:指辛亥革命)时期里的经历,显示出那次革命完全没有扩展到人民当中去。在西方文学中,捷克的古典作品《好兵帅克》庶几近之。但是在混乱的局面里,帅克至少在军队有个托身的地方,而阿Q则了无寄身之所。阿Q常常遇到挫折,他通过无知和迷信来看待世间的一切事物,他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可是每一次都像哲学家似的把失败解释成为胜利。阿Q没有犯什

么罪而被处死，甚至在临刑前，他也说出半句自己不解其意的戏语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鲁迅说，“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既然国民党已进行了第二次革命了，”我向鲁迅问道，“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

“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正是通过鲁迅(还有孙夫人)，我认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年轻作家和编辑。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大都不知名，但是我发现，他们在思想比较正派的中国青年中，是很有名望和影响力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就像鲁迅一样，过着避难亡命的生活，他们办的刊物和出的书籍，遭到了查禁。

姚和我合作着手翻译鲁迅的作品后不久，他就因事要回到上海去了。姚离开北京以后，在我的私人中文教师和几位中国学生的帮助下，我继续探索用本国语写的中国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它并不是常常值得写的，但是它对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它从多方面揭示了同我年纪相仿的中国人的心情思绪，使我认识了作者写这些作品时的若干情况——经常担惊受怕，失望与希望交织，几乎常常过着半饥饿的生活。这样一来，我也就从中得到了教育。

《亚洲杂志》的编辑采用了许多这类的翻译小说，这对我是一种鼓励。约翰·戴伊则把它们结集出版，题名为《活跃的中国》。作为艺术，这本小书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是中国文学中抗争和同情的现代精神日益增长的重要表征，是要求最广泛规模的社会公平的重要表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第一次确认“普通人”的重要性。

在尼姆和我编纂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俄罗斯文学早就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为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所认识不到的。

192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遭到官方查禁。许多学生甚至因藏有《战争与和平》等书而被捕。其后,国民党的“禁书目录”,扩大到了德莱塞、萧伯纳、厄斯金、考德威尔、辛克莱·刘易斯、约翰·史坦培克等一长串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藏有“危险”书籍的人,可能被监禁,或者遭遇更坏。

我自己所藏的秘密书籍和刊物,日益增加,不久,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常来借读了,他们渴望读到珍书和禁书。燕京大学是一所上层阶级的大学,就读学生照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随着日本人对华北的占领,一股激进主义的浪潮乃在那里翻滚。到了1935年,燕京大学出人意料地成了学生抗议的发祥地,它触发了全国性的“青年造反”浪潮。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版)

中国的伏尔泰

——一个异邦人的赞辞

[美国]埃德加·斯诺

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坛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可以比拟于:苏俄的高尔基;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罗曼·罗兰;巴比塞;今日的 A·纪德等几个仅有的、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的伟大作家。他曾在中国革命的几个不同的阶段中生活过来,他的小传不异是一篇记载那个“大动乱”的史诗。从 1917 年由他建立了“白话文学”的基础,他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导,直到逝世。虽然他羸弱的躯体,因了环境和物力的限制,不能胜过严重的“肺结核症”的折磨,但在精神上,他是始终不懈的以勇敢而坚定的步伐,迈过那些为摧残革命的恶势力所笼罩着的黑暗而悲惨的日子。同时,正有无数虽具有比较壮健体格的人,却因为思想意志的不够坚强,被摇动而趋于毁灭了。鲁迅的“坚决不移”态度,不仅是激发和鼓励所有为着同一的理想而奋斗的中国青年的原动力,并且增强了所有的友邦人士一向对于中国前途的信念。所以,我们应当为中国失掉一位刚强勇敢的革命志士而哀伤,因为他已立够了不可磨灭的战绩;所引以为憾的,是他不能活下来看他曾出力完成的中国民族光荣的将来。

鲁迅是中国作家在国际上最负声誉的一个,他的作品的一部分——特别是《阿 Q 正传》——已有英、法、德、俄文几种译本。不过,真正对他的作品能有深刻的认识,而作一个详尽的介绍的,只有最近在伦敦

出版的一本《Living China》^①，那是一本短篇小说的集子，鲁迅的作品占了一半，如今，正可以作为对于鲁迅的一个永久的纪念。我总觉得，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可惜关于他一生伟大的事迹，在中国、苏联、日本诸国以外很少人能够知道。好在一个作家之能负盛名往往是在死后；料想不久鲁迅的名字将广为人知，并成为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有一点我愿意唤起中国青年的注意：那就是鲁迅遗嘱中的一句：“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是的，“宽容”是中国的民族病，在目前的中国，它再不能算作一种“美德”，即使在相当的限度内算是一种“美德”。我想每一个稍具头脑的人都会了然罗南(Renan)所说的话：“任何一种德性，如果趋于极端，便流为最卑劣的缺点。”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的，绝不是“宽容”而是大胆的“批评”。这正是鲁迅毕生重大的任务。他以一支尖刻、残酷的笔，冷嘲热骂地撕毁了“道学家”的假面具，针砭了一切阻滞中国民族前进、发展的封建余毒。像伏尔泰写他的“憨第达”(Candide)的动机，是为打破“定命论者”的谬说——永久的“宽容”啊；鲁迅也是借着阿Q的人生观来讽刺中国人的“定命论”对“穷苦”、“虐政”……一切环境的不良。伏尔泰是高喊“反抗”而切恨“宽容”的。是他燃起了法国革命。同样的，鲁迅是更努力地在激发中国大众的情绪来反抗一切精神上物质上不可忍受的痛苦。拿鲁迅与伏尔泰相比拟，真是最恰当不过。对于“封建制度”的抗战中，他们在不同的国度里，却同是一员猛将。在另一点讲：伏尔泰对于当时法国文化上的贡献是“集其大成”；同样的，鲁迅也在文学著作，文学批评，古代和近代艺术上……多方面的努力，并且借翻译及其他方法，灌输世界新知识给事事落后的中国。鲁迅是不甘心于仅仅做一个“文人”的，他在实际的行径中表现自己——不像其他的知识分子。同时，他又是一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

（《大公报》）

^① 《活跃的中国》。

鲁迅的事情

[日本]本间久雄

中国的文学者鲁迅,最近常常被介绍过来。正月的《中央公论》里,佐藤春夫氏译了他的小说《故乡》;同月的《书物展望》里,有伊藤贵磨氏的关于小说家鲁迅的评论(译者按:原题《谈中国现代小说》);本月的《改造》里,又载着增田涉氏的长篇评论《鲁迅传》;而在我未读这些以前,他的杰作《阿Q正传》,已经被人翻译出版了。

我读《故乡》,更读上述的《鲁迅传》,久已忘却的鲁迅的丰采,现在新鲜地想了起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一度 and 鲁迅相会的缘故。

那是昭和三年(1928年)三月初,我因渡欧路过上海时候的事情。事先熟悉上海的内山书店主人,为了我,约集鲁迅和其他代表新兴文坛的三四个文人,在三马路的热闹的一家叫做陶乐春菜馆的酒楼上作一餐的宴会。鲁迅生于1881年,所以他那时候是四十七八岁光景,但看去似乎比年龄要老一些,因此我们常想像他是如同南画(日本画家的一派)上的人物一般的高士或隐士那样的人。

遗憾的是,我那时候对于鲁迅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不能和他谈什么问题。那时他用流利的日本话说,在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国家观念,儒教在现在的中国,也没有多大的感化力,而且代替儒教的何种宗教也没有,中国的民众,在这种意味上,思想的任何依据都没有的。这样一句一句地说着,丝毫不加藻饰。他说完之后,低垂着头,不再言语,忧郁的脸上只有虚无的情调浓厚地出现着。正好像怀疑“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故乡》的主人公的样子。由上述的《鲁迅传》,

知道那时候的他,大约正是为逃避国民政府的缉捕,“用足逃走比用手写作更忙”的时候,因此忧郁的虚无的情调特别显著也未可知。他那时不经意地在我的小册里,给我写了《唐诗选》里充满凄怨情调的“潇湘何事等闲回”一诗,由这事看来,那时候他的心境也就可以了解了。

但总之,《故乡》是有趣味的作品。内容是叙说篇中的主人翁,为变卖房屋家具,回到十数年隔别的故乡,接触着景况依然的山容水态,并遇见所怀念的少年时代的故乡的人们的单纯的事情。技巧比之日本的作家并不特别见强,但这作品,在日本作家却是写不出的。因为篇中到处鲜明地漂浮着中国田舍的情趣、Local colour(地方色彩)和中国独有的国民性的情调的缘故。

我于十年左右以前曾游中国,经过杭州内地和泰山附近的村落,《故乡》里的田舍的描写,常使我仿佛看见那时中国村落的情景。实际上中国的乡村,皆同样的疲敝穷困,和日本的村落不同,阴郁而且停滞,表现着腐败的向没落走去的气氛。居无定所的百姓,四处流转在路边过夜的极多。

我于天未明时从泰安府出发,在登泰山的半途,曾几度因碰着卧道旁的百姓而摔倒。他们是过着不像生活的生活的,完全和我所说一样的蠢动着而已。其结果,正像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漂泊的农奴一般的“今日主义”者,只是相互格斗,漂流到各处去。他们只想利己,在人们不留意的一切机会里,从事于掠夺东西。这事已成习惯,以至于偷盗物品并不感到何等的耻辱。这中国独有的国民性之一端(译者按:此言殊不合理,《故乡》里豆腐西施那样的人物,在日本恐怕也不少,而其军阀的行为更不必提了)在《故乡》里极鲜明地描写着,这篇作品,在这意味上,毕竟是中国的作家才写得出来。

多年以来,鲁迅经历过十分奇厄的命运。而在此次的上海事变,可被置于极困窘的境况里。事变的结果,据最近归东京的上述的内山书店主人所谈,事变勃发时,他又为官宪所压迫,因内山氏之助,才得侥幸逃入日本租界,在某家隐身,现在其近旁一带的袭击的便衣队的流弹,累射入他的屋窗,他若偶一不慎,便有丧命之虞云。如今他到底怎样了?我这里不住地为鲁迅的健在祈祷着。

(1932年5月13日北平《世界日报》)

会见鲁迅的夜晚

[日本]长与善郎

译者按：本文前半部分，作者记述他与长泽千代女士及导游、台湾青年徐炳南，在满铁上海事务所所长石井的介绍下，于1935年5月18日从上海到杭州旅游并住一晚的经过与观感。由于这些内容与鲁迅研究没有关系，故略去不译，而从19日午后他们乘火车回沪时译起。

……归途中，火车到某站时，忽听到像广告乐队那样的乐声。怎么回事呀？只见中国某军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站台上，欢迎着刚刚从上海迎面开来的列车。

“那是干什么呢？是哪个大人物在车上吗？”我向徐炳南君打听。

“嗯，”正在剥着生龙眼肉的徐炳南君歪着脖子想了一下，忽然拍着大腿说：“噢，明白了！那大概是迎葬仪式。前些时候，上海有位著名的报社社长被杀害。听说他撰写和发表了一点攻击政府的文章。他是杭州人……”

“是被判处死刑？”

“唉！就像一种死刑吧，是暗杀……”

“现在还盛行暗杀吗？”

“蓝衣社这个特务组织，您听说过的吧？就像格贝乌（译者按，即苏联秘密警察，ГПУ）那样，他们是蒋介石一伙雇用的暗杀团。就在最近，在天津也有两位报社社长同时被害！尽管其死因是公开的秘密，都知道这是蓝衣社干的勾当。但凶手突然销声匿迹了，而死者也就胡里糊

涂地被埋葬了。”

“不埋葬的话，自己也得遭殃，是吗？”

“那是呀！”

不说一点儿也不会注意，只见到处是屋顶塌落、仅存外廓的砖瓦房和骸骨似的废屋，在一片新绿中述说着“一·二八”事变的往事。过了上海郊区，到达北站，时间刚刚4点左右。讲好7点钟有约会，在这以前打算去商店买点土产，或者把所画的钱塘江、三潭印月等素描根据记忆着上色。但正在这时，新闻联合社的松本君却早早来了。

“啊，回来啦！今天要见的，不管怎么说，都是中国某方面的第一人啊！一定得去噢，因为他是风格独特的人。”松本君所说的作家鲁迅，将出席今天晚上的聚会。

“在北京曾听说，鲁迅是不见客的。不是吗？”

“唉，是不大见客。不过，内山书店老板请他，他还是出来的。因为内山老板掩护过他，还经常帮助他。”

在上次带我去内山书店时，松本君也极口称赞过这位老板。老板夫妇都是基督教徒，在“一·二八”事变时他也坚守在危险区域的书店里，仍像平时一样工作，态度非常镇静。他在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声望。日本的好书渐渐受到他们的注意和阅读，在这方面内山氏的功劳确实不小。听过这番介绍，我就感到即使在神田一带的书店街上，像这样充满优秀书籍——不用说，大部分是学术书籍——的书店也是不多的。内山氏那天正好外出，今晚的招待会我是通过松本君而来的。

在哪条马路、哪家饭店聚会，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仿佛是在像神田的神保町（译者按：那是东京著名的书店集中地）那样热闹的——但那后面的小路却令人感到好像藏有多么可怕的罪恶巢窟似的——明如白昼的街上。比主人和其他客人都早早登临此楼的松本君和我，便先坐在大长凳上，眺望那五光十色的上海的夜景。

接着来这里的，是留着散切（译者按：这是日本江户时代盛行的一种发型）、穿一件毛线衣、一看就像个活动家、很像岩波书店老板的健康潇洒的内山老板，前天见过的和蔼可亲的内山夫人；还有日本牧师某某夫妇，以及也是新闻联合社的庄原君；再晚来一步的，是短个子、粗胡须、风骨凛然、脸色苍白、看上去身体很弱但眼光似乎有点特别，很像我

国的犬养木堂似的中国绅士,与其他两人一起来。不用说,这就是鲁迅。

“鲁迅先生。这位是郑先生,现在最有名的戏剧作家。这位是诗人某先生。”内山老板正在这样作介绍,而松本君却在一旁故意插话:“这二位是全上海最相敬相爱的内山老板夫妇!”这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欢笑。

内山老板果然是个爽快人,当然一点儿也不是正襟危坐开会的样子,而是立刻让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无拘无束,心情甚畅。但虽然如此,毕竟与鲁迅先生是首次见面,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话头。据说,他与弟弟周作人君在性格、主义上都是相反而合不来的,几乎断绝往来。这个,我在北京曾听说过,在这里也听说过。因为我不过是偶尔从日本来的旅游者,便装着不知道这一关涉骨肉间关系的消息的样子,先开口说:“我在北平见到了周作人先生。”

“是吗?”应声回答的鲁迅即周树人,他的日语没有弟弟周作人好。大概因为曾在东北的理科大学留过学吧,语调稍许有点不好听。当然,一般的交谈是没有困难的。周作人君已经在北平的大学里坐稳了教授的铁交椅,家里装有电话之类,埋头于日本文学史研究,沉默寡言,温柔敦厚。而这位作家长兄,却胸中怀着郁勃之火,是恼怒、热烈、神经过敏的某种思想家。这些,在他的生硬的寸言断语中锐利地闪耀着。

“最近不怎么写东西吗?”

“一点不写。什么也写不出来。要写的话,我想写农村。为写这个,想去乡下。但是,这又不行。”

“在这里,言论那样受压迫吗?”

“那是不消说的了!”郑先生以流利的日语插话说。

“如果写一点什么送到报社或杂志社去的话,编辑那里首先就要送去给军方过目。”

“连不是赤色作品也不行吗?”

“即使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也被禁止发行呢!”鲁迅冷笑着这样说。

“这真是昏天黑地啊!日本也没有这样厉害啊!在这里,自由主义的立场,不左不右的个人独立的立场,不是被认可的吗?”

“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可不行。作家们都没法生活,非常痛苦。”

“没考虑去日本工作吗？”

鲁迅对此的回答是，既没有钱，身体也不行。那是根本不考虑的推托了之的回答。这样说来，五十五六岁的他，连吃饭也只稍稍动了动筷子，确实明显地看出他身体的衰老。我忘了自己曾经喜欢过的这位作家的作品的题目，但提到了他写鸭子的可以称作“春禽图”的好短篇，还谈到想读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等等。说老实话，通过自己惟一读过的这位作家的短篇，我曾想像他是一位比较开朗的温和的大作家。我想像他经历过、思考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尽管有烦恼，但从心底拥抱着它，以更深的教养和资历包容着它，一见之下便能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温厚而平易的人。然而事实却相反，实在令人有峻险、阴暗、锋芒毕露的感觉；即使一点儿坏印象都没有，也总令人觉得很可怜。实在想想，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日本，左派因某些言论而被检举；但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只要对国民政府的做法稍微表示一下不同意，便忽然就像那位报社社长一样，被蓝衣社的手枪击中了。问题不是经过所谓检举、审问之类手续，而是一下子便夺去生命。像那些“竹林七贤”，中国历来无数学者名人之流，为免横祸之来，就或者装疯，或者扮傻，隐遁山林。我仿佛觉得，这些事在周围都能看见。在现代中国，这类事情与两千年前，是没有一点儿两样的。

这个，是我回到东京后，在《改造》杂志上读到鲁迅关于孔子的文章，才领悟到确实像他所说的道理。但在会见时，我提到了在济南偶然能听到的“尧琴”。我非常理解那样的音乐曾受到孔子的赞扬、王摩诘的喜欢的原因。那种以清微淡远为旨趣的有如高雅的兰花般的《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曲子，令人难以忘怀。我一说到这些，鲁迅也许讨厌抬出那孔子吧，只是冷淡地应酬道：“好像听人说起过的。”他生在中国，从小就被迫接受最愚劣地形式化了的儒教，对这些的反感是根深蒂固的。这应该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也不能不认为这是很可怜的。

“在来这里的路上，现在如果看到有漂亮的樟木棺材，真想立刻就

爬进去呢!”^①在上饭的时候,鲁迅总算稍稍动了动筷子,并这样说。这一慨叹当然被认为是说笑话。但是,这过于尖锐的虚无性谐谑本身却不是笑话。一座人想笑又笑不出,特别扫兴。

吃完饭,又一起在边上站了一会儿。眼前的砖墙上贴着很大的广告,上面把“Flirtation Walk”这一活动项目译成“月媚花娇”。听说那十字路口的某商店,在二三天前光天化日下被抢去了百万元金银财宝。因此,过路的中国人正在逐个被巡警搜身。只见吧嗒吧嗒地从胸部拍打到腰部,大概是在检查有无手枪吧。在这中国巡警的背后,还站着一个高大的英国警官,握着手枪,态度傲然。这时,还有衣着盛装的中国艺妓姐妹合坐着人力车,叮铃铃地分开人群飞驰而去。

“怎么样?这就是上海之夜!为帮助消化,稍微走走看看好吗?”我听这样说,便与松本君等人再次上了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马路。

“灰暗,确实太灰暗!从前可并不是那样使人感到阴惨的人啊!”松本君一边走,一边这样谈论厌世作家鲁迅。而我呢,在这个夜晚总是感到有一点失望。

陈福康 译

(《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

① 鲁迅在1935年8月1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还说:“……还有乌丸求女的文章,朋友剪送给我,我转给你。但其中引用长与氏所写的‘想爬进棺材去’云云,其实仅是我所说的一部分话。当时,我谈到中国常有将极好的材料胡乱糟蹋掉的事情,作为一个例子,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例如把黑檀或阴沉木(类似日本的埋木,仙台有)做成棺材,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玻璃橱窗里,用蜡擦得发亮,造得十分美观,我经过那里一看,对那种巧妙的做法颇感惊奇,就想爬进去了。’然而那时候长与氏不知是正同别人谈着话呢,还是想着别的事情,只摘用我末尾的话,就断定‘阴暗,阴暗’。假如我突然就讲那样的话,那就实在太愚蠢,并不仅仅是什么‘凶险,阴暗’的问题了。总之,我与长与氏的会见,彼此都不愉快。”

回想鲁迅

〔日本〕长与善郎

虽写《回想鲁迅》这题目，实与鲁迅并无如斯交谊的关系，而且尚未读过他多少著作。仅在某杂志上看了《鸭的喜剧》一篇，使我联想到沈石田画鸭的春景图，觉得都是霭霭好感的小品。知道现代中国还有这样的作家。

其次，昭和十年（1935年）晚春，在北京与现已作古之故友同盟（当时的联合通信社）山上正义君晤谈，据谓在那前日，曾与钱稻孙等人在某宴席上识面，谈到周作人，说乃兄鲁迅已成了声望极重的作家，其代表作《阿Q正传》几为今日中国知识青年无人不读的文章，乃弟周作人却与他性格相异，思想、立场也不同，兄弟殆近于绝交状态。

但我见的周作人，也是一温厚笃实的学者。我感到或者中国人是难知其腹怀的，因思虑用心过深，轻易不露情热，也未可知。

后到上海去，也是同盟的一位松本君，力说应该去会鲁迅一次。据说鲁迅轻易不与人会面，但有内山完造氏的介绍，是不妨的。因在上海事变时曾得内山氏援护，二人交谊极笃。幸内山氏，亦以为然，于是商得本人同意，与鲁迅及其他作家数人，得有一夕聚餐，关于这前后经纬与印象，我已在数杂志上写过了。

我对他人于鲁迅之宣传，虽非无视，但此次会面，事前确属漠然，并未有极大热心。他那时五十五六岁，面色苍白，仿佛犬养木堂翁瘦弱的形态。走进来时并无威肃堂皇的丰采，但一见在群众之中是别有异人的地方的，我立刻就感到了这是一代伟大人物。在有如田园诗人的神

情里，有着志士的壮烈的魂魄，他沉暗又光亮的双眼，更有着牵引人的力量。

然而他心身衰疲，甚至菜肴每每落下箸去，健康已有不能胜任的样子了。对他一无所知的我，感到他何只于礼教，即对孔子也从不肯予赞颂的，不禁吃惊。说到国民政府连契诃夫的没有什么相干的小说也禁止，所有的新闻、社论都非经过官厅的眼睛不可，他总是显得慷慨激昂。并且说 he 要想写时，一定要写关于农村的东西，但现在他却不能，这又使他慨叹了。他这种愤世的倾向，不为无因，这是使我同情的。

我稍有详知关于鲁迅的事情，是在那数月之后，读了岩波文库的《鲁迅选集》的时候。他在发表这些作品以后，如所传说一样正在“用手写的事情不比用脚逃的事情忙”的情形之中，即在这作品里亦以过于警戒慎重的缘故，几乎寓言化了，因使我感到那会与真实有了出入，并没引起我如何期待的兴趣。

像“阿Q”那种并无定见的人，不只中国，在日本也正多。现在重读一遍，或者于他那婉曲的讽刺的表现，有所同情也未可知。但在我，对那直说法的《藤野先生》、《孤独者》、《故乡》、《风波》以及《鸭的喜剧》等短篇倒更有兴趣。而且于我最有兴味的，则是他在试验有无被官厅狙击，以政治犯加以逮捕资格而站在讲演台上讲演“魏晋时代与文学”一题的讲演记录及增田涉氏写的《鲁迅传》两篇。

我曾在汉文及中国学泰斗——自学生时代以来夙所敬仰的小柳司气太博士前请教过：关于汉学与中国一般文化之精密的科学研究调查，是否日本比较中国本国尤其发达？是否汉学学者也是以日本的杰硕之士为多？

小柳先生答的是：“不，没有那事。我已经70岁了，直到今年一向是专攻这一门学问的，但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架上梯子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伟大的学者，在中国还很多呢。只是那样的人，都深居简出而已。”

想来，无论如何，是这道理。假如欧美有笃学研究日本的人，关于日本的故事古典，即或较之日本一般学者知道的多，但我们也不能以为他比我们自己还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日本的。由于那种“研究”得到的知识，是会有想像与架空的地方的。同样，某一土地上的事物，不是那土地上生长的人，总有学问的研究所不及的地方。而且这也常是最紧

要的地方。想到自己那质问的浅薄,就不胜惭愧了。

关于中国的学问、文化,日本以及世界的研究者,概括而对照检讨,从大局上看来,可以比较公正批判的,即是日本因在地理的立场上有着自由便利,所以眼界博达的人较多,这是无可疑议的。但关于中国一国知识的深邃、详尽的地方,无论如何,自有其本土人独擅的。比如做一件调查,文献方面,大抵不外既有之物,但每每在他国人不得寓目的事物里,却含有那民族性格之文化的真面目与时代相应的神髓的。

鲁迅并非本来纯然的学者,而且他当初是修自然科学,又想做医生而到日本留学来的,也不是什么生来的文学者。然而仅仅读了鲁迅那篇演讲记录,就不由深深感到,像那样能够把生人与其所呼吸的时代的空气,以凝成的血滴的具体性,整个刻画描写的这件事,终归不是日本的学者所能作为的。

当然那也由于作家鲁迅天赋的才力,然而魏晋已是一千五六百年前旧事,在描绘那世相上,自不得不赖诸想像,这在日本也属可行。但,鲁迅谈曹操、何晏、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人时,宛如说他邻居,有着尽其底细的确信,在日本人则需完全依靠空洞的想像了。这不仅是关于通晓民族上的人情思考及其乡土历史等事的深浅关系,实在也由于自己身处于与一千五六百年前旧时无异的生涯与忧虑中,所得的体验深切的缘故。

他并不是为准备这演讲而读的,然而仅其参考书目中所举的书名,已可惊人,虽然到底不暇繁举,但关于陶渊明,以至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日本学者的著作,已经很多。由之可见彼等大抵是惟我独善的个人主义者,容易对世间尘俗,加以白眼,但知吃酒,辄弄清谈,这些隐逸,即是中国一流的变态的颓废派艺术家,对于社会国家毕竟是有害无益的存在。他们确是中国一流的特产,但他们能说是单纯的“独善”么?

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军阀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作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

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地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是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是那演讲中的一节（此演讲原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系1927年9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稿。载《而已集》——译者注），在此鲁迅正是讽刺着在现代国民政府下的自己等人的立场。恰如柴云甫在《关于烟草之害》一谐谑剧里所说，在结尾他（鲁迅）写着：“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这样就把要试验他的危险思想，目光炯炯的官宪们，轻轻地用烟就给裹起来了。

在佐藤春夫及增田涉两氏合译的《鲁迅选集》的卷尾，刊载的《鲁迅传》（增田涉撰）一文，已是8年前的东西了，今日提起，或有不无迂远之感，实在那写得生动活现，我以为那较之鲁迅的小说是有着数倍以上的兴味的。增田氏是曾亲炙于鲁迅多年，深得鲁迅口述的人，说是拟以鲁迅为中心写一近代中国成长史，不知这人现在何处。

我以为今日虽晚，但要认识中国的人，必须一读《鲁迅传》这书。

是对于事物的表与里，外貌与真相，一般机会主义者，不知其上等赝品与真实东西的混乱关系的讽刺！尝尽世间嫌恶，寂寞而死的鲁迅，那看法教示的万一，对于今日的日本人，也是一个极好的反省，这真不是他国人的事情啊！

以前我曾以《站在新中国的立场上》一文寄给杂志。在从来反复易姓革命的中国，孙文倡导的国家维新的革命运动，究竟是怎样根本破了型的性质相异的东西呢？在三民主义之中，哪一点日本可以协力援助，而且必须协力援助呢？关于这些问题，我申述过些许意见。但改造新中国活跃过的大人物，并非仅是孙文与其党徒的政治家之属。实际上却是那文学运动的斗士们。我应再添加一句是关于这事的重加检讨是必要的。

关于胡适及陈独秀，有许多褒与贬的话，我虽不详知这些，只知道不管他们是何等人物，抑或于日本是如何厌恶的敌人，我们也不该以小

乘的敌忾心与幼稚的私情去观察的,尤其对于胡适打破中国文学上由来的陋习这功劳,是应该认识的。

文体用白话文,即所谓言文一致,这不啻去使思想的表现自由、准确、真实。不仅排斥了无意味的美丽词句的夸张与传统形式的虚伪。那夸张与虚伪正与科学制度的不良的政治组织彼此关联,而那政治组织又与中国民族更生途上的障碍——腐败封建的家族制度及其保守道德等等礼教互相结合。企图于这种特殊、复杂的宿弊,解放中的人心与文化的这种文学革命运动,当然要与政治革命呼应而起。这文学革命理论之最初的实现者鲁迅和政治革命的先驱者孙文,不期同是由研究西洋医学出发,也可以说是兴味极深的了。

鲁迅想到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改革是由于兰学(荷兰来的文化——译者注)的西洋医学滥觞而起,这即是他志望于医学的动机。但他后来把想由医学拯救中国的希望,转在精神上的医学之文学上了。

从独善主义每每成为常习者的日本文坛的风气看来,鲁迅他们这种行动的态度,是劳苦已极的。也许以为在一个诗人、艺术家,这是一种全不必要的烦累吧!这也许是对的,但,这种事也是由于人的命运使然,鲁迅并非有所嗜好而敢然投身于这赌命的烦累里。

只是,在他那样的立场上,政治的问题也即是同胞全体命运的死活问题。似是在人上具有自然的同情,正义感,爱国心,而对于虚妄,伪善有所愤激的明彻知性人,并且当这祖国存亡危机万千的时候,看清了那原因与趋向,他就不能以诗人悠然的态度,不去理会这些,而独善其身地混下去了。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这仍是他青年时代的愤慨。他看穿了的这西洋镜,正是当帝制瓦解同时,革命也变成了利于列强各帝国主义之资本主义者的军阀割据的内乱,至于对于继承孙文遗志的国民政府的统一工作,他们这些忧国之士期待渐薄。加之由于蒋介石的苦迭打,他们的深刻的烦恼与危险

便开始了。他还这样说过：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坠到陷阱里去，起初他们说共产党拉了国民党，革命才成功的。因之青年感激，都成了共产党。这回则突然因为他们成了共产党的缘故，一一屠杀起来。在这一点上，倒是旧军阀还比这好——他们（国民党）如果在最初就容共产党，他们的主义，不接近那可厌恶的东西，而反抗它，就好了。所以我说国民党的作法，完全是上了当了。那种杀法也太残酷了。——我自那以后无论如何是厌恶那骗人、把人作成屠杀材料的国民党的。那憎厌不能离去。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

他又破坏了自己的一种妄想。他说：直到现在自己以为压迫而杀害青年的大抵都是老人，所以妄想这班老人陆续死了，中国一定会成了比较有生气的国家，但现在自己知道了却又不然，杀死好青年的大抵都是青年。

鲁迅与孙文有过什么实际上的关系？对孙文怎样看法？并且如果今日鲁迅在世，他将取怎样的立场？这些我都不知道，也不能说。然而我想孙文与他都是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些理论的，但毕竟并未成了那些主义的党徒，他们同时洞悉中国历史的国家实情之纯情的爱国者。像他们那样能够洞察肺腑的人，也不会看不清第三国际的野心的。他（鲁迅）说：在现在的（共产主义）青年里，患小儿病的也极多。

指我为反动，他们什么也不知道，都是自己吃了苦辣，因之一时引起了兴奋的。

然而蒋介石最初聘用了鲍罗廷，输入而利用了战术，军事资金，以至于兵器，忽然一朝又把鲍等一党屠杀起来；乃至为了抗日，为了统一，又行使中国式的方便主义，与共产党拉起了手，鲁迅对这样的国民党，也就只有敬而远之了。想来即或他在国民党的感情上对日本不曾抱有好感。但在看透了自国表里，认清了第三国列强那些黑心的他，结局不免是孤立的，更加深了他的懊恼的，因之他已先由这不能与之周旋酬酢的现世解放了。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上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

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

一生东奔西走，到处受人排挤，以至于被逐逃亡——在这样生涯里的鲁迅，想起他那疲劳的瘦弱的姿态，和那有如志士的壮烈，而又充满着田园诗人善良情感的一双眼睛，我感伤于他流露出的所有的言语而点头了。

那也就是自中国有史以来，真诚的圣人，君子，忧国爱民的诗人们，所尝尽了的“没有法子”的发散。人怀有着所必有的人的“妄想”与“希望”，在“幻灭”与“幻灭”的演奏里，感到的寂寞的滋味。这比起仅仅由于性格上的趣味，每好摆弄着怀疑、偶像破坏以及厌世家的言辞的日本旧自然主义者，那背景的含蓄是完全不同的。

同是乐天者，前题也有种种不同。同样是“没有法子”，那思想的背景，内容，匹夫以至老子，孔子，也是有着几百阶段的。惟其如此，在那语句与神情之间，才有着那样不同的醇味。

红笔译 1940年4月15日、5月1日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第4卷第8期、第9期）

与鲁迅谈话

[日本]野口米次郎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认定鲁迅是忧郁的。现在,我与他对面坐着,从其外貌上得到的印象来看,他并不是一个绝望的人。我喜欢他的人所难及的小心谨慎。他的以不梳理的头发和不修剪的胡子为背景的黄色脸庞,不是引人余兴的好节目;但是,他看着我并笑着说“今天天气不错”时,从那个略大一点的嘴巴里露出的牙齿,却是很好看的。他的带着小皱纹的细眼睛里,有着无法形容的亲切感。鲁迅,使人感到就像一棵寂寞的但还能开花的老梅树。

在上海郊外的六三园的豪华楼房的二层,日本式的拉门打开着。不热不冷的令肌肤感到清爽的秋天的空气,在净无一尘的席子上飘溢着。紫檀木的大桌子上,正上着一些美味菜肴。我们一面夹筷品尝,一面在这洁净的楼上谈着浑浊如扬子江似的中国的各种现象。如果不是《朝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木下君与内山书店老板的周到安排,今天与鲁迅的会谈就不可能这样愉快地进行了吧。鲁迅一边用手摆弄着小酒杯,一边下断语:“日本人是了解中国的啊!”由这句话开始,他说开了:

“他们不懂,即使孔子,也是与一般民众没有关系。日本人对于孔子,添枝加叶,把他夸张为中国道德的老祖宗。孔子是逃避现实的文人。他为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他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吧?但是,有趣的是孔子老被政治家利用。在中国,革命一兴起,首先第一件事便是着手打破他的偶像;而当革命最终不成功时,

这回则是相反,要开始褒扬他了。现在,国民党拼命宣扬孔子,这不过表明了他们如今已走到最后的绝境了。”

“政府对你的压迫,还是那样厉害吗?”我问他。

“在中国古已有之:权势者把学者集中起来,然后让他们写文章;如果文章中有似乎反抗的语句,权势者便立即将这个作者杀死。在中国,其他国家很自然的事情却不能自然地去做,而其他国家不可能的事情却是可能的。我不明白现在的政府为什么恨我。我猜想,大概是我的正直行为不中他们的意。我想使国家尽量好一点,但政府官员却随便怎样都无所谓。我同情自己的同胞,拼命想使他们多少觉悟一点,但政府官员却安于现状。我为中国的将来担忧,但政府官员却只考虑眼前之利。”

“我曾以为你是一位虚无主义思想家,原来你是一位爱国者啊!”我吹嘘他几句,并静静地盯着他的脸,等待着他讲出些什么来。鲁迅说:

“你的英文诗集《来自东海》在读书界引起轰动时,我正在仙台学医。我曾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借助于科学之力。然而,我在日本住了八年后回国,觉得还是应把更多的人作为工作对象,便搞文学了。如今,相信我的人年年增多,对此甚感欣慰。”

“冒昧地问一下,稿费收入如何?在中国,搞文学能吃饭吗?”我问鲁迅。他低声笑着回答:“唉,不能吃饭啊!”接着这句话,内山老板说:

“鲁迅先生也好,其他人也好,只要作家乘坐汽车而让出版商看见了,出版商就会向他们大嚷:‘你连汽车都坐得起,稿费之类就不要了,不是吗!’在中国这个地方来来去去,如果没有当强盗的勇气,是不行的啊!”

“真是这样!”鲁迅叫了起来,“从古以来,在中国,成功的不是强盗便是近乎强盗的人。灭亡了元朝的朱元璋,成了明太祖,在中国历史上大名远扬。但其实,他不过是强盗中的伟大者、最大的谋反成功者而已。中国的狂人都梦想当皇帝,那是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榨取。在中国,谋反也成了一种商业,至少是一种有趣的竞戏。最近,更有不愉快的事,那便是要将这种榨取合法化。现在的财政部长,要在他56岁生日之时聚集10万元巨款。就说他终于长命活到56岁,高高兴兴地收集并交付10万元的愚民们在哪里呢?这个,不是巧立名目的榨取又是什么

呢!”

“正像鲁迅先生说的,中国越来越走向沙漠化了!”内山书店老板大声说。鲁迅又说:

“可怜的是一般的老百姓,不过,有一点是幸运的,那就是他们与当前的政治完全无关。他们对谁掌权不掌权这类事毫不关心,像蚂蚁或者蜜蜂那样生活着。他们是与政治无关系的存在,这是有国家以来便如此的。怪不得即使中国到了亡国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民族也永远不会亡。”

我对鲁迅说:“像英国人在印度那样,如果雇请某个国家来当女管家似的治理中国,那一般老百姓也许会更幸福吧?”他立刻回答说:

“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

我与鲁迅的会谈便在这里打住了。我们走出饭店,一起坐上汽车。鲁迅与书店老板下了车,我和木下君则一起去别的地方。

陈福康 译

(《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

紧邻鲁迅先生

[日本]原胜

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鲁迅先生，既没有军阀那样的武装，也没有土豪劣绅那样的地位，更没有帝国主义那样的势力。他不过是一位被逼困在角落里的文人。然而，正是这位鲁迅先生，他却以不屈的威力使反动派感到恐怖，并且成为进步的、革命的新兴势力的精神指导，成为一种推动力量。

我认为，鲁迅是世界性的天才。与他已经获得世界性荣誉的作品相比，鲁迅被磨炼成的人格，使他获得了更崇高的威望。

我和鲁迅先生是一壁之隔的邻居。我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对文学也颇感兴趣；鲁迅虽然谦虚地说自己对政治、经济动向没有多少了解，但是由于他具有细致、敏锐的观察力，所以我们经常广泛地谈论各种问题。

据说，记录历史人物的言行并加以编辑，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决定以当时与鲁迅先生谈话的日记为中心，编纂一部小小的鲁迅先生言行录。

平素的鲁迅先生和他的怀古之谈

×月×日 晴

徒步旅行归来，我的心情非常愉快，但是身体却疲惫不堪，于是一头倒在窗边的床上，开始了我的畅想。拉开幔帘，从窗外飘来了一股无法形容的香气，这是今天一天都缭绕在我身旁的残留在苍穹和大气中的香气。晚报的社会版上，刊登着一幅大照片——“徒步于大自然中”。

我无意中想起了一壁之隔的鲁迅先生，他今天一定没有外出。有一个评论家说，在鲁迅身上，存在着虚无的阴影，这大概是指在如此晴朗的日子，被剥夺了自然、大地和自由，身心受着可怕的威胁时产生的阴影吧，而并不是什么虚无的阴影。在远见卓识和信念之中顽强地生活着的鲁迅先生，尽管不会用那广博的学识和坚定的信念作为盔甲，糊涂地跳上街头，但也不应该是虚无地逃避现实，或者虚无地冷眼旁观现实的人。鲁迅先生并不是不关心现实动态的文人，他的远见卓识和信念都存在于现实之中。所以国民党南京政府和法西斯反动团体，都同样不放松地监视着“先生的动向”，而且把“鲁迅参与”与否，作为衡量进步的文化团体和左翼组织是否反对了政府的标准。当权者甚至忘记了，鲁迅已被追逐到了“都市的堑壕”里。

事实上，鲁迅先生几乎不外出，也没有多少来访者，除了鲁迅去访问中国化的老朋友内山先生，以及几位左翼作家，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访问鲁迅以外，其他就不和什么人来往了。如果把前者内山先生的家比作是鲁迅先生的堑壕的话，那么后者就是敢死队吧。

鲁迅先生总是在家中，虽然中国誉之为世界性的小说家，但是目前一篇小说也没有发表。鲁迅先生并不为了生活而轻易地调转笔锋。不记得什么时候，他曾苦笑着说：“出版社呢，让我写些国民党不禁止的好卖的小说，但是，那样的小说，我绝不能写。”鲁迅经常批评转向者，说他们没有信念和良心。然而鲁迅先生自己，正是一位在信念和良心中顽强地生活着的人。所以，尽管鲁迅只是有时写些随笔，此外不再发表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就像美浓部先生无言的抵抗成为日本自由主义者的一种力量一样，鲁迅先生的存在，对于中国的革命势力来说也是一股强

大的力量。

每当我接连不断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时候,就会恍恍惚惚地产生一种敬慕之情。

夜幕在不知不觉中安然地降临了,鲁迅先生和夫人、孩子以及阿婆在一起的生活之光,深深地被窗帏锁闭着。冲破这寂静,我继续思索着。

“从社会的功利心推论出来的慈善,并没有理由赞美,所以我反抗了。”我仿佛看到鲁迅先生面无笑容,眉尖紧皱地站在厦门大学的讲台上,并听见了他那怀古之谈的声音。据鲁迅先生说,有一次,在教授们的宴会席上,大学的校长对某位富豪的捐赠极力称赞,夸大其辞地赞誉他为中国惟一的伟人。鲁迅先生听着听着愤然了,于是大声地说:“中国有两个伟人在,另一个就是我!证据就是我也捐赠了,这是我出的钱,接住!!”宴席上顿时骚然了。鲁迅给的钱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校长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呢?”鲁迅继续抗争着说。

“某先生是百万富翁,与他拥有百万而捐赠的行为相比,我也按同比例拿出了月薪中的这笔钱作为捐赠,意义应该是相同的。”

鲁迅先生迅速地收起了钱。此后没有多久,他便从厦门大学辞职了。

我一边听着,一边笑了起来。鲁迅先生为了探索真理而产生的如此强烈的意志和斗争精神,打动了我的心。

论中国沙漠化

×月×日 阴

“在遥远的将来,中国如果还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戈壁的沙漠肯定会南移,中国的全土将会被沙石埋没。”

以上所述,是鲁迅先生关于沙漠论的要点。

“是的,根据戈壁沙漠最近发掘来的文物考证,沙漠的下面,曾经是古代的都市。如果是都市的话,那么就一定也有过河流和树木。”

鲁迅先生这么说,可能是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寂寞吧。鲁迅具有某

种革命的犀利的目光,然而这却给他的心灵带来了一丝暗影。听他这样讲,我的心情也很忧郁。的确,鲁迅把戈壁沙漠下埋着的废墟,想像成为当时的都城,并且与现实的中国进行了对照。他接下去说:

“请看看中国广阔无垠的原野、山岭吧,哪里还有像样的树木!山岭是光秃秃的;田野上幸存的也都是些幼小的树木。然而,就是这些为数不多、自然生长着的小树,现在也没有了吧。什么缘故呢?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贫困不堪,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们为了生活下去,竞相剥去树皮食用,挖出树根充饥。民众处于这种状况,中国是长不出树来的,于是政府的植树造林政策也就归于失败了。若要使政府的植树造林政策成功的话,恐怕种十棵树需要有两倍三倍的军队保护吧。然而,如此的军队装备,要占现有军费预算总额的八成至九成,所以想保护树木,就必须增加二三倍的开支,这是政府办不到的,因而对于植树造林也就不热心了。这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多么大的悲剧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对黄河长江所造成的灾害,为什么逐年增加的原因窥知一斑了。没有树木的堤坝是容易被水冲走的,然而,正像这没有树木的堤坝一样,没经济余力的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灾害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也很容易被水冲走。于是,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听到灾后再建设的呼声,能听到的只是逃荒农民惨淡的脚步声和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难民的呻吟。”

“命运注定了的中国的悲剧,如同沙漠化的中国的未来一样,正在发展着。”

鲁迅先生缄默了。

正像鲁迅先生深刻考虑着的那样,中国现代的经济、文化、思想以及各个方面,是中国的悲剧——中国的沙漠化。在中国旷野中竖立着的濒临灭绝的仅存的小树,使得鲁迅先生悲上加悲。当我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凝视着鲁迅先生的时候,他那种纯教徒式的对于祖国的爱,深深地感染了我。于是,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响起了鲁迅先生的声音:“同样是财产化为乌有,我宁愿让败家子挥霍掉;同样都要被杀,我宁愿死在本国人手里。”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已经记不得了。

日中知识分子的合作

×月×日

蒋介石提出对日协调的六项提案。

我紧盯着“北部中国自治运动的进展”这样耸人听闻的字样，今井君雄心勃勃的得意之态，便随即映入眼中。今井君是大朝社的特派记者，他正在把刚刚获悉的蒋介石提出解决北方中国问题的对日六项具体提案的特讯，用急电抢先发回国内。作为他的朋友，我愿为他的聪明和敏捷的活动能力，献上我的赞辞。

晚上，听说今井君抢先发回的特讯，成了日本内地的竞争新闻，被搞得狼很狼狈，实在令人遗憾。

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围绕中国问题的日本特电）很有兴趣，所以就作为与鲁迅先生交谈时的话题了。然而，鲁迅对于日本的新闻记者以及蒋介石对日的六项具体提案都不太重视。因为，蒋介石也好，南京政府也好，他们都没有对内对外发表冠冕堂皇的声明或宣言的权力。而且，他们在执行这些声明、宣言的时候，恐怕连自己说的是什么都会忘记的。如此的背信行为，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劳苦大众对于要人们的谈话、政府官厅的通告，一点也不关心的主要原因吧。这或许也是鲁迅先生不把蒋介石的对日六项提案放在眼里的道理吧。然而，一部分中国的爱国之士，却以激烈、愤慨的口吻，指责蒋介石的对日六项提案是出卖华北的货色。

对于蒋介石的宣言、南京政府的提议之类的东西，在世界上最早表示信赖并且采纳的就是日本了。所以，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背信行为最先表示愤怒并加以指责的，当然也是日本了。在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候，鲁迅先生大笑起来，他说：“完全正确！”说笑的同时，眼角上过多的细细的皱纹，都纷纷绽开了。我也被带着放声大笑起来，整个房间中回响着我们得意的说笑声。在与鲁迅谈话的日记中，我和他如此地相对大笑的情景，再也没有其他的记载了，它在我漫长的中国生活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鲁迅先生对于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是虚心地

毫不关心,也不是说鲁迅先生只是一味地冷嘲旁观中国的国际政治、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鲁迅先生非常思恋祖国,思恋自己的民族。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解放的那一天到来之前,祖国的光明和民族的希望,都是不能想像的。这是一位具有远识、信念的人,冷眼旁观中华民族社会解放之日到来之前的中国现状时的苦闷。他悲哀地说过,中华民族的社会解放如果不能实现,中国终究会变成沙漠的。他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

为实现中国的社会民族解放,现在的日中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是没有力量的吗?我想关于最近由室伏高信和胡适之提出来讨论的日中知识分子合作问题,谈谈鲁迅先生的感想。

“室伏先生对胡适说,日本和中国,日本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共同携起手来,维护东方的自由、遗产和文化,进而为我们的东方世界出现在世界史舞台上而拼命努力吧……听到这种说法,日中知识分子合作将会怎么样呢?……”

正如我所预料的,鲁迅先生用对日中知识分子合作不抱任何期望的口吻,回答了我:

“所谓的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合作,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不是都还没有公开地发表过什么意见吗?尽管日本的新闻界说了些什么,但是其中重要之点是变成了‘伏’字。不变成伏字,就会抹杀自己的良心,歪曲自己的思想,隐瞒自己的主张。这样才能实现中日知识分子的合作吧。我最近什么也没有写,因为也变成伏字了。”

总而言之,鲁迅先生说,像现在这样轻视知识分子,并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的情况下,一点也看不出推动中日知识分子合作的这一国际运动的原动力。

翻译和中国新兴的作家,以及日 中的转向者林房雄……

×月×日

在《新小说》同人的招待会上,听到了给新兴的中国文坛注入了朝

气的进步作家们的具有抱负的革命性的雄辩。散会后，径直来到鲁迅先生的家，薄暮笼罩的路上，充满着冷气。

一敲门，来开门的阿婆，脸上露出了祈祷四海平和的温柔的神情说道：“先生不在家。”于是，我只好回到一壁之隔的自己家中。在空荡荡的、没有一点热气的屋子里，我拆开了刚刚收到的《现代中国》杂志。刚翻开一页，走廊里便传来了渐近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正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踏着给人印象深刻、轻快而有节奏的步伐来找我的。

“真对不起，我在二楼上，阿婆不知道。”

鲁迅先生一面礼貌地解释着，一面走进了房间。

“啊，是吗……”我对他的解释，很觉得过意不去，一面急忙生起火来。我想，单身汉住的没有热气的房间，老年人会感到特别冷的。然而鲁迅先生却阻止了我，反复地说“还是很暖和的”，让我放心。

我一边和鲁迅先生谈着话，一边看刚才那本《现代中国》。我说：

“这里登着译成英文的您的《阿 Q 正传》呢。”

“谁翻译的？”

先生面部紧张地读起英文的《阿 Q 正传》来，一会儿，用温和的口吻说：

“谈到翻译，外国的作家或作品，有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有的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听说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这对于作家来说，是很不放心的。这位翻译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他自己也是作家，所以不会有损于我的作品吧。《阿 Q 正传》已被译成俄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日本的译者我还了解。我的作品有井上红梅的译本，还有佐藤春夫的译本，比起来还是佐藤春夫译得好。什么缘故呢？因为佐藤春夫自己是著名的作家，从而对我的作品有较好的理解，并且译得很生动。”

“是的，我也是从佐藤春夫先生的翻译中熟悉您的一个读者。”我一边把鲁迅先生说的话作为真理来思索，一边这样说着。于是鲁迅先生更进一步地谈起他关于翻译的理论。

“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是很出色的，但是小林的文章，现在由中国的翻译家介绍的却很有限。一般说来，他的作品不够亲切，也不具有普遍性。例如，《蟹工船》已经出了中译本，然而，中国没有‘蟹工船’那样的

东西,所以找不到合适的中文对应词汇,于是译者就按原名照样地写出来。这种译本放在店里,因为读者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也就引不起兴趣。”

“最近中国新兴的作家怎么样了?”

我转换了话题。

“现在中国新兴的作家,使我不得不惊奇。”

鲁迅先生一开始就这样说,露出了辛辣的批判的舌锋。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从天上落到上海滩的,不在地上生根,没有生活经验。他们是中国人,但是却不看中国一眼,更恶劣的倾向是,他们不了解中国。所以他们没有个性,他们的作品也没有真实感。”

鲁迅先生简洁地指出了中国新兴作家的弱点。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参加《新小说》同人的讨论会时,我耳闻的思想、感觉、主张和语言,都不是中国式的,而是苏联的语言,法国的语言,德国的语言,英国的语言,美国的语言以及日本的语言。

中国新兴的作家处在这样的状态中,然而,因为他们的指导者是进步的、革命的,所以他们受到南京政府白色恐怖的威胁,被逮捕,被投进监狱,甚至被枪杀。从反动政权镇压下逃脱出来的仅有的“转向者”,把优秀指导者留下来的“文坛苗床”搅乱了,我想,这至少是中国文坛不振的一个原因吧。

“先生,中国的转向者们是些什么情况?”

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转向者,实在是不守节操。他们一旦转向,立刻就靠骂倒以前的同志过生活。这些转向者,肯定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义,更可恶的是,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主张也黑了良心,他们对于思想和主义,都是独善其身的,一遇压迫,便立刻声明转向,甚至出卖同志,为政府效劳……”

“日本也有这样的转向者。”

我话音刚落,先生立刻就说:

“……但从整体上讲,日本的转向者保持着沉默,什么也不说,我

想,这是合情理的。”

“像现在这样敌对的思想 and 主义都在崩溃的时候,抱有不同的思想和主义也不斗争的人,除了沉默,是没有其他出路的。”

鲁迅先生的这些话,我想也表明了他自己的现状吧。

和国民党周旋的鲁迅先生

×月×日 阴转晴

今天,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广东等地,都因为“室伏事件”而骚乱了。起因是室伏高信先生与一位新闻记者的个人谈话被歪曲地报道了。当我与鲁迅先生交谈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室伏先生没有什么关系吧?”

“没有关系。听说陆军武官厅从长崎发出了强硬的呼吁,要求室伏先生返回,然而……您的情况怎么样?”

我把话题一转。

“我总是那样。我在和国民党周旋,但结果还是我胜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国民党现在要对我施加压力,所以谣传我被车撞死了。可是一般的人都认为我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这是有损于国民党的声誉的,因为国民党尽管要对我施加压力,但是还不打算杀掉我。”

鲁迅先生说。

据说因为鲁迅先生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南京政府对他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迫,给鲁迅先生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想这种精神上的苦痛,一定也会引起了肉体上的苦痛吧。

希望访日的鲁迅先生

×月×日 晴

浅间号由香港抵达。

整理好了回日本的行装,立刻又去访问了鲁迅先生。为离别,我感到惋惜。

“马上就要回去了吗?”

鲁迅先生一面给我倒茶，一面问道。

“先生不去日本吗？”我想到离别后难于忍受的寂寞，不由得这样劝诱道。

“想去的，我总想再去一次日本。”鲁迅先生脸上带着幻想的神情说，“现在再去东京，一定会像做梦似的，因为我在东京的时候，还是铁轨、马车的时代呢。”

“是的，今天的东京对于先生来说，一定像是梦境，而且恐怕是比H.G. 威尔斯主义的空想更大的梦幻境界。”

我这样说，是想说明东京的新面貌，煽起鲁迅先生访日的旅情。

“只是……”鲁迅用犹疑不定的口气沉静地说，“我要去也是以后的事情了。”

鲁迅先生到日本去，并没有什么困难之处，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应该去访问什么人，却是件麻烦事情。有的人他不想去拜访，而另一些人又不能去访问，如此的旅行是没有趣味也没有意义的。于是，刚刚被煽起的旅日之情又压抑住了。

“如果先生去日本，打算会见些什么人？”

对此，鲁迅先生回答说：

“秋田雨雀。我不了解日本的年轻人，所以即使会见了也没有话题。如果是秋田先生，恐怕我读过的书，他也读过；而我认识的人，大体上他也认识，所以和他谈话不会缺少话题。”

“但是……”鲁迅先生接着又说，“秋田先生由于苏维埃之友会的缘故，正在受到警视厅的监视呢！”

这真是发自肺腑的寂寞之言啊。鲁迅先生想访问日本而不能前往，想与之交谈的人又不能去拜访，我想这正是侵袭着他的极大的寂寞之感吧。

1936年3月5日

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日本]须藤五百三

我觉得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即以先生日常的谈话看来，先生自少年时代，身体便不见得壮健。

先生自七八岁起即患龋齿，一直到二十四五岁，都在担心脱牙和临时应急，若幸这样的过去了，及至二十六七岁时，终于有全部镶牙的必要了。故先生自少年时代起便不能像其他的儿童似的吃那硬而甜的东西。

因为牙齿不好，常常减削了胃肠的活动力，而发生胃肠加答儿、消化不良等病。所以四十岁左右便患胃扩张症，肠弛缓症和长年食欲不振，便秘等。胃肠时常作痛，每隔三天即须服缓下剂和施行灌肠，努力于通便。

胃肠病最易罹营养不良，而于生成孱弱的体质尤易召患，结局酿成结核性的体质。先生自身于四十四五岁时已有结核，尤其是肺结核的预感了。

然而，当患胸膜炎，用针抽取右胸膜的渗出液时，就担心能否痊愈。当看见右胸膜有渗出液时，先生便说医生曾对他说过左侧也曾患过胸膜炎的，因为不久便好了，所以自己便不担心了。我便对他说，凡胸膜炎总容易酿成肺结核的素因和诱因，两侧患过胸膜炎的人大概是会害结核的，然而先生毫不露出早已意想到在什么时候置自己于死地的必是结核菌的表情。

先生平生很注意于保健，尤其厌恶寒气和煤烟。自本年5月间起，

前面的人家常不客气地放出黑烟来，真气煞他了。

他常说道：“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在先生的小说中很多对于月夜和月夜之主观的记述，也许是一种性质罢。我曾说过恰似日本过去的作家嵯峨个家之对月亮之主观的一样。

在先生逝世之前的一天，和先生谈话中说到先生的身体，若由医生来评论，是筋骨薄弱，并应列举痔核，牙齿全缺，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喘息，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这样我就觉得先生肉体方面，颇有缺损和不全，体力减退筋肉薄弱。要是普通人的话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活泼地继续工作的。不过，先生平日是晚上早睡，每在夜间一两点钟起来工作，读书。他的辛烈的透明冷彻的脑力之能充分发挥，是这结核性体质的特征，又是普通结核性体质所俱备的。恰与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学家子规、红叶、樗牛等相同。我觉得他在玲珑皎洁中发出辛辣的警句，大有故小村侯的句癖。又和这些人的体格相等，而躯干的瘦削及筋肉薄弱的状态也和这些人一样。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力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

然而他对于事物虽有过敏性和敏捷的判断力，可是在治疗上，辛辣的药味一点也不忌避，又如对于注射和痔核疼痛等，不独能忍耐，就是在治疗期间——8个月里面，不论何种治疗，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嫌厌或异议的话。

今年3月他的体重只有37公斤，所以常常述说关于饮食的意见，和谈论香烟的害处及不适之点，但他说惟有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香烟和自己无论如何是离不了的。到后来，结果减至每天吸15支。

要是我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要他限制他所最喜欢的香烟的。现在他走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我曾写过一篇《眺望着紫烟》在报纸上发表过，但是没有精密地描写那结核和吸烟的事情。现在反而感觉着惭愧。

先生在世时曾这样说：受着胃扩张和肠弛缓症的妨碍，每日的食量

不但不及常人一半,就是饮食的味道也尝不出来的。先生在日常食物方面,好像没有什么趣味和嗜好似的。不但心肠淡泊正直,且食用方面也很淡泊,没有什么欲望和嗜好。

先生不只能记忆许多中俄德等国的文学家,且能记忆着关于有名的科学家之年代和事业,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佩服和敬仰。

在平日杂谈中偶然谈及中日问题及文学批评之类的时候,那谈话就好像是先生的得意的小说的主体似的,表面上是主观地议论着;可是,从另一方面,很可以看出他一定是着眼于客观的冷静透彻的批评的。这些都是可以用来肯定结核性体质之脑的透彻过敏的材料。

一天给他拍了胸部 X 光线照片后,说明了他那病灶部。我告诉他右胸的病变部很多时,他便说左边损害不多,还很可以做点事情。并不以为意。他的意志这样的坚强,使我吃了一惊。

然而,因为他的儿子海婴是腺病性的体质,患着喘息病,是很担心的。遇到海婴发热或下痢的时候,先生常常亲自给他检查体温,敷解热药和吩咐他注意饮食等事。为了儿子他可以说是竭尽了他为亲者的慈爱的心力了。

我们为朋友的,是在虔心地祷祝着海婴康健地长大的。先生关于海婴的体质与教育,好像无时无刻不在脑里思量着似的。我们在杂谈中常听到他有这样的话,说:“海婴生来就是孱弱和体质不好,很有点不妥。要是他的头脑属于中等以上的話,我倒很想教他在学问上得点成果,不然的话,我觉得教他从职业方面找出路比较适当。要是体格又弱,头脑又不聪明的话,就打算教他充一员适当的职工……”

先生的死,为什么这么样快地就到来了呢?说起来,是从 10 月 18 日午前 3 点钟起,旧病支气管喘息发作,因为呼吸困难,肺脏组织的抵抗减少了,呼吸困难促迫;因为胸内压亢进,容易引起肺组织的脆弱部自开或穿孔,增加胸腔内气压压迫心脏,引起心脏性喘息,愈发增加了呼吸困难血行异常及障碍。因此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症状剧增,而惹起心脏麻痹,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了。

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会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

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这话我现在尚记忆着。但是,他在10月前就预感到自己快要离开人间了,到这时候他就不去顾他平日的主张,发表他那遗嘱的条文,这事在我想来是有点意外的。

附 记

鲁迅先生病状经过

本年3月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不振,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须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

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粘稠,质量或多或少,发热最高在 37.6°C 左右,毫无自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

胃扩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

3月19日。发热较高,系“消耗性热型”,病者声称右胸下部较痛,于是作突刺试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咯痰有结核菌阴性,弹力纤维甚多。

3月25日。咳嗽,咯痰甚多。

3月28日。第一次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300公分。

3月29日。咳嗽频发,而咯痰甚少,热度仍为“消耗性”,渐次升降,而于 37.6°C 乃至 36.4°C 左右为多,一时进以滋养食物后,保守安静,经过良好,遂停止用药。

6月1日。咳嗽，特别在晚间为甚，有胸内苦闷，食欲不振之兆。承招往诊，察得右胸锁骨上下窝及第二三四肋骨部深处，有繁密之大小水泡声音，睡眠不稳。

6月9日。热度平温，食欲振奋睡眠良好，元气充足。

6月15日。从右胸抽取胸水(第二回)，采得带黄半透明液体100公分。

6月19日。头部沉重而痛，易感疲劳，有轻度寒热。翌日平温。

6月23日。第三次抽取胸水，全量百公分，较前15日所采得者色稍黄而浓。咯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

6月24日(?)病者声称尿量减少，然尿中并无异常现像。

6月28日。因劳动过度，夤夜发热，未能安眠。

7月5日。诊察右胸，觉下底部分呼吸声音增加，尿量亦稍增。

7月9日。热度平温，然有渐次上升之兆，食欲不振，睡眠不足。

7月16日。体热再高，升降于 37°C 乃至 38°C 之间，食欲依然不振，右锁骨上下窝有微小之水泡声音，头部沉重。

7月18日。体重37.8公斤，筋骨毫无肥胖状。

8月7日。右胸下方感到重压，诊察后，有增加抵抗之兆。第四次抽取胸水，呈浓黄色，半透明，200公分。

8月14日。在痰中开始发现少许咯血。

8月18日。右胸锁骨下方之水泡声音减少，尤以较深部分未能听到。

8月19日。从本日起到8月末，体温完全相同，并无异常现象。

9月2日。因过劳，稍有寒热，食欲大振，达平生最高量，精神良好，活气增加，常往观电影，并作轻松之散步。

9月23日。仅觉发热。

10月1日。体重增至39.8公斤。

10月8(?)日。食欲又不振，咯痰咳嗽等如常。

10月15日。体重39.5公斤。

10月8日。自是日至10月16日,甚至良好,急于服药,散步后甚觉快适。

10月18日。午前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6时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管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 35.7°C ,脉细120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鸣,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52乃至46之间,脉软弱,110~114。体温下降,为 35°C 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鸣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pneumothorax)”。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5时20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

1936年10月19日

上海密勒路108号 主治医生须藤

(追加疾病名称:胃扩张,肠弛缓,肺结核,右胸温性肋膜炎,支气管性喘息,心脏性喘息及气胸。)

(《作家》1936年11月15日第2卷第2期)

最后一天的鲁迅

[日本]池田幸子

10月17日的午后,意外地迎接了鲁迅到我们的寓所。

那天从早晨起,鹿地亘和H为了先生的杂感集的翻译而非常忙碌。H说“出去一下子”,我不客气地托他说:“如若到先生那里去,请把《中流》带来。”

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罢,大个子的H跟在后面,鲁迅微笑着走进房里来了。向北的房子里,当时刚吹起来的风不留情地吹进来,冷气从足边升上来。我连忙把窗子统统关上了,只希望先生的病体不受妨害!我们请他坐惟一的帆布的长椅子。

“这似乎是不稳当的……”他亲自拉近了方形的坚固的椅子。我赶快放上了小小的红垫子,同时说有一次H把巨大的身体一屁股坐下去而折断了椅心的事情,他听了大笑。

“请把这个送给日本的朋友。”他这样说,而把《中流》和英文的Voice of China 以及缩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二册一同放在桌上;又说道:

“这一次写了《女吊》。”他把脸孔全部挤成皱纹而笑了。我说道:“先生,你上个月写了《死》,这一次写了吊死鬼,下一次还写什么呢?真可厌呀——”

在今春大病的时候,H和我说过,先生的肺原来是5年前已经溃坏了的;而枯瘦的先生竟还坦然描写死,或关于死的事情,我觉得寒心,可怕,可厌的。

鲁迅笑而不答，突然问道：

“日本也有无头的鬼吗？”

鹿地亘回答道：“无头的鬼没有听到过——脚倒是没有的。”

“中国的鬼也没有脚；似乎无论到哪一国的鬼都是没有脚的。”

以后在鲁迅和鹿地亘之间，古今东西的文学中所记的鬼成了话题。《聊斋志异》、《红楼梦》、《雨月物语》，还有别的没听惯的书中的事情，我忘记了。H和我因为没有听见鬼这种东西被人这样有趣可笑地谈论过，时时发出奇声而笑个不停。

“我回国后在本乡（绍兴）的学校里服务的时候，从学校回家的路是这样弯曲的，”鲁迅以细细的手指沿桌角画了一条半月形的弧线，又说道：

“学校和家里各在一端，夜里黑暗而静寂。有一条斜行的近路，是经过坟墓之间的。某天晚上，在学校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里想：走哪一条路呢？我选定了近路。两边草很高，我依正中的小路走去，忽然看见从正对面有白东西毫不作声地走近来了，他渐渐变为矮小向我这边拢来，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唉呀……我当然不相信鬼类的东西，但也觉得害怕，这里——”他按着干薄的胸部说：

“跳动起来了。我想：还是回头去呢？或者怎么办呢？但我不管心跳，仍旧向前去了……白东西不动……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那里。我怒喝道：‘在干什么呀！’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里之后，还尽是心跳，那似乎是个小偷。”

“最可怕的是日本的鬼。在日本戏里有的，是叫什么呀？是的，那叫做牡丹灯笼……还是御岩。我在仙台时常花费八分钱去立着看戏。可是御岩很脏，是讨厌的。”

“中国的鬼，有更奇特之点……女子常常出来。常有与鬼亲昵的男人的故事。这是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的东西。因为是鬼，只在夜里出来；在不必要时就隐灭了，别人不会知道；而且无需给养。我以前想：若有那样的鬼倒是好的。”

他这样说过，便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们热心谈天的时候，风大起来了。鲁迅时时地轻声咳嗽着，似乎有痰塞上来。我想用空烟盒以代痰罐，但因欲避免使鲁迅心烦，好多

次中止了。

“鬼的时节在日本是夏天，所以在那时候演戏。现在已经是秋天了，鬼要渐渐隐退了罢……”鹿地亘这样说。

鬼魂是隐退了，却由自杀接替它而成为话题。鲁迅向着我是常混入青年女人的语调而说话的。

“现在谈谈吊死罢。这也是女人常做的。在中国，吊死在男子是很少的。据传说，因为死了的鬼魂来把活人哄去，所以有这种自杀。古时王灵官这个人把男吊打死了，所以只剩有很少的了；而女的却没有被打死，所以常常出来带活人去。因此说起吊死鬼，照例是指女子而说的。”

“女人自杀，近来往往吞咽金子等东西。因为金子是重的，停在肠里，引起肠炎。这种自杀，因为不是直接的，而是由炎症而来的死，很费时间，所以有的人弄得不愿意死了。医生用使金和排泄物一同出来的方法来救治。女人等到痛苦停止之后最先查问的事是：‘先生，我的戒指呢？……’”

我们又大笑了。鲁迅先生把现今的一群女人说成一种典型。

由先生说起来，无论是鬼或自杀，说时都没有忘记破坏偶像的意思，启蒙和尖锐的讽刺。他的杂谈写出来后就充满那种激烈的杂感。

“我要静默3分钟。”先生从衣袋里拿出体温计来而说道：

“每天4点钟左右要测一次体温。”他把体温计插进口里了。我们在那时也没有停止谈话。

“热倒没有。”

“时间太短咧。”

“这是因为必须给医生看的，这样就可以了。”他这样说，立刻把体温计装进袋里去了。

话题改换为木刻展览会的批评等等了。

从10月6日至8日在八仙桥的青年会馆举行了“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把德国、苏联的优秀的木版画介绍于中国，把这个艺术移植于青年美术家之中而培养了它的萌芽的人，这是和在别的文化领域中同样，也就是鲁迅。

青年美术家们付托全心于一枝凿和一块木板，默默地雕刻。这里

无需口号的论争,无须政治家的策略。全国的美术家只专心雕刻,而把作品汇集于一堂,并且举行流动展览会,使在全国的都市——直至贵州、云南——都盛开艺术之花。

在中国,学习文字而到能够自由使用为止是要费长久的年月,有许多困难的,以文学而被开拓的民众在现在还很有限。新出的木刻的启蒙上发挥了巨大的功效,在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技术日渐提高,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力群的正确的 Dessin;陈烟桥的舒畅广大;新波的稀有的纤细美;野夫的积极的主旨的把握;李桦的热和力量——我看了这些及其他作品,心里想:这种艺术及其艺术运动不是在中国的一切艺术中最为进步的吗?

“先生,你去看过了木刻展览会了吧。成绩那样好,实在觉得惊异。除了苏联以外的国家,木刻艺术这样进步的地方还有吗!”

“哎,很有进步,我也没有期待能是那样的。”

鲁迅好像快乐地观看自己的孩子们长大的父亲似的眯起了眼睛说:

“不过人的脸孔都像外国人,中国人是有中国人的脸孔的……可是青年们很肯努力。”

其后有了两三个作家的作品的批评。被印像于鲁迅的心里的东西,似乎是 Dessin 正确的,用新写实主义描写的一切作品。他对于旁的艺术,如同对于一切文学一样,不是用理论给人讲解,而是以伟大的艺术家的感觉寻出它,并且给人看的。

我们的谈话似乎没有穷尽似的继续下去。

懂得言语是多么便利呀!我希望和这个国家的其他朋友也能这样自由地谈天,或以文章而被启导,自然把学中国话的困难向先生诉说了。

“我也用日本话写过文章,实在麻烦。不能不一一细想×行的×段等事情。那样的东西,究竟也可以算是日本文吗?”

“怎么不能算,好得很呢。而且有含有以前日本话里没有过的妙味的話,来得很适切……”

“哈哈,连外国话都会创作——实在不敢当……”

先生装起了可以说是满脸胡子那样的多疙瘩的脸儿而大笑。

“我学外国话的时候,当初乱读了很多。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会懂的,所以就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只要多读多译就好,没有别的秘诀的。”

“那么请你们再做工作罢。我先回去……不要送。”

鲁迅喝了快冷了的红茶,阻止 H 去送他而站起来了。我们也站在门口,只有说:“请好好保养!”鹿地亘和 H 立即回到楼上,继续工作。我走到门外再向先生说一声:“再会!好好保养!”已经开步走的鲁迅不再回顾了。

“谢谢!”

只有温和的声音传来。不送他也可以吗?风这么大——为了成都事件、水兵射杀事件等等,上海增加了日本陆战队的步哨,走出我家的弄堂,最先看到的就是巨大的陆战队本部。左右有执枪穿铁马甲的卫兵森严地守着。野蛮的杀伐的气味会激动鲁迅的生病的心胸吧。

鲁迅的心会痛吧!但这种悲痛,总是成为不屈不挠的斗志,对于任何东西都不畏怯地奋斗过来,这是先生的生涯。

狂风要把他的深紫色的长衫的衣裾吹去;而他却毅然头也不回地大步而去。沉静的步调没有纷乱。我自己安慰不曾送先生去。先生是倔强的,身体也不久就会复原罢。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不是这样说明吗:一个被杀害了的青年作家柔石和先生一同走路时,他总担心先生或许被汽车轧死,先生也为他担心,看到他疲劳,先生自己也就疲劳!

我稍抬起脸儿,目送先生一直走出了弄堂的铁门而拐弯过去了。

这在鲁迅先生是最后的访问。是我们最后的会见。

(《作家》1936年11月15日第2卷第2期)

我们最后的谈话

[日本]奥田杏花

这天是17日,神尝祭的日子。

扬子江上游充满着的高气压,起了混乱。从早晨刮起的北风,卷着密云向上海的天空南面吹去。

气温急剧地降至29℃,天空很阴暗。

我站在停晚的北四川路的电车的终点,眺望着火光消失了似的戒严令下的街头。突然,一个五六十岁的孱弱的中国人,在尖利的北风中走来,尘风翻起他的长袍的大襟,飘飘然像风也似的进了内山书店。呀,这不是鲁迅先生吗!鲁迅先生自春天以来,就为病魔所缠,时好时坏,直至今天,那种痛苦的情形,还记在我的心中。

不论是谁,穿着中装或和服从后面受到了强烈的秋风时的姿态,都会有些衰颓之感;可是,今天的鲁迅又怎样了呢?走着的鲁迅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当一阵更猛烈的风刮过时,瘦牛的背影般的他的帽子的边缘,就像船帆似的被卷了起来。

我已经有三个多星期不曾和鲁迅会面了。在这期间,中日的空气失去了安定人心的力量而愈显紧张。我们在戒严令下,揣测着今天、明天地度着日子。

在杭州,蒋××聚集了华北将领,正开着杭州会议,在南京,须×与高××正在重作非正式的会谈。最近,日本报章开始散布出乐观的论调,然而,我总觉得未许乐观,有时与鲁迅谈起,他也同样地漏出中日时局悲观的口吻。

但是像今天还在作外交交涉的当儿,他又将有着怎样的观察,而谈些从报章上看到的新闻呢?最近异常空闲的我,于是就立刻跟随在鲁迅先生的后面,走进了内山书店。鲁迅先生走进内山书店当然并不是为了买书。他与内山主人是最亲密的朋友,不大能够分离的知己,在内山书店中,每日从早到晚,来宾与客人都有着座谈的癖好。中日的文艺家、实业家、画家、各派军人、新闻记者、评论家、旅行者,见面之后就捉住一切的话题加以谈论,然而大概总是讲一些中日问题、经济界的大势、世界上发生的事件。鲁迅先生在写作倦了之后也就是常常来参加的一人。

这天傍晚,内山主人出外去了,由担任管理的镰田氏款以日本茶,我从鲁迅先生的后面以手轻扣他的肩头,他回过头来:“啊!久违了!”他的目光闪烁着,这声音较平时的鲁迅精神一倍,他的健康着实使我安心了。

我还不及等待他坐下,就将以下的话相询了:

“鲁迅君,中日关系你觉得将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鲁迅不论在什么时候,他总不愿人家以“先生”称他,所以我见面时总以“君”相称。他将最爱好的烟卷用手移开,沙哑的声音就从牙齿间穿过粗黑的胡髭发出来:

“这是困难的问题,究竟会逐渐变糟或者变好,是很难说的。第一,不知道日本在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中国在想些什么,不了解内心的人们中间的商谈,是最为危险的。”

鲁迅这样说着,又燃着了烟卷。我在与鲁迅先生谈话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当作是中国的鲁迅的观念。在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中国的文豪,倒不如说他是世界的哲学者。只有这样,才能触到他的真正的面目。要是与鲁迅有一言之交,就会觉得他毫无人间的欲望:不论在金钱,在虚荣。若照佛法说来,他已是遁入了“般若”之境的人了。然而,他的热诚,是在努力着怎样拯救中国的四万万民众。他是伟大的哲人。我得倾听这使人受到感动的毫不客气的谈话。他的说话又与烟一起吐了出来: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比如:一个懦弱的孩

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两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翘起八字式胡须成了一字式而笑了。他这天很早就离座。在走出店门时，与平常一样对店里的人轻声地道声“再见”。我在分别的时候曾对他说：“鲁迅君，今天的天气对你很不宜，请留心别受了风邪。”唉，唉！谁料到这天竟是我听到的鲁迅先生的最后的谈话，竟是永远离别的日子呢！

（《作家》1936年11月15日第2卷第2期）

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

[日本]山本实彦

冬天一个微寒的日子。三个人悬肘曲肱轻松地吃着烧鹤鹑。那天,他脸色很苍白,但情绪却分外愉快,好像从平日的忧郁之中解放了出来。他威严的眼睛眯起来,这是愉快时刻不留痕迹的一种表情。我问他:“在日本什么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微笑着,沉默了一二分钟,回答说:“哦,是江户川河畔迷人的傍晚!”他在那段日子里似乎已经想到自己在人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死亡的预感,好像已在不知不觉间偷偷接近了他的身边。在那瞬息间的笑脸上笼罩着一丝阴云,然而他几次一饮倾杯。说肉的味道很好,不时把筷子伸到锅里。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筷子,没有一点倦怠的样子。各种各样的谈话费去了几个小时,这中间根据鲁迅种种表情的变化,我得以知道他的内心的历史。不过只根据他的表情并不能保证完全准确。而且,从他的谈话来看,现在之所谈与过去之所为,也不完全一致。然而作为我个人,我是想准确无误地把它记下的。

作为他个人,在日本人中有很多交往至亲的人。U^①对他来说是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后援者。U经营的书店及其住宅,也都成了他的避难所。上海事件的时候,他在U的精心保护下,在遭受枪弹洗礼的地方终于安然无恙。尽管如此,他却坚决回避对我国国体发生关系。他的存在像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纵然是这样,对

① U是指内山完造。

于民族的墙壁他燃起人们更加炽烈的火焰。他对民族愿望的了解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在他的脑海中非常敏感地把种种现象清晰准确地映现出来。但是,尽管他的强而有力的愤恨的心在燃烧着,然而却慎于言。这也是给予每个可嘉的对手的友谊。他的愤怒的墙壁,对分寸界限是反复三省的。在这点上,对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一言一行都不能过分,这就把他置于苦恼的立场。这是我和他作各种各样谈话过程中往往直接感受到的。他对我国人的批评的讽刺,也那样洗炼,从中可以看出其深刻性。由此可见,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如果不把民族的墙壁放在眼中,生存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现在,中日两国关系严峻对立的时刻,这就更为重要。在我和他谈话之前,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些事。对于对方深邃的心灵,我自己的心灵能达到吗?我自己对人类的爱和敬和他对人类的敬和爱,在观念的深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和我的会见也许是无聊的。在国际问题上,他经常发挥着非常宽容的心怀。对于民族间的对立,他采取着超然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必然不是这样。在这种的场合,我到底应该怎样捍卫自己的民族的立场呢?首先我必须考虑到这个。他对这些没有一点考虑,侃侃而谈,想来倒非常有意思。谈话中想尽可能回避政治的、民族的问题,而如果谈及到这些,那么在文艺方面的谈话就会不切实,言不及义。他的一生都在和本国的军阀战斗,并且对帝国主义也没有妥协。他谈到自己时说:“唔,我的存在如果方便蒋介石政权的话,就不会被杀,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被假以共产党的口实给杀掉了!他们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马上就会加上共产党的罪名啊!”他在刊行《彷徨》的时候,受到了段祺瑞政府的盯梢。1926年3月终于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因此他只身前往厦门。然而在厦门又为守旧派所逐,到了广东也没有出现使他心情舒畅的天道至理。1931年,他的5名同志被国民政府逮捕,他又幸免于险。保护他的人是很的,每当危险时,消息会很快传给他。在那些黑暗的年月里理应潜入地下,然而鲁迅却没有那样做。可是在他的活动中,蒋政权是疯狂的政权,所以他没有得到一天安心的日子。针对这种情况,他经常注意发表文章时变换笔名。据他说:“我近些时候在中国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回,否则就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被发现出来。前些日子日本某学者在和我见面的时候对我说:‘最近没有拜读到你的作

品呐。’我说现在我写的东西很不少，用的都是变换频繁的笔名。”说着举出六十多个笔名，使那个学者很惊异。不仅如此，他的住所也经常保密。我听着他的谈话，当他说到必须提防不要让特务发现的时候，他愤慨起来，接着又陷入沉痛的思索中去。

他的生活朴素，穿着粗布衣服。总是吸着廉价的香烟，在U的店头叉着腿烤火，看到这个样子会被真的错当成书店的掌柜的。而实际上也真有几次被搞错了。但是，只要接触一次那锐利的眼光，马上就会知道那目光不凡，绝非常人。他的弟弟周作人有一副稳重的中国大人物的姿容，而他却有一副卓越的革命家的颧骨。可以说有着“被追捕的‘目付’”^①的坚强性，气势高大。

今年2月，我到南京和当地的主要记者会见的时候，曾经提议：“政府与政府之间既然正在推进两国的合作，我们也要迅速在两国的艺术上进行合作，作为第一步应该交换彼此的创作。”南京的人们负责推选作品。我回到上海，和鲁迅与U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鲁迅说：“这是规定作品不能作为商品出卖的呀！”我说：“请你担任推选工作吧！”他微笑着，左思右想，说：“有两三个新进的作家可以达到在贵刊（《改造》）刊登作品的水平，但是这以下的某些作家即便是水平低，也请将就着点，从扶植出发还是用上吧！中国的作家是很可怜的啊！稿费收入非常少。”一边说着，我们就达成了两国艺术合作的约定。他认为青年作家是钻在锋刃之下在写作的，难免不能沉着冷静。他还说，这些作家哪怕每月有四五十元的收入，那就可以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也用不着去担心生活问题，而从事于写作工作。可是，他说纵使有这样的困难，他也讨厌同中国政府的交往，同时和日本公务人员的交往他也讨厌。他谈到要是同政权合作，或者由政权去庇护，那么活生生的艺术就会丧失生命。还有，受旧道德统治的思想，也不会产生不朽的艺术。他的作品很容易读，然则其巨大的骨路在任何一篇小品文里都有。他一生奋斗的核心是要把中国民族从儒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他想要写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只想改写几篇。在他逝世之前本

^① “目付”是日本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武士职务的一种名称，主要从事追捕、密探、监察等工作。“被追捕的‘目付’”意即造反之意。

社决定出版的随笔集《忽然想到》两册,我通通看了一遍。约定这个原稿交付的前一天,他逝世了。我在今年2月到上海的时候,在U的书店里,在U的寓所中,还有在新月花坛,在新雅,都和他会过面。就他对于艺术的热情等等作了一般的交谈。他的脸色虽然苍白,不好看,但是万万没想到,仅仅半年,就成了弃世而去的人。

吕元明 译

(《改造》1936年12月号)

谨忆周树人君

[日本]藤野严九郎

往事,记忆是不清楚了。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到仙台的学校确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之岁暮。其后两三年,周树人君作为中国最初的留学生入了学。因为是留学生,所以比较特殊,没有参加入学考试,只一人杂在留级的三十余人和新生百来人中听讲。

周君身材不怎样高,圆脸,是聪颖相的人。脸色看上去不太康健。我教的是人体解剖学,他在教室里十分认真地记着笔记,总之在入学时好像不大能充分地说日本话,听讲也不大理解。好像用功得非常吃力。

于是,我授课完了就留下来给周君看笔记,改正添补他听错了的地方。在异国的天空,东京那里也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但在仙台,前面已说过只是周君一人,所以想来谅很寂寞,但也并没有怎么寂寞的样子,在听讲义的时候是非常努力的。

那时的记录如果还有些什么在,周君的成绩就可明白,但现在什么也没有。记得是不大好的一位。

那时候我在仙台空堀町的地方盖有房子,他也曾到过我家来玩罢,但我是记不起了。倘若去世的妻子还在,会知道一些。前年我的大儿子在福井中学的时候,担任汉文的菅先生说:“写着你父亲的事呢,读读看,假若是的话,就给我问问罢。”于是就借了周君写的书回来给我看,这是一位名叫什么佐藤的人的译本。

其后,约过半年,菅君来看我也说起这话,就知道了周君回中国已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这位菅先生去年离世了。最近姬路师范的教师前

田君也听说了周君写过关于我的事,他对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话说得颠倒了,周君在学校确是待了一年左右就不见了。现在想起来,无论如何,研究医学总不是他由衷的目的罢。他大概曾到我家来辞过别,最后的会面是什么时候,却已忘记了,一直到死还把我的相片挂在房里,真是让人欣慰的事,上面这样的情形,这相片照得什么样子,并在什么时候送给他的,也记不起了。

若是毕业生,也会一道照纪念相片的,但我却一次也没有和周君撮过。我的相片他是怎样拿到手的呢,也许是妻子交给他的吧。这样一说,我倒也希望见见那时候自己的样子。把我敬仰为惟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奇妙。先前说过,我仅仅给他看过笔记。

周君来的时候是中日战争之后,即使过了相当的年数,很可悲痛的是,日本人当时还骂中国人叫猪头三。因为这恶骂风气,所以同级生之中也有这样的一群,对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相看的。

我少年的时候,曾承福井藩校出身的野坂先生教过汉文,一方面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情,所以这在周君就以为是特别亲切和难得了罢。如果周君因此而在小说里和友人之间把我当作恩师谈着,要是早读到这些该多好呀。而至死周君还想知道我的消息,倘有音信,我会怎样的喜欢呢?

遗憾的是,到如今是怎样也不成了。蛰居在这样的乡间,外边的事尤其对于文学我更是门外汉,所以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前几天的报纸上读到一个姓周的叫鲁迅的去世的消息,就想起了以上的事。周君的家人怎样了呢?有令郎吗?

我一边深悼着那以些微的亲切作为那么样的恩谊而感激着的周君之灵,同时敬祝周君的家人永远康健。

(《中流》1937年3月20日第2卷第1期)

鲁迅访问记

[日本]鹿地亘

2月6日,下着小雨。

在约定的时间里,我去访问内山氏。我坐在有大火盆的客厅里,抱着满腹的期待,描画着鲁迅的风貌。鲁迅走近来了;两年前曾住在日本的评论家张君,也和他一道来。我曾请中国话说得很漂亮的友人日高君和我一同去,但由内山氏介绍给我们的新友,都是极会说日本话的。我们见面的寒暄极为简单。

我从什么写起呢?内山氏退出了客厅,现在与鲁迅对坐着。喜悦就像潮一般的激涌着,我完全沉浸在这喜悦之中了。坐在椅子上,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什么时候由那出来的?”

张君先开口问我。我答道:“我恢复自由还不到3个月。我没有想到会得到今天这样荣幸的会见。”我忘记不了垂问我的健康的鲁迅那双充满了挚情的眼。

我必须谈谈鲁迅的眼。

他的眼睛,是怎样充溢着静穆而温挚的情味的眼啊!他的眼就像在底里荡漾着光辉的深泉那样澄澈着。当房门推开,穿着宽大的华服的他,静静地走进房里来的那一瞬间,我立刻就感到了这一点。我和他对坐着,为他那静穆的神情所震撼,就像怕在泉中激起波纹似的沉默着。

窗子被雨濡湿着,窄小而荒芜的庭院,看去很迷濛;这种情趣,使我

们的会见更为从容而愉快。

“张先生在东京时还不曾会见过，是在什么时候回中国的？”

“我曾被捕过，但什么原因也没有。我作了特别的留学，我看过东京的监狱啦！”

张君这样说着，向鲁迅看了一眼，并且笑了起来。

“那才是真正的留学呵！”鲁迅小声地说，也笑了。他的眼角里荡起一阵使人眷恋的小皱，但如泉里的波纹一样，这小皱马上又平静起来了。

我心想，鲁迅的眼就是他的文章。我在他的眼里感到了他那具有东方的深刻之成熟的古典文体，他那蕴藏着激情而宁静的语言，以及他那有如波纹荡漾的流露于文章之中的 Humour。

我问鲁迅中国的作家们现在怎样，有些什么人写着什么好的作品。

“谁也没有写什么。”

我一时呆住了，望着他，但不久就跟着他的笑而笑了。

“谁也没有写作，中国的作家不能写作，我也几乎没有写什么。”

“也是因为受了压迫么？”

“这也是一个原因，但还不止这一点。作家的生活，不断地受着威胁。动不动一点原因也没有就被捕去。作家略想活动……所以许多的人都转向了，一部分的人跑到乡间去，文学杂志被禁止发行，文学遭了灾厄了。”

“左联的活动停止了么？”

“虽有组织，但并无人，作家不能活动。”

我不禁想起日本作家同盟解散时的状况：组织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形骸，转向者日有所闻。1930年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创设，其受难与苦斗的历史，也同样是随着国际的新文化之进展而生的现象，所以有些地方也与日本文坛情况相像。

“日本也是不断地有转向的人呢。”我说，“在日本的文学界，我们的一团，竟被称为转向派。”

“转向派！”鲁迅轻微的笑了。“但总在创作着罢？”

“是的，大家都在拼命地努力着。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虽然免不了

社会的压制,但随着对于文学的理解之成熟,普罗文学之支配的地位,反似强固起来了呢。”

“啊,中国作家的转向,与日本作家的转向不同……在日本,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就叫做转向罢,所以作家虽然转向了,文学依然存在,但在中国就不能这样。所谓转向,是为××××效力。”

“为××××效力!”

“是的。”

他觉察到我被怔住了,一时没有说话。隔了一会儿,他又说到:

“慢慢地变成这样子。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就被释放,那是从前的事;现在却要他们改变文学的思想。”

鲁迅笑了起来,但马上又恢复了真挚恳肃的相貌,低声说:

“渐渐地变成这样子,渐渐地不能写作了。”

隔了一会儿。

“认真地照实写出事实来,那就完全不行。但除这样以外,作家就没有可写的了……作家就不能写作,或则只好借托神话与故事来暗示真实。讽刺发达起来了。”

张君向我说道:“鲁迅先生出版了取材于这样的神话的近作集,那集子的标题,名为《故事新编》。”接着我也说了一点日本的讽刺艺术的问题,并且还谈到这类的艺术团体。于是张君笑着说道:“那团体就是‘桑丘俱乐部’么?”他对于日本的新讽刺艺术家俱乐部知道得很清楚,将“村长”与“收入役”等役员的名称解释给鲁迅听。“啊,是堂吉诃德的桑丘么?”鲁迅也点头说。还问到独立作家俱乐部的事情。

“讽刺文学的产生,有其必然的根据。”鲁迅说:“从历史上看来也可明白……但到了反动更厉害的时候,就连讽刺也很困难。我的文章,有人说是讽刺的。一有了这样的批评,就有作者本意并非讽刺语句,也被解释为讽刺的,而被人说坏话。”

他又说:

“慢慢地达到不能产生文学的时代……在中国,作家已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不作声息了……但反动的波涛,也时有消长,最近也时有新文学杂志问世。”

“好像如此啦。”我点头答着,一边想起前天到英租界四马路的书店

街去，在店头所看到的排列在那里的几种杂志。我还记得在那些杂志中，有不少田汉的名字。

“田汉写作相当多吧？”我问。

“田汉君到处都写文章呢。”

鲁迅淡然地答。那时我实则也像在他的话中听出了冷肃的音调，这是到后来才明白的。

鲁迅说道：“但不久那些杂志也受到压迫，没能长时间坚持下去。人们心想现在太平了吧，但马上就又来了一个反动，中国老是这样的。……”

他又说道：“我熟识的青年作家们最近办了一个叫做《海燕》的杂志。送你一本吧。”

“呵，海燕么？我记得一首叫做‘奥克卡克里’的俄国歌曲。那歌曲歌颂俄国的革命，序曲里面，有卷起暴风的一段，我记得这段里面有海燕高鸣的一句。”

“是的，海燕被称为暴风的前兆。”

鲁迅深深地点头回答。

张君向鲁迅说田汉最近作了一个叫做《水灾》的戏曲，好像在南京上演，问他知不知道。不用说所谓《水灾》是指扬子江的水灾。我到中国的头几天便已听到这种悲惨的故事，如：去年长江的泛滥，产生了叫人不能相信的数千万元的受灾者，失去了家屋田畴的流民奔涌到都市求救，饿死、冻死的尸骸到处皆是。我们还听说了为防止身无分文的农民成为土匪，当局将其××等惨不忍闻的故事。

“水灾，”鲁迅说，“不成，描写水灾的戏剧，不会能够上演的。”

张君说：“不过那戏剧只描写着天灾，内容是所谓救济水灾政策之类的东西。”

“就是如此，我觉得也麻烦……尤其是照事实来写水灾是不能得到准许的。”鲁迅将脸向着我。

“有这样的事呢……军队将修堤的农民××××了，就那样便算是筑了堤。”

“是么？……”

我们继续谈着水灾。日高君举出可惊的数字。据说文学上所表现

出来的水灾,是与实情大相径庭。

“但文学家不能描写公然的事实。作家不能写作,生活也就困难起来。而且,中国的出版家没有钱,支付作家的稿费与版税很不容易。坏的出版家也很多,专门剥削作者。听说在东京著述家是支了出版者的钱而不肯写稿;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是出版者剥削作家。”

接着他说了这样的话:

“有一家书店,出版了左翼作家的书,那个作家去取版税,书店的人对他说,我们书店……你快走吧,钱马上派人送到你府上去。于是作家匆匆忙忙走出了书店,但店主把他吓走后,是决不派人送钱去的。”

我们都笑了。

“不,在东京,也有剥削作家的书店。”

“是么?那么,也有生意不好的出版家了。”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

“所以,我总不让这类书局出版我的书,我自己把它们印出来卖。我写了书,自己来做生意(他脸上浮起微笑)。好像是很赚钱的,但我的生意却从来不曾赚过一次钱。我卖了很多贱价的书,老是亏本。”

他与张君互看了一眼,朗声笑了起来,我们也笑了。我以为鲁迅的所谓“生意”,是“士人从商”的意思,但据张君的说明,并非如此,鲁迅是从未做过生意的。

“鲁迅先生,为使多数的大众能阅读到有价值的书,以低贱的价钱售卖着;原来就知道要亏本的。书的卖价,比成本还低,所以别的书店越多卖一册就越赚钱,而鲁迅先生的书,越多卖一册就越亏本;是一种奇妙的生意呢!”

“不,中国的民众,不像这样,就没有买书的余裕,出得起高价的人们,却又不想读我的书。”

我注视着他的脸,我在心里对他这真正的中国民众的老作家致着敬意。他继续说道:

“这样说起来,我像是有钱的,但实则我很贫穷,没有钱,不过别人似乎不以为我没有钱。×××从前宣传说我在苏联领着钱,说我是卖国贼。后来因为我置之不理,便又说受日本的……津贴……大凡可怕的国家,我都拿着它们的津贴呢!”

大家笑了。笑声止后，他低声地添说了两句：

“不过，我不辩解，辩解反倒使人觉得好笑，也没有辩解的必要。”

中国的文学家是在怎样的过活啊，不，就是日本的我们也过的不是人的生活，靠文学是不能生活的，在中国的困难，似乎更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总之，文学家生活不好过，是因为没有使文学的花朵开放的土壤。尤其是政府对于出版物的方针，极不统一，有进步的倾向的出版物，据说均为各地的×××的机关所任意禁止发卖。作家的路已经绝了，不论是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

数日前，我在上海发行的中国资料月报上，看到一篇由×××的机关报转载的文章，那是由左联转向过去的穆木天等三人的声明之类的文章，很显然，退出左联的人，为辩护自己的退出起见，对于左联作着中伤与嘲骂。在那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好好坏坏的传闻；我颇想知道在解散的当时，左联是如何应付这种败北的局势，我便问鲁迅：

“穆木天好像有左联汇编之类的文章，那文章是怎样地引起问题来的？”

“那是中伤诽谤。”张君与鲁迅几乎同时答。张君说：

“那一切都是虚构。是对于左联的卑劣的中伤，虽然引出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认真地把它当作问题。”

“我以为必定成为问题，”我说：“并且也以为已经成为问题呢。例如，对于××××的压迫失败以后，那样轻易为×××系的机关出版物写文章，一般人对于这种也可说是文学家的节操问题，是作何看法的呢？这是组织上的问题。”

鲁迅平静地以思深索邃的口调回答：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一般人似乎是没有严格的考虑的。引为遗憾的事也很多。……并且穆木天那些人，相比而言没有大坏处。我觉得田汉他们的行径，似乎更坏。”

我虽没有询问，但目下田汉的行动，由鲁迅下面的话，似乎约略可以知道一点。

他说道：

“田汉君不仅是戏曲家，也是自己演剧的剧场人。他能演戏。中国的谚语，有这样的话：天地大戏场，戏场乃小天地。”

我拿出记事簿,想写下这句话;鲁迅和蔼地将我的铅笔与笔记簿拿过去,代我写下了。

“他能将任何给予他的舞台当作自己的天地而活动。”

他的语调,似乎带着他对于×××及其阿谀者的激烈的憎恶与侮蔑的音调。

谈话在继续着。

老妈子端来的红茶,在茶几上已经冷了。窗子外面朦胧静寂而微暗。年轻的店员走来扭开灯开关,屋子亮了。我瞧了一下手表,我们已谈了两小时的话。

鲁迅的谈话之中,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困难的几点,这里我把它写在下面罢。

“新作家,尤其是我们所期待的由劳动者或农民中产生出来的文学家,在现在的中国,是颇不易产生的。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也恐怕不易产生出来,因为生活丝毫不给人以从事文化的余裕,而且文字的拘束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力。在中国,因为那种困难的文字的关系,能够粗浅的看得懂写得出,就要花费初等教育的大半的精力。想驱使文学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是需要许多的教养的。在目前,劳苦的大众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中国的新近作家,都是由大学出来的知识阶级,无论怎样,与劳动阶级出身的作家,是大不相同的。他们那些丰富生活的体验者,如果有了文学的才能,那无疑会产生出伟大的文学来。语言文字上的改良,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黄昏时分,我们满怀着对于鲁迅的倾慕与敬爱,离开了内山氏的宅邸。

雪 译

(1936年5月4日《世界日报》)

鲁迅的回忆

[日本]鹿地亘

葬仪完了,哀伤的群众离开鲁迅的墓地的时候,月光照着那默默地走在矮树丛间的群众。我的肩上,还残留着灵柩的重量,耳朵里还有那充满了挚情的鲁迅的声音。

5天前——10月17日的下午,那声音才玩笑似的说过:“我在《中流》九月号上的遗嘱,你看过没有?”那,我是知道的。不过还没有读过。我是不喜欢听活人讲到“死”的话的,所以那时,也只当是我的师友的不好听的玩笑那么听着。我也笑着说:“在明治中叶,日本有一个叫斋藤绿雨的文人,发表过死亡的公告。”

“噢,那是旧事了。那个人马上就死了吗?”他就问我。

“不久就死了,当然不是预感的死,而是偶然的病死。”

然而,现在,我读了鲁迅写的在《中流》上的题为《死》的文章,不由心潮起伏。因为在他的有特色的带微笑的谐谑后面,随时看得见的悲痛的预感。那里面有这样的话:

“(医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

又说: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吧——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

鲁迅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的“死”，不时地为“死”的阴影所迫迫。然而“死”也不能使他的意气沮丧；反而使他在成遂的事业上增添推进的力量。于是他为那死在中国新兴文化的形成以及民众启蒙的战斗中的一个朋友，自费出版《海上述林》；编就那为被压迫者的解放奉献终身，中国新兴美术上伟大的贡献者德国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他为了中国新兴文学运动的统一，屡次不顾疾病而执笔。他那工作的态度，总是泉水似的冷静，不稍使侧近的人感到一点“焦躁”，我们劝鲁迅休息保养，但是他总笑着回答说：

“面桌执笔，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的时候，是我的休养。若是停止了这种保养，在我是做不到的。”

如今想来，那还是因为他被“死的意识”迫迫着的缘故。可是，那意识既不引起沮丧，也不引起焦躁，只成了为着继续他事业的一种不屈的斗志上的推进力；外观上，只有那贯穿他终生的、“时光之流走”似的镇静而不知停息脚步的继续。在鲁迅，要说到休养，真的惟有“死”才是他的休养。

对待“死”的态度，往往便是对于生的态度。因为“死”，每每是一个人的一生的结论。说到这一点，我要在鲁迅面前低下头来。就在讲“死”的那一天，我们谈到了自杀的芥川龙之介。

“芥川也是不知诡诈的文人。”我这么一谈，鲁迅就肯定地点着头。他说：

“是的，是的。他在那时候，发现了自己所意识的世界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他不能跳过这距离，所以只好死。”

鲁迅理解芥川，认识芥川。他的大陆新村的寓所的客堂里，芥川的全集和小林多喜二全集、高尔基全集等等，并列在玻璃门的书橱里。但是所谓“认识”，当然也是明确地认定了他所走到的地点的。所谓自杀，是对人生感到焦躁。至于连焦躁都未曾意识到的、无动于衷的人，我不想说。为什么呢？正因为现在的世界，才是对于追求真实生活的人们，十足地充满难与期待的时代。

2月里，我第一次会见鲁迅；接触到他那真挚的声音时，我狂喜着，想把鲁迅的“真实”传达回日本。我问他，我把刚才听到的话照样传达过去，“没有什么麻烦吧？”

“没有关系。我是不怕死的。”这是他的回答。

这一句话，贯穿着他的全事业。

《改造》四月号上《我要骗人》的一篇文章里面，写着“用血写添几句话的预感”的话。所谓“血写的预感”，我觉得，便是每每用生之终息的预感来对付一桩桩的事业。所谓拼了命的事业，换一句话说，所谓一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便是那能以他的事业在自己的一生中打上终止的符号的，不留后悔，不感焦躁，泰然处世的，最充实的生活态度。

因此，鲁迅是不焦躁的。他常满足着自己的死会是填平后进者的进路的一块土。他在1919年便已这么说：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这是前前后后鲁迅的一贯的处世决心。

每当我与鲁迅谈话中感到这决心的时候，便羞愧地想起一个回忆。1934年，我因为下狱而不得不停止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心想：“我还有很多很多工作得干吧！”我感到一股剧烈的焦躁。这么想着，再回头一看自己过去的工作，那简直是被焦躁的鞭子抽打得混乱了的挽马的足迹。我从我的师友学习得的，铭刻在胸中的教训，便是这。那是无论何时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打上终止号的。不懈怠、不焦躁的生活，即是既无路草又不跑步的，如时光之流走似的一贯的生活。

鲁迅玩笑似的说到死；就在最近，我也看不见那鞭策鲁迅趋向终止号的“死”的阴影。

而是——好像一株活尽了命数的古木，在意外的瞬间，突然倒下了。遗下的话是这样：“忘记我，尽管自己生活。”那好像是古木折倒的声音，是一句简短的言语。他在死的瞬间所期待的音响——怕是那渡过用他的死填平了的深渊的、下一代的、年轻的足音吧。

关于鲁迅的事业及其意义，我不能在这有限的篇幅内说尽。想说的只是，谁都知道的，他在生的时代，是被传统和虚伪束缚住的老大中

国的苦闷时代。是为了新中国之诞生而战斗的时代。他为毁灭旧时代,为了新时代而斗争。他的足迹,是新中国成长的足迹。在文学方面,白话即语言方面,绘画方面,在文化的全领域内想探求新时代诞生的事件中,到处脱不出鲁迅的名字。他的名字是新中国的标帜。那么,我们来检查检查那终于倒下来的古木吧。那上面数得出致密地积叠着新中国历史的三十余年的年轮。

那年轮,是不懈怠不焦躁地一步步堆积起来的,致美坚实的,事业的堆积。我在鲁迅坚持不懈到最后的、最近的文学讨论上,也想到这事。有时他给那伸展着的年轻一代中习见的、想飞越坚实致密的一种焦躁加以一击。这一点,是尚未了结的问题。年青的一代是应该解决的。不过,当解决的时候,鲁迅教我们不焦躁不飞越地堆积上去的、一贯的教训,仍然非把它奠在根底不可。

17日下午,是刮风的日子。我目送着鲁迅和我们分别以后,在风中回去的背影。鲁迅连头也没有回。他笔直往前,一步一步地迈开那贯彻他终生的,平静坚定的脚步走去了。

现在,我的眼中依然清晰地映现着走到风中去鲁迅的身姿。是那个为新中国的诞生斗争的、泰然在风中迈步而去的身姿。

(上海《译文》1936年11月16日新2卷第3期)

鲁迅和我

[日本]鹿地亘

风 貌

2月6日

在约定的时间之数分钟以前,我到了N书店。N氏在和蔼可亲的圆脸上露着笑容说:“他就会来的。”我觉得肌肉紧张起来,举起手腕看看表。那时候鲁迅来到店门口了。

鲁迅!终于见到了鲁迅。

我不自觉地立起来,N氏说:“啊,来了,来了!”微笑着站了起来。

这就是鲁迅。

苍白沉郁的脸孔,幽静而极澄清的瞳神。不加梳理的短短头发。重量偏在两端而自然地闭合着的安静的口唇。包涵于沉静之中而不能不惹人亲昵的温雅的小皱纹——以前就是在照片上我也没有见过鲁迅。但不至于错误,我就直觉了:那样的风貌另外人是不会有的,这不是鲁迅以外的风貌。

鲁迅挺着穿深浓的青紫的长衫的身体,用踏查似的脚步向我们走近了。后面有个只有自脖项以上是高的大个子的男人,在秃顶的圆脸上,使眼尖和小儿似的笑着而跟来。那是H君。我们由N氏介绍,低下了头,被引导到就到店里面的N氏的住宅里去了。

鲁迅一就坐,就开始问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才成了自由的?

健康如何？我就觉得热血涌上心来，几乎要哭了出来。我自从流浪到外国以来，初次寻到了要他听我说流溢出来的话的心儿。

但鲁迅始终是静静的。

“中国的文学者现在怎么样？我们自从听到了1932年的血腥的消息以来，几乎断绝了消息。有怎样的文学家在做怎样的工作呀？”

我抑制着自己，却接连地问他。

“中国的文学，在我们那边还未充分地知道。若是读先生的东西……又有体系的鲁迅论有没有？可以大略中国文学轮廓窥见的文学史的研究有没有？”

鲁迅以同样的幽静的语调，逐一回答我，关于文学史的研究，没有好书，只有直接读具体的东西。关于他自己的呢——虽然稍稍过誉——有瞿××写的书；他说那种书以后送来给我。

我谈了日本和日本的文学家的情形。就是在那时候，鲁迅的幽静的眼底里也有使对方肃然正襟的诚实和如同在地底下也不会消灭的火一般的情爱燃烧着。

“你现在住在哪里？……在上海要住多久？”

我回答说：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只想看看中国的文学者们。可是我在心里却分明地想留在中国求学。

关于这次最初的会见，我已经在文艺6月号里写过了，不再详述。不过H君后来对我说了如此的话——“那时候先生和我都没有想到你们诸位日本人士会到这里来的，听到了你的名字更觉得惊异。想起来的确是自从1934年听到了你的最后的消息以来的事情：鲁迅为别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决不流露于外表，而是悄悄地去。那时候先生很为你担忧，也惦念你的生活。”

我没有能亲自聆听这些话，只能在心里深切地感动。不久以后我藉鲁迅和N氏的援助，和改造社联络开始了中国新文学的介绍和鲁迅杂感选集的翻译。那些稿子承鲁迅一一详细地过目。鲁迅的许多费心，是不能逐一详述的。

不久之后，就有刊载瞿××的文章的出版物和好几册杂志寄来了。出于为朋友帮忙的考虑，我开始翻译这些文字。我读着在这个国家新文化建设的前线上死去了的领导者的文章，眼前仿佛浮现了鲁迅的风

貌。

若说那眼睛是贮蓄着中国的历史的深深的 H,那么那步子便会走过了惨苦的历史的鲁迅的终身的走法,是鲁迅的永远的休止,死亡的时候。一直向前走,决不把目光横瞟。用大声威胁,谁能使那眼睛横瞟呢?谁能使那种脚步着忙跑走呢?被鲁迅名为苍蝇的许多人,始终因此徒然叫喊而翻了跟头。

青年和鲁迅

葬送完毕后的第二天,就是 10 月 24 日。H 君和 O 君来了,我瘦了——这一天有朋友对我说。而从 H 君的圆脸上则好像削去了肉似的。他默然在椅子上坐下,无力地说:“难道我连可以哭的地方也没有了吗?”他说了之后抽搐着身体而啜泣。我也眼泪流出来了。H 说:

“对着他是无论什么都可以谈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情他从来不推诿别人,而由自己的双肩承担。”

他的话,在我的心里也深切地感应。我不能不回想在鲁迅近旁过了的 9 个月的情形。

我到上海来,是混于巡游乡间的戏子们的巡回献技之中而来了的;我为故国的阴暗和孤独所压迫。

在黑涛翻腾、云海奔驰的玄黑中,我立在摇动的甲板上,我的心儿动荡着。

在中国没有认识的人。只使专思前进之心毫无目标地驰骛于奔腾的大海的极边。能与鲁迅会见,是想也没有想过的。在东京是只流传着谣言,说鲁迅是在政府的合法的世界躲藏着。

“做事吧!开始做事吧!”

我被再唤回了涌上来的奋起,是在遇到了鲁迅的温和的无言的激励之后。他的眼睛能唤醒对方的良心;是没有诚心的人不能正视的眼睛。

从那时以来,我和鲁迅时时会见。我记得有许多事情不谈,因为我的心有灵犀。时时有非读不可的书和杂志寄来,我的译文,时时被加上了仔细地看过后所写的校正的细字而寄回来;又有时送给我附有非常

恳切的话的杂志,比如说:“虽然不是有趣的东西,译了出来会变成金子罢。”鲁迅并不表示外表的友情;我却在他的短短的话,温和的谨慎之中感知了不能言传的情意。“对着他是无论什么都可以谈的。”H这一句感慨的话便立时共鸣于我的心胸,然而这对于我是没有说的必要的。

“我们不想互相谈谈吗?”

我对H君这样说。我忽然感觉到胸中有某种坚强的确信占据着,了然意识到这是与鲁迅的记忆连在一条线上的。这在9个月以前是没有的;是在这9个月之间在我的心里成长了的。

所谓鲁迅的影响是什么呢?关于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中的鲁迅的先驱的事业,文学、白话运动、美术、版画运动的开拓,将来会另有说述的机会的罢。“我不是青年的导师。”这是鲁迅在《写在〈坟〉后面》及其他文章中常说的话。在革命的事业被推进的当初出来了许多“青年的导师”。鲁迅极恨这些括弧里的导师。他有一段文章说:他接受了一个要买他的书的青年握着的钱而在手掌中感到了留在钱上的青年的体温,因此痛感自己的文章和思想对于人的影响的责任。

我看着听到鲁迅的死而聚集于葬地的万余的群众而想起这种事情。这几乎都是青年,有学生也有工人。哀挽的大旗聚集了无数,其中有“失我良师”的话。他自己说“不是青年的导师”,而一切青年却都倾心敬慕他。这是由于因终身不屈的战斗而被锻炼了“诚心”发出了的光辉。一触到这种光辉,人人都被化为温暖,在心中生出了无言的激励。这并不是向人“指示行为”,而是唤醒“对于行为的热情”的东西。在我的心里忽然意识到的某种坚强,我确信这的确不是其他东西。

H等回去了之后,不多时就有青年画家S·P来访。他十分明白我是如何忙,却说他可以去谈话的地方而眼泪涌上来了。他说不久就回去,颓然在椅子坐下了。他说,他在做S中学的图画教师,为鲁迅所深爱。

据说S中学里有个不好的教师。我也听见鲁迅先生说过这个人的事情。“有个人每月专买N书店里由日本寄来的进步的杂志。我去买书时,也常常因为他先我一步买走了书而白跑一趟。后来了解到,他是一所中学校的教师。听说是和×××××有关系的。他是专买有害的书的。”我和店主人说:“你立即又让寄些来,尽管叫他买了又买,定会

很赚钱的。”鲁迅笑了。说的大概就是这位先生罢。听说他因为 S·P 对于鲁迅的丧事帮过忙，就说他“也是康牟尼斯特罢”，正在设法追逐他。我激怒了。在鲁迅的出殡时举了手的这个癞皮狗大概是青年的导师罢。对于这些奴才们，青年应怎么样回答呢？

我因为要 S·P 不至于颓丧，安慰他说，关于他的事情我们也尽力商量罢。在另一方面，我在脑中画了奔集于葬地的青年学生的群众，被教师所率领的无数的小学生。

病中的鲁迅

我和鲁迅特别亲切地开始谈话，是在他的病暂时有所恢复，被医师再允许了会见的 8 个月以后。

6 月的某一天，我为放松一下，走出家门到 N 书店去了。鲁迅正在那里，我向他问候。他的脸色是苍白的，时有不适宜的咳嗽，较平时更少说话；我疑虑他是为了什么不高兴的缘故。却并不如此。我问他是否生病，他回答说：“是气喘，没有什么要紧。”就是在痛苦的咳嗽之间，他的眼睛又像平时一般的和气而幽静地光耀了。不久，S 医师正好来了，他说：“我也请你稍稍腾出点时间看看病。”因此他和我们辞别而和医生一同出去了。我的耳朵里留下了他的痛苦的咳嗽——后来传来了鲁迅病危的消息。

我为什么那一天怀疑鲁迅是不高兴呢？这是有一种理由的。因为当时在文学界有“联合战线”的问题发生，我知道他对于那种工作方法有某种不满意。那种运动当然是不能不发生的，关于它的意义，鲁迅也充分地认识。但对于实际上形成着该运动的一部分主流青年作家的观念的倾向和政策上的焦躁觉得不满，对于依然残留于人们之间的“宗派”的弊害觉得失望。尤其是在“左联”陷于苦难的时代一直坚守到最后而经历了种种事情的鲁迅，采取了“暂且让我看看”的态度，实在是当然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这想要得一个详述鲁迅的意志的别的机会。

总之，在一部分青年作家之中有焦躁的情绪，这是不容忽视的事情。虽然是当然的事情——他们想把鲁迅当作新运动的旗帜。他们或

强制催促鲁迅“参加组织”，或忧虑鲁迅的静观是“反对组织”。鲁迅是无须催促的，这是因为鲁迅的路在中国新文学的大道以外是没有的。他不过一时静观而已——青年作家们原来只要进行他们的实质的工作就好了的。但是事实往往缺乏周到。鲁迅在病床里不见有他们所做成的“工作”，而只接受了他们的拘泥于“口号”的字句的论争和“催促”。

在鲁迅扶病执笔写了的几篇文章之中看出了“对于新运动的反对”的人们。我想对于“新运动”的实质的展开的理解是不充足的。鲁迅期待它，看着它。他最憎恶的是旧式的政治家的策略。他有时不能自制，对于运动的弱点加以尖锐的批评，对于想强制引诱他出去的政策的手段，则以冷静的沉默回答之。

“我在希望你们停止字面上的争斗而做有意义的工作。我个人是否参加组织，你们现在不必把这作为问题的。”——鲁迅这番“病中谈话”的意向和态度，人们是应当充分地了解，以各自对于工作的努力给鲁迅以安心和激励的。

我记得是中秋节左右。我初次到鲁迅的寓所去慰问他的病，一时曾经传说过病危的他，那时候病情已经渐趋平稳，虽然还似乎要发烧，而在精神较好的时候，已能经常坐在桌边执笔了。

“哦，是你吗！请到这边来！”

我由 N 氏作伴，走过走廊到了书斋门口的时候，已经听到鲁迅有精神的声音了。我初次看到了畏敬老友的书斋。多么朴素呀。在不满十“坪”的房子的窗边有两张桌子和椅子，桌上和四壁都堆满了书籍，至于家具，则除了床铺和几把椅子之外没有什么装饰。在这样的房里，我看见了只穿短衫裤子的鲁迅，他留着长头发和胡子，非常消瘦衰弱的小小的身姿。

“请不要客气……请照旧睡着。”

我着了忙，忘记了问候，连忙制止鲁迅起来。我看见他那么衰弱而很心痛。可是他却精神很好。

“已经不要紧了。若是只起来坐坐，大抵是可以的了。”

面对多日未见的来客，他似乎很快乐。病中的他移椅子来请我坐，拿烟来请我吸。我探问他的体况，为了他在病中送了我的《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而道谢。

“那是病中的工作，是早已计划了的。我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就是×××的纪念。”

他这样说，一面拿出了装订华美的《海上述林》。

“送你一个纪念品罢。”

我的手感觉到书册的结实的重量，翻开那华丽的书的目录来看，其中大部分是收集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翻译；他说：“在下卷里想收集其他翻译，编成一册。”他一页一页翻开给我说明。我因此知道在中国于1933、1934年就已经有翻译恩格斯的《关于文学的书简》和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献的先觉者，同时也知道了鲁迅爱好怎样的工作方法，我觉得很愉快。后来S·P等青年问我“关于现今的文学运动的口号的论争你有怎样的意见”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话：

请看这本书吧，这里有新中国文化开拓者的工作。比诸浪费时间于少有成效的论争，他更爱默默地做着能成为文化的启示的实际必要的事情——无论是翻译或介绍。倘若人人都肯努力，以期能以这样的工作充满种种出版物，以代替那种气力不足，无穷地反复的论争，那么“联合”自然会成立的罢。在工作实质不足的地方，无论何时总是感情和字句的琐屑的冲突不绝的。口号的论争也是好的，然而如果基本的方向一致，那么就不必拘泥于琐屑的字句的问题，各方向的人都应当从速努力充实工作的内容。

鲁迅的工作就是这些。他在病中不曾休息，出版版画集，编辑《海上述林》。这是鲁迅以外谁也不曾做过的事情，听说鲁迅曾这样说：“因为这是谁也不做的事情，我来做罢。”

不可不使鲁迅休养，不可不禁止他工作——身边的人们劝他转地疗养，他却决不肯“下野”。

他说：“保养是什么一回事呢？我向桌子执笔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靠在椅上看书的时候是休养的时候。若禁止这种事情算是休养，那在我是不可能的。”

要使他休养，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能办到。

那天夜里，他亲自拿出珂勒惠支的原画来给我们看。但担心鲁迅疲劳，屡次站起来欲辞。

“我很好，不要紧的。”他每次这样说，表露了不少满意的神气。听

说他后来和 H 君说：“他以为我有病，当即回去了。”

最后的会见

10月17日

从早晨起刮着寒风。

H 君来了，帮助我进行鲁迅杂感选集的翻译；后来有了疑问的地方，他说“我出去一下子”，就到鲁迅那里去了。不到一小时以后，我听到 H 君在窗下喊，立刻就往下面看。我很惊异：鲁迅和他同来。我连忙跑下去，打开了后门。鲁迅很少见地戴了帽子，微笑着走上楼来。

“身体可好吗？”

“好的。”

他亲自把帽子放在我的书箱上，他说与其坐我请他坐的柔软的帆布椅子，还不如“坐稳固的椅子好”，就拿了一把方形的木椅子坐下了。我非常忐忑不安。

我不能忘记那一天；以后也是不会忘记罢。

从 8 月以来，我们骤然变得亲密了。我常常去访问他，和他同去看电影。可是鲁迅先生来访问我，这却是第一次，而且竟成为最后的一次了。

因为风吹进来，我想关闭窗门，他却说并不冷，阻止了我。

“你看过了我所写的关于死的文章没有？”

鲁迅以有特征的鼻上聚起皱纹的笑法笑着而这样说。我是知道了的也知道其中含有遗嘱，但还没有读过。活人议论死，这在我是不喜欢的，所以他的文章，我也以为是老朋友的恶戏。我虽然知道鲁迅的身体被疾病所深深侵蚀，但从他的快活的谈笑之中不能感觉到死的迫近。

真也偶然，那天的谈话，几乎始终是谈些与“死”相关联的事情。关于自杀，古今中外的幽灵，芥川龙之介的事情，以及冥鬼等等。

我似乎还听见鲁迅的笑声。

“在日本，就是被砍了头的人，变了幽魂，也是有个头的罢。在中国却是没有头的。”

我们就这样互相谈说着“死”；而就是在那时候，鲁迅也分明地意识

着他自己的死,被那种“意识”可怖地追逼着。不过从他的毫无阴霾的笑法和毫不紊乱的沉静的语调是不能感到这种情形的。后来我读了发表在《中流》里的他的《死》这篇文章,心不由一激。

“……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

他抱着这样悲痛的决心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工作不断鞭策自己,虽然在外表上,就是在这篇文章里,这些事情,也被他所特有的讽刺和诙谐所隐蔽着。

那天夜里他忽然病又转剧。第二天——19日的早晨我跑去的时候他已经逝世了。

他拒绝我们陪送而在风中出去了的那一天的姿态,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着。

(《作家》1936年10月27日2卷第2期)

鲁迅魂

[日本]鹿地亘

回想起来,鲁迅离开我们已经九年多了。时间虽然不长,然而这正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激荡的时代。变幻多端的事,真的痛切得刺人心腑,的确是惊涛骇浪的时代啊。风浪随时袭来,我们时刻浮沉浪涛之间,有时定眼一看,对时代力量的伟大,不禁惊叹。

想起鲁迅先生,我的心便像刺一样锐利地感觉到痛苦,从心之深处涌出海潮一样的悲哀。他的面貌仿佛浮在我的眼前,我不由得要想叫他一声,我想和他说话,忍不住想和他说话。

——现在我也明白你的心了。我好像才开始明白似的。你留下一句句的话,原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也懂得了。可是懂得太迟了吧。到了今天,我才不自觉地明白起来。

于是,在我眼前的他那面貌,半闭着眼睛向我凝视,安静而欢快地浮起微笑,幻影从我眼前消失了。我只有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很深切地感到先生对我的情爱。我手头有我自己翻译的一部日本版的《鲁迅全集》。长久没有打开过了。这几天我有空便看看它,而忽然,我目瞪口呆了。

那是我自己翻译的书籍么?那是我曾经读过,打算什么都了解进去的先生的著作么?那么我到底自以为了解一些什么了呢?

我因此不能不激烈地对自己的傲慢加以悔恨鞭打。我自以为从鲁迅那儿毕业了,渺小的我却俨然以为自己比起先生来,我是青年,对伟大先辈的苍老悲痛的灵魂只要加以慰藉、体谅便可以了。

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东西吧。一定，一定……我们要为新时代，为新东亚而倾注全力去奋斗。相信明天吧，无论如何，明天是要来的。我们是为了明天而从事现今的斗争。

这些话没有说出口，可是我只要到先生面前去，便总是在心里这么说的。我情不自主的被一种虔诚的心情拘束着。那温和的面容对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不错，我很喜欢你这么说。我也是确信有明天的，或者比你有过之无不及。可是千万不要让人打败。你现在怕，也和我一样想法吧。你一经献身，那么一定要痛切想一想，青年们所勇敢地说着的伟大时代，对于我们东亚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我看，你们要不让人打败，该是怎样斗争才好呢？……

自然他也没有把这么多话都说出口，只是一瞬间的表情，用一句话把上述的意思向我表示出来罢了。

为伟大的明日而从事的斗争到了。

民族解放的全大陆的咆哮奋起的日子到了。真正是河溪里一样的支持东亚运命的中华全民族抗战的日子到了。除了一举而解决日本人民的革命和远东诸民族的共同运命之外，没有第二条路，非解决不可的伟大的山洪一样的时代展开了，先生曾经说过的可以一度现出沙漠来的那样的时代开始了。

可是鲁迅没有能够活着看见这一时代。我们是多么希望他能看见这一时代啊——看一看吧，终于我们是在战斗着了。

除了惊叹还有什么。虽说是预期了的事，但人们假使回顾一下，自己走在里面的大时代，返顾一下自己是怎样的在战争着，恐怕连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吧。被虐害、蹂躏、侮辱的东亚，由于日本强横的侵略，竟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烈火似的远东的愤怒，自卫解放的民族的奋起，想与过去被虐害、被侮辱的命运相诀别的年青自由的东亚的兴起，这一切使旧东亚从根本上崩溃了。奴隶的东亚在开始巨大的地崩。原本是什么东西在推动这地崩哦，连参与其事的侵略者也不得不惊慌失色吧。由于一切时代的侵略者，强夺者不待血迹干燥地吸着培养起来，层层淤积起来的苔一样的历史黑暗厚厚地蒙在地面上，就连生命的萌芽也不敢设想的东亚开始动了，如同凝聚几千年的血与泪，一旦变成民族的伟大喷火迸发出来一般，旧东亚从侵略者置足的根底上开始崩溃，

它被振舞起来,被卷入这“时代的大崩溃”中,不可救药地开始往深渊沉没下去。

在鲁迅这是多么愿意看见的事啊。

然而不久这巨大的东亚的地崩,在全世界的旧社会中引起了狂风,结果便接到侵略与强夺的旧世界全体陷落一般被埋葬下去的大时代上去了呀,现在,中国从自卫解放的民族战争的时代踏上了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斗的最前线斗争的时代了。

这仅不过是5年间的事情。

请看一看——我每想到鲁迅便不能不心里这样叫道。正如我自以为是新时代,因此,我从前以为比老前辈对新时代更能了解些,以为只要安慰、体贴他们便是我的义务一样,当我现在再度接触了先生的文字时,我的这种矜持的傲慢,是多么脆弱地被打得粉碎了啊。

——是,是……我手里拿着自己翻译了的书,好像要哭出来的郁结在心里这么喊着。你其实是知道的,你比我们知道得更深刻些,不,我们倒是没有什么也没有知道,现在,我了解你眼睛里的意思了!了解了!了解了!

然而,我伴着悔恨,一面从自身被舍弃不得的情爱所压倒,一面不能不这样的立誓——你的话我也明白了。一定得斗争到底,一定,一定得不让人打败地斗争下去的。

率直地说吧。在你大战斗的时代,在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地崩时代,在自由的东亚新生的时代,我们如果忘记了负起惟一的使命向前,那是很大的错误。想一想就知道了。自由与战斗的新东亚的生命如果冲出地壳,旧东亚自然是要崩溃的。近世诸国所说的“亚细亚的黑暗”的历史当然要和寄生于旧历史的侵略者与强夺者一道被推落到“过去”的深渊里。这就是伟大的历史的“地崩”。恰如被风化了了的巨山崩溃下来一般。岩石、砂土、树木、生物一起,发出可怕的响崩落下来。轰轰烈烈如雷崩一般,石块卷着石块崩落下来,岩石现出了断面,又被层层崩落的岩石覆溃下去。那是正如山脉开始了奔流一样的。我们这些可怕地崩落了的断层与逐渐动摇,被埋葬的岩流里如今应该把一层层厚积的“旧亚细亚”加以认识了,东亚曾经全体都把肩负到今天的历史的重担,像这样子明明白白的意识到了么?对可怕的岩石与砂土的奔流冲来,事

后不管有生物无生物都要被卷入漩涡同归于尽的那盲目的力,能有谁不心惊胆战的么?这个地崩的底层里的就力量所负担的“东亚命运”的重量,日渐一日逼近我们身边的时代,能有不感觉绝望的么?

率直地说吧。短短9年中大时代的激动,已经把我们所负担的“东亚的命运”,我们所开拓的“历史堆积层”的巨大情况,不客气地教给我了。战斗终归于胜利——这是我们不能动摇的确信。然而我们能够说不曾时常叹息过、迷惑过、消沉过么?时代在激烈地流动,然而一个巨大的地崩发动起来的壮大的情况,决不像溪中的流水一样看得清楚,我们对溪流迂缓没有焦急过么?但大地是在震动。过些时候,我们会发觉历史已经改了观,我们会发现寄生于旧东亚的侵略者与强夺者在我们的脚下半身被掩埋着焦急狼狈不堪。我们会感觉那不过是过去的东西了。可是现在我们却觉得大时代的激流太缓,觉得我们所支持的“崩溃着的历史”的重量压痛了我们的肩膀。我手里拿着自己翻译了的书本,现在所以睁大着惊奇的眼睛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浅薄的我,也明白了东亚与我们的时代的真相了。然而这一切在鲁迅的书本里都已经被他没有残余地写出了的,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呢?用不着我来一一例举,只要翻开《三闲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以及先生的其他许多著作,一看便知道了。一句话,我以战栗之身,在这大时代的“地崩”的断层中,在崩落的土层中,在开始奔流的岩石中所感知的一切被掩埋着的历史都赤裸裸地被照耀出来了。而我,虽说是力有不逮,连那些话是为什么而说,多说些什么都没有切实地了解过。

——这是镜子!反映一个时代的巨镜……我不能不发出叹声。镜子非照出它面前的东西不可。如果不愿意被照出来,那就只有从它面前逃开。

像所有的镜子,一般的不过是映照。丑态在镜子里只不过叫人捧腹大笑。镜子决不修改映像。那是刚直之魂的化身。

但鲁迅这面镜子却不是单纯的玻璃。照在这面镜子上的光线全被吸收进去,如果我们自身有感光板的知觉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得见镜子把吸收进去的映像加以分解,像被分光器所分解的妖魔一样,连灵魂都压根儿给暴露出来了。

镜子不会说谎。它也不会妥协。它不会把犬誉为人,把蛀虫照出

伟大的姿态来。有空虚就能照出空虚,有虚有其表的假冒的充实就无情地照出假冒的充实。

可是单说先生是镜子还不充分。我忘不了接近先生时所感受到的严肃感。他破颜而笑的时候也常常使我像痛感到什么似的。这在今天是清楚了。我虽然没有看见过先生的眼泪。但先生是在哭,不,哭泣的心是温存的,是悲哀的,是在悲哀。他说话的酷烈与辛辣是为有些人所恐惧,所憎恶的,而这种酷烈就是悲痛。我们的东亚不是别的姿态,而是用深刻的悲哀反映出的。

照出故人,照出朋友,也无情地照出被称为“同志”的人们的弱点与罪恶。为什么,有做到这种地步的必要么,世上不反映出来,是,不反映出来也可了事的事情不是也有么?为什么连那不足轻重的事也不放松呢——也有些人要这样问吧,我自己也并不是不时常发问鲁迅为什么要自取苦恼呢。而现在我明白了。镜子决没把小事映成大事,决没有把不必要的事情映成看似必要的事。

有人说鲁迅有洁癖,于是说这是为“缺乏政治风格”的结果而忧心。但我今天要说——看看镜子吧,我们并不希望镜子同时又是别的什么。不要把眼睛看到一边去,不要抱着恐惧来认识这样正确地反映出东亚及其历史真实的映像,相信一切在这里是也有政治的基础的。

镜子是有生命的。他的灵魂在悲痛着。但决不是、决不是没有希望地在哭泣。也有人说鲁迅是多疑的。然而他曾经失去过明日的确信没有呢?如果是没有确信的人,在这时代,怎么能保持那强韧的灵魂呢!他的悲痛,难道是对今天的东亚的绝望么?绝望的人又何必对民族、对社会、对制度、对人类加以这么酷烈鞭策呢!

他在确信着。不过新东亚决不是忽然从天而降的,那是从旧历史的积压之下负起沉重的使命,以伟大的努力凸现出来的。现在正是这伟大的时代,我们就是这时代的担负者。因此我们肩上的负担即使重也得担着。现在的中国之所以与顶天立地的阿特拉斯一样伟大的原因就在此处。

鲁迅因为确信明天,所以决不把层层积压得难以呼吸的东西、决不把非解决不可的宿命的负担避开不管。巨大莫测的镜子,无情地照出了历史叫我们负担的课题。

同时他又爱。爱、疼爱东西、疼爱民族和新生的生命。所以，他没有离开爱、单以壮语来敷衍革命，他没有用例行的政治来冒充对时代、对民族的责任。

可惜他没有亲见伟大的时代。然而他是确信了的，他把我们这种课题，那反映在巨大镜面中的一切，残留在他的文学中，委托时代负担者的下一代的青年来解决。

有遗著！我未够用心地看过的文字，确是用血写的遗著，作为时代的镜子的巨人把他一生的愿望委托给我们的他的遗著在我们手里，我现在不能不以如同热汤涌上心头一样的悲痛的情热来喊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他的面容仿佛出现了。想起那激动、刺痛我全身血液的先生的心，我立刻便心为之疼。

可怕的记忆浮到我眼前来了，那是不能拭去的记忆。先生藏身的地方是在上海的一隅。知道这地方的人数很少。少数的知己劝先生到海外去，也有少数的国外友人在愿意迎候先生。先生郑重地把一切辞退了。他寓所的附近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营，每天有着轰然震摇街屋的带威吓性的战车队伍往返疾驰。在我看来，那威吓的响声是如何震动了先生的灵魂呵！可是先生顽强地不肯改迁寓所。他正视着威吓的兵营与战车，正视着市民们过着被虐待的生活。与此相伴的是践踏着市民们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跳梁。他们的孩子们也背着玩具炮，舞着玩具剑与枪，将穿长衫的中国人的孩子追回屋里去，使他们不敢出来，先生每天出来散步，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我知道，那悲痛的面容是明白的。先生顽强地正视着这些。先生从他的寓所看见一切。看见民族及其运命，看见沉重的负担及其负担者的青年们，看见大时代的前夜。于是他带着病躯，一刻也不敢休息地直到深夜，用心血一点点滴在纸上，把这一切写成了文字。

这是可怕的事情。这是这位刚毅的灵魂从事战斗的可叹的人间的伟大姿态。

看看他的遗著吧。那遗著是我们的东西了。我们应该负起属于我们的血写的文字所说明的一切责任。我们应该以刚毅的灵魂面对着这些文字所表现的一切现实而从事战斗。这样来建立光荣强大的民族、独立自由的光荣。新的和平东亚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这是侵略者和

强者所决不能染指的。伟人的5年抗战,在我又是以亲身的经历来理解的。这实在是民族的伟大战争,一定会把民族锻炼起来。

我们不要懈怠地完成战斗吧,今天是能够完成的时代。而伟人鲁迅的遗著是对我们的不断的有力鞭策。

(《文艺生活》1942年6月15日第2卷第4期)



会见鲁迅的前前后后

[日本]高良富子

自昭和六年(1931年)的年末至第二年的二月,我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躁情绪搅扰着,这种情绪促使我乘长崎至上海的客船,来到大陆。最初,我打算走访老朋友,现任天津美术馆馆长的严智开先生,会见在北京和南京的所谓欧美派的抗日知名人士,开诚布公地与他们促膝谈心,坦率地商量“怎么做更好”等问题。当时的余日章、王正廷博士等人,还是具有“一说就明白”那种充满信心的青春朝气的。协和医学院的朱友渔博士夫妇,来信希望我早些去北京,他们可在家里接待我住下。因为滞留上海,所以最终还是辜负了他们惠予的一片好意,取而代之的是会见了鲁迅先生,然后就回国了。

不知是一种怎样的兴致,我急匆匆地从南方来到上海。那是一个寒冷的薄云之日,我在上海着陆了。

初到的上海,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作为女人,我首先要考虑投奔何处的的问题,无论如何,我认为血要比水浓,所以决心先去访问我的同胞。我打算先到内山书店去看看。在这之前,我与内山老板虽然素不相识,但是听说他们夫妇对待青年,即使是一个人,也总是会给予帮助的。内山书店的老板穿着鼠灰色的毛衣,爽快地招呼我到中国式的火盆旁坐下,自己则时而坐坐,时而站起来,与前来购买思想书籍、农村问题书籍的中国知识青年们亲切交谈。

内山书店的老板娘,身材矮小,相貌端庄,看得出,她是一位实干的老板,感受力很强的文化人。我感到,她还是一位容易交心的人,她说,

他们没有孩子,感到家庭里哪怕有一点孩子带来的亲昵气氛也好。还说,在上海没有什么消遣,到语言不通的大街上走走,是惟一的一种休息了。我确实受到了款待,难忘的海苔卷的香味,至今令人留恋。

女子青年会国际中心大楼,坐落在像银座那样热闹的地方。这次被轰炸的紫菀饭店,当时在它的旁边,只隔着一两幢房子。中国女子青年会的会员领着我,在大楼里住下,周围尽是中国姑娘。她们的装束都非常摩登,大概全是附近英美商社的打字员、秘书一类有职业的妇女吧。没有御寒铺盖的寝室中,只有我一人,总觉得要感冒,果然半夜发起烧来。我没有去打扰任何人。

第二天一早,我到内山书店去,内山夫妇都为我的身体担心,把我强按在二楼暖和的床上,用毛毯把我裹了起来。他们轮流来陪我,和我谈起中国的生活与政治,并向我询问日本的情况。屋内书架上排满了内地出版的新旧书籍,只要看看这些书籍,就可以了解从日本来的知名人士们所提到的内山老板的渊博学识。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内山老板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说要给我介绍两位朋友。一位是才从福建沿海的偏僻地区回来的小原京华堂的老板,另一位就是中国的作家鲁迅先生。小原老板在中国居住三十余年,几次畅游了扬子江,懂得方言土语,深晓中国的风俗民情。他是一位通过深入中国民众的商务活动,使日中同胞友好相处的人。在这位先辈的指引下,居中国已达20年之久的内山老板,也正在通过书和药,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见面后,小原老板高声谈论起福建人民的气质和内地芳香的中国兰草。我们约好,回到日本后,我一定去走访他在日本桥的商店。

那天晚上,尽管我还发着烧,但是一听说要与鲁迅先生一起吃饭,就摇摇晃晃地起来了。我们一起在二楼的房间里,迎接着从后院悄悄走来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五十出头,面色苍白,听说刚刚大病过。瘦削的手,在内山夫妇劝食的火锅中,拘谨地动着筷子。当时谈话的情景,内山先生好像要把鲁迅先生、夫人及其孩子,从蒋介石、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隐藏起来,保护起来似的,至少,这次好像是一顿安慰性的晚餐。在鲁迅的眼里,对我这位日本来的女教育家,不知印象如何。

席间,谦虚的鲁迅先生怀念起在日本的往事,断断续续谈起在日本

的学医生活,千叶田圃里开着的菜花,弟弟周作人曾隐居在千叶县,以及去神田一带逛夜市的情景。然而,关于现代中国的状况,却一句也没有讲。由于我知道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所以也就没有冒失地发问。

我只是希望这位老人——以“阿Q”著称的思想家,他那回忆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梦幻般的思绪,以及他那驰向遥远日本的思慕之情,连同品尝带有响声的火锅里的佳肴,都不要被打断。我一面望着火锅,一面在充满着热气的温暖的气氛中,专心地静听着老人柔和而轻声的述说。我已经记不清与鲁迅谈了些什么,只是希望能将一位日本女性的想法,转达给苦恼中的中国兄弟们。怀着这种愿望,我说了一两句。鲁迅先生默默地点着头,我见到了众所周知的那种表情。鲁迅先生还谈到,由于孩子尚小,夫人不能来,很遗憾等等,并询问了我孩子的情况。

第二天,我被诊断为肺炎,用汽车送到了我丈夫的朋友、某医学博士的医院里。

此后大约3周的时间,烧才退尽。我一人躺在病床上,做了许多不祥之梦。在中国的女朋友们都来看我,学生时代的朋友陶慰孙女士也背着个大钱袋,从物理化学研究所前来看我。她是京大的理学博士。

放弃了去南京和北京的念头,我拖着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从医院直接来到码头,登上了回日本的客船。内山送来了鲁迅先生的照片和鲁迅创作的诗句一幅。躺在开往神户去的“諏访号”的船室里,一路上,这首诗给了我多么大的安慰啊。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不管会见了什么人,都不如见到了鲁迅先生有意义。

鲁迅先生为了四万万中国民众,为了东方,也为了他所喜爱的日本,把难以抑制的忧虑,都隐藏在沉默中。那是一种连阿Q在无知民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不允许有的幽禁的日日夜夜啊!从神经质颤抖的手指上,可以看出他忧国的热情,从他敏锐的眼底,透出反对蒋介石的光。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鲁迅的这首诗讽刺了为虚荣心和私欲而陶醉的“英雄们”,正是孙

中山先生的悲痛所在。

那年的6月,内山老板来到舍下,和我一起重温了这段旧情。我叹惜自己没能报答鲁迅先生赠诗的一片盛情。最后决定,哪怕是送一套当时日本朝野钦仰的唐宋元名画展览的图版大观也好。于是我买了上下两卷厚厚的《唐宋元名画大观》,请内山老板尽快地带回上海。这对于过着隐蔽生活的鲁迅先生来说,至少也是一点点安慰吧。不久,我接到了致谢的回信。

从那以后,听说鲁迅先生也受到了日本方面的误解。在十重、二十重的攻击、误解中,他那患有肺结核的病体和他那被遗忘的往日的世界名望一样,在物质和社会的穷迫中,寂寞地逝去了。当我在照片上,看见棺椁中的鲁迅先生清瘦的面容时,我仿佛看到了先生灵魂的胜利。

把中国的青年看作希望的鲁迅先生,虽然没有见到新的中国,然而,至今活着的青年不是与民众结合了吗?鲁迅的忧国之魂不死!

我热切地祝愿鲁迅先生的夫人能很好地养育幸存的孩子,祝愿新的中国和新的日本能亲密无间。

陆晓燕 译

(日本《大陆》杂志 1941 年 2 月第 4 卷第 2 期)

鲁迅先生

[日本]内山完造

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电车路，看着它向北伸展，成了近年来成为问题的越界筑路。靠近电车路的终点，有日本小学啦、福民医院啦，等等。福民医院的对面，有一个陈旧的、叫魏盛里的小弄堂。房子只有7幢，全部住着日本人。我借了那弄口靠右边的两幢，把它打通成一所使用着。进出就用着那原来的两个石库门，小天井上全部盖了玻璃，作为采光之用；可是里面依然阴暗；几乎白天也开着电灯。电灯底下，有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那就是所谓“漫谈席”。凡有空暇的人或者疲乏了的客人，谁都可以坐下来，喝喝茶啦什么的，一边宽荡荡地看看书，谈谈话。

那时候，听说从北平受厦门大学之聘去任文学教授，后又转任广东中山大学文科主任的鲁迅先生愤慨于——政府既叫人家向鲍罗廷、加仑等等那一些顾问致最敬礼，非常地礼赞俄罗斯，拼命派遣留学生到那边去，然而一方面又乱杀那些留过学回国来的青年的那种暴乱的态度，说着：“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们走。”而愤然离开中山大学，到上海来了；当时我们夫妇俩，与鲁迅一次也未曾见过面，所以不认识先生。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常常和二三个朋友同道光顾我们书店的穿蓝色衣衫的人，他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胡子，有一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他威严，尽管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几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送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寰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从此,在执笔得疲乏了,或是看书看倦了的时候,就蹑跹过来了。他把许夫人介绍给我们,是稍后的事。先生真是一位豪爽坦白的人。他一天天地和我们亲密起来,几天之间,我们心里便已没有了所谓客人的意识。那时,先生也常常被一些不清楚的客人错认做掌柜的而大笑起来。

可是他随便什么时候,总以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他把我当作掌柜的了。”这么告诉我们,决不是不高兴什么的。

有时,一些认识先生面孔的学生什么的来了,他们不客气地望着他细声说:“鲁迅!”“鲁迅!”于是他就——

“喔,又来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说着,就拿起帽子,匆匆地出去了。

许夫人和我们,因为言语上的关系,没有过多的交谈,不过和我们之间,大家心中都很了解。

不知不觉,10年的岁月过去了。

其间,先生的身边常有危险,先生却很坦然。

在国民政府下通缉令等等的时候,也一直是满不在乎,好像完全不知道那么一回事似的来来去去。

我们担心着:“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怎么样?”这么一说,他就说:

“不，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

“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

他真是平平淡淡满不在乎。

可是因为夫人担着心，我们也就劝他，曾经强迫他避一时之难。

他和蔡元培先生、宋庆龄先生、杨杏佛先生等等组织“人权同盟”的时候，在日本人之间，好像传言说那便是共产党的团体似的；那是完全错误的，实在是因为标榜着法权国家的国民政府当局，以太不合法的行为活葬人命，是为要矫正这种不合法而组织的团体。所谓“人权同盟”是拥护人民生命权的一个团体的名称。

可是随着这同盟的活动在表面上的得势，国民政府就显露出了对“人权同盟”的敌视。不知道是故意为之呢？还是无意为之。

正在那个时候，杨杏佛先生在“人权同盟”本部的门前被暗杀了，那消息一传来，先生便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本部去。

后来，许夫人也非常担心，曾经到我的店里来，等待先生的回来。

先生是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把许夫人的心衷和我们的忧虑向他一说，他便说：“管它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他颇不以为然；但是，实际的情形，危险似乎非常紧迫，因此又强迫他避了一段风头。

回忆是无尽的，不过小的事情现在我不说。

已经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我桌边的椅子（先生的定席），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泪水的遗物！

鲁迅先生已于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长眠了！

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来了三通电报；最后一通，是叫我写一篇与先生的交游记（或者是交友记呢？）的预约，我打了个回电说：“好”，就担任了下来。

20日和21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期间，有一万余人从早到晚排着长蛇形的行列。22日的出殡，虽说是下午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壅塞进来的群众，围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道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余人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

来9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8个治丧委员办了。这些,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不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上弦月开始放射清辉,已是下午6点了。

“哦,答应下来的责任,是非尽不可的。”

我这么想着,便提起钢笔,坐到了桌子面前;可是一点也写不出来。不知怎的,好像统统忘记了。

终于,一天工夫一行也没有写。心想今天算了,从明天写起来吧,便抛下了笔,洗一个澡睡了。

“但愿今天能行。”心里这么想着,又拿起笔,坐到了桌前,可是依然不行。一句也写不出来。

情绪平静之后,就想,原来山本先生是叫我写交游记(假定不是交友记)的,而所谓交游记,要写点什么才好呢?先说这事情我就一点也不明白。因为是叫交游记,那么一定是应该写一块儿游玩的事情的。譬如说,是应该写某年某月到某处去看梅花啦,某年某月玩洞庭湖啦,这等等的回忆的吧。

刚这么想定,无奈真是不巧得很,那么样的风流之游或旅行,我和鲁迅先生几乎从未有过。而第一,资格先就不够,但是既经答应了下来,如今再去回绝,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此,挨骂也好,被人家笑也好,打算把我能写的东西写出来。请各位容忍我吧。

我这个家伙,实在生来就是个不风流的人,天明也罢,天黑也罢,总归在堆积着的书架当中,守着那张长5尺宽3尺的桌子,左边电话听筒,右边钢笔,是一副这么的腔调,过着365天的。

先生说:“老版(把版字当老板写的,只有先生一个人),怎么样?你这样子早晨忙起忙到晚,不歇歇工作休养休养,是要生病的呢,哈哈哈哈哈……”他这么笑着,我也就说——

“好,好,那么,我到这边来喝一杯吧。”

说着,便骨碌地把椅子转了过来,冲了杯茶,开始聊天。我问他:

“先生,昨天你去了哪里?”

先生就说:

“老版，昨天到大马路 Cathy Hotel 去看一个英国人。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们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通，于是乎说‘走出去！’”

“我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要找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

“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哈哈……”

听了这些话我就想道：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简直像百日燕^①的形状。脸上蓬蓬的蓄着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只有一双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彩。以这样子的神气跳进上海屈指可数的豪华旅馆的电梯，让司机们没办法起来，也不是讲不过去的事。虽说是他赶出他，可是马上说错在他身上而加以责备，又奈何呢？毋宁说那窘住了的司机，倒未免觉得有点可怜，想寄他一点微微的同情起来了。

“老版，‘泰山’来了，去看看罢。听说非常有趣的呢。我同你大概是没有机会到非洲的山中去的了。不去看一点电影之类吗？”

“老版，你晓不晓得这个？这个，是广东产的，叫‘黄皮’，只有指头这么大，却确是橘子的一类。不过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他说着这一类的话，常常拿珍奇的东西来给我们。心里正在想“是这样的吗？”他却又说：“老版，对本国人扯的谎，是罪恶，不过从外国受到强大压迫的时候，对那压迫者扯的谎，却决不是不道德的。”

我的神经常常被他这种意义深刻而内容非常明了的话切切地刺激着。

^① 日本戏剧演员扮演乞丐或囚徒之类时戴在头上的一种假发。燕，假发的意思。

“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里面，有一个大的艺术运动，那就是一个黑与白的木刻。”

先生老早就注意到这木刻，他远远地从英、俄、德、法、日各国收集了许多木刻。那数目实在总达到好几百件的吧。我曾经向先生拜借来开过三四次展览会，每一次都有四五百参观者。

仿佛是1931年(?)吧。当夏季炎热的时候，上海第一次的，不，怕是全中国第一次的木刻速修讲习会，仗先生一个人的力量开成了。那时因了某种情形，连那仅是极短期间的一星期，也是突然的，所以什么准备也没有，譬如刀，也只把钢笔头的屁股磨一磨，装上钢笔杆，就这么在现成的木版上刻着。

从召集学生以至每日的口译，统统是先生一个人干的。听讲的只有13个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是可惊的，它促成了今日风靡全中国的木刻艺术。

先生一方面移植西洋派的木刻，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特有的古代木刻艺术中优良作品的存在，并且痛心着它的日趋灭亡，于是与郑振铎氏相商，要想保存它；其排除万难而作成的，便是那《北平笺谱》。《北平笺谱》有6卷，是合计搜集有400种诗笺，仅印了200部。英、法、俄、日各国的图书馆，各寄赠了一部去；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法西斯蒂的国家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终于没有送。

《北平笺谱》之后，又计划翻印《石竹斋笺谱》，那也是和郑振铎氏协力着手办的。第一卷已粗装出版；因了郑氏的离开北平，第二卷也就见不着了。

先生终于未见完成而故世了。我希望郑氏继续先生的遗志，尽力务使它完成。

我一写漫谈，他便说：

“老版，你的漫谈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那么样，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老版哪，我反对。”

责备我的先生，屡次，不，老是毫不顾忌地暴露中国的现实，因此，其遭到一部分人的反感，也决不是少见的事。

然而，先生对现实暴露，并不是为了写文章；他当然不是以暴露现

实为快的浅薄者，也不是为暴露而暴露的人。

在先生对现实的暴露中，贯注着默默无尽的热血。

“恰如父母对孩子的痛斥，是与热泪俱下的鞭子。”

惟有先生的暴露，才真是从伟大的爱出发出来的奔流，是给中华民族的警世名言。

不但看了下鞭子的文章，还当面看到鞭泪同下的先生的这个我，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我明白先生的感情，只是怕会减弱他的鞭子的力量而守着缄默罢了。

我讲到中国民族富于悠久性的一点，只要稍微说了一点乐观的话，先生马上便要说：

“老版，我反对，我是非常悲观的。”立刻在我头脑上压上一个烙印。

“中国的将来，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斗争。”

他对我这么说，那实在是撕裂肺腑的沉痛之言。无际的蒙古沙漠，一阵凶似一阵地拥到那清澄之极的眼中来。面对着那沙漠衣而无衣、食而无食的一国的百姓，每个人的枯枝似的手臂上，都棱棱地梗起了粗大的血管，握着最后的武器的一双空拳，在仇恨那凛然扫压过来的滚滚沙尘。凄惨的饥饿大众，历历犹在他目前。这是我们痛感的。

“老版，此番我睡了3个月，细细想过了。”

“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

“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然而，弄到现在这样的不认真，其中当然是有该同情和该愤慨的距离的；

“不过，要肯定现在的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又想到日本的8000万人民。”

“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

“虽然我看得很清楚，最近的倾向有点相反，然而纵令现在有这样相反的倾向也罢，而其成就到今日的事实，却是不能否定的。”

“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然而,目前似乎还不是说的时机,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说不可的。

“我说,等我的病好起来,大概那时机也该到了吧。

“这一点我一定要说的。”

呜呼,先生虽身与重病相抗,尚诊疗着东亚两个国家的病源。

至此我没有话可说了。

果然,鲁迅先生实在是给五万万东亚两个国家启示其行路的一大预言者。

附 记

本稿特应与鲁迅先生关系深切之上海的《译文》及日本的《改造》之约而执笔。

雨田 译

(上海《译文》1936年11月16日新2卷第3期)

思念鲁迅先生

[日本]内山完造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20年,真是光阴似箭,过得太快了。鲁迅先生晚年在上海居住的10年间,同我非常亲近。缅怀往事,追加记叙,作为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的纪念。

回想在1936年10月18日清晨6点钟的时候,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送来先生的一封信。信里写着:

老板台端:

完全出乎意外,从半夜起,气喘又发作了,这样,十点钟的约会就不能来了,很对不起。

拜托您一件事,打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些。

草草顿首

L拜

十月十八日

我看了这封信,立刻感到很大的不安。这是因为,先生不论在什么时候,有一点要紧事情就写在纸上送来,而先生这次让夫人许女士送来的信,字迹却非常潦草。先生的文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特别工整的,但今天早晨所写的信却紊乱得很难读下去。虽然如此,在“老板”下面还写了“台端”二字,末尾还很完整地写着“草草顿首,L拜,十月十八日”,先生在痛苦之中握管,以书信(日文)来说,竟然写得很完整,我觉

得,这是先生的意志坚如磐石的力证。

当时我立刻打电话给须藤医师。须藤医师是先生非常信任的医师,也是我十二分地信任的秉有高尚人格的医师。他答应马上就去诊视,我也就立刻赶到先生家里。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而且呼吸情况已经异乎寻常,只有吸气,没有呼气,成了气息奄奄的样子。尽管是这样,先生右手手指之间还夹着品海牌的香烟。

我告诉他,须藤医师马上就来,先生说了一声“谢谢”,但是,我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他只说这句话也是很痛苦吃力的了。

先生的脸色非常不好,虽然他平素脸色就不很好,但今天早晨特别坏。

我家里时常制做一种治咳灵药“蛋黄油”,每当咳嗽时就服用此药,所以我经常备有这种药品。

当时我在急切之间,将这“蛋黄油”也带来了。问先生“吃些‘蛋黄油’,怎么样?”以前,在先生咳嗽的时候,我曾几次劝他吃这种药,而他从没有表示要吃这种药,可是今天早晨经我劝说以后,先生说吃,于是我立刻把“蛋黄油”送到先生口边,先生用嘴凑近,一口便将全部吞下。“搁一搁吧。”和平常完全不同,先生只说这一句,就不再言语了。我在心里默祷这药能够奏效,但是并没有发生效果。没有多时,须藤医师来到,轻轻地推开门,凝视着先生的神态,说:“怎么啦?”一边说着,走进房来。我在这时,又感到一种异常的不安。

须藤医师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已经准备让医师注射的先生,仍然喘息得很痛苦。医师劝他:“丢掉香烟吧。”他才把香烟丢掉。医师给先生注射以后,一秒、两秒、三秒、五秒,时间的缓慢,真使人等得心焦。我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一分钟的时间是这样地长久。两分钟过去了,先生的呼吸仍然一息仅存,只是吸气而已。显然,先生盼望针药发生效力,也盼得很心焦了。先生说:“怎么啦,还不见效啊?”须藤医师摇了一下头,说再打一针吧,于是又注射了第二针。先生两肩虽然微微地起伏着,但看起来好像好一些了。先生也说:“好像有点见效。”

这时,先生才离开藤椅,睡到床上,同须藤医师开始谈话。我也松了一口气。先生在这时说:“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而我因为8

点钟还有人来相会，所以先告辞回去。

不多时，须藤医师到我家说，先生安静一些了，不过，这种病叫做心脏哮喘症，情况是很严重的，希望再请福民医院内科主任松井博士诊视一下。于是，我立刻打电话给松井博士，但是不凑巧，松井博士不在家。当时，另外有一位医师石井政吉先生偶然来访，须藤医师就把鲁迅先生的病情告诉他，请他去诊视一下。石井医师说，就这样去吧。于是，3个人一同到了鲁迅先生家中。石井医师非常仔细地诊断以后，他说现在病情非常严重，今天一天需要特别注意，并且应该用氧气治疗器使病人吸收氧气。于是，我们三人又一起回到我家，石井医师就用电话通知护士携带药品立刻到这里来。

石井医师也是鲁迅先生以前相识的医师。这位医师曾在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患斑疹伤寒入院时，为郭先生治过病的。

不久，石井医院的护士来了，石井医师把病情详细地告诉她，要她每两小时注射一次，并且要使病人充分吸入氧气。当下，我又和护士一道再到鲁迅先生家里。由于吸入氧气和每两小时注射一次药针的关系，鲁迅先生的病情好像大有减轻，但是，这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罢了。

从那时起，先生睡在床上就没有再起来，只是昏睡，直到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先生最后只说了一句“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就在夫人许广平女士和弟弟周建人先生等人的守护之下，与世长辞，结束了56岁的生涯。

家里的人一齐放声痛哭起来。我立刻把先生逝世消息通知了各个报纸杂志。20日各报全都以头条新闻报道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

“文星陨落”

全中国的青年都为先生的逝世悲痛不已。遗体移至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直到22日出殡时为止，前往祭吊的行列络绎不绝。下午2时出殡，但是，政府官员和官僚之类的人却没有送葬。6000男女青年和同志非常肃穆地送葬到万国公墓。沿途两旁有工部局派出的骑巡队担任“警戒”，童子军维持交通秩序，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在万国公墓的灵堂中，由8位葬仪委员主持，举行了非常肃穆的告别仪式。仪式完毕以后，棺上复以黑底白字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

天鹅绒,随即下葬墓中。埋葬完毕以后,群众哀哭的声音依然不绝。那时,玉轮般的明月皎洁地高悬在天空,映照悲泣呜咽的人们。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20年了。先生生前曾经说过:“如此下去,将来中国将会变成沙漠,到那时,4亿人民将陷入饥饿的境地。这不仅是中国的不幸,而且也是全世界的不幸。因为这种缘故,我要战斗。”先生使用了130个笔名,一直战斗到最后。今天,先生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我想他会含笑于九泉之下的。

记得那时我在致告别词的时候,好像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鲁迅先生是涉猎极广的人,给予日本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还觉得,先生是一个预言家。

先生说过:道路并不是原初就有的,一个人走过去,两个人走过去,三个人、五个人、越来越多的人走过以后,才有了道路。

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而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

从那时起,经过13年后,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以雄伟的步伐向前迈进。记得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同志社大学的创建者——我们日本的伟大的先觉者新岛襄先生曾经预言说:“中国将成为20世纪的世界的中心。”同时我也记得鲁迅先生曾在卧病期间的一天对我说:“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4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整个日本,也要买来那种药。这次我病好以后,就打算这样说。”

鲁迅先生这话,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而且,在实际上,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再有这种灵药了。相反地,在新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认真的态度这种灵药。而且是,正如先生所说,这种药拯救了中国。

我深切地感觉到,新岛先生的预言和鲁迅先生的预言,正是所谓:伟大的预言家的话如出一辙。现在,我要为曾经有过大预言家鲁迅先生的中国,举起双手,高呼万岁;同时,我对同样有过大预言家新岛先生的我们祖国的今天的现状,感到难以排遣的哀愁,不禁欲为之一哭。

王孝宏 译

(1956年3月28日《文艺报》第15期)



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

1927年

这一年，鲁迅先生从广州来到上海，住在附近的东横滨路景云里23号。但我不是神仙，做梦也没有想到跟这位鲁迅先生竟会生活得这么亲近。其实我是好久之后才知道他住在景云里的。记得他跟我这么说过：“老板，我结婚了。”我问道：“跟谁呀？”先生极其简单干脆地回答说：“跟许。人们太为我们操心了，说这说那的，不结婚，反而于心不安了。”所以可以说鲁迅先生和我店发生关系是在他跟景宋女士结婚之前。不过要说是从哪一天开始，我可记不得了。因为在最初的时候，先生总是叼着根烟卷，那么轻飘飘地走进店来，看看书，买了书又轻飘飘地回去了；他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说：“我叫鲁迅，来买书的。”我现在还记得，先生第一次说的名字不是鲁迅，而是周树人。我听了之后说：“啊呀，您是鲁迅先生吧！？”总之，这一年是我跟先生发生关系的第一年，这在我的生活中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年。不过，当时我不可能这么想，也许是由于我一向糊糊涂涂地生活吧，许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现在想起来实在懊悔得了不得，但这一切都是“马后炮”了。

有一阵子，鲁迅先生带着青年人一块儿到店里来，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好几个，在政治家的屠刀下牺牲的柔石就是其中的一个。鲁迅先生经常说：“学生们年纪轻，经验少，往往被骗子手利用当作垫脚石，再没有比骗子手更令人可恨了，他们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宣

扬他们的名声,总是无动于衷地把思考欠周、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当作垫脚石。”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显得很激动。先生确实是个诚实的人。我常常听说,即使在进行论战的时候,先生也坦率地说自己不可能写劳动文学,因为没有劳动的体验。这是一位多么诚实的先生啊!简直叫人不可思议。这位先生死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赞扬他说:“鲁迅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但鲁迅精神是救中国的,他是我们的导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表示了这么大的尊敬,这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跟这样伟大的鲁迅先生的晚年有着十年亲密的交往,这确是我一生的幸福。……

1930年

鲁迅先生对文化方面的各种事物都是独具慧眼的,他早就注意世界的木刻(木版画),收集了许多好作品。我看到的虽然都是黑白画,但具有非常感人的力量。我终于也被吸引住了,感兴趣起来。有一次,我跟鲁迅先生商量说:“搞一次展览会,让大家看看,你看行吗?”他说:“好,办吧。”于是先生还是他那个老脾气,非常认真地把一张一张的木刻画装进镜框,而且一一地注上日英中三国文字的说明,我把它印成目录,在北四川路狄思威路购买组合^①楼上的日语学会,举办了两天约有七十余幅木刻画的小型展览会。入场的中国人很少,大多是日本人,两天也只有四百来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新木刻(现代版画)的首次展览会,这次展览会是中国美术界划时代的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鲁迅先生还复制了一套革拉特珂夫的小说《士敏土》的插图,由我店代售,买的也都是日本人。而我不怕失败,还想要搞第二次版画展览会。那次的地点是在老靶子路的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展出了法国小说的插图,可是比上一次更不叫座。

^① 是当时日侨合资办的一种百货商店。

1931年

这一年的暑假,我最小的弟弟嘉吉(当时在东京成城学园担任工艺科教员,现在是东京内山书店经理)到上海来玩,跟每天上书店来的鲁迅先生也熟了。不记得由什么事情谈起,他答应讲一点木刻的入门知识(他的雕刻曾在二科会^①的展览会上展出过两三次)。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把我办的日语学会作为会场,由鲁迅先生当翻译,给“一八艺社”的人办了短短一周时间的木刻讲习会。中国新木刻对现代中国艺术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就是从这里发端的。我弟弟这次还有缘同我当作养女看待的他的现在的妻子结了婚,而且结婚仪式是由我出的主意,办得与众不同。详细情况,我弟弟写得很准确。据我的记忆,他们俩谈妥并决定就要结婚之后,对谁也没有透露,只是由他们俩和我们夫妇俩定了个日子。我在三马路的新半斋订了六七桌酒席,内山书店中日两方的所有人员以及鲁迅先生、郁达夫、郑伯奇和漓本助太郎等人都来了,另外还请来了与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出星商会的夫妇等人,直到大家快要拿起筷子的时候,我才宣布是我弟弟的婚礼,客人们都啊呀一声惊叫起来。因为连店里的人事先都一点不知道,感到大为高兴的当然要算我了。这确实是一次奇特的婚礼。新娘内山松藻现在已是三男一女的母亲,而且是东京内山书店的直接经营者。

1932年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件”,随意捕捉和杀害中国平民。这段文章的前面,内山完造写他到处去保释被日军抓捕的中国人。——译者)

我回店里,大家才放了心。正在这时候,店前走过一群中国人,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押着,正要送到陆战队去。我不经心地朝这群人

^① 是1913年成立的美术团体,每年9月在东京上野公园举办美术展览会。

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属。我赶忙跑出去,跟陆战队说明理由,让他们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释放了。以后,我让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了脚,第二天让他们拿着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带避难去了。这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确实太好了。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地审问,统统都在底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地杀掉了。鲁迅先生的一家也平安地到英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了。由于我打开了蓝格尔公寓鲁迅先生的住房,最后被围困的36个日本人在那里保住了安全。后来这些人给先生送火钵来,表示感谢,我才知道这些情况。最后我也不得不避难了,我随身穿了件毛衣到吴淞路的出星商会去避难,接着被送往日本。在这次事变中,连电台也多次广播了内山书店的名字,各家报纸多次写到内山书店的名字,报纸发行的上海地图上也特别标出了内山书店,中国方面的报纸还报道了鲁迅先生平安地在内山书店的分店里避难的消息,还说安全避难的人们都是由于得到内山完造的保证才平安无事的,等等。这一切对我都是有利的,内山书店这一下又名闻天下了;再加上我的漫谈到处闻名,因此影响愈来愈扩大,上海内山书店在中日两方面都闻名了。不过另一方面,在当地的日本人中间对我的评价更坏了,有的竟说我是中国的间谍。这种情况跟现在一样,我一谈中国的事情,肯定后面就有人说我是中共的宣传员、中国派来的特务,由此也可以推想当时的情况。

我记得是这年举办了第二次版画展览会。这一次主要展出了法国小说的插图。我们以为第一次中国人之所以来得少,是因为地区不方便,因此这一次是在老靶子路的JYMCA(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但这一次比上次失败得更惨,我很扫兴,感到对不起鲁迅先生特意付出的努力。不过并没有泄气,第二年举办了第三次展览会就是证明。

1933年

萧伯纳翁来沪的时候,改造社特派木村毅来沪,山本社长要求他安排萧翁与鲁迅先生在上海进行对谈。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好在萧翁与鲁迅先生、蔡元培先生及宋庆龄女士座谈时,木村君获得了与萧翁见面的机会(在宋庆龄女士的府上),并弄到了鲁迅先生的文章。木

村君达到目的后,又在萧翁乘船经天津赴北京时,赶在他的前头到达北京车站,再次见到了萧翁;然后又立即回国,在萧翁乘坐的船只到达横滨港时,他又模仿宋庆龄女士在上海垄断萧翁的办法,使改造社彻底垄断了萧翁。这一幕幕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痛快。

鲁迅先生为木刻的普及尽了自己的努力。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木刻运动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运动。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争取普及苏联和德国的木刻;另一方面痛惜本国传统木刻的日益衰落,倾注精力予以保存。具体地说,一方面出版《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士敏土之图》、《木刻纪程》等,以资新木刻的普及;同时出版《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从这里可以了解先生的工作是多么仔细周到。而在尊敬的先生的这些工作中,我尽管参与得很少,但这也是我不胜欣快的。特别是为了新木刻的普及,不顾一、二次失败,我举办了第三次木刻展览会;我还特意为中国的木刻普及出售过木刻刀等,这也是我感到愉快的一件事。

鲁迅先生的诗决不能算多,承蒙他赠了我一首,我妻子也获得了一首,可惜现在遗失了。给我的那首叫《赠邬其山》。下面的一首是给山本初枝的: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后来郭鼎堂(郭沫若)先生称赞这是一首好诗。别的朋友也跟我说过,鲁迅先生的诗也写得非常好。不过,我不懂诗,对诗一窍不通,实在遗憾。

以前的第一次、第二次展览会都称作版画展览会,我们感到这样的名称对中国人也许是难以理解的,因此这一次改为世界木刻画展览会,这一改可太好了。不过,鲁迅先生从没说过:“老板,不办了吧。”对此,我确实感到敬佩,感到他真顽强;同时也对自己稍有了耐心,感到很高兴。总之,这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基督教的教义说,忍耐到底就会得救;人们也常说

最后五分钟决定一切。对这些话我总算有了切实的体会。

1935年

(内山完造 50岁)这一年东京学艺书院出了我的第一部随笔集,题名叫《活中国的姿态》,承蒙鲁迅先生为我写了序文,这真是天下最好的序文,当时我高兴得简直像一步登了天。

写一点我所想到的关于鲁迅先生复制木刻画的事。这都是去年的事,鲁迅先生说,中国传统的木刻画渐渐地衰微了,现在必须要下功夫加以保存,要印《北平笺谱》和《明代小说插画》,接着重刻现在中国也非常珍贵的《十竹斋笺谱》。这些都属于保存方面的工作,其中《北平笺谱》已经完成,《十竹斋笺谱》仅出了第一册。所谓笺谱或笺谱,都是中国文人写信用的信纸,简单的印单色,一次完成,费工的往往要套印六七次,实际上是奢侈品,但要在上面任意挥毫,所以越来越豪华,当然,我想蹩脚的字是不能往上面写的。新木刻方面的工作,印了《引玉集》,这其实是我承揽的,我委托东京的洪洋社,请他们代为印刷装订,初版100部很快就卖光了,再版和三版各印了500部,我既显得有面子,价钱又便宜,真是一件痛快的事……

1936年

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今年都是多事之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这对中国是一件大事,可是中央公论社发行的《中国问题辞典》的文化史年表中竟然没有提到。鲁迅存在于现代的中国,不单纯是由于他的文学和思想,他那高大形象的存在,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是一个中国人。这一点仅就他的死而震动全中国就可以了解。现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为纪念鲁迅先生的逝世,曾在延安建立鲁迅艺术学院,而且表示了最大的尊敬,称他是“我们的导师”,这实在说明了很大的问题。而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甚至在这样专门的辞典中都没有当作大问题来看待,由此就可见一斑了。在这个年表中,却把中国公布的根本不可能实行的征兵令突出地列了出来。而胸怀天下的共产

党,鲁迅一逝世,就说鲁迅精神是救中国的,鲁迅是我们的导师;而且认为鲁迅尽管不是共产党,仍把这样的鲁迅尊为自己的导师。所以没有疑问,鲁迅是一位比通常一般所说的文学家、英雄豪杰要高大得多的人物。不过,这部辞典的文学思潮部分倒是把这位伟大的鲁迅大写了一通,但其内容还是写文学家鲁迅。它使我感到,这与在中国、在全体中国人脑子里烙印着的鲁迅是有所不同的。我认为,我们日本人应当更多地看到作为一个人的鲁迅。如果把鲁迅当作一个区区的文学家,那么,我认为世界上还有其他的鲁迅。文学家鲁迅可能受过果戈理的影响,甚至还受过夏目漱石的影响,也许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更为恰当。但是,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那样:“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就是说不如真的高尔基。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每当想起这些话,我的心情总是为之一畅。作为中国人的鲁迅,前途才是无限远大的。我认为人生在世,就应当有这种气概。鲁迅生前的这种气概,其实何尝是想当一个区区的文学家或作家呢!诚然如此,全中国青年男女的痛哭,并不是哭文学家鲁迅,而是哭作为一个人的鲁迅的死。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说过:“鲁迅是现代的圣人。”我感到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吟味的。

现在就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的关系,摘录两三件具体的事情,来结束这段叙述。

《士敏土之图》(木刻)	内山书店代售
《铁流》(曹靖华译)	同上
《伪自由书》	同上
《南腔北调集》	同上
《准风月谈》	同上
《且介亭杂文》	内山书店总代售
《且介亭杂文二集》	同上
《且介亭杂文末编》	同上
《海上述林》上、下	内山书店总代办
《木刻纪程》(中国新木刻集)	内山书店总代售

《引玉集》(苏联木刻集)	内山书店总代办
《北平笈谱》(现存中国木刻)	内山书店总代售
《十竹斋笈谱》(中国木刻)	同上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德国木刻)	同上

除上述外,前面已经说过,1930年以后,曾举办过3次鲁迅先生收集的世界木版画的展览;1931年由鲁迅先生亲自担任翻译,为一八艺社同人举办过中国首次新木刻讲习会,等等。正如中日两国人士所了解的那样,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在先生死后,中国的报刊等曾谈到我在经济上给过先生很大援助,有些青年也经常问到这件事。每当这样的时侯,我总是忠告他们说:“说这样的话,是对先生的冒渎。我没有援助过先生一分半文。鲁迅先生杰出的地方也表现在这里,不论什么时候,只有先生把钱在我这里存放过,而没有一次向我借过钱。有时我想像先生可能很困难,但我担心会有损于先生,所以我也从未提及过。”为了避免万一的误解,最后在这里附加一笔。

1938年

(内山在这段叙述的前面,回忆两三年前,通过朝日新闻社上海分社社长木下,在上海的万岁旅馆会见三十多年未见面的小学时代同学——朝日新闻社主笔原田让二,在一起畅谈的情景。——译者)……接着,我跟原田让二说,给你介绍一下鲁迅先生吧。他欣然地同意了。于是我赶快在新半斋(这是我30年来经常去的一家熟识的菜馆子。上海只有两家扬州菜馆,另一家叫老半斋)要了一桌酒席,来的人有原田、木下、鲁迅和我,其他还有谁,记不起来了。我们在一起吃了饭,作了介绍。第二年1月1日东京和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鲁迅的《上海所感》一文,其原因就是由于这次和原田让二的奇遇。

卞立强 译

(《鲁迅研究资料》第3集)

鲁迅追忆

[日本]林芙美子

得以瞻仰鲁迅先生,这是在昭和五年(1930年)秋天的事了。那时我刚到上海,在为我所设的欢迎宴上,由内山完造先生给介绍的。请来聚餐的客人有鲁迅先生、郁达夫先生、田汉先生、郑伯奇先生和白薇女士。当宴会告终时,诸位先生都为我写诗相赠,鲁迅先生为我写了一首唐诗选中的二十五弦的诗,并且还赠了我一部《阿Q正传》,不多时我便沉溺于诵读它了。这且不说,就是《故乡》、《鸭的喜剧》那些像诗似的短篇,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反复地读着。

昭和七年(1932年)的六月,当我从马赛回国,留居在上海的时候,我曾经重拜访过鲁迅先生。也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孩子和年轻的太太。鲁迅先生自上海事件以后,精神显得异常的疲乏。我跟他谈着巴黎的事情,他也贪婪地发着问——日本的鸥外是后世硕果仅存的作家,鲁迅先生也和他是一样的伟大作家,东洋得有此位作家,是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伟大的名誉。

莲子 译

(1937年4月17日《世界日报》)

我的回忆

[日本]内山嘉吉*

从1931年8月17日至21日,我在上海生活的这一周间,在我生涯中充满了最光荣的纪念。这即是:通过鲁迅先生的翻译,我能够直接参加了第一期的中国新兴木刻的活动。^①在这一个月前,也就是当7月下旬我还未从日本到上海的时候,是我绝不能梦想到的。

这次,应中国国际书店的邀请,作为日本出版文化交流访华代表团的一员,当我整理行装的时候,发现了一身古旧的夏服。料子是白夏布的,衣服的肩背和臀部,已经缝了不少补钉。这套满身补钉的白夏布服,就是上面谈到的那光荣的一周间每天穿着的衣服,它使我眼前浮现起往事的回忆。

在这6天里,鲁迅先生也是穿着白夏布的长衫。我记不清是否是在狄思威路(系长春路之误——“版画”编者),那里有一所住宅改用的日语学校,有几间较窄的教室。就在其中一个小教室里,坐着13位美术青年学生,眼里闪着光,一个个的挤在窄小的座位上。面对着他们讲话

* 内山嘉吉现在是日本儿童剧研究家,日本儿童剧作家协会的常务委员,也是1931年鲁迅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会的讲师。他在这次讲习会上,讲授了日本创作木刻的技法。25年后的今天,他又应邀来我国访问,并且受到版画界的热情招待,同时举办了欢迎座谈会。日本投降后,他在东京积极支持中国木刻在日本的展出,1947年,他参加“全日本新木刻运动会议”,会上十分热烈地号召中日木刻的交流;1948年,他又参加了日本新版画恳话会的筹备工作。

① 即指鲁迅于1931年在上海举办的“木刻讲习会”。

的,是鲁迅先生,他用着真挚而且十分有力的语言……。

这一切,都像影幕般地又浮在我的眼前。

现在,这里还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全部记述它,可是只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谈,那就是:为什么,既不是版画专家的我,怎会被鲁迅先生邀来讲习版画呢?

容许我先来介绍我的前辈和老朋友斋田乔先生。我们交游近40年,他给了我很多教益和帮助。斋田先生是画家,另一方面他也是日本学校儿童剧的创造人,写了三十多年日本儿童剧的脚本,对儿童剧有很多贡献。我是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当画家的,受斋田先生的指导。由于这个关系,在1927年秋天,我被斋田先生聘请为成城学园小学部的美术教师。在这里,我担任着雕塑、版画和实用美术等门功课。但同时,我又开始向斋田先生研究儿童剧的理论、演技和导演法。为了这种缘故,我放弃了当画家的志愿,专门倾向学校儿童剧方面去了。不消说,学校美术课的工作仍旧是继续的。

版画这一课程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学生们要在暑期作业中运用所学的版画技法刻制明信片,作为暑期的问候,寄给朋友和亲戚们,当然也要寄我一张当作作业。1931年夏,我在上海家兄完造家中旅居的期间,也收到了几张孩子们在暑期中制作的木刻明信片。不必说,家兄完造夫妇和内山书店的店员也看到了。特别是兄嫂两人对孩子们的自刻版画感到很大兴趣和关心。

大约是在8月23日早晨,为了回答嫂嫂的希望——版画到底是怎样刻制的呢?我就使用刀具和木板当场做了表演。嫂嫂和我的爱人(片山松藻)以及刚好来玩的日本小学校的青年教师都实习起来。

这期间应当说明:我曾从家兄完造夫妇的口中听到过鲁迅先生是很爱好版画的,并且搜集了许多国家的作品。甚至家兄完造曾借来一些作品在1930年于上海第一次举办了版画展览会。可惜那时还不能普遍唤起中国人的关心,除了少数的中国观众之外,参观者几乎都是日本人。

当我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里刚刚开始讲解版画的时候,想不到鲁迅先生却走进来站在我们的面前。兄嫂两人把情况告诉了鲁迅先生。接着,鲁迅先生看了看学生寄给我的木刻明信片,并且聚精会神地看着

我用雕刀刻木刻。突然,鲁迅先生提出希望我能给中国学生们讲习版画技术。我十分出乎意外。要知道听讲的都是上海的美术学生,不是版画专家的我,是很难胜任的,因此极力推辞。鲁迅先生认为像教孩子们一样的情况就成,从最初入门的技术开始。兄嫂两人也在旁边怂恿。我被鲁迅先生的热望所感动,结果接受了鲁迅先生的邀请。我当时那种精神上的不安,和那种不是版画专家的羞惭的心情,即在以后也未曾消失过。就是这样,我于1931年夏在上海参加了版画讲习会。

其后,在鲁迅先生的信中,知道这些美术学生十分努力于木刻,在蒋介石政权的压迫与迫害中展开了勇敢的活动。我当时怀着严肃的心境读着信,并且看着讲习会时合拍的纪念相片,我忍不住一个个地祝福着他们工作的成果与健康。

十数年后的1946年,我在东京又看到了中国木刻^①,我的胸腔充满了感动,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仅仅十数年间,中国木刻有着惊人的成长,它贯彻着和继承着鲁迅先生的精神。忘记生命危险的中国木刻家们的活动,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苦和牺牲的代价,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这都不时地激动着我的心胸。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20年。在这纪念中准备创刊“版画”双月刊。我在10天之后,也将亲眼看到闪耀着鲁迅精神的光辉的新世界和新中国。这种幸运的惠与,是我生活中最大的愉快。

祝贺中国木刻运动的进一步长成和发展,并且祝福诸位同志们有更高的成就。

李平凡 译

(《版画》1956年第10期)

^① 战后,中国木刻曾有四批作品渡日,并由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及中日文化研究所前后组织过三次全日本的流动展览。文中所指,是中日文化研究所于1946年带往日本的一批中国木刻,这批木刻,自1947年2月在东京开始展览。

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

[日本]长尾景和

1930年,我在关西大学读书时,为了将来研究中日贸易,很想熟悉一下中国的风俗习惯,就到上海游学去了。当时住在黄陆路的花园庄。

一个晴朗的冷天,我在四川北路遇到一位向我问路的日本妇女,因为地理不熟,我正苦于无法回答,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句流畅的日语,代我回答了她。这是一位和我身材相仿、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国服装的中年绅士。迷路的女人得到完满的解答,非常高兴。我已感到这人很亲切,便行了一礼表示敬意,当时就这样分别了。次日,在花园庄又见到了这位亲切的中国人。我说我叫长尾,并将名片递过去。他说:“我身上没有带着名片,我叫周豫山。”因为同住在一个楼内,紧接着,第二天,第三天,我又会见了周豫山。两个人很快就亲密起来了。周豫山第一次谈话时所谈的都是有关美术的事情,从哥赫、郭刚、米勒的画,谈到罗丹的雕刻,又从日本的水墨画谈到广重、歌磨^①的版画。我暗中估计,他一定是位艺术家。

第二天的谈话,是从医学开始的。从维生素、荷尔蒙、达尔文的进化论起,一直谈到天文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灵魂不灭说,愈谈愈觉得他是个博学的人。像这样学识渊博的人,我是从未见过的。在日本,我虽然也结识不少教授、博士等有名的人物,但他们对于自己业务以外的事,知道的并不比我多。直到现在我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谈得投机的

^① 即宏藤广重、喜多川歌磨,都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版画家。

人,然而和他却不可思议地很容易引起共鸣。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情投意合了。

周豫山总是很谦虚,不论谈论什么从来没有表现出知道得比人多 的神气。如果他修一修面,一定是位仪表堂堂的美男子。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样了不起的人,您真了不起!”他笑着说:“我吗?没什么!”每晚当我和他告别回到床上时,就揣测他一定是某大学的教授。至于他的真正身份,我从来没有询问过。

随着我们的相识,愈来愈感到他的伟大;我想,在上海一个普通的里弄之中,竟会有这样的人,中国真是太伟大了!和他在一起谈话,你会感到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我丝毫觉察不出,我们两个人的年纪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也无所顾忌,甚至忘掉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国籍的差别。当时正好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能够经常整日长谈,常常是从早晨开始,吃过午饭之后再接着谈,晚饭后仍然继续谈。他所谈的话,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精神食粮。他说:“我们两人之间很熟悉,所以我没有什么顾虑,可以随意连续谈上几个小时。”他总是微笑着很热心地倾听着我这样一个无名青年的谈话。他的日语造诣是极其深而博的。每当我脱口诵出《万叶集》《源氏物语》《徒然草》等的章句时,他都能很好地理解。这些词句,即使对现代的某些日本人来说,也是很费解的。可见,他的日本文学修养是比普通的日本人还要高的。

我们谈话时,除了有关学问上的问题,其他问题我是向来不问的,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位没有家室的、因公外出的学者。待我们相识后的半个多月,我才知道他是偕同夫人、孩子一起到花园庄来的。他住在副楼楼梯底下靠里边的一个小屋里(后来我才知道,鲁迅先生隐居的小屋,原来是工友住的屋子)。他的房间,除了床之外,什么也没有,就是睡觉的床,也是很窄的。他那狭窄的房间总是睡着小孩,平时他就坐在火盆旁的椅子上取暖。几乎没有任何人来访问他。我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出外,差不多整天坐在门口楼梯旁边和周豫山君谈话。和他谈话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们常常烤着火彻夜长谈。

一天,我买来一些花生围在火盆旁边剥食。他谈起了云南出产的一种什么豆,粒小味甜,谈得非常详细;等我买来栗子时,他又说天津附近良乡的栗子比其他地方的都好,就是日本的丹波栗子也赶不上。有

一次我打来些老酒，他的酒量不大，稍喝一点，眼边就微红了。他说绍兴出好酒，因为那里的水性像日本云滩^①那里一样的好。总之，他什么都知道。我想，就是将5个日本博士集合在一起，也不会知道这么多。

像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天。一天下午，我从四马路回来时，买了一本鲁迅的《呐喊》和一本郁达夫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我看不大懂。我坐在平常取暖的那个地方，正要把手打开时，他走过来了。他笑呵呵地坐在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我把书递过去，说：“请您看看这本书，我有很多地方读不懂，我想您是一定懂的。在日本，鲁迅也是很出名的，郁达夫则就不太熟悉了。”我做出一副很懂得的样子这样地评论着。当时他的面部表情是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他衔着烟卷，微微地笑了笑。于是我想，是因为我说这本书很难懂，他在笑我连这样的书都看不懂吧。或者他大概早就看过这本书了，所以笑我到现在才劝他看这本书吧！可是，紧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悄悄地对我说：“我就是鲁迅。”我当即大吃一惊。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本名叫周树人，字豫才，笔名鲁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然后他又很感慨地告诉我：“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政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我知道了我所尊敬的这个人就是鲁迅，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非常憎恨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逮捕这样伟大的人物呢？我马上向他致了歉意：“由于不知道您就是鲁迅先生，很失礼！为了尊敬的先生，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尽管交给我好了！”鲁迅先生很热情地紧紧握着我的手，用很轻微的声音说：“谢谢，谢谢！”

自从知道了他就是鲁迅先生之后，先生的一言一行，我都细细地加以玩味。这时，我说话的语气较以前更有礼貌了，可是先生却没有比周豫山的他有任何变化，反而更谦虚了。

大概是在2月上旬的事。我照样在楼梯旁的那个地方和先生一同围着火盆取暖时，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走到了我的身旁。先生说：“这是我的小孩。”我立即将他抱起，问他叫什么名字，先生说叫海婴。我说：“海里边的樱花，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名字。”先生说：“不，是取其在上海

^① 在日本兵库县，以出产好酒闻名。

生的婴儿的意思。”这个孩子用小手指着旁边的椅子，我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先生说：“他告诉我，这把椅子上有颗钉子露出来了。”我一看，果然露出一个芝麻粒大小的钉子尖。这个孩子的聪明伶俐，使我惊奇不已。先生说：“我因为这孩子的神经太过敏，所以有点担心。他睡觉时，身旁稍稍有些动静，马上就会醒来。”在小孩的身后，有个端庄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先生说：“这是内人。”我点头致意寒暄。这就是我第一次所会见的许广平女士。当时先生带着苦恼的神情，亲切地对我流露出他的心情。他说：“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

记得仿佛是2月中旬，先生为我写了一首义山的诗，说：“在花园庄什么也没带来，这幅写得不好，将来有机会再用鲁迅的名字写幅好一些的。”同时还送我《苦闷的象征》《彷徨》各一册。我想，这一定是先生偷偷回到家里为我写的，使我深为感动。

在一个2月的雨天，我们谈了一整天。最初，我是以朋友的身份和先生结识的，现在却以学生的心情来侍奉先生了。我一边听着淅沥的雨声，一边听着先生讲述列宁、高尔基的故事。先生谈起了克扣囚粮的中国监狱，谈起了受金钱左右的审判。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先生非常愤慨。当时他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中国也一定会这样的。他又谈到帝国主义的末路，谈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危机。先生是非常厌恶美国资产阶级那种奢侈生活的，对当时中国民众的贫困则嗟叹不已。他说：“只看城市里的中国人，你还不能了解中国人的贫困生活。在比四川省更远僻一些的地方，人们都住在窑洞里，而且那窑洞是连门都没有的。”“为什么连门都没有呢？”鲁迅先生叹口气，说：“洞口如果装了门，就会被强盗抢走，拿去烧火取暖。”他举出种种实例来说明贫民生活的疾苦。“他们生活的贫困，你真是难以想像！”说到这里，先生眼睛里立刻露出同情、苦闷的神情，脸上也笼罩了一层悲哀的阴影。到现在，我的眼睛里还常常浮现出先生当时的形象。

笔者追述鲁迅先生在花园庄的3个月亡命生活时，只能按着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写，不敢妄加蛇足。

记得是旧历春分前后的事。一天下午，当我从主楼走出来时，看见

两个男人在花园庄草地上徘徊。他们的行动很是可疑,一个人窥视着门口。我连忙跑进副楼把这情况告诉给鲁迅先生,先生立刻躲到里屋。约莫过了10分钟,鲁迅先生从里屋走出来,我们两人就从窗口向外望去,看见那两人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瞅着这一边。先生紧张地一句话不说,又悄悄躲到里屋去。我为了查清情况,就到主楼去。最后才把事情弄清楚,原来那两人是因为花园庄的一个房客要搬走,叫他们来搬东西的。可是他们不知道院里的情形,所以在那里东张西望,停留了许久。当时对鲁迅先生和我说,这20分钟真是特别长久,对于鲁迅先生恐怕更是令人不安的时刻吧。

天气渐渐暖和了的4月初的时候。一天,鲁迅先生突然来到我的房间,拿着一封信说:“长尾君,这封信想请您代为送去。”接着拿出一张画了路线和草图的纸给我看。又说:“如果有回信请给带回。”鲁迅先生紧张的表情使我感到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于是用报纸把信包好,藏到大衣的最里层,走出了花园庄,沿着北四川路电车站走去,走到横浜桥向左拐进一条小道。那地方仿佛是在这一带,可是又不太清楚。收信人的姓名因为时间久了已经记不起来,不过记得那姓名是一个很难的汉字。我认为询问人会引起注意,不大合适,所以不敢随便打听。我想到花园庄里有许多中国仆役,鲁迅先生不把这封信托付给他们,而托付给一个地理不熟的日本人,这样的信一定是很重要的。我为了受到自己衷心敬重的人的这种信赖而感到满怀喜悦。

一个警察走过来了,问我找多少号门牌。我一时回答不出,好不容易说出一个比我要找的号数多10号的门牌,使得他告诉了我到目的地附近去的方向。

我一面想着鲁迅先生受到蒋介石这样的迫害,连日常的自由都被剥夺而气愤,一面继续寻找,结果是越发找不到目的地。当我在一条沥青小路的尽头,好不容易才找到收信人住宅时,已是出了一身冷汗。这人家的红色砖墙上装有防贼的碎玻璃片、黑漆的铁门。我上前一按电铃,走出一个女人。我问她主人在不在家的时候,大约里面听到了声音,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人。我把写着收信人姓名的信递给他,他一看就点点头。等了一会儿,他给了我一封回信,我笑着向他说了声谢谢(这家人家,以后我又去过一次)。

我回到了花园庄，鲁迅先生担心了吧。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什么事也不做地在等着我。我把信递给鲁迅先生，先生说：“让您受累了。”这时，他平静的脸色又像平时所常见的一样了。

4月中旬，一天我正在和鲁迅先生谈天时，一楼的两个仆役来找鲁迅先生，先生跟着他们走了。我想许是有什么紧急的事。约莫过了1小时，鲁迅先生重新坐到椅子上，我问：“有紧要的事吗？”先生平淡地回答道：“他们常给家乡写信，来找我代笔的。”说着燃起一支香烟。

4月末，鲁迅先生回到了北四川路的公寓。日本有句谚语：流言过不了七十五天。我想也许是风声不是那样紧了，监视得没有以前严了吧。立时我感到花园庄寂寞了。鲁迅先生走后约一星期，先生的佣人拿着一封信来到我屋里找我。原来先生以鲁迅的名字为我写了老子的话，特地送给我的。这是一幅写了一百数十字的大幅字屏。信上写着：“我的字很拙劣，笔家看了会见笑的。我也没写过这样大幅的字屏。”此外还写了和我分别后感到寂寞等的话。

5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到鲁迅先生住的公寓去访问先生。鲁迅先生住的公寓靠近北四川路火车站终点，在新公园的前面。记不清是四层还是五层的建筑物，只记得是一座四方形、惹人注意的大楼。名字好像是拉摩伊公寓。

先生的房间虽大，但好的家具摆设一样也没有。有的只是靠墙壁排列着的像书店里一样多的书籍。

微微含笑的鲁迅先生出来了，他一面说：“你来了我真高兴。”一面把我引进书房里去。他身上穿着一件口袋很大的灰色毛衣，夫人从另外一间屋里端来自己煮的咖啡。

鲁迅先生拿出照片来给我看。其中有一张是鲁迅先生穿着中国长袍站在墓穴里，一具棺材放在他身旁的稀有的照片。我看了说：“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呀！”鲁迅先生说：“中国因为有许多迷信，所以中国人是不喜欢拍这种照片的。”我说：“日本人也讨厌在墓穴里和棺材一同拍照片的。世界上不论是哪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会喜欢的吧。”说完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就以世界上的迷信为话题，谈了两小时之久，我才回去。

从那以后，十天过去了。

我打电话给吴淞路的裱装店,知道已经把鲁迅先生写的字屏裱装好了。于是我立刻到吴淞路去取。在回来的路上,顺便就到鲁迅先生的公寓去。鲁迅先生像素日一样穿着那件宽松舒适的毛衣走了出来。我说:“您为我写的字已经裱成一幅立轴。现在送来给您看看。这家店里没有适合的绫子,只能裱得这样。在给任何人看之前,先请您看看。我刚从裱装店来。”鲁迅先生说:“已经裱起来了?特地送来给我看的吗?”说着,就自己去搬来一把椅子,把立轴挂在书房原来挂画的钉子上,然后朝后退了两三步,看着这立轴说:“字写得不好,可是裱得太好了。”我说:“您的字写得丝毫没有矫揉做作之气,所以我很喜爱,我将永远带着它。”(当时做梦也想不到25年之后,这幅立轴会挂在鲁迅纪念馆。)

这天,我得到了鲁迅先生赠给的由先生编辑出版、印数有限的一册描绘俄国革命、工人、工厂等等的单色版画后回家去了。

几天之后,我从花园庄迁到鸭绿路。这以后我又到鲁迅先生的书斋去访问过两三次,但不记得谈的是些什么了。最后一次访问鲁迅先生的时候,是在我搬到鸭绿路一两个月后,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一看见鲁迅先生就说:“我决定再过一个月就回日本去了。因为这里发生了排日运动,连北四川路的文具店对我这个日本人什么都不卖了。我只有通过一个老朋友,广东人何志澄君,才买到一点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希望贸易情形好转的。”鲁迅先生说:“这真是遗憾的事,你回到日本之后,请给我写信。”我说:“您是有名的人,所以不论住到世界上的哪一处,都能很快地从报纸上知道;我是个无名的人,不论住到什么地方,您都不会知道的。10年以后,我或许能够稍稍为人们知道,成了名吧。到那时为止,请以10年为期,我不给您写信,请您原谅我。这对我的心是有一种鞭策的意思。”“是的么,像你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成功的。”鲁迅先生这样说着,又让我看他收藏的种种书籍,并且告诉我:“这些书是和我共过患难的。请来看看我的书架。”

在鲁迅先生这样说之前,我还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尽是木制的箱子。坚固的厚木箱叠成了书架。鲁迅先生说:“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就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书架,像这类的准备逃跑的书架,世界上恐怕

也没有,这使我很佩服。我说:“对您的迫害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日本也有特高警察和宪兵这两种可怕的东西,如果被他们钉上了,真是走投无路,那就要一生抬不起头来。”

“什么时候你再来中国啊,一定会有好日子来到的。”最后,鲁迅先生这样说着就和我分别了,而那一次竟成了永久的分别。对我来说,和鲁迅先生大约有一百数十小时的谈话,这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了。

我认为伟大的鲁迅正是从中国和日本两个文化悠久的国家摄取了有益的传统,同时具备着渊博学识和仁与勇的、这个世纪罕见的完善的伟大人物。

梅韬、张葆莘 合译

(1956年《文艺报》19号)

回记鲁迅

[日本]河野樱

这篇文章原载日本共产党机关刊《文化评论》今年2月号(总三号),原题为《病床上的鲁迅》。作者河野樱是日本进步的女作家,早年就参加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1936年时,她似乎是在上海工作,但直到鲁迅逝世前两个月,她才有机会获识这位她所一直敬仰的伟大的中国作家。这里的一篇纪念文章,是她根据25年前的片断札记写的,对两次见到鲁迅的日子,都没有明确记载,但《鲁迅日记》里对她的两次来访都提到了:第一次是1936年的8月23日,第二次是同年的9月23日。这里的译文曾作了一些删节。

——译者

1936年8月×日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在小房间里关了一天,一到太阳落山时分,我更感到孤独难熬起来,于是洗了一个澡,穿上一件新洗好的上青布旗袍,就这么走出了小巷。人们都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乘凉,高兴地大声谈笑着。我这时候连一句上海话都不懂得哩,但我也想找个什么人谈谈。北四川路底有家内山书店,打我这儿去,只需3分钟就可以走到了。等我来到书店门口,正好内山完造、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三人迎面走来,我停住脚步,羡慕地问道:“上哪儿去啊?”

“我们去探望鲁迅,你也一块儿去好吗?”内山完造这样说,他身上是一件夏天穿的单和服。

“一块儿去罢！”池田幸子邀着我。

中国伟大的革命作家鲁迅，在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下，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不能公开，而且现在还有病在床，因此，我从来都不敢想像有去访问他的念头，今天突然有了这个机会，真是激动得心情都安定不下来了。使我吃惊的是，鲁迅的家离我们很近，地点就在大陆新村，那是庶民阶级居住的专为出租而造的住宅，一排排紧挨着的三层楼建筑，是统一的规格。打内山书店前往，一条大路，用不到10分钟就可抵达，而且就在我住的松云别墅一排上，从我那间小屋子走去，只7分钟左右的路程而已。

我们被邀到二楼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子很暗。桌子上放着一只绿色灯罩的台灯，消瘦的鲁迅就站在这张桌子边迎接我们，我想，他大概在病床上实在睡得太久了。

“这个人虽然穿着中国的服装，但她是一个日本人啊。”内山完造含笑把我介绍给鲁迅的时候，我简直羞得有些无地自容了。他们三位和鲁迅原来就是很亲热的朋友。大家在谈着什么，我一点没有听进去，我只是独自在打量着屋子里的情形。

中国式的床，样子非常朴素，连被单也没有铺，书籍、桌子、椅子，都已很陈旧。斑迹点点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版画的镜架，但因为灯光太暗，看不清里面画的是什么，我只发现其中有一张画是红色的，竖直地挂在那里，这是一幅苏联的女共青团员的肖像，是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少女。这一幅女共青团员的肖像画，使我的心情完全安定下来了，鲁迅还用青年人讲的日语在为我们作着解释哩……

当时，鲁迅在内山完造的协助下，出版了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刚才印好，但市面上还不曾见过。鲁迅对这本书的出版，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墙角边搬出许多珂勒惠支的版画的原版本，一幅幅地用手把它张开按在墙上，为我们作着说明。一幅以第一次大战后那种荒凉和饥饿做主题的珂勒惠支版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哩。

“……这是受到凌辱的农妇。”

大家对一幅画着一个妇女倒在田地里的版画^①默默地注视了许久之后，鲁迅又作了这样的解说。后来，鲁迅让许广平给换了一只亮一些的灯泡，这时候我才看清楚了鲁迅的姿态。这是多么朴素的人啊！一点儿没有虚饰，和一个普通人一样的表情，还带着年轻人的朝气哩！

“先生，您累了吧？”

幸子听到先生在咳嗽，因而这样问。

“不，一点儿也不累，我原来就在做事哩……打牌、围棋、象棋，这些我都不喜欢……所以只好写文章啊。”

“那可不行啊，您这样拼命地写，又要发烧的。”

内山书店的主人这样说，大家笑了一下，可是突然又有些紧张的感觉。

附 注

我后来也承鲁迅送了一本《珂勒惠支版画集》，那是非卖品的限定版。在大战期间，我一直珍爱地保藏着，可是在战争结束后遣返的时候，由于经济实在困难，终于不得不脱手了。

同样也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下午，池田幸子和我两个人到大陆新村去访问鲁迅。那是刚才发生了海宁路事件之后，马路上，每隔几步便有一个日本陆战队的士兵站着，上了刺刀的枪，对准着马路上通过的行人。^②我们对此毫不在乎，花两毛钱在路边买了一束大波斯菊，走去敲着鲁迅家的大门。大陆新村的弄堂里有许多孩子在嬉戏，还可以听到有些妇女在大声地谈笑，中国的人民大众完全没有把那些神气十足的日本陆战队士兵放在眼里。许广平带着笑脸打开了大门，她告诉我们，鲁迅正睡着，现在大概已经醒了，她这就上楼看去。这样说着正要上楼去时，幸子慌忙阻拦着说：

“请不要去惊醒他，不要去惊醒他，我们不过顺便来玩玩罢了。”

① 即著名的历史连续画《农民战争》之二《凌辱》。——译注

② 按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内山君遣人来通知，街上有兵警备”的记载。——译注

可是夫人已经急急忙忙上楼去了,不一会儿,又笑嘻嘻地下来,把正在感到尴尬的我们,引到了鲁迅的房间里。

“我没有睡熟,早已醒啦。”

鲁迅这样说着,让我们在椅子上坐下,他自己就坐在桌子跟前那只椅子上。他穿一身仿佛睡衣似的白布衣服,和一个顽皮的孩子穿的衣服有些相像。他请我们抽烟,自己也燃了一支吸着。

“先生,为什么要发表那篇像‘遗嘱’似的文章啊?”

幸子这样问了一句,鲁迅听了哈哈大笑。他笑得那么愉快,因而引得我们都笑了。幸子指的就是他最近发表的那篇题为《死》的文章。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把鲁迅和“死”字结合在一起,看到他既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自己还这样有趣地笑着,因而禁不住在暗忖:这个人真会淘气。看他现在的样子,不但是淘气,而且还很兴奋。夫人把量热度的体温表递给他,他接来往嘴边送时,嘴里却还在不断和我们说话哩。鲁迅看到我手里拿着《中国之声》^①,因而对我说:“你在看《中国之声》吗?我这儿从创刊号开始,每期都有多的,要是你缺少哪一期的话,我可以送给你。我不太喜欢读英文。”

我感到既惭愧,又高兴,到上海已经5个月了,中文还一点也看不懂,这是我的懒惰;高兴的是,我正在想收集《中国之声》,现在鲁迅可以送给我,那真是我的光荣。

体温是37.3℃。我们告辞要回去而鲁迅还在留我们时,日本医生须藤先生来为鲁迅注射了。这是一位在虹口开业的老年医师,他既不会奉承,又不懂得客套,完全是日本一个乡村医生的类型。我们是初次见面,这一回是鲁迅来为我们介绍了:“这两位虽然是穿的中国服装,但她们是日本人啊。”鲁迅一面接受注射,一面和须藤先生谈着话,他们谈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心里却在暗忖:“为什么不找一位更好的医生来治疗啊!是不相信新的医学的进步吧!”我内心甚至还为此感到不满哩。其实,我才是最愚蠢不过了。

1936年10月19日。

① 《Voice of China》,上海出版的英语半月刊,是当时在抗日人民战线文化方面活跃的斯沫特莱所编辑,主要向海外发行。——原注

清晨5时,我接到了鲁迅逝世的丧报,离开我那次参观版画展览会不过是10天的事情,内山书店一个青年站在我那间小屋子的窗下,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了我。前天晚上我已经听到鲁迅的病发生急变的消息,但万想不到今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立即赶到大陆新村去。整个的家都沉浸在寂静中,中国的作家们以及史沫特莱、内山完造、鹿地亘、池田幸子,都呆呆地凝视着鲁迅的灵床。

那是多么平静的安眠啊,面容和生前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有那一对曾经发射着强烈的光芒的眼睛,现在已经闭上了。

下午,鲁迅的遗体移到了万国殡仪馆的一间屋子里,安置在无数的鲜花中间。在这里,有两天的时间让民众和他告别。挟着书包才从学校里回来的学生、老太太、还有公务员,一到傍晚从工厂里才下班的工人们,满身油污的工作服都来不及换就到鲁迅的灵前来了,人们都在门口签了名。

10月21日,这是下葬的日子,送葬的群众都到万国殡仪馆集合,护送灵柩到万国公墓的墓地。人们组成了整齐的行列,在这一里之遥的道路上行进。到处飘荡着鲁迅挽歌的合唱,我也得到一份乐谱和歌词,随着一位穿中国服装的青年的指挥唱着。在这3天的时间里,我已经置身于上海民众之中了。我虽然默不出声,但心里却在为自己能够和上海民众一起参加这一葬仪而感到骄傲。沿途挤满了群众,每个人都拿到了《鲁迅先生生前救亡主张》《鲁迅先生挽歌》等传单。

所有参加葬仪的人都聚集在礼拜堂的门前,严肃的告别仪式完毕时,墓地已经完全笼罩在暮霭中,人们的脸都看不太清楚了。在悲怆的安息歌声中,抬着灵柩的人慢慢地把灵柩放进了墓穴中,在暗暗的墓穴周围,人们挤得紧紧地站着,默祷着。

送葬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散了,不知怎么的,我却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墓场的大门口。我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已走完了,不料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却在这时候走了出来。等他们一到外面,那两扇墓场的大门就在他们后面咔哒一声关上了。我们就沿着那条道路向前走着。从路旁的行道树下面传来了一阵歌声,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影,还在那里踟蹰着舍不得离去。

月光光 照村庄
村庄破 落炊无报
月圆圆 照篱边

这是几个青年人的歌声。歌子是蔡楚生的电影《迷途的羔羊》中的主题歌,那是一支和他导演的《渔光曲》的主题歌一样在上海非常流行的歌曲。可是,真正的迷途羔羊,是像我们这样的日本人啊!

鲁迅逝世后的第十个月,即1937年的8月13日,日本在上海燃起了侵略战争的火种,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乔良节 译

(1962年12月2日《文汇报》)

鲁迅的追念

[日本]仓石武四郎

鲁迅逝世已经 30 周年了。

回想我听鲁迅先生的讲演,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记不得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鲁迅这个名字的,在已故青木正儿先生的《以胡适为中心漩涡的文学革命》那一篇著名的论文中,还没有出现鲁迅的名字(译者按:这是作者记忆的错误,正是青木正儿的这篇论文,第一次向日本正确地介绍了鲁迅先生)。昭和三年(1928年)我在京都第一次见到了处于青木先生的所谓“中心”中的胡适先生。同年,我到了北京,那时已决定在上海定居的胡适先生,偶然北上,我有机会与他再次相见。然而,因为鲁迅先生是特意离开北京的,所以,对我来说,连想见一次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昭和四年(1929年)的春天,我从山西的太原一直到闻喜县绕了一圈,回来之后,继续在北京大学听课,经常出入北大第一院,也就是所谓的“红楼”。有一天,我从红楼门口径直上楼的时候,在楼梯的墙壁上,见到一张小小的布告,那是以“北京大学国文学会”的名义写的,内容说鲁迅先生回北京省亲,已得到先生的允诺,定于某月某日来讲演。布告上那个表示“恳请”的意思,却用了“教请”两字,不知为什么,对于这一点我至今还不曾忘记。

我很高兴,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我连“国文学会”这个名词还是第一次见到哩。然而,我当时想,我是在那样的聚会上露脸好呢,还是等人少一些的时候再说呢,对此,我确实不是没有一点踌躇的情绪的。可

是,我还是决定了,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也是要去出席的。于是,就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天。

终于到了讲演的日子。这一天,我准时到了红楼,大概是在二楼的一个教室里吧。我是怀着又兴奋又踌躇的心情走进去的,但不知为什么教室却是空的,一看黑板,吃了一惊,原来因为这里作为鲁迅先生的讲演会场太狭小了,已迁到二院的某某教室了。糟了,晚了吧,我只得快步穿过院内往北去,到了指定的教室,一看那个教室不也是空的吗,看了正面的大黑板才明白,还是因为会场狭小,搬到南池子三院的大讲堂去了。我想这下子已经来不及了,立刻决定叫洋车,赶到大讲堂。

这个大讲堂是北京大学最大的课堂,虽是粗糙的建筑,却可以容纳很多的人。这时,大讲堂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大家都坐在长条凳上,讲演还没有开始。从讲台的最尽头,到入口处最近的条凳上,都是我认识的学生,因而,总算勉强挤下了。看到这个场面,我想这怎么做演讲呢。我看见的那是一个小小的告示,恐怕主办人也一定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所以会场被临时改动了几次。中国人耳闻口传的本领是很高明的,从前就听说北京大学在动员学生这方面是很让人吃惊的。我大体上是遵守时间来的,但是,这里却已经聚集了那么多的中国学生,好不容易才找到座位。学生们仍然是很快地蜂拥上来,这气势真是要吓破胆的。

讲演还没有开始,甚至像我这样晚到的人都等得有点疲倦了,突然,一个人被簇拥进来登上讲台,不用说,一定是鲁迅先生了。他留着黑色的胡须,站在讲台的桌子前面,同他一起登上讲台的人站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围着。由于讲堂太大,谁也搞不清楚谁,后来才听说,我在日本时候的那位教书的朝鲜学生——这时候他在北京大学担任朝鲜语讲师——也在场,可是当时我全然没有顾上,大概是注意力集中在鲁迅先生一人身上了,其余的就没有顾及的余暇了吧。

讲演会开始,主持者也没有致辞,鲁迅先生突然高高地挥挥手就开始演说了。那语言,当然是地道的浙江口音。当时北京大学诸位先生的语言,大多是浙江方言,因而我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了锻炼。我拼命地竖起耳朵来听,但是无奈满场的学生们总是发出“哇”、“哇”的叫声,甚至有的还站在凳子上叫好,我即使稍微听明白一点,就立刻又被

叫喊声、怒号声吵得听不见了；就是在讲台的最前面也不行，只能作为单词听懂一些“人道主义”呀、“胡适的新风”呀等，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甚至连讲演的题目也没有搞清楚。

没有办法，只能在过道上等着，听见的只是某些单词和学生们的叫声、掌声和走动声。就这样，鲁迅先生讲了三十来分钟，被包围着走下了讲台。不用说，讲堂里还是拍手、顿足和怒号。这就是“漩涡”吧！

然而，在这里我亲眼看见了文学革命，并且坚定地看到了鲁迅先生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等这阵骚乱平静之后，我问站在边上的学生：“是鲁迅有名呢，还是周作人有名？”那位学生用轻蔑的语调说了声：“他呀！（指周作人）如果用日本话来说，那就是‘あんつらもの（什么东西！）’”弟兄两人今后会如何，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有命运的吧，然而，这位学生的批判，至今对我还是一个教育。

那时候，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中有一些对考古学有兴趣的朋友，希望访问鲁迅先生的家。为此而拜托那位朝鲜语讲师，我也希望加入这些朋友的行列中。讲师先生看上去似乎有些为难，他认为让鲁迅先生为几个少数人而停笔，有些不好办。我们这些在北京大学的日本听讲生，原先在日本也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了，终于，我们大家就一起去了。

考古学者们之所以访问鲁迅先生，是因为先生收藏了六朝造像的拓本。在鲁迅先生家的一间屋子里，先生把几种类型的拓本拿给我们看，使人惊奇的是先生的保存方法，据说北京大学的拓本全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拓本都有衬里，有不少是鲁迅先生自己亲手做的——用很整洁的裁剪得一定大小的纸做成衬里，所以拓本一点儿也没有损坏。因为衬里裁剪大小一样，每一个拓本的大小也就一样，所以整齐地迭在一起，寻找任何一个拓本都可以很快地把它抽出来。鲁迅先生说，这些造像几乎都是河北地区的，有一个是江南的东西。他拿出几份拓本说是送给我们，每人一份。

其后，话题转到了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收集拓本上。先生说：“那时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的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弹压。谁要是批评政府什么，立刻就会被特务逮捕，当然，抓去的人是决不会再回来了。甚至在家里说一句话也会被捕了去，因为家里的厨师、车夫什么的，也全都是特务呀。我原来就喜欢拓本、绘图等，为了逃避这种危险，除了

拓本之外,其余一切都不说了。家里有客人来访,就只说些拓本的事;在旅途中与朋友也只谈些拓本的事,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的脑袋还连着身体哩!”

在鲁迅先生的《故乡》中,有这样的一段:不曾知道挂在水果店中的西瓜有着这样危险的经历;我也全然不知道,在鲁迅与拓本之间,还有着这样危险的回忆。

鲁迅先生当时所说的话,我们全都能很好地理解,因为先生是用很慢的日语说的,恐怕藤野先生对鲁迅先生语言上的帮助也还记着吧,先生是用很准确的日本语语法说话的。

这次拜访鲁迅之后,我立刻去北新书局,把那里摆出来的鲁迅著作全部都买了下来,仔细地阅读。第二年,即昭和五年(1930年)我回到了日本,当我重新登上京都大学的讲台的时候,我就把鲁迅先生的《呐喊》作为最初的教材。当时的日本学生,还只习惯于讲读中国的《古文辞类纂》之类,当我使用红色封面的《呐喊》作教本时,他们都大吃一惊。恐怕在日本的大学里,把鲁迅先生的著作作为大学教材的,我是第一人了吧!当时,我听一些学生说:“先生,你这是发难者呀,还是赶快作罢吧!”然而现在,讲读鲁迅先生著作的日本大学生却是越来越增加了。

我们究竟是在哪月哪日访问鲁迅先生的呢?对于我这个不记日记的人来说,真是忘却了;然而,鲁迅先生《日记》上却清楚地记着这一天——“5月31日”,那距今已是37年前的事了呀。

陆晓燕 译 严绍箴 校

(《大安》1996年10月第12卷第10期,日本大安出版社)

鲁迅和我

[日本]镰田寿

见 面

我和鲁迅先生初次相见,是1929年夏天,在内山书店,由内山老板介绍的。当时,内山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福民医院(日本人经营)对面叫魏盛里的一条小路上。

鲁迅先生穿着朴素的长衫,完全不像一个文豪。那时,我已在内山书店,直到1941年4月,我在内山书店工作了11年(我在内山书店的情况及后来离店的事情,这里就从略了)。这期间,遇到“上海事变”(按:指一·二八事变)、“日支事变”(按:指八·一三事变)两次战火。“上海事变”时,我的弟弟诚一一个人守店,“日支事变”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从7月日本军队在杭州湾登陆,到上海周围的中国部队败退到南京的两个月间,因为那一带变成了战场,我们奉命退避,从北四川路逃到虹口,并被困在那里。

当两次事变发生的时候,内山夫妇都回日本避难,半年多没回店。因此处理战后的一切事务,就成了我的责任。内山老板之所以两次都没有立刻回店,是因为夫人生病,正在疗养,也恐怕是为了保身,君子不近危境。然而直接的原因搞不清楚。只因为我是和老板关系亲近的人,他又有充分的不回来的理由,老板已经受到了注意,所以就由我来代管店务。那个时候,和中国人亲密交往是有危险的,或者会感到危

险,这在现在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景云里的鲁迅住宅

1931年柔石等被逮捕的时候,鲁迅先生从景云里搬到与田丰蕃先生经营的花园庄避难。那时,同内山老板商量,在鲁迅先生原住址的门上,钉了“镰田寿”的门牌,因为做了准备,那个宅子没有被官兵骚扰。

花园庄在租界内,实际的经营者的又是日本人,在中国警察的权力之外;而景云里在租界外,处在蒋政权的统治之下。景云里是一幢三层楼的上海式的许多家共住的房子,是鲁迅先生和夫人许广平共同经营的最初的爱巢,也是独生子海婴诞生的地方。鲁迅一家在花园庄住了约一个月后,搬到北四川路的北川公寓的三层楼上。那儿离内山书店的距离约一百米,隔着马路是工部局设立的大学预备学校,左手是日本陆战队本部。当时的内山书店已从魏盛里迁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口。

我在书店的工作是经营一切邮购。老板很慷慨地赊卖,他对中国人总是“好!好!”地满不在乎地赊给他们,于是,那些请求、收款、督促都成了我的事。办公室人手少,势必难得参加内山书店有名的火盆漫谈。出入书店的中国人很多,大部分书都卖给了中国客人。鲁迅在开始的时候,表面上是作为留日出身的客人,很多中国人在店中说日本话,鲁迅也不完全用中国话。

上海事变

上海事变是1932年(昭和七年)1月28日拂晓爆发的。我的上小学一年级的长子在1月5日,因患麻疹而死,我正处在悲戚的丧事中。我的家在租界外面,因为附近已经变成了战场,28日早晨,我抱着儿子的骨灰盒,一家五口,在战火和炮声中逃到租界内虹口附近的朋友家里,然后避难回国,到了故乡福冈。

鲁迅先生从北川公寓到了内山书店,然后再到租界内四川路三马路的内山书店支店去避难。内山书店的支店,是在一座古老的西洋式五层建筑的三层楼的一个房间里,平常是不能居住的。内山夫妇也回

国避难了,只有弟弟诚一独自一人没有走,留守店门。当时,他怎样照料和帮助鲁迅一家,弟弟没有详细地说,我也没有细打听。弟弟对油画感兴趣,常常拿着画笔,每次他都催着鲁迅办版画展览会,并帮助收集、布置。

在这一点上,诚一似乎要比我跟鲁迅先生更亲近些。事变到2月末停战了,我只身回到上海,和弟弟两人修复了被弹片损坏的店门,又开店了。接着,中国店员也回来参加工作,内山老板指示,支店也要开张,我去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鲁迅。

当时,鲁迅一家睡在地板上,连床都没有,生活实在很苦。我不忍心把老板的意图告诉他,那种困惑的感觉至今难忘。

事变后,鲁迅一家又回到北川公寓,后来(1933年4月)移居大陆新村。

《文交》

《文交》是由内山书店每月编印发刊的新书索引的刊名,刊的题字是鲁迅先生写的。那时,鲁迅就说明是“文化交流的缩写”。序言中记载着内山老板得意的漫谈。我担当着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物、上海税关、工部局等刊物的介绍工作;日本的新书,由年轻的店员负责介绍。从上海事变一直到我离开书店,这份刊物一直散发给中国和日本的顾客。

改造社版的《鲁迅全集》

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上海,和鲁迅先生、内山完造君一起在六三花园的松月亭吃饭,决定由在上海的鹿地亘、胡风等人担任编辑,由改造社出版《鲁迅全集》。以后山本社长游览了苏州、南京,我作为向导,与他同行。在南京,山本社长希望会见蒋介石,他精神百倍地到了日本公使馆,然而却没有达到目的。第二天,在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拜访了院长蔡元培先生,山本社长的近似不客气的谈话,给翻译带来的困难,也是至今不能忘怀的。

那以后的一天,鲁迅先生到内山书店来对我说:“镰田先生,这是给你的。”说着递给我一幅蔡元培先生赠送的亲笔条幅(横幅),上面是这样写的:“风生江浦千帆晓,月落山城一笛秋。镰田先生正 蔡元培囍”。

蔡元培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同乡、前辈,在教育部和在北京大学都帮助过鲁迅先生。直到鲁迅先生去世,都在保护着鲁迅,他是中国学术界的元老。

鲁迅先生对这位蔡先生怎样讲了我,又是怎样要来了这幅字的,鲁迅先生没有讲,我也没有问,只是感到非常荣幸。战败后引渡的时候,这幅字和相册一起,被艰难地带回来,并长期地保存着。3年前,裱糊了以后挂在自己屋里,朝夕仰望,就像再一次看见鲁迅先生,并亲切地回忆起蔡元培先生。

《两地书》

用出版情书积蓄款子招待客人,是受了鲁迅的启示,那就是出版了汇集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夫人的通信——《两地书》(1933年4月发行)的时候。地点是鲁迅先生的住宅——大陆新村,客人有内山夫妇,和我们一家(夫妇和孩子三人),还有他的三弟周建人出席。大家围坐在一起,由广平夫人亲手做了一桌菜,高兴地过了一个晚上。当时鲁迅先生的爱子海婴4岁左右,和我的女儿同岁。

粽子和荔枝

一到五月节,广平夫人就要把广东粽子送给老板,还有镰田,各一包。广东粽子和日本粽子不一样。广东粽子有拳头大,分为在糯米中放甜枣、莲子和放猪肉两种,很好吃。还有,过去杨贵妃喜欢吃,玄宗皇帝为此特意从远方运到都城长安的荔枝,一到上海上市的时候,广平夫人就送来一笼给我和老板。鲁迅先生在世时,这件事是每年都要做的。鲁迅先生这样地待我,我只有深深地感谢,而且至今不变。

“要忍耐些”,内山总是这样劝慰鲁迅先生。内山夫妇是基督徒,对谁都很亲切,好帮助人,好说话,对中国人也是敬慕的、信赖的。然而,

对于和他朝夕相处的我来说,我懂得老板是要锻炼成为立志刻苦奋斗,终于成功的人。夫人是一个不生孩子的女丈夫,使人感到具有巾帼女子特有的性格,这种感觉,鲁迅先生也有。

对于我来说,鲁迅先生有慈父般的眼睛,慈父般的容貌,而不是横眉的烈士、革命家、写作《阿Q正传》的大文豪,更不是毛主席说的“新中国的圣人”。他穿着粗布长衫,夹着白布包袱皮儿的包,戴着礼帽,穿着中国鞋,悠悠然地走来,鲁迅先生那青白色的脸上,常常带着一点寂寞的忧愁。

《海上述林》和三闲书屋

鲁迅先生为了悼念瞿秋白的死,把他的遗稿汇集成《海上述林》一书,出版、印刷是靠岩波书店,清样是我拿到岩波书店去的。用绿色天鹅绒装订的豪华的本子,定价5元。当时定价为5元的书,在医书、法律、化学、农工一类的专业书中,也算是高价的。在上海,还是初次出现这样豪华的书,内山书店代为出售。

鲁迅先生用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他晚年著作的廉价本,委托内山书店出售,交我办理。就像谚语说的那样:染匠穿白裙——自顾不暇,我虽然办理着鲁迅的著作,但是却没有认真地阅读。仅仅读过文库本的《阿Q正传》、《藤野先生》等几篇文章,没有那种想要探求所谓鲁迅精神的使人钦佩的心情。

镰田诚一墓碑文

上海事变的第二年,弟弟诚一为了养病回国了,由于药物无效,终于在1934年5月去世了。第二年,一周年忌日的时候,哥哥五郎想建块墓碑,托我找人写墓碑上的字。在这之前半年,我在故乡营建我的长子的墓石时,曾请上海书法私塾主人小岛先生执笔。因为满意他的笔迹,所以信上说诚一那份也请小岛先生写。我与老板商量,因为诚一君是为书店工作死的,所以墓碑请内山书店代建,并希望鲁迅先生执笔。鲁迅先生除了写墓志铭之外,还赠以追悼文。那时,他还为我恳切地说明

了这些字的读法与意义,我非常感谢,把说明和建设费(80 日元左右)一起寄给哥哥五郎。墓碑的正面写着“镰田诚一墓”,背面是鲁迅先生写的悼文,侧面写着“上海内山书店建之”。鲁迅先生写道“忝居友列,衔哀记焉”,把弟弟诚一作为朋友。1935 年 5 月,大阪《朝日新闻》以“来自文豪鲁迅先生写给恩人的碑文”为标题,作为日中亲善的美谈加以报道,其他各地的报纸也报道了。战败后,所谓的民主、平等思想,把我的故舍也刮没了,改变旧的价值观、道德观,破坏了旧时的墓地,当地的人们决定建设骨灰堂,并且实行了。那时,哥哥五郎没有注意保存重要的诚一墓,结果墓碑也失落了。我当时已经移居福冈市内,知道墓地被破坏,诚一墓碑丢失,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真是遗憾得很,完全对不起鲁迅先生、内山老板,只有谢罪了。五郎兄死前半年哭着对我说,想再建诚一的墓碑,但是遭到家族的反反对,很难实现。我也极力主张:原来的墓碑是上海内山书店建的,一定要再建起来赔偿损失。这以后,哥哥没能活多久,前年 8 月去世了。

许广平女士

鲁迅先生去世之后,夫人移居法租界。听说她在日支事变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我因为离开了内山书店,也就没有再碰到她。

1956 年(昭和三十一年)八月,为参加第二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广平夫人第一次来日本。得知她从长崎的归途中要经过博多车站,我们夫妇前去车站月台,在车窗旁与她相见,依依不舍。当时,广平夫人还问“小妹妹怎么样了”,那是指我的小女儿,她与海婴君同岁。

广平夫人第二次来日的时候,在福冈,我们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主办的欢迎会。我在会场入口处等她。当夫人退场的时候,我碰到了她,她对我说:“一会儿还要去参加其他会,10 点回饭店,没什么事的话,请到饭店来。”我和妻子在日活饭店拜访了她。从她那里知道海婴君已经是 3 个孩子的爸爸了,还谈了内山老板赴中国访问时去世了,以及上海的近况等等。与她同行的年轻的妇女很惊讶,打听我们是什么关系,广平夫人笑着回答说:“老朋友了。”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才告别。许广平夫人满头白发,长相端庄而温和,已经是一个老婆婆了,而今夫人也

已经去世了。

鲁迅是一个热爱自己民族,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正因为爱,所以就毫不宽容地指摘与痛骂它的缺点和弱点,奋笔先天下之忧而忧。然而他的生活,虽然还不到像爱儿被迫饿死的杜甫那种程度,却也贫苦、困难。鲁迅和中国的读书人、诗人一样,他们的文章和诗只有为天下,才算是有血性的吧。增田涉先生曾说:“就我个人来说,直到目前我所接触过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日本人在内,与任何人比起来,在人间,我最尊敬鲁迅,感到他的亲爱。”我也有完全同样的感觉。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直到今天,我如果闭眼一想,旧时的人们,特别是中国的人们,上海的学生时代,中华汇业银行时代,内山书店时代,全国商业总会时代的人们的脸庞,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然而现在他们都几乎成为故人了,活着的人们也没有再见的希望了。“人生不相见”,我余下的生命不多了。每想到这里,徒增我的寂寞忧愁。

写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八月十五日。

陆晓燕 译

(《鲁迅之友会报》,第55号;《鲁迅研究资料》第9期)

在上海的鲁迅

[日本]木村重

出乎意外的伟人

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怎么说呢?我颇感困惑。我不如大家,没有研读鲁迅的文学著作,也缺少文学素养,而且同鲁迅,也没有深交。犹如一位男性想起街头鱼铺,中国鱼类那样。大家到会,我感到不胜荣幸。

我只知道鲁迅是一位普通人。当然,鲁迅是世上的伟人。但即使现在,我仍未把鲁迅看得那样伟大。简而言之,就和同级在两个班的人交往,仅仅结识了一下。1931年,我来到上海,见到了鲁迅先生。

大正时代结束,中国和日本之间签定了文化协定,在上海建立了自然研究所,北京建立了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些都是拿义和团事件的赔偿金造的。当时的中国是国民政府,日本方面是外务省,由这两方面,日本和中国学者参加,开始对中国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进行研究。在日本,以京都大学为中心,建造了图书馆。那里收集了中国各类书籍,藏有历史、文学等书目,进行人文科学研究。在上海,有医学、药理学、化学、物理学,还有生物学,进行纯科学研究。因此,即使是医学也不是从盈利角度出发。对一个鱼类研究者来说,因生在农村,因而选了这个专业。那年,大约27岁,作为一个生物学部长,我加入了自然科学研究所。

这以前,1928年我曾由日本外务省资助,沿长江来到四川省。这件事,我曾在《中国》杂志(1970年3月号)上提及过。我的先生岸上谦吉,在金枪鱼研究领域,是世界权威。先生是退休后辞去工作的,这是先生的宿愿。先前去调查长江鱼类,是我陪同先生的。此外,又带了3名中国学者,乘船沿长江而行,最终到达四川省。岸上先生劳累过度,在成都死去。昭和六年(1931年),在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之际,我前往上海。

留胡须的老人

提到鲁迅之前,应当谈一下内山完造。大家早就知道吧,内山在上海开设书铺,他是药铺老板,所谓“两根扁担肩上挑”,是一个在中国地方巡回的卖药郎中。他是卖富士眼药的,正因为这样,内山先生很详细地写了关于中国民情的《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话》。因此,我搞鱼类调查、拜访了内山先生,并什么都向先生请教。如动物学、鱼类学……他尤其知道不少生活上的事情。谈到这些事我经常去内山家。内山家是鲁迅先生的来访之处。当年,内山书店处在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我住在施高塔路。我工作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在法租界,离我的住处很远。去研究所有专线公共汽车,乘车回家,顺便去内山住所,自然能听到许多事情。内山书店读者来自四面八方,也常有日本读者,但多半是中国读者。客人一到,内山先生便请茶迎接。内山嗓子不怎么好,有重重的嗑嗑的喉音。然而他的妻子招待得很周到,给围着桌子、天南海北地大谈一通的客人沏茶。

一到内山书店,常常有一位身穿蓝长袖衫,脚穿棉布鞋,留着胡须的老人坐着。桌上有红纸包装的强盗牌香烟——画着手持大刀的海盗。这是贫民吸的。把烟丝装在烟管里。那嚯罗罗吸着烟的就是鲁迅先生。

最初的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他是鲁迅先生。后来,内山老板说,留胡须的老人就是鲁迅先生。听说这位老人是有声望的,我吃了一惊。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藤野先生》,在日本也翻译了。我读《阿Q正传》大概在中学一二年级。那时,我不懂什么叫革命,因此,对于有一

点气概的阿Q,精神面目是神气活现地飞跑的形象很感兴趣。我阅读《藤野先生》,记得是进了高等学校以后。

我拜访过鲁迅先生。实际上,我是调查中国的水生生物问题。

可是,令人惊奇的是,鲁迅先生非常了解动物、植物问题,还有中药。这真的是鲁迅先生吗?我以前认为他仅仅是一个文豪。后来才知道鲁迅学过医,后又退学立志文学,从日本回到中国后,一度在浙江师范学校当生物和化学先生。这个时期,鲁迅攻读生物,因此知道那么多知识是理所当然的。

从那以后,鲁迅先生刻苦攻读中国古书。鲁迅说,不读古书,就不知现代事。事实上,我调查过的鱼的习性、食性的学问,中国古书里介绍得很详细。那时,我大量地买古书。当时靠工资是不够的,所以向父母要钱,一个劲地买书。尽管买书欲望很强,但也有很难买到的书。我把难买的书告诉鲁迅先生。鲁迅不但介绍书的内容,并指出去哪里买。而且鲁迅带我去买过书。我和鲁迅先生这样的接触,与其说是与文学家接触,倒不如说我在同一位生物学家接触。这话虽然有点失礼,但我确实以为这样——同一位生物学家的接触。

第二回拜访周先生

出于一种偶然,我和鲁迅生活在同一幢住宅。有关鲁迅书库这件事,我在《大安》(1976年10月号)的小杂志上写过。第一次上海事变的发生是在1932年1月。那时,我让家属返回日本。然而,一家三口遇到了许多周折。但这年春,战火稍有平息,我想让家属再来上海。寻找房子的事得到了内山先生的帮助,住所是狄思威路776号,找到了一间适合的房间,就和家属一起生活。记得这年2月末3月初,我去内山书店,老板说:“周先生住你那儿二楼房子,请多关照。”我当即表示:“可以,可以。”当时,是上海事变的次年,日本和中国关系当然有所恶化。那年,中国国内反动势力猖獗,对面就是蓝衣社,即秘密警察。残杀百姓就从那时开始的。当然也被中国的解放者揭露。总之,这是一个异常恐怖的年代。那些“自由主义者”会突然不见踪影,而被杀害,投进那条黄浦江,因水深泥土厚,死者不会冒上来。那些较有名气的人,经常下落

不明。当时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众所周知,鲁迅原名周树人。内山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周先生。这恐怕是违背鲁迅先生意愿的。我想这无疑是鲁迅先生了。但是,二层楼已被一个在日清汽船上工作的叫小岛先生的借去了两个大间。这样就只有一间面对空地的朝南房间。要去那间房子,一定得通过我房间边的阶梯。那里既无厕所又无浴室,他们怎样生活?虽是他人之事,我为其担心。况且,鲁迅先生已和许广平女士结合有了孩子了。

上下堆满了书籍

鲁迅搬家这件事,我对妻子是守口如瓶的。以后便能看到鲁迅进进出出,而且经过我们那儿。女佣人扫地打开鲁迅房门,就能看到房间里。呵,尽是书!除了窗户,房壁上上下下堆满了书,床铺也沉沉的。房中央有一个书桌,桌上摆满了书本。古书、洋书、日本书、版画集都很多。报刊和杂志堆成小山。有一个桌子和椅子,放别的书。这就是鲁迅先生的书斋。

恕我失礼,用不妥的辞藻形容,他的房间使人有煞风景之感,仅仅是为了读书的书房!只有一个水瓶,一个茶杯,写了一半的稿纸,零乱地放置,为何有这么一个书库,我不知道。也许是他的家里书放不下了吧?鲁迅先生的家在内山书店里屋,这里是鲁迅先生的书库。有时鲁迅也来我的房间,大约喝上一杯茶。鲁迅很喜欢孩子,常常抚摸我孩子的头。孩子们高兴地叫他“周先生”。当然,对于伟大的鲁迅先生,孩子们是不知道的。女佣人只知道他是“周先生”。

俭朴的生活

我曾去鲁迅先生家二三回,但只在门口将借的书还给他。屋里未曾进去过。屋里有一位太太,是许广平夫人。对于她,日本文学者给予高度评介。我对她直言不讳地说,有点不喜欢。她对不熟悉的人总是不冷不热,睁大眼睛凝视你。我说:“今天把书还给鲁迅先生。”她说“啊,是吗?”就是这个样子。当然她是一个地道的好人。也许我看过

于苛刻了吧？

鲁迅的住宅现在成了纪念馆，当年叫大陆新村。那个时候，日本文学家住着华丽的洋房。鲁迅不这样，所谓一间长屋，在房子的一角，最大的10坪（1坪=3.306平方米——编者注）左右。院子也很小，他过得很朴素的生活。鲁迅先生是个勤奋读书的人。新书刚出版，他便去内山书店预定。只要进新书，内山首先送给鲁迅先生。其中有文学书、哲学书、生物学讲稿，童话书，还有玩具制作法、烹饪、影画研究，这些书都是鲁迅先生用自己的稿费买的。鲁迅的稿费与日本文学家相比是很低的，除了用来糊口，还要买书。鲁迅先生就是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

精力充沛的生活

事实上，鲁迅搬来我处的第二年，我就搬出了狄思威路。我的二儿子患赤痢，不久死了。那时，我因广岛大学有个动物学会会议，去了日本，而且是讯息很急，匆匆忙忙地走的。为我二儿子的死，我请先生写了悼文，可是因战后的混乱丢失了。我是多愁善感的人。由于丧子的悲痛心情，于这年12月我搬了家。鲁迅先生的书库是否一直还在那里？事实是，鲁迅健在的第二年仍在那儿。

再说些题外话。我叫木村，如同“高桥”、“佐藤”一样，不论在哪里，都有这个同名同姓的人。所以我使用俄语写姓名、门号。当时，在上海流亡的白俄很多，或许他们都以为我也是白俄。并且与白俄混在一起，夜半醉汉鼾声大作，使人很窘。最终我只好拿下用俄语写的门牌。我向鲁迅提到这件事，鲁迅笑着说：“这对你不是很好吗？”我与鲁迅见面是在内山书店，平均每周有一小时能在一起畅谈。这样的相会，持续近3年。鲁迅说话镇静、慢条斯理，态度很温厚。他很喜欢电影，今天看了无味，明天再看。有时感到无聊，就带着海婴一起看。他们的生活一般说是舒适的，但从没看到鲁迅穿洋装，穿皮鞋，他专穿中国的高帮丝棉鞋，留蓄着胡须。而且他似乎从不刮胡子，也许鲁迅胡子不长吧？鲁迅常常把手放在口袋里，燃着香烟走路。但鲁迅决不走马路中央，而是在路边悠悠地走着。内山书店常常打电话给研究所，说鲁迅发现了新资料，但我自己却不当一回事。研究所距离内山书店有4公里，这段路程

要乘出租汽车。我到内山书店后得知,这是鲁迅先生特意打电话让内山告诉我的。因为这样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式了。鲁迅先生自己看到的好书,他是不会武断地帮我买来的。大概他总是考虑我的心情。这种办法不错,他常常为我发现新书而尽很大的力。

鲁迅笔名取自《罗亭》

是的,关于鲁迅的笔名,曾听鲁迅先生说过。“鲁”为山东省,“迅”有疾驰和激励人之意。我问先生:是浙江人吧?为何起“鲁迅”?先生说,这是俄国人名,此名很不错,故取之。鲁迅还说,“鲁迅”取自屠格涅夫的《罗亭》。后来在自然科学研究所时,我出版《自然》同人杂志,曾请鲁迅先生题过字,他说:“好啊!”爽快地接受了要求,在内山书店写了题字。这是鲁迅逝世前一年的事。然而,此事我未曾谢过,仅赠过一册创刊号新杂志。

今天,我依然认为鲁迅是我的先生,我蒙受过先生的亲切教诲。然而,我是一个不肖弟子,很对不起先生。

总而言之,以上是一些不成文的闲话,承蒙赐教。

附 注

木村重生于1930年,日本东京帝大水产学院毕业。1926年至1945年,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物学部长。

季昌华 译

(1973年8月第57号东京鲁迅之友会会报《鲁迅》)

鲁迅印象记(节选)

〔日本〕增田涉*

一 绪言(略述认识鲁迅及受教经过)

开始知道鲁迅的名字,是在哪年哪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在旧制的高等学校当学生的时候,同班有一个在台湾生长的洪君,他在阅读中国的杂志、小说,我和他相当亲近,大约是从他那儿听见过的。或者是,因为当时在看京都大学的人们所办的《支那学》,在那杂志上刊登了青木正儿^①所写的《围绕着胡适的新文学运动》的文章,才开始知道的。当时的事情已经不清楚了。那时是大正末年(1925年)。

直接读鲁迅的小说,是上了大学之后。同班的辛岛骁君^②,利用暑假到中国旅行,在北京会见了鲁迅,得到那时候鲁迅他们出版的《语丝》等。他回到东京,和同班同学商量,筹划成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会一类

* 增田涉(1903~1977),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31年在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相识。同年3月到9月,为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几乎每天到鲁迅寓所请教。两人关系渐渐密切。其所译《中国小说史略》由鲁迅作序。鲁迅逝世后著《鲁迅印象记》,为研究鲁迅生平、作品和思想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

① 青木正儿,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曾在我国北京大学学习,后任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等书。

② 辛岛骁,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见过鲁迅,并互赠书刊。

的团体。第一次会是评论鲁迅的文学。我也在会(实际只有四五个人的集会)上发表了类似批评的意见。记得是读了《故乡》,断定那是牧歌的抒情性的东西。总之,当时连鲁迅的文章都没有读过,因为记得读起来是很困难的,一定不明不白地瞎唠叨了。不过那研究会也只开了一回就停止了。

鲁迅的名字成为难忘的东西渗透我的头脑的,倒是由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在大学听过盐谷温先生^①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课,在那时,关于中国小说史,盐谷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说得最详细,被认为在小说史方面是最高的成就。正在那时候,出现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那材料的丰富和体系的完整使人惊异。因为当时谁也不注意,所以他给与新的研究的启发是不不少的。受了它的刺激,盐谷先生完成了明代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研究,弄明白了《今古奇观》的成立系统。我和长泽规矩也君^②、辛岛骁君同去上野图书馆查考《醒世恒言》,查考三言的编者冯梦龙,研究的辅助工作是很多的,那都是以《中国小说史略》做引导的调查、研究。从这样的工作中,我深感到《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划时代名著。而这正是我刚入大学的时候,这《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的确是惊人的学者——这样的尊敬的念头就深深栽进青年的头脑里,还不止我一个人,当时的同学,谁也一定是这样。

我出了学校(虽然在学校时已经开始)不久,就做佐藤春夫先生^③的助手,从事中国小说的翻译等工作,很想到中国去看看。当一千页左右的长篇翻译告一段落的时候,趁即便决心去上海。这是昭和五年(1930年)岁暮的事情。由于船的便利之类,第二年3月到了上海。最初只打算旅行一个月左右。当时对于中国文坛的事情,并没有特别注意,最初也不知道鲁迅在上海。只是因为得到佐藤春夫先生给内山完造先生的介绍信,一天去访问内山书店,恰好听说鲁迅正住在上海,而

① 盐谷温,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曾任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和鲁迅相识,并互赠书物。著有《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书。

② 长泽规矩也,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在我国北京大学学习。

③ 佐藤春夫,日本现代作家,中国文学介绍者,尊敬鲁迅,并翻译过鲁迅的作品。

且每天都到内山书店来的。

我想,这是了不起的人,什么都得向他学习吧。在前面说过我对于他的尊敬,是由于《中国小说史略》,不过也知道作为作家,他是中国的第一人。因为曾读过上海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集》,又稍稍翻阅过上海发行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

最初会见他的印象,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如果那时自己是暂时的旅行者,和鲁迅只会过一两回面,也许到现在还能够鲜明地记起当时的情况吧。但是后来一直经历了10个月,每天都和他接触,所以那第一个印象就自然地消失了。

总之,我怀着向他学习的心情,最初是计算着他出现的时间每天到内山书店去。大约是由于我问他学习中国文学,应该阅读什么书籍才好吧,他便给了我他所写的回忆幼年时代的《朝花夕拾》。我把它带回住所去读,不明白的字句或内容,第二天到内山书店去向他请教——这样继续了一段时间。《朝花夕拾》是回忆他幼年时代(以及留学日本的时期)和那周围情况的,其中特别回顾了中国的生活风习和生长于其间的人的幼年的梦。这对于从外国来的,而且要学习中国事物的我,首先必须知道中国的生活风习及其气氛,——我想他大约是从这样的用意出发的。那是一本不到200页的书,1个星期左右就读完了。其次,他给了我散文诗集《野草》。虽说是散文诗,却不是抒情的^①,多数寄托着激烈的愤怒(具有政治的意味)。他为什么写作这样的东西呢?在缺乏对当时具体情况详细知识的我,真正是不好理解。只是由此知道,眼前显得消瘦而苍白的他,是具有沸腾着的强烈愤怒的感情的人。

跟着开始了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学习,这是本来就打算翻译的(内山完造先生也劝过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听他讲解的。那时候,已经不是在内山书店的店里头,而是直接去鲁迅的住宅了。在内山的“漫谈”(当时这样说)一结束,就和他一道去他的住宅(从内山书店到他家约两三分钟的距离)。然后,两人并坐在书桌边,我把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念不好的地方他给以指教,关于字句、内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彻底地询问,他的答复,在字句方面的解释,是简单的,在内

^① 著者这里所谓“不是抒情的”,即不是牧歌式的那种抒情的意思。

容方面,就要加以种种说明,所以相当花费时间,大约从午后的两点或3点开始,继续到傍晚的五时或六时。当然也有时转入杂谈,或参加他对每天发生的时事的意见或批评,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消费在那本书(《中国小说史略》)的讲读上。那时,因为他跟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大致上没有客人。在那宽大的书房兼客厅里,广平夫人在稍远的地方,干着她自己的工作(读书、抄写、织毛线等,他们的儿子海婴,大都由保姆带了出去,不常在屋里),没有什么人打扰,我得以充分地接受教导。许寿裳所作的鲁迅年谱,那是根据鲁迅自己的日记编的,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七月项下记有“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①当这事完毕时,我松了一口气,我想他也松了一口气吧。后来,《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的讲解完毕,是在那年的岁暮。所以我在那一年里,是春、夏、秋、冬,每天都进他的书房;而且一天约3小时在接受他的个人教授。每天还受到广平夫人给以点心或茶水的招待。每星期还大约有两次在他家吃饭。他没有厌倦,而是把手谆谆教导,我说不出感谢的话,就是直到现在也还感到他的恩情。

二 鲁迅重视自己所写作的东西

对于鲁迅的印象或回忆,以前我也写过,但是写过哪些事情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我没有把写了的东西保存并加以整理的习惯,虽然多少写过些东西却都散失掉了——由此想起,鲁迅对这样的事情却是规规矩矩的。他把自己所写的东西完整地保存下来,到了具有相当的分量,就结集成一册一册的书送到世上去。从《热风》到《且介亭杂文》,许多随笔杂感集都是这样做的。短章断片也集合起来,按年次编辑。要是还有遗漏,就把它另集成《集外集》^②出版。从这种事情看来,他是把写作,把所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当做自己生存的意义。写作和发

① “后来出版了的《鲁迅日记》,7月17日项下:‘下午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译者按:此条“追记”原来插在正文里,现在改为附注)

② 按《集外集》,是杨弄云同志搜集付印的,但鲁迅给以指导,提供资料,并写了序言。

表的事情,可以认为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不是把自己写的东西选择出版的,他是把所写的一切,甚至断简零墨,无遗漏地照样投向世间的。虽然在他死后,有关的人为出版全集把一切收录下来,但他生前已经由自己的手把自己所写的东西逐年出版了。应该说,执笔著作就是他的生活本身的证据。和这相关的,我想起他有时对我说,什么都好,要无顾忌地写,如果有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给以修正就行了,不要一开始就想写出完整的東西。这话虽然有鞭策小心翼翼的我的意思,但也可以认为是恰当地说明了他自己执笔的生活方式的态度。

三 鲁迅的性情、状貌等

回想到鲁迅同时浮现的,决不是教训说教的、可怕的、讲客气的人,而是和蔼可亲,完全可以信赖的,因此能够坦白地说话,毫不感到威严之类的重压。作为朋友,年龄相差颇大,要说是老师,又不觉得那么敬畏,总之,显得是个惯于得到人信任的人。一句话,就是什么都可以说,而又什么都肯听的人。从文章看来,他好像有些可怕的样子,自然具有威严、矜持;但是,实际上我日常接触的他,却是个好叔叔,连那漆黑的髭须,也增加他那幽默的可爱。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

他夏天穿白色的中国服。但是在我眼里最有印象的(他在室内的常见的形象),是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因为他不大进理发店,服装也从来不注意,所以有一次,他为了看望一位英国人,要到某大厦的七楼去,管电梯的中国人,当他是可疑的家伙,把他赶开说“向那边去!”他没有法子,只好一步一步地上到七楼。我听他说过这件事。对于这,他并没有特别生气,是当作笑话说的。总之,在他的动作、表情上都显出不介意的样子。倒是香烟不离手,因为是便宜的香烟吧,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头发也有时剪了,大概由于剪发的事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

他的鼻子并不高,稍微有点向上,关于这,最近鲁迅的侄女(周建人

的女儿)周晔(我出入鲁迅的家那些时候,建人先生时常带着夫人和小孩们同来,因此周晔君我是应该见过的,但是现在已经忘记她的样子了),写了回忆伯父鲁迅的文章,谈到他的鼻子。

当她做小孩的时候,把伯父的鼻子和父亲的鼻子相比,看来伯父的鼻子跟父亲的不一样,它显得低,而伯父和父亲的脸孔却很相似,只是鼻子不同,——当她带着疑问说的时候,鲁迅回答说:“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鼻子是跟你爸爸的一样。可是到后来,碰了几次壁,就把鼻子碰扁了。”又说:伯父的“四周围是黑暗的洞穴,还不容易碰壁吗”?①

周围是黑暗的洞穴,在黑暗的洞穴里继续地碰着鼻子走路——这是把他的生活原样巧妙地比喻的说法。人们说他的文学阴暗,那不外由于他的周围是黑暗的洞穴。不从那黑暗的洞穴脱身逃出,一面碰着壁,一面从内面捣毁着它前进。这可以说就是他的生活罢。

五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

我在日常生活方面和鲁迅相接触,除开前面说过的日常功课之外,有时候也同去看电影,同去看绘画展览,或者同进啤酒酒店;也在我的寓所接待过他,开牛肉罐头,喝啤酒。后来,我离开上海,还大约每月两次给他写信,每次都得到回答。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去世,他的最后回信,写在去世前四五天;当它送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是在广播里知道他逝世的消息后几天。书信,主要是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询问、解答,另外还添上一两页互相报告家庭状况的。他的儿子海婴的照片,也常给送来,有3张。我的大儿子出生时,他还特地寄来了礼物。所以我一谈到鲁迅,总是首先强烈地浮现出他日常生活的面影。眼所见,耳所听的他的姿态和声音,总是比文章里的他首先复活。直到现在我还是切身地感觉到日常的他,那文章上的他,有时甚至以为是另一个人。然而他的真正重要之点,倒是必须在他的文章里,通过执笔著作的所谓公

① 周晔:《伯父鲁迅的二三事》,原刊《新文化》半月刊1945年10月20日第1期。这里及下段所谓“黑暗的洞穴”,原文作“黑洞洞的”(很黑的意思),大概由于当时著者所据印本字迹不清致误。

生活里去看。阅读他的作品,自然就会知道真正的他。现在我要写关于日常的他的回忆和印象。也许对他的真正理解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但是只有一点,我想要唤起鲁迅研究者注意的,他说过自己是个文体家,而且除掉一个批评家之外,没有别人提到过^①,把他当作文章家看的时候,希望不要被作为文体家的文笔修辞所眩惑,而看不见那重要的东西。总之,就我个人来说,直到现在所接触过的人——当然日本人也算在内,和鲁迅比较起来,在为人上我最尊敬他,对他感到亲爱。这我多次对人说过,现在还是这样想。那不是把他作为文章的人,而是作为日常的人,直接地和他亲近所受到的铭感。回想一下,怎么会在我的心里刻上那样深的尊敬之意呢?那却是从我个人本位出发的,因为他对于我是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肯听的人。因为他是诚实的人。如果不是深信特别亲近,值得尊敬又足以信任的(这也许是僭越的话),那就不是什么都可以说吧?(如果不是相信他什么都肯听,就不会什么都说)当我听到他逝世的那个时刻,好像我心里依靠的某一部分失落了。我是那样地依靠着他的。因为我对于中国遇到不明白的事情,立刻就给鲁迅写信——就好像依靠着手边的字典那样。

六 鲁迅喜欢埋头苦干的人和 他对版画的爱好

鲁迅在性格上是诚实的,对于别人也喜欢那种认真的人——例如某些时候他要和一位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一道搞工作^②,问他为什么要和那样的人一道工作,他用信任的口气说,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认真、诚实是他最喜欢的。同时,他不喜欢浪浪荡荡的什么也不干。他自己不停地工作着。杂志的编辑工作,也热心地干,受了委托,就替人校订译稿。他曾经说过,人什么事情都不干是最坏的,就是像奈罗^③那样

① 文体家,原文是用英语 stylist 一词的译音“斯太里斯特”,这个词有人译作体裁家,也可译作风格家。鲁迅的话,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② 据说这是指巴金。

③ 奈罗,古代罗马著名的暴虐君主。

的暴君也比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人强些。生活在世上而“无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情。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①的话是骗人的，他讨厌它。他不喜欢作这种无为的说教的老子。在名为《出关》的小说里，他把老子漫画化了。就是暴君奈罗也好，因为在积极地干些什么。鲁迅这种思想，我以为是说明他对中国人——有闲知识人性格的一面的无为思想（这我想是从人类对于自然暴力无能的认识来的）的抗议。世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动不动就轻视它，他认为这就是使中国停顿不前的原因，所以他极力提倡勤勉努力。总之，做些事情，埋头苦干是最贵重的——这是他对中国人强烈的希望。他自己就是这样实行的。我所知道的时间，虽说只是一天的四分之一，但他在正午之前起床，直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都在书房里读书、写作。我曾经在夜里两点钟的时候，走过他居住的大厦（二楼以上都是住宅），那大厦别的窗户里全都熄灯熟睡了，只有他房间里的电灯辉煌地亮着。“先生正在用功呢！”我一方面感动着，一方面仰望着他窗口的灯光。五十多岁的人了，已过后半夜还在用功，这对于年轻懒惰的我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尽管这样说，但也没有觉得他在鼓励任何时候都不离开桌子死读书的。他的兄弟建人时时来访，常常一道去看电影。兄弟是有职业的人，整天过的是不能自由活动的生活，不能不偶尔休息一下——鲁迅怜惜地说着这种意思的话。我也大都被带着一道去看电影，看的是实况影片、纪录片或文学作品改编的片子。有时也去看绘画展览，回来时也进啤酒店。一天，他劝诱我说，不想去看看跳舞厅吗？于是，我们和广平夫人三人就去了。可是喝着咖啡看了一下，说这是没有意思的东西，不到10分钟就回家了。中国人搞的西洋风的舞蹈，因为得到入场券，也曾经一道去看过，他说是没意思的、肉麻的（恶心的），在开幕不到5分钟就回来了。

文学之外，他最喜欢的是绘画。对于古董好像没有兴趣。他当时所住的房子，任何一间（就是大厦的一个单元，约3间，另有厨房）里都没有摆设的器物，只是嵌着镜框的版画，丰富地挂在那些房间里。版画收

^① “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极端的唯心主义哲学。语见《道德经》第37章。原来“无为”上面有“道常”二字。

集得不少。外国的东西,是托商务印书馆从原出版处寄来的,也有在外国的朋友送来的。有格洛斯^①等的大幅的、印数非常少的画册;珂勒惠支^②的东西也直接由她(或通过珂勒惠支的朋友或鲁迅自己的朋友)送来;苏联的版画,记得是由苏联领事馆的斡旋,用中国纸去交换而从作者那里送来的。他对于中国的版画,也有好感,曾经和郑振铎共同搜集、出版过《北平笈谱》(出版时曾经送给我),《十竹斋笈谱》也复刻了(这在他生前没有完成,但他曾送给我两册印刷样本)。

九 鲁迅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别国好

歌人柳原白莲君^③从日本到上海时,因为想会见中国的文学家,由内山完造先生的照应,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一个饭馆里见面,我也陪了席。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他说中国的坏话,正好像父母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儿子:这家伙很蠢,没有办法。原是爱极了的憎恶,别人是没有觉察的。中国的政治家只知道做坏事,使国民受苦,尽管这样,就是有很好的政治,也不愿意接受别国的统治。那正跟自己的财产被放荡的儿子所浪费没有办法,可是被别人浪费就不愉快一样——他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那时,我懂得他是多么爱着中国和中国人的。

他由衷地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所以任何时候都思念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将来。而对于将来,他流露出有些悲观的看法。因此尽管特别怜爱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却不得不挥动叱咤的鞭子。

① 格洛斯,现代德国进步画家。

② 珂勒惠支,现代德国进步的版画家。鲁迅曾经编印过她的版画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③ 日本和歌作者,30年代初,曾与丈夫宫崎龙介(孙中山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儿子)来游中国,在上海会见了鲁迅。

一〇 鲁迅重视文学作品和祖国的未来

鲁迅确是在任何时候都考虑到遥远的将来。有一次,我表示想翻译当时有名的茅盾的作品,他反问说,你想是翻译只在今天有声价的作品好呢,还是翻译有永久价值的作品好?他劝告说,那作品就算今天有好评,可只是今天的东西,还是努力做更能延长到未来的有生命的工作吧。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明白地说,也得把没价值的事情并举,就是只在今天有价值的东西,也想翻译。但是这时,我也觉察到了,跟我这样的小人物不一样,他是什么时候也注目、努力于为遥远的将来工作的人。

他非常关心地说:“中国未来,将出现沙漠。”他这样说的时候,是用了慨叹的口气的。这种话虽然是比喻,但也可以知道他是无比地关心着未来,而且想要看准它的。他说过:“如果中国人再不死一些(由于饥饿和相残杀),和平不会到来吧?变成三分之一(听说的是三分之一,又像说的是十分之一,因为说到要出现沙漠,或者是说十分之一吧)左右的人口吧。”那时候说这样的话也许过于刻薄,是他异乎寻常的担心使他这样说的。我觉得有些过于夸张,但也可以知道,不能不这样认真地考虑到遥远的将来的他,具有拯救现实的悲伤愿望。

关于鲁迅,郁达夫也说:“当我们看到一部分时,他看见了全般;当我们着急地要抓住现实时,他把握了古今未来。”^①鲁迅比起我所知道的任何有名的中国作家都不相同。他对于过去有深沉的功力和锐利的观察,(举一个例子,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使我们看到深入彻底的关于“竹林七贤”的研究,什么人曾经用那样周到、敏锐的眼光观察过历史呢?)而且那眼光彻底地贯注到未来,由此产生了对现实的痛烈的批判和鞭策。他总是期望着中国今天的生存,是为了使未来的中国永远生存下去。

^① 这是郁达夫为日本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的广告小册子所写的话。

一一 鲁迅对敌人高度的警惕性

鲁迅对于自己的生命,是慎重地警戒着的,觉得倒有些过于神经质的程度——这也许因为我不很了解情况。我最初会见他的时候,正是在柔石、胡也频等左翼的年轻作家被捕杀之后,其中的一个人身上带有鲁迅的信^①,据说危险也迫近他的身边。由于内山完造的照顾,他到了一个日本人经营的旅馆^②避难;知道形势比较缓和之后,才又回到原来的住宅。偶然地我也住过他避难约一个月的旅馆,而且正住在他带着夫人、儿子海婴及保姆一道生活过的那间屋子,这也是奇缘。

有一次,上海的日文报纸的某记者,因为想会见鲁迅,叫我给介绍,和他一商量,他说,在自己的住处有些不方便,还是在内山书店吧。那位记者对于鲁迅不让自己去他的住宅,感到不满。鲁迅说,报社的人因为有政治关系,所做的事,必然泄于外界,所以不在自己的住宅会见他。又一次,日本一位自然科学家说是希望会见他,一商量,他说因为自然科学家是没有政治关系的,所以可以在家里会见他。还有从看绘画展览回来,或进啤酒馆回来,跟他一道同行,他觉得有坏家伙从后面跟踪着,就说,你先回去,因为我要在我家附近甩掉那坏家伙。我记得和他一道走着,那样的事情有过两三回。

记得他曾经说过,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做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工作,数学呀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关系到政治的工作,总是像穿着湿衬衫一样不愉快。^③总之,他在政治的压迫下好像相当烦恼。可是,他并不被它压倒,而是越受压迫反抗权力的气魄越尖锐。同时,这也琢磨、锻炼着他的文学的方法,到晚年,他的文笔确是更深沉、峻烈了。

① 据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所说,是柔石身上带有他的“印书的合同”而不是书信。

② 指花园庄旅馆。

③ 这是鲁迅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压迫的愤激语,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晚年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坚强战斗,就充分证明这点。

一三 鲁迅在病中的状貌和心情

我最后和鲁迅相会,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七月。从昭和六年(1931年)分别以来,隔了5年重见时,他已经是躺在病床上的人,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烈的,尽管是非常有斗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疾病的侵犯和环境的困难增加所致。我忘记了是7月的哪一天,被请去吃午饭,他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便说:“我已经疲乏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说完,他一面靠着扶梯,一面由广平夫人扶着,脚步沉重地向上走去。我看着他的后影,一面喝着玫瑰酒(用玫瑰花浸的烧酒,因为它是难得的,我一直独自还在喝着),感伤地目送着他。同时心里想:先生已经没有希望了。

但他的诚实、温和的心情,还是同过去一样。两三天之后,我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国,去向他辞行,他已经准备好许多土产礼物;本来由广平夫人给包装了的,他说夫人的包法不好,自己抢过去给重新包了。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谢、温暖的心情,默默地从侧面看着他那并不特别灵巧的双手的动作。

一四 鲁迅轻蔑虚无主义者

在鲁迅所写的作品中,有时散发着虚无主义的气息——那时,也许我正在读着《野草》。有一次,不记得是从谈什么开的头,“一切贤明的人,在他们心胸的深处藏着虚无的深渊。”我把自己认为真实的话对他说了。这句话是我在高中当学生时从什么书上读到,并且很受感动的。可能是在勃兰克斯^①的《歌德论》或者别的著作(记不清了)里。总之,我一直有这种想法,那是不能彻底除掉的(也不想除掉它)。鲁迅的文章尽管不断出现虚无主义的气味,但有时却说出完全轻蔑虚无主义者的话,因此我说我有点感到不平。我那时还有着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

^① 勃兰克斯,近代丹麦文艺批评家,《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是他的代表作。

的傲气,加上说话不客气,就认真地说了。他是不赞成的,只说,怕不能那样说吧。但是我却认定了:虚无主义者也许是值得轻蔑的,但虚无主义在人类复杂的精神里,一定是作为基础的一部分存在着,应是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基础。要不是这样,就不能成为活人的思想。我觉得像鲁迅这样的人却不赞成,倒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因此,我硬说不管怎样,我也这样想。这样一来,他像放弃了似的说:“也许是那样吧。”也许他是因为嫌麻烦而那样回答吧,总之,他“屈服”了,消极地妥协了。年轻的我产生了胜利的心情。现在看来,那也许正是好的气质,在公的〔社会的〕场合,对论敌彻底地战斗的鲁迅,另一方面,在感到麻烦时也就放弃了(也许是因对手不同),他决不是始终执着的人。

还想起一件事,他和郑振铎共同编辑出版了《北平笈谱》版画集,从全体看来是漂亮的,但其中也搀入了很粗糙、拙劣的东西。为了鲁迅的名声,我慨叹,并透露了下面意思的非难:某某的画,实际是拙劣的,你为什么选入那样的东西呢?这不是完全起破坏作用吗?他回答说:我也认为那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现在是想表彰那死了的作家而选入的。^①从绘画本身说,实在一无足取,现在却把死了的作家行将消亡的东西,顺便一道留给后世,这是从一片人情味来的。我知道了这点,也就此看到了他的妥协。被认为性格上的洁癖、严峻的他,另一方面又相当具有屈服于“人”的温情,不能把他只看作非常狭隘的人。

一六 鲁迅的爱憎

鲁迅对于日本的中国研究家,他称赞橘朴先生^②。他说,橘朴先生比他自己更知道中国的事情。他说从“橘朴”这个名字看来,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许是中国人的笔名吧。内山完造先生说是日本

① 参看 1934 年 3 月 18 日鲁迅致增田涉的信:“是我特意这么做的。说实话,自陈衡恪、齐璜(白石)之后,笈画已经衰落,20 人合作的梅花笈已感无力,到了猿画就很庸俗了。因为旧式女人逐渐减少,笈画遂趋衰亡,我为显示其虎头蛇尾,故来表彰末流的笈画家。”(译文见《鲁迅书信集》下卷第 1171 页,1976 年。)

——编者

② 橘朴,日本中国研究者,著有《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思想研究》等书。

人。我以前不很知道橘朴这名字,好像只是模糊地见过的名字,但从此之后,对他就颇为注意了。

他认为日本的汉诗人中,久保天随先生^①的作品是好的(只是记得,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对于所谓汉诗人,我差不多没有兴趣),但是觉得,现代的日本人写汉文、作汉诗,似乎是没有意思的。写那样古老的文章或诗歌,到底想给谁看呢?给今天的日本人看,没有意思;给中国人看,更是可笑的话。总之,不过是游戏罢了。我对鲁迅这种意见,是完全有同感的。

又一次,《中国文学月报》的编辑竹内好,想请鲁迅写篇“对于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期望”之类的文章,说是要登在杂志上,由我写信请他把期望写出来,他回信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关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事情,现在想想,也都是不足道的,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②是因为本国的事情多,没空闲来考虑那样的事呢(听说他当时很忙),还是因为在《中国文学月报》上,有人说过:“鲁迅是奸险的”,所以他觉得讨厌呢?总之,那是淡然无味的回信。也许正像他回信所说的理由,所以没有写;可是我想,他是那样认真的人,突然受到不明事理的外国青年用所谓“奸险”的讨厌的话来批评,因而损害了他的心情吧。我还听到那时候在上海会见过鲁迅的M君说,鲁迅提到那句话,脸上显出不愉快的样子。不过,我常买那到达上海的《中国文学月报》来看,后来我会见他时听他说过,便告诉竹内好,直接给他寄赠。

跟着还回想起来,日本某报的上海支局长在那报纸的《世界的面貌》(?)的专栏里,中国方面写了鲁迅,听说文章里说了鲁迅的坏话。鲁迅说,如果读了我的作品说说坏话倒不在乎,但是连读也没有直接读过,就说坏话——他对那位支局长很生气。后来那位支局长请他写文章或赠送什么东西,他把它打回,顽强地拒绝了。有一天,我跟鲁迅一道去看绘画展览,在那儿碰到那位局长,局长讨好他说一道去吃饭吧,但他却掉过脸去全不理睬。他露骨地表现了自己的感情。一度认为那

① 久保天随,日本近代诗人、汉学家,著有《山水美论》、《秋碧吟庐诗草》等。

② 见1934年12月3日的信,载《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239页,1976年。译文稍有不同。

家伙是讨厌的,就永远粘着于头脑而不能去掉。在别的场合,也有说明他这种性格的事情,而这时我也想起了他那些话。爱憎的感情很激烈。在这点上,他是没有那“清浊并吞”的雅量或宽容的。分清黑白,不隐瞒自己的心情,不仅如此,而且是露骨地表现出来的。敌人很多,想来就是这缘故吧。

一八 鲁迅在敌人面前的兀傲姿态

和鲁迅在家里的情形不同,当他一步外出的时候,就作好一种准备——战斗的准备。这时候因为受着政治的压迫,所以他的警戒心就是那样表现的,总之,它给我以“战斗着的鲁迅”的强烈印象。其中,有直到现在还明显地保留下来的印象。有一次,他和许夫人和我去看绘画展览会回来的道上,正在等待公共汽车,同样为了等车向车站走来一个人,他好像和鲁迅是旧相识样地在谈什么。但他是个相貌凶狠的男子,说话的调子也带着凶险的味道。忽然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在鲁迅的周围围上来几个也是具有可怕的面目的青年,他们像是那男子的同伙或者是手下。鲁迅和对手的应答声逐渐高昂起来,好像增加着危险。我想,是什么事呢,在提心吊胆地从旁注视着。那时鲁迅的样子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眼前。他快快地、激昂地、不客气地说着什么,忽然,好像要说的都已经说完,突然沉默了。他挺起胸膛,撑开两脚,傲然站着把头扭开去,显出无视对手的态度。一会儿,公共汽车来了,那一伙人都上车去了。鲁迅故意地仍站在那里,好像在等候下一班公共汽车,但实际是避开公共汽车改乘电车,而又在半途下了车,带着我们走进啤酒店,故意拖延时间。说是为的摆脱先前那些家伙。他一面喝酒一面对我说:那男子说,政府虐待我是不对的,而我却回答说,政府大约也有政府的想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家伙是个政治流氓,听说在广东曾经从苏联拿过十万元,现在是右派,替政府方面做工作。他是在试探我。尽管鲁迅被那面貌丑恶的男子和那几个像手下的人所包围,却傲然屹立着的姿态,给我的印象不单是小说家、随笔家,而且是广义上的政治现实人物,并且也加深了所谓“战斗着的鲁迅”的感叹。

他说过,虽然他对发出逮捕令,但是在政府和国民党里,有他的老

朋友,大概是不会被捕的。不过地方的省政府、省党部下面的党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却不知道了,所以不能不警戒。我对于那样微妙的国内政治的关系不大明白,不过因为听过他这样的话,便在这里把它记下来了。

二一 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

鲁迅说过,他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为读书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责。但是,他又说,因为读《西游记》,开始觉得书本有趣,所以读起书来。他还说,祖父由进士而成为翰林是经过国家最高考试的,大概可说是有学问的人吧。他是受过这样的祖父的许多责备的,但是后来他做了教育部的官员,有机会看见部里保管的从前进士的试卷,他从其中发现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读了,而那文章并不高明,听了这话,我感觉到那是小孩时受了严厉斥责对于祖父的报复口吻。这儿,也可以看到他那种不服输的性格。

因为鲁迅的祖父是翰林,大概是有相当地位的官员吧,所以我在《鲁迅传》的原稿上,说他祖父是翰林出身的大官;他说,不是什么大官,接着把“大官”二字抹去了。听说是在什么地方做知县之类。在他祖父的朋友里,有个称号很长的人,他说着用铅笔写了“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十个字给我看。我想:“嗳呀,是赵之谦!”因为我曾经认为赵之谦不仅是在清朝晚年,乃至于是在中国长期历史上的最可尊敬的艺术家(长于书、画、篆刻);我盼望从鲁迅的口里听到关于赵之谦的什么逸话之类的东西,虽然问了,可是他却没有什么现成的材料。我当时心里想,对于赵之谦那样的文人,他好像是不太关心的。

又一次,他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在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感到非常有兴趣,混血儿和颓废派相结合,耽溺于一种好像“有道理的”感伤。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关于苏曼殊,我

曾经读过他的《英汉三昧集》^①，还从佐藤春夫先生(或者是在佐藤先生家里从神代种亮先生)那儿听到过关于他的事情。这时候，知道了他是鲁迅的朋友却不免有些惊讶。我问了种种关于苏曼殊的话，可是除了上述的浪漫不羁的生活，和章太炎的关系那一些之外，再问不出别的了。但他马上给了我当时出版的、柳亚子编纂的《苏曼殊全集》五册说，读读它罢。因为关于《新生》的事情，在《呐喊》序文里写有，但没有提到曼殊，在其他任何地方，一直都没有看见他提到曼殊，因此他的朋友里有曼殊，就使我特别感兴趣，我贪婪地读了《苏曼殊全集》。特别对他那“数奇”的身世感到有意思，我写完《鲁迅传》之后，就写了《苏曼殊》，送给《文艺》杂志，原稿已经排版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杂志不出了。(后来，《文艺》(改造社)的编辑高杉一郎君把那文章的校样还给了当时和《改造》有关系的我)

二四 鲁迅跟月亮和小孩

鲁迅好像喜欢月亮和小孩。在他的文学里，这两样常常出现^②——这是佐藤春夫先生和我谈到鲁迅时说的话，我认为这是诗人佐藤先生锐敏的感受性所直接地抓住的鲁迅艺术精神的要点。鲁迅是不是优越的艺术家，且当作次要的问题，但深入地观察他的艺术，或者他这个人所发出的东西，就像是象征着月亮和少年的。这，我也有同感。月亮和少年——在月亮一样明朗，但带着悲凉的光辉里，他注视着民族的将来。而由于描写了无垢的少年，他是希望拯救他们。也许说得夸张点，在这两种事物里，不是分散而是联系在一起象征着鲁迅的艺术和为人的纯洁姿态。

我想起他对给他治病的须藤医生说的话：“我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亮。”(须藤医生，我也认识他，在上海大陆

① 《英汉三昧集》，原名《汉英三昧集》，初刊于日本东京，后有上海泰东书局重印本，为苏曼殊译编的中国古诗英文译集。

② 参看林志谦译：《佐藤春夫谈鲁迅：月光与少年》(《鲁迅纪念集》)，鲁迅纪念会刊，1936年12期)。

新村鲁迅最后住过的地方,时时在旁边听来诊病的须藤医生和鲁迅关于德国文学或日本文学的杂谈。)

所谓正直的人,最有希望的还是小孩,因此,换句话说,他最喜欢的还是小孩和月亮。

关于这,我且再添加一些并不怎样重要的回忆吧。他是在正午前起床而通夜不睡觉的(自然,说的是我所知道的那个时候的他),大概因为寂静的晚间适合于学习和工作吧。有一次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透过台灯的青色灯罩发出青色的光,在漆黑的夜里,只一个窗口照耀着,那不是月光,但我好像感到这时的鲁迅是在月光里。

又谈到小孩,回想起来,是他感觉到身边的危险,而匿居在日本人开的旅馆里的时候,因为房子特别狭窄,白天里常在走廊里,那儿设置有粗糙的长椅,大家随时可以休息,听说他坐在长椅上,常在剥蜜柑吃,同住的日本小孩们走过,他就要把蜜柑分给他们。但是对于陌生的新来的外国人这样亲热的态度,小孩们不知是由于客气还是由于害怕,谁也没有接受他的。他离开之后,我在那旅馆里住过,我想打听鲁迅住在那里的情况,那便是从旅馆的服务人员或同住的人听来的。同住的日本人大部分是什么洋行的店员,对于鲁迅这样的人是不知道的。又因为他是秘密的,所以更不知道这中国人是谁了。而我听了被追捕的他,和不敢接受蜜柑的孩子们的事情,他那爱小孩的心情和他常说的“寂寞”两个字,便一同浮到心上来。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听到那样的话,我总是想:他好像特别喜欢小孩,直到现在也还有印象。

还记起一件事,当我们的长子生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到日本,给鲁迅寄去了孩子的照片,他看了,回信写着古怪的话:“这样说也许不

好,但是你儿子的照片比父亲神气,可以证明人类是在进步的。”^①仅仅看了初生的婴儿的脸孔(照片的),就认为是比我神气(大约是把我的脸相描在心上而加以比较的吧),而且还要作为人类进步的证据,这究竟是根据什么呢?我不禁茫然不理解,也不服气。不仅对我说,而且在他给我们共同的友人山本初枝夫人(原住上海)的信上也提到这事说:“给了[孩子]比父亲更神气的回信,虽然对于第一代[按指增田涉]有些失礼,但这是事实。”^②什么事,我不大了解,就算是不懂得表现在人类脸孔上的生物进化论的明征,我也只能认为,他实在是无条件地喜欢小孩的,而且深信小孩子必然比父亲神气,主观地相信人类是进步的。尽管这样说,但现在15岁的我那大儿子,比我更吊儿郎当,不能用功,身体也不太健壮,现在的情况,一点也不能成为人类进化的样本。

二九 鲁迅的广博知识

鲁迅是读书家,他读过许多书,知识可惊地广博。有一天他来到我住的公寓,暂时在会客室里一道休息,闲谈着。壁上挂着葛布兰式的壁毯^③,是西洋男女在街头相会的图景,我平常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图景看,这时看见鲁迅直走到它前面去,突然说:“是但丁初次看见比阿特里邱的情景^④……”我因他那丰富的知识而吃惊,所以到现在还记得。他知道得很多,许多事例现在忘记了,但是,譬如说,在埃及是这样的,在波兰是怎样的等等,他有着广泛的知识。他写契开加尔^⑤等的事,是1901年^⑥,27岁的时候,正是他钦佩着尼采的时期。

对于日本的事情,连很细微的地方都知道。例如在日本曾有人斤

① 这是1934年2月12日的信,《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157页,1976年。译文略有不同。

② 这是1934年1月11日的信,《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161页,1976年。译文略有不同。

③ 葛布兰式的壁毯,为法国巴黎葛布兰工厂的出产物,是一种装饰品。

④ 比阿特里邱,是古代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集《新生》里歌颂的女性。

⑤ 契开迦尔,近代丹麦哲学家,提倡极端个人主义,他的学说,影响了尼采和易卜生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谈到他。

⑥ 1901年,是1907年的误排。

责无产阶级文学说：“糟蹋花园的是谁呢？”^①他觉得这种说法是可笑的，不禁独自笑了。

他也阅读着大佛次郎的《特勒飞斯事件》^②等，他称赞说，写得不错，使人感兴趣。当时出版的《无产阶级文学》杂志，我看见他也在阅读，他笑着说，比起《文艺战线》来，这是激烈的，还是激烈的有意思。

三四 鲁迅在日本见过孙中山

对于现代中国稍为关心的人，就会记起产生民国的“民国之父”孙文(中山)的存在，我也是这样。曾向他问过孙文的事情。听他说了些什么，现在大半忘记了，记得的是，他说孙文被叫做“孙大炮”。因为只听发音还不明白意思，再问他，就写了“大炮”两个字给我看，并且加添说“是吹法螺的意思”，而独自笑了。又说，在东京的时候，孙文从海外归来的途中，在东京逗留，留学生们狂热地开欢迎会，他也去了，不知在演讲些什么，“唉呀”的一声，这样就结束了。^③鲁迅的根性是文学家，不能把现实的政治家只当作偶像来归依、倾倒。即使具有好感，也要像文学家那样冷静地、作为人地看待^④的。我又问到《三民主义》，他说，没有读过。林语堂也说没有通读过《三民主义》。热心阅读、研究《三民主义》的，倒像是日本人更多些。

常常感到他想要把我们对中国的观念，或认为是伟大的中国古今的人的既成观念，一下给以破坏。他也说，要抛弃既成观念，要用自己的眼睛直接地看中国。不仅是对我，就是对从日本来拜访的客人，至少是和我同座的，不管谁，他都用那种态度对待，把中国的事情，还有中国

① 据说这是中村武罗夫所说的话。

② 大佛次郎(野尻清彦)，日本现代作家，除《特勒飞斯事件》外，还著有《赤穗浪士》、《归乡》等。特勒飞斯事件：1884年，犹太世系的法国人特勒飞斯，任法军炮兵上尉，因为出卖军事秘密的嫌疑，受到终身流刑的处分。此事当时引起国人的争议，其后终于得到平反。

③ 鲁迅对于革命家孙中山，“五四”以后，曾经在一些文章或讲演里谈论过，如《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战士与苍蝇》、《中山大学开学致语》等，可供参考。

④ 作为人地看待，意思是不把他看成神或超人。

古代和现代的要人等,都不客气的给“骂”了。因而有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询问:“你讨厌中国吗?认为生长在中国是不幸的吗?”给这样一问,他却回答说:“我认为生在中国比起生在别的任何国家更幸福。”那么,为什么要那样露骨地说中国的坏话呢?我只能说,因为他爱中国,所以不肯说敷衍了事的话,而且,因为他是文学家。

三五 鲁迅与李贺、杜甫

鲁迅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李贺。^①我想,这里不是有着理解鲁迅文学的一把钥匙么?他说自己是文体家,又知道他喜欢李贺,不就会猜想到些什么吗?而他的文章——在表现方法上不是可以想到与李贺的文学的联系么?在浓烈的感情之中充满阴暗的色调,稍稍奇谲的美——自然不是说,让李贺的原样移到现代的鲁迅身上,问题是在他喜欢李贺的性情这点上。在理解他的性情的途径上,如果能假借别的东西,去帮助理解的时候,试看看他所喜爱的李贺文学,不是可以推测到什么吗?我固然没有具体地研究过其间的关系,只是想,为了知道他,而去考察他所喜欢的李贺,不也是一个课题吗?

还有一个相当有关系的人物,佐藤春夫曾把鲁迅比做杜甫。我在给他的信里曾经提到。他在回信里说,要是杜甫倒不坏。^②这虽然是以轻松的心情说的,但我以为随着他晚年的来临,他是逐渐成为杜甫的了。从李贺到杜甫——他变化着。当然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比喻。跟对李贺一样,对于杜甫我也没有详细用过功夫,不过是凭自己主观的感想说的,只是说这样的看法是可能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 鲁迅在1935年1月17日给另一位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上说:“……在年轻时比较喜欢唐代李贺的诗……可是现在对这位李君也已经不佩服了。”(参看《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204至1205页,1976年)

② 这是1934年11月14日的信,见《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194页,1976年。

我的恩师鲁迅先生

[日本]增田涉

我在大学是专门学中国文学的。大正末年(1925年)入学,昭和三年(1928年)毕业。我的学校是东京大学,当时有一位叫盐谷温的先生教中国小说史。这位先生以前出版过一本书叫《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他以这本书为底本,放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我们当然也有这本书。可是一段时期以后,这位先生讲起了我们从未听过的——他那本书里没有写过的内容;学生们感到很奇怪,在底下议论开了,认为老师不可能了解这些内容,大家正感到纳闷,有一天,老师给我们看了一本书,说这就是蓝本。这本书就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过,那时是50年前,和现在不一样,日本几乎——可以说根本——不知道鲁迅的名字。当时竟连老师也说,《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写的是鲁迅,可能是周作人的笔名。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当时日本都知道有个周作人。我们的老师虽说是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老师,但当时却是汉学的老师,尽搞古代中国的语言,所以关于现代中国的知识也就是这种程度。当时的一般情况就是这样,学者们几乎不注意、不学习现代中国的情况。

我们也是在这种风气中培育起来的学生,但我自己当时是个文学青年,对现代中国的作家多少有些关心,像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买是买了,但很难读懂。因为这些作品和古汉文不一样,不理解现代汉语就看不懂。当时的大学虽有“支那文学科”,现代汉语并不是必修的课目。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鲁迅的名字,但了解到这位鲁迅就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感到他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家和学

者,于是慢慢地对他尊敬起来。

我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心里一直想到实际的中国去看看,离开学校的第二年,决心出国到上海去。当时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准备向父亲要到钱就出发。当时日本研究中国的人,都往北京跑。因为北京有具有传统的著名的大学,有适宜于研究家的气氛,另外大概还因为中国研究旧学问的有名的先生们都聚集在那里。但我关心现代的中国更甚于关心旧学问,感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核心,有一种不到那儿去看看就不了解中国的想法,因此,决心到上海去。虽然准备毕业的第二年就去,但由于某种差错,未能乘上船;在毕业后的第三年,也就是昭和六年(1931年)春季三月才去了上海。我做学生的时候就认识佐藤春夫先生,并帮他搞过翻译等工作;他是个诗人,也是写小说的文学家;他以前去过中国,认识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先生。由于这些关系,出发之前,我从佐藤春夫先生那里拿了给内山先生的介绍信到了上海。我带着这封介绍信去内山书店,内山完造先生跟我说,鲁迅先生现在正好在上海,要搞中国文学,可以跟鲁迅先生学到很多东西;他还劝我把《中国小说史略》翻译出来。开头已经说过,鲁迅这个名字,当时在日本还几乎不为人们所知道;从日本报纸上也没看到鲁迅在上海的消息。而现在听到这位写《中国小说史略》而使我吃惊的鲁迅就在上海,心里想,如果能得到这位先生的教导,说得夸张一点,那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内山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每天下午1点左右到书店里来。第二天,我瞅准了这个时间跑去了,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况,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记得第二天又在内山书店见面的时候,先生送了我一本记载着他过去的种种回忆的书——《朝花夕拾》;还说,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先看看这本书。跟仙台有关的藤野先生的事情,就收在这本书里。所以我第一次知道鲁迅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以及藤野先生的关系,是在40年以前。

我在自己的宿舍里读这本书,第二天到内山书店跟先生见面,把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就这样大约继续了一个星期左右。大概是先生认定了我是一个不需要加以警惕的人,才跟我说以后上他家里去。以后我就每天到内山书店二三百米的先生的寓所去。一般都是下午一点左右在内山书店里碰面,跟其他的人闲聊一会儿,然后两个人一块儿上先

生的家去。

刚才我说了警惕的问题,我想就这件事谈一谈。那年的1月,中国年轻的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频等5个人,正在开会的时候被捕了,据说其中有一个人的口袋里装着鲁迅的信,所以鲁迅的身边也很危险,于是内山完造先生出主意,急忙让鲁迅全家到内山的一个日本朋友所经营的公寓里去避难。被捕的年轻作家们很快就被杀害了,大概是由于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征兆,一个多月之后,鲁迅才回到原来的寓所里。我到上海正是他回到原来寓所不久,所以认为还需要提高警惕。在这以后不久,上海的一家日文报纸的记者某君,要我给他向鲁迅介绍。我向先生一说,他说不在自己的家里接见,可以在内山书店会见。我把这些话转达给了某君,某君到上海来日子还不太长,对鲁迅先生不愿意让他上自己家里去,有点不高兴。可是鲁迅先生说过,不愿意让与政治有关系的人上家里来。这还是出于警惕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起一件事。鲁迅先生说过,他上内山书店去,要坐摆在哪儿的椅子,自己要考虑考虑才坐下。因为内山书店和日本的书店一样,两边都有门,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四周放着四五把椅子。所以鲁迅先生说,要预先考虑好坐哪张椅子,然后才坐下,以防袭击自己的人进入店里来,从这边门进来,可以从那边门逃走。可见他到内山书店来也是抱着警惕的。他就是过着这样不自由的生活。当时我曾经看过一家小报——当时有许多小报,竟然登出这样一段记事,说鲁迅的头悬赏十万元。如果有一个冒失的家伙,突然想得这笔奖金,那就什么事也会干得出来的。因为有这些情况,当然就需要警惕!

话再说回来,我跟鲁迅先生一起,来到他那个公寓三楼的住房,一块儿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请他帮我学习《中国小说史略》。我把这本书译成日语读给他听,不懂的地方就问坐在旁边的鲁迅先生。我提的问题不单单是词句,也包括内容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涉及现代和当时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也提出来请教。就这样从两点左右一直继续到四五点钟。中间许广平先生来给我沏茶、送点心,就休息一会儿。在休息的时候,随便谈谈时事问题,另外我也问问文学界的情况。接着又继续搞《中国小说史略》。到了傍晚,先生总是说,今天有什么什么菜,一块儿吃晚饭吧。平均一星期要请我吃两顿晚饭。当时先生的独生子海婴君

才两三岁,正是淘气的时候,到处爬着滚着,这时一般都是由保姆带出去玩。至今我还记得,在这间书房兼客室又兼卧房的宽阔的房间里,许广平夫人总是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或者帮助编辑先生的作品,或者编织着毛衣什么的。

10个月期间,我就是这样每天上先生那儿去,到他的家里去。跟先生接触,我丝毫没有感觉先生叫人害怕、令人拘谨。他以一种和蔼的长辈的态度接待我,使我受到了教益。我也说说笑话,开个玩笑。因为先生常常说些幽默的话,在先生的带动下,我也说起了笑话。

这是先生对待内部人的面貌。对待外部的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见到的先生,看起来似乎很严厉、可怕。但那是因为政治压迫很残酷,生活很不自由的缘故。前面我已经谈过,当时的情况是到书店里坐椅子都要小心留意。关于这一点,我记得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

先生的住房是在公寓的三楼,窗下一条宽阔的马路正是电车的终点。一条大街从他的窗前通过。上海的夏天很热,温度常常升到华氏百度左右。窗前有一个小凉台,可是先生从未上那儿去过。许广平夫人来给我们沏茶休息的时候,要是在夏天闷热的日子,我就来到窗前,走到凉台上吹吹风。因为没有电风扇,我到凉台上可以搦搦扇子,凉快凉快。我跟先生一块儿坐着的桌子,就摆在离窗口三尺来远的地方,休息的时候,我走到凉台上一边看看底下的大街,一边乘凉。而先生却坐在桌子边一动不动。记得有一次我多管了闲事,我跟先生说,是不是到凉台上来凉快一会儿。而先生却说,他不愿意让下面看到,知道这是他的住房,因此绝对不到窗口去。当时先生就是过着这样不自由的生活。

在先生的老朋友当中,也有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的。有一次,我听说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这在日本就相当于总理大臣吧,通过先生的朋友,要求跟先生见见面。记得过了两三天之后,我问先生跟行政院长见面了没有,先生说 he 拒绝了。至于说为什么要求跟先生见面,据说是因为先生写的文章都是痛斥当时的政治,因此想不让他写。在这以前,说实话,我把先生看成只是一个文学家,一个像日本一般所说的那样的文学家。而现在 he 拒绝了行政院长的要求会见,我才感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当时从学校毕业出来不久,在昭和初年(1926年),

一个总理大臣还是使我感到是一个离自己很远很远的了不起的人物。而一个普通的文学家居然拒绝了这样大人物的要求。他不考虑个人的生活,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他过着连窗边也不能站一站的生活,却始终不妥协。我深深地为先生的这种态度所感动。以后,先生继续在报刊上匿名写尖锐、讽刺、进攻的文章。

我想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在延安的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曾作过一次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提到鲁迅的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政治远见;说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看中国的社会,用显微镜观察得真,同时又用望远镜看得非常远。看中国的社会看得真看得细,那是由于看到了中国遥远的将来。据我和先生接触的体会,鲁迅先生是经常谈到中国的将来的。我很清楚他对中国的将来很担心,正因为担心,他才批判和攻击现实的消极面,这一点我也是很清楚的。我很了解他的这种批判和攻击并非单纯出于一时的愤恨。我想大家都很了解,他写过很多维护青少年和儿童的文章,说他们肩负着将来。

毛主席提到鲁迅的第二个特点是斗争的精神。说他在黑暗与暴力的侵袭中是一枝独立支持的大树;说他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刚才我说过,他不受高官显贵的引诱,由此就可以了解他的这个特点。只要看一看先生的短评、随笔——也就是所谓“杂文”,就可以了解贯穿着多么坚定的战斗精神。

毛主席提到第三个特点是牺牲精神。说他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勇敢地把钢刀一样的笔投向他所愤恨的一切,又提到他斗争的彻底性,说他没有一点假慈悲、伪君子色彩。

毛主席还说,综合以上3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顺便说一说,现在人们常说“鲁迅精神”,我想这是从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开始的。我认为这句话概括了文学家鲁迅展望遥远的未来,细致地观察现在,站在黑暗的现实中考虑民族的前途的形象,说明了鲁迅具有先驱者的使命感。

鲁迅先生的弟弟周建人先生,现在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我和他分别了四十多年,去年见了面。我在上海出入于鲁迅先生门下的时候,周建人先生经常带着家属到先生那里去。周建人先生的女儿周晔,在鲁迅去世的时候,我曾经读过她写的一篇回忆伯父

鲁迅的随笔。随笔里写着这样的事,据说周晔曾经说,伯父和爸爸的脸孔很相似,只是伯父的鼻子比爸爸稍微低一些。而鲁迅先生回答说,我的鼻子小时候跟你爸爸一样,我碰了多次壁,鼻子碰低了。鲁迅先生还说,自己的周围都是黑暗的洞窟,因为太黑暗了,很容易碰壁。鲁迅说他周围是黑暗的洞窟,他在这洞窟般的黑暗中,鼻子碰着壁前进——看来这是他用巧妙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一生。不过这里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我想如果是一般的人,一定想要尽快地从这样一片漆黑的洞窟里脱身。而鲁迅不是这样,他为了后来的人们,宁肯自己的鼻子挨碰,也要用他凿岩机般的笔,拿出全身的力气,从事着从内部来挖掘周围的洞窟的工作。我感到这里也表现了鲁迅牺牲自己、奋勇战斗的精神。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感到可以看出,鲁迅这个人是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对社会对自己毫不虚伪、毫不妥协的人。

因此在作品中所见到的鲁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严酷的人,其实在他的内部有着一颗善良的、温暖的心。这也可以说是他严酷的另一个侧面吧。他有一部收集了他的论文和随笔的作品《坟》。在这部作品的后记里,他说过这样的话: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样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从来买自己的书的青年由衣袋里掏出的钱上,感到对方的体温,这正是因为鲁迅自己的身上有着温暖的体温可以反应这种体温。我想如果是一个冷酷的人,那就既不会感觉到也不会想到这些。虽说他自己的体温可以条件反射地感到对方的体温,但他还反省自己会不会毒害这类青年读者,说他迟疑不敢下笔,这就说明了他这个人对自己写的东西是负责的。我认为,正由于大家都了解他诚实的人品,了解他是写诚实文章的人,由于是这样的文章,所以在他逝世后四十多年^①的今天,他的那种严肃认真精神仍然能激动人心,成为人们的鼓舞。

鲁迅是一个写小说和写过许多短评、随笔的文学家。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随笔中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小说不算文学,所以自己也从未想过写小说,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

^① 应为鲁迅先生逝世 38 周年。

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文学家鲁迅是利用写小说,利用小说的力量,来变革维护中国旧社会的旧思想,启发思想的变革。这就是鲁迅的文学的出发点。

鲁迅是这样的一位文学家,他在介绍外国文学以及吸收外国文学的方式上也很有特征的。日本在明治、大正时代,介绍外国文学是拼命地介绍英、美、德、法等先进国家的第一流的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而鲁迅介绍到中国的文学,大多是波兰、匈牙利或希腊的文学,以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文学;大多是东欧国家即所谓后进国家的文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从近代世界文学市场来说,恐怕应该说一般都是第三流的偏僻的文学。他决不因为是一般人认为的第一流的作品,就被迷惑住。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地位的问题;因为他把最大的关心,放在中国社会首先应当要求什么这样一个比文学更为重要的社会基础、或者叫做历史的现实的问题上。这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把离自己太远的地方所产生的先进国家的文学,原封不动地搬到自己后进国家、弱小民族的社会来,那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介绍跟自己同样处于被压迫境遇的民族所产生的文学,可以了解他们在压迫中想什么和追求什么,它可以参与到当前自己的社会里来,会有所裨益。他认为繁荣的先进国家所产生的文学,对当时的中国仅是装饰品,不会有实际的用处,不会对改良社会起作用。可见鲁迅不是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教养,因而他不是文学中追求没有国家或民族的抽象的人和人生,而是始终考虑、探求中国的社会、民族和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鲁迅可以说是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和中国的历史的文学家,今天鲁迅仍然受到举国一致的尊敬,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在上海的时候,诗人柳原白莲也来过上海。因为她想见中国的文学家,内山完造先生就给她介绍了鲁迅先生和郁达夫——这个人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但是个文学家,我在鲁迅那儿见过几次面——把鲁迅先生和郁先生请到上海一家素菜馆子,跟白莲女士见面。我当时也同席。鲁迅先生在席上不断地说中国不好。当时白莲女士是和丈夫宫崎龙介一起受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来中国的。这是因为龙介先生的父亲宫崎滔天,曾经帮助过清末的革命家

孙文和黄兴，同国民党的前身有很深的关系。当时白莲女士是国民党政府邀请来的人，而鲁迅一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关系吧，鲁迅才一个劲地说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不好。于是白莲女士就问鲁迅先生说，您认为生在中国是不幸吗？鲁迅先生回答说，不！我感到生在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好。我至今还记得，鲁迅先生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都润湿了。我感到在这句话里看到了鲁迅先生真正的面貌，至今还不能忘记当时所受的巨大感动。鲁迅先生对中国所说的尖刻的坏话，那是出于从内心里真正爱自己的国家、爱中国，是出于一种非常痛切的心情。我想我们这些外国人，仅仅从表面上看，恐怕是无法理解鲁迅先生所说的这些坏话的；不仅如此，他们本国人也不能理解。鲁迅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就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日本的间谍，领了日本政府大批的钱，因而说中国的坏话。当然，这不过是他的反对者和政治上的敌人的宣传，但确实有人说过这种话。

鲁迅先生青年时代在东京留学的时候，他到东京的第二年，也就是21岁的时候，他在赠送给他的朋友许寿裳——这个人一直到最后，始终是他亲密的朋友，我仅在他来访问鲁迅先生时见过一面——的照片上题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这么说：“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当时的这种精神，为中国的解放而贡献自己一切的心情，在他的壮年、老年，一直到死都始终坚持着。这里所说的轩辕，据说是古代传说中开创汉民族文化的帝王，也就是黄帝。当时是清朝的末期，清朝是满洲人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所以“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说要以自己的血献给反清革命。鲁迅先生至死坚持了这种精神，进行了战斗。这种精神特别表现在文学方面——变革国民的思想方面。

不过，这决不等于说鲁迅先生是一个生硬、拘谨的人。他在家经常穿着手工编织的粗毛衣，学生们穿的黑布裤，系着皮带，胡子乱蓬蓬的，头发经常不理，用内山完造先生的话说，就好像带了一副扮囚犯用的假发。有一次，英国工会的总书记来到上海，要求见鲁迅先生，约定在某个大厦会面，先生来到那个大厦，站在电梯前，而那个开电梯的中国人却冲着先生说，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到那边去。于是先生只好一步步地从楼梯爬上了七楼。我这是从内山先生那里听来的，我曾问鲁迅先生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我记得先生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微笑着

回答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先生对自己的穿着打扮毫不留意,过着简朴的生活,使用的东西都很简陋。写稿子用的砚台,按当时的钱只值一两角钱,和小学生使用的一样。先生爱抽烟,经常是把廉价的香烟装在烟嘴上抽,手指头都熏黄了,而所谓的烟嘴,只不过是一段截断的竹子。他就是过着这样非常简朴、淡泊的生活,屋子里看不到一件装饰品,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室内到处挂着许多先生特别喜爱的版画——世界各国的版画。我记得他吃饭的屋子里也挂着版画。

前面已经说过,先生对自己国家的政治所说的坏话,对自己民族社会的消极面所作批评是辛辣的,他顽强不懈地发动进攻。在这一点上,先生主张要有“韧性”,就是说不要简单地认为“没法子”而垂头丧气,要坚持不懈地顽强斗争下去。也就是在改革上要求彻底。但先生的个人生活,前面已经说过,是极其淡泊的。他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交往看来也是淡泊的。由此而联想到先生的日记——先生留下的日记,从1912年到北京记到1936年在上海逝世的前一天——在先生的1935年日记的后面附有一个“居账”。所谓“居账”就是住址录、通讯录。那上面记着的地址,令人感到对于经常通信的人是极力控制的。地址不到50处,其中还包括图书馆、研究所、学校和书店等,作为个人的通讯地址仅有30个。当然罗,当时先生也并不是完全不出来同人们交往,但一般情况是不得不闷居在自己的寓所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从这个极其控制的通讯地址来看,可以了解他只和关系亲密的人往来。我看到这个“居账”时,留下的印象是感到他是个不太愿意交际的人,这里顺便说一下,其中日本人仅留下内山完造和我,还有山本初枝三人的姓名和住址。山本初枝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清轮船公司一位船长的夫人,是阿罗罗岐派^①的歌人,经常去内山书店,和先生关系亲密。山本的地址写的是她因战争遣返回东京的住址。内山先生的地址也是写他日本的住址——东京世田谷祖师谷。

我想这是由于当时先生受着压迫,因此不太愿意跟人交往,不愿出头露面。不过一般来说,我认为先生对世间的事还是淡泊的。他辞退作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的事就是一个例子。事情是这样,瑞典著名的地

^① 当时日本和歌的一种流派。

理学家、探险家斯文·海定向北京政府交涉,要到蒙古新疆方面去旅行调查,当时根据中国的学者也参加这个旅行团的条件,成立了“西北科学调查团”,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北京大学的刘复;他同海定商谈的时候,可能是海定要取悦刘复,说他准备推荐中国人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并委托刘复推荐。刘复通过鲁迅的朋友、也是鲁迅主持的“未名社”的同人台静农,征求鲁迅有无当候选人的意愿。而鲁迅当场就拒绝了,说自己不配。这封给台静农的拒绝信是1927年7月写的,收在许广平先生编的《鲁迅书简》中。鲁迅在信中说,倘因为黄色脸皮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还说世界上比自己好的作家有的是。这也可以说是谦虚吧,但毕竟是淡泊的。他没有见到诺贝尔奖金就眼红,也没有要出人头地,在人前从未吹嘘过这件事。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认识先生前的三四年。先生给我谈过他许多往事,他一次也没有给我谈过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有这件事。直到先生死后,才从《鲁迅书简》中知道,从一个叫魏建功的人所写的关于先生的回忆中,才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件事我谈得这么多,也许也是由于我们日本人有着一一种对诺贝尔奖金异常感兴趣的倾向吧。

我没完没了地谈得很乱,占了很长时间。最后根据主持人的意见,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鲁迅和仙台的关系。现在仙台举行“鲁迅纪念典礼”,在全市宣传表彰鲁迅的功绩。由于鲁迅曾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过,在仙台生活过,今天希望为日中友好架起一座桥梁,我感到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业。为日中友好举办这样的纪念,我是非常赞成的。

不过,仔细地想一想,鲁迅后来曾在《藤野先生》中写过,是仙台——主要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赶走了来这儿留学的鲁迅。这么说也许过分了一点,但我认为,起码可以说对他施加了迫害,使他不愿住下去。我想读过《藤野先生》的人都了解,鲁迅在第一学年末考试的成绩是中上,有人说这是老师泄漏了考题,因此班干事在黑板报上写召开班会的通知时,末一句写的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影射地讽刺鲁迅。而且干事还来检查了他的讲义,并寄给他一封很厚的信,信上第一句就写着“你改悔吧!”这就是说,中国人跟日本学生一起考试,不可能得到这么好的分数,对他进行了种族歧视的侮辱。鲁迅说,他们大概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这种由于

“弱国”而产生的屈辱感。也许进一步促进了鲁迅要摆脱“弱国”的侮蔑,增添了他改革的热情。一般都认为,在外国亲身体验的屈辱感,是难以磨灭的刺激。不过,我这次到这里来之后才听到,说当时班上留级学生占三分之一左右,他们都非常跋扈,弄得新生手足无措。在这样的气氛中,担任班干事的留级生肯定是很专横的。另外人们还认为,日清战争战胜国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也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仙台受到了屈辱这一事实是必须看到的。

但是鲁迅在《呐喊》的序文中并没有说到是因为受到这种屈辱而离开仙台的。这一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呐喊》的序文是这么写的:在教室里用幻灯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给学生看,有时讲义的一段已完,而时间还有多余,就放映一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当时正是日俄战争的时候,有一次在画片上出现了中国的同胞,据说是因为做了俄国的侦探,被日军捉住,正要被砍下头颅,而周围的许多同胞,显出麻木的神情,围着看热闹。这些人都有着强壮的体格。当时便觉得医学并非紧要,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认为要推文艺,于是就提倡文艺运动,去了东京。鲁迅说他是为了提倡文艺运动而离开仙台的。但是,这在毕业之后也是可以办到的。比如同样从事文学运动的郭沫若先生就是九州大学医学部毕业的,他也未从事过医学,当个医生。去年我们去中国时,郭老还谈到这件事。鲁迅说他看了幻灯,由于当时受到了刺激,因此决心要从事文艺运动。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唐突,但他自己是这么写的,所以我想这也可能是事实。不过,作为在这之前的背景,也可以说是他产生这种想法的基础吧,恐怕在学校受到的侮蔑是起了促进的作用。比如说,全班都能像藤野先生对待他那样友好,对他这个外国人有一种爱护的气氛,也许鲁迅也能像郭沫若先生那样,在仙台的学校一直待到毕业。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考虑,仙台给予鲁迅以强烈的民族屈辱感,所以也许可以这么说,仙台对于鲁迅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这种说法也许欠妥当,但起码仙台是给鲁迅带来了放弃医学、投身文学的转机。因此,也许是近于诡辩吧,如果说仙台是作为反面教员培育了鲁迅这样的历史人物,那我认为仙台是通过鲁迅而和今天中国的历史有着很深

的联系。

我还要附带说一说,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如果能到日本去,他希望上什么地方去看看。鲁迅先生立即回答说,希望上东京的“丸善”去看看。鲁迅先生青年时代在日本的时候,经常上“丸善”去,从那里吸收了世界的文学和美术的知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还从“丸善”邮购书刊,这家专门出售西洋书刊的书店一直使鲁迅向往,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当时鲁迅先生还说过,也希望到仙台去看看。仙台是先生青年时代做学生学习过的地方,尽管只待了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但我想年轻时代的印象仍然永远铭刻在他的心上。到仙台的什么地方去,他没有说过,但他确实说过如果到日本去,希望到“丸善”和仙台去看看。现在我要把鲁迅先生的话,向仙台的各界人士,向选办“鲁迅纪念典礼”、拥护鲁迅的仙台市民们转达。

杂乱地谈了很长的时间。我的讲话完了。

卞立强 译

(《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

回忆鲁迅

〔日本〕辛岛骁

最初会到他，是在昭和元年(1926年)夏天。

当时鲁迅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我是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的学生。是通过怎样的程序看到他的呢？由于日记都留在朝鲜，而且是23年前的事情，已经记忆模糊，想不清楚了。好像是先看到周作人，由他介绍的。

总之，在离开东京之前，我是佩服那部《中国小说史略》的，因而会到他时的心情，并非去会作为作家的鲁迅，而是要向作为学者的鲁迅表示敬意，向他请教。鲁迅的住所，也已经记忆模糊，好像是在周作人的家里。尽管周作人和鲁迅是兄弟，可他们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因而这一记忆也许会使人感到奇怪，但这时正是鲁迅要到厦门去以前不久，怕是暂时寄住在周作人家里吧。总之，在西城，这是不会错的。

恰好紧接着在东京出现《中国小说史略》，宫原民平氏也出版了《中国戏曲小说史概说》。尽管其中小说部分许多都是依据鲁迅的《史略》，而在《序文》中却并未提到此事，这使得我们青年学生都有些感到气愤。因而当涉及此事时，我也透露出个人的愤慨，随便代替宫原氏向他告罪，但鲁迅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好像受到损害的态度，反而回答说，尽管自己的东西还有着许多缺点，竟被加以利用，对此感到抱歉。事后想来，我觉得这决非外交辞令，实在是鲁迅式的谦虚心情的淳朴表现。

由于我自己当时正专心于中国旧小说的研究，因而是学生式的，而且生性不知拘束，就向他提出了正在找寻着的《警世通言》的下落以及

其他各种问题,好像还说出了—些自负的意见,但鲁迅对此始终以洋溢着慈爱的态度,恳切地加以指教。后来,也就在这一时期,他还把作为小说戏曲的收藏家而闻名的马隅卿(廉)氏介绍给我。第二天,我马上就拿鲁迅的名片到孔德学校拜访马氏,在那里我又作了许多钻研,我想,作为小说研究家的马隅卿氏之为日本学术界所知,乃是从我回到东京报告了这次的会见而开始的吧。不过这位马氏,尽管曾经被大大地期待于将来,却于数年前去世了,真可惜。

在初次访问过了几天以后,有一个晚上,鲁迅把我请了去。初次访问的那一天,是头一回见面,我处处都把鲁迅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者、北京大学的教授,向他请教,鲁迅也不讲有关学问以外的话。而这天晚上的鲁迅,却已经不是作为教授的鲁迅,在我的面前呈现出作为—个人的鲁迅的全貌,给了我以深刻的印象。

昏暗的灯下摆着菜肴,喝着鲁迅故乡的绍兴酒,鲁迅和我都喝醉了。鲁迅渐渐地显露出激动的感情说着话。那已经不是有关中国过去的小说的话,而是有关在鲁迅周围打着漩涡的活的现代中国的深刻苦恼。

为什么会搞成那样呢?这是因为张作霖这些旧军阀的势力统治了北京,以致出现了鲁迅不能不在二三日内从北京逃走的状况之故。

那天晚上,就是我一个人跟鲁迅在一块,并无其他客人,只有—个年轻的中国女学生不时在进出。因此,也许鲁迅的心情是:觉得此时无论对谁都没有拘束的必要,就通过穿着东京大学制服的我这个人,实际上是在对北京许多仰慕鲁迅的大学生们的悄悄地留下告别的话。鲁迅讲到了天安门事件(按即“三·—八”惨案——译者)。而且,他对中国不易动摇的黑暗封建势力的力量感到愤慨,同时也说出了对当时领导纯真的学生的部分领导者(指部分参加领导工作的国民党右派人物——译者)的利己行为感到憎恶的话。在谈话的过程中,鲁迅很神气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他的因为喝了酒而发热的脸孔,由于愤怒更加泛红。他—面飞快地伸出手臂,—面表演着指挥学生群众的人物的模样,说:“他们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枪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教中国吗?”这时鲁迅连眼泪也流

出来了,凝视着我的脸孔。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鲁迅像这时候那么激动的神态。从北京逃走前夜的鲁迅!我偶然地得到好机会看到了他。如今还忘记不了鲁迅在那时候的激动。当他进而谈到以后要逃到厦门去时,鲁迅很快就表现出寂寞的神态,黯然地说:是朋友要我去,但也不晓得能否在那边待得长。我不想随声附和。当我想起这时候的事情,也忽然记起蒋光慈曾在《徐州旅馆之一夜》中所写的“可怜的中国!”这样的话。“这是在厦门的住址。”当我确实要告辞的时候,鲁迅就拿起笔来,写给了我。

后来的20年间,关于中国现代的动荡,我一直比较关心,可以说,实在是这天夜晚从鲁迅身上受到了深刻的感触的结果。我从高等学校的学生时代起,就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学运动有一些关心,读过一些作品,但那不过是从对所谓日本的汉学的天真的叛逆精神出发,因而对于那些“新东西”特别具有兴趣而已。自从那天晚上亲眼看到了鲁迅的哭喊以后,我才完全用不同的态度去接触那些作品。了解了中国现代的苦闷,那就对于没有意思的作品,也会受到从被印刷的纸张后面听得出来的中国人的苦闷的叫喊所刺激。每当拿到新出版的书籍时,也觉着那寻求解放的中国的灵魂和年轻的自己在心中的血肉联系正在加深。报纸上关于中国的短小的记事,我也能够将它背后所具有的意思读出来,一颗颗的铅字都像中国民族的血一般地铭记在我的心胸。

我访问了北京大学教授鲁迅,了解了鲁迅的为人,了解了中国的苦闷。

照片上所揭示的鲁迅的书信,是这样的:分别后我收到他从厦门寄来的第三次来信。这封信在改造社编辑《鲁迅全集》时,恐怕中途失落,也没有送去,如今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只有这一封,因为偶然放在东京而保全下来了,别的都因为留在朝鲜,现在不晓得情况怎样。总之,他在信里说厦门是个死岛,对隐士倒是合适的。正如他在离开北京时所预料,那边还不是哺育革命灵魂的地方。到广东去!到如今要把中国的革新势力团结在一起的革命策源地广东去!到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的灵魂正在沸腾起来的中山大学去!像个逃亡者,可是燃烧着新希望,鲁迅渡过东中国海的风波南下了。我正为鲁迅此行而感到高兴;但,1927年,当北伐军进到长江沿岸时,国共合作忽然破裂,革命势力分化

了,鲁迅就在上海隐居起来。

第二次会到鲁迅是在昭和三年(1928年)夏天。

那一年春天,我从大学里出来,到京城去就职,利用暑假到上海看望了鲁迅。鲁迅很高兴。并且,在那里我还看到了夫人许广平女士。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在鲁迅的屋子里一同聆听鲁迅的激动的谈话的那个女学生。那也许是我的混乱的记忆的错误。然而,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颇感拘束,没有就此向鲁迅打听过……

当时鲁迅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中,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积极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凭借《语丝》去应战。楼上的书房内有好些关于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书籍,他正在慢慢地努力阅读。那时,关于那些事情我不很搁在心上,记得的是:新认识的张资平氏的豪华的广东菜酒席的稀奇古怪;以及给田汉领着一次又一次地去喝酒散步,对话剧运动感到新的兴趣;还一心一意跟郑伯奇氏、陶晶孙氏等人来往。后来,当鲁迅去世之后,我要着手写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了,把当时文坛的动向冷静地加以思考,鲁迅在默默地努力着的情景,如今还铭记在心胸。遭受着喧嚣的非难,又在慌乱的空气中,而且自身还暴露在不安全的可能被捕的危险里,可鲁迅就是那样沉着,毫不动摇,坚定地、一步一步地加深思考。在这种生活方式里就能够感受到毫无浮薄之处的真挚的鲁迅为人的风度,而在这里——也看得出今天我们应该学习的鲁迅精神。一年多以后,跟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同时,鲁迅成了它的重要人物,这不就是当时深刻思索和研究结果所自然地表现出来的吗?鲁迅对于没有根儿的瞎起哄是从心里感到厌恶的。

当我在苏州内地发掘了明末的文艺批评家金圣叹的墓地,决定要离开上海回国之前,去向鲁迅请安的时候,我就请求他让我把《中国小说史略》加以翻译。鲁迅愉快地答应了,还把读完了的《醒世姻缘》当作礼物送给我。这部小说就那样地摆在朝鲜,如今并不在我手头。停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译者)之后不久。我搬到镰仓居住,因而在八幡前的旧书店“镰仓文库”里看到正在陈列着的同书的石印本。因为是在鲁迅去世之后,是在由于战争而丢失了一切藏书之后,更加使我不胜感慨。《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方面,曾经准备跟东京和九州的同学共同译出;可是占重要地位的我,对于那样的工作,还不如对于当前的朝鲜民族问题方面

保持着更多的关心。在停滞期间,待在上海跟鲁迅很亲近的同学增田涉君来了信,跟我商量,可否让给他来搞。增田君是我顶要好的朋友,这就使我跟东京的同学们之间陷进了进退两难,可我不吭声地交给他去努力了。这很对不起东京的同学们;但我觉得恐怕是鲁迅喜欢增田君的翻译。

第三次会到鲁迅是在上海事变(指“一·二八”沪战——译者)一周年纪念日之前不久。不用说,地点是在上海。这时,鲁迅已经成了左翼作家联盟的中心人物,我要询问鲁迅的也已经不是学问方面的事情。有一天夜里,在他那隐秘的家中谈论中国的现实,谈得很晚,那是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被提倡,鲁迅发表了许多所谓手榴弹式的文章与之论争的时候,因而关于民族主义文艺原形能够作许多研究。鲁迅把放在手边的左联的机关刊物、传单等等拿了出来,连使用匿名的文稿的执笔者实际上是哪一个都一一给我说明了。而且在回去时他把那些资料都给了我。关于怎样地把它们安全地带回朝鲜这件事,我费了不少苦心,但好歹总算带回来了。我不知道当晚的谈话和带回来的东西,在我以后写1928年后的中国文艺运动史时有着怎样的用处。不过这贵重的资料,当我离开朝鲜时,就那样地收拾在行李里面搁着,如今连它们在哪里我也不晓得了。

揭示在照片上面的诗,是鲁迅在那天晚上送给我的。正如在同一照片上能够看到的一般,当时鲁迅跟许广平夫人之间,已经有一个名字叫做“海婴”的孩子,那也就是我的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因而鲁迅就给了我那样的诗。

投身于革命漩涡中的猛虎般的人物,如同那猛虎回看小老虎一般,不是也可以有忽然想到爱儿的事情的时候么?

这就是诗的意思。我认为,在这简短的语言里面正把作为一个人的鲁迅的丰采多么好地表现出来了。在去世的病床上,激荡在鲁迅的头脑中的怀念,不用说是关于中国将来的忧虑吧。可是,通过这两行文字也可以想像出来,就在那个时候,鲁迅对于遗留在后面的海婴的事情,也深深地操心吧。我的小於菟今年17岁,如今就要上新制高等学校了。鲁迅的小於菟该是十八九岁了;但在动乱的中国如今是怎样地成长着的呢?

那天晚上,我谈起,我被邀请去看为纪念上海事变一周年的上海话

剧团联合演出的救济东北难民的义演，透露出在险恶的形势当中，我这个日本人去到那样的群众聚会的场所，感到不放心；鲁迅却边笑边劝我，说是不碍事，一定要去看看。第二天，由郑伯奇氏做东道主，我去了，正如鲁迅所取笑的，不但没有什么不放心，还被请到后台，受到欢迎。而且，这一实地见习，由田汉氏送给了我许多有关话剧的资料，使我有知识准备，这倒成了很好的钻研。在归途中跟郑氏讨论了有关话剧和大众化问题、语言问题等等，对于我更是个良好的启发。把游移不决的我推向那一边的鲁迅的指导，直到现在我不胜感念。

却说跟鲁迅的会见，这一次的机会终于变成最后了。但就在这一天晚上，因为内山老人请客，我们一块到四马路（即现在的福州路——译者）附近的饭馆里吃饭。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眼前的情景是：大家快要入席了，紧跟在鲁迅后面走进房间时，我所看到的鲁迅的颈脖子背的瘦削姿态。那时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好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从阿姨的后面咬着她的颈脖子，叫一声“老师”似的，我为一种冲动所支配，想要把感情一口气吐露出来，从后面抱住他。自从当上了大学生以后，到今天为止，我曾受到许多前辈和师长的教诲。可是，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人，虽然在学问方面我都佩服，而感到像此刻这般的冲动，却一次也没有过。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觉得鲁迅好像是把全中国被压迫大众，不，全世界人类的苦恼都搁在那细小的颈脖子和瘦削的肩膀上承担着似的。这不就是在那时候那样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吗？

我会到鲁迅，就这样地只有3次。并且最后的讣告是在报上得知的，从京城发了唁电。听说，当时这封电报成了特别高等警察（即特务——译者）的问题，有过将要调查我周围情况的议论。那个事后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特别高等警察方面的人，风闻在停战的时候被杀了。

鲁迅把民族的苦恼当成自身的苦恼而活了一辈子。当我反省到自己不止一次接触过鲁迅，并受到他的教诲，如今正在干着什么的时候，我流出了冷汗。鲁迅是个不论处在怎样的境遇都是好学不倦的人。现在我身上有着多少那样的精神呢？虽然我也读写到将近天亮，但只考虑这是糊口之资而努力，这是可叹的。想到那长眠地下的安静、温和的颜容，并且其中还蕴藏了激烈的申斥之意而凝视着我，就有身如刀割之

感。

我只记述了私事；可是，倘使在这篇拙文中，能够多少传达出已故鲁迅的面影，那我就感到幸福了。

任钧 译

(《鲁迅研究资料》第13期)



我怀念鲁迅

[日本]清水安三

走访周宅

在《鲁迅日记》里出现的日本人的名字,最多的是“山本夫人”,其次就是敝人[按,与日记有出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论怎么想,我也猜不出来。也许,在很多日本人里我是走访八道湾周宅最多的,听说这次搜集与遗稿有关的很多东西的“鲁迅展览会”^①,19日开始先后在仙台、东京、名古屋、神户、广岛举办,而今我的怀念之情至深,心绪纷乱,难能把话讲得井井有条,这里只把浮想起的顺笔写下。

周树人先生在即将到日本留学之前,受父母之命结婚。^②这种结婚的妻子称作幼妻,鲁迅就让这所谓的幼妻,住在正房,自己住在西厢房。正房面向南,日照很好,西厢房面东向,午后完全见不到阳光。这就是说,在中国一家的主人是住在正房的。同时周宅的后房,是日本式的房子,大弟弟周作人住着,东厢房是小弟弟周建人住着。进旁门(横门)的东格房,曾借住给盲诗人爱罗先珂。但是鲁迅和这个幼妻之间没有一切夫妻关系。只有扶养幼妻,给以好的待遇。他在娶许广平之前,一直在西厢房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当我访问周作人,因

① 指1976年在日本仙台、东京等地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览会。

② 鲁迅1902年赴日,1906年回国与朱安结婚。——编者

为没在家要回去的时候,通常他把西厢房的门帘掀开一半,露出上半身关照说:“清水君,要是不嫌弃的话,到我这儿谈谈可以吧?”因为他是这样的好人,又是直言不讳、无话不说的人,当我把写出的汉诗请他添削的时候,他几乎一字不漏地加以订正,说:“日本人不会作汉诗哟!”不仅是对我作的诗,对古今日本人的汉诗,都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经常说日本汉诗没有什么诗趣,只不过是爱讲点小道理。顺便带一句,鲁迅的日语不像周作人那么流利,但完全是运用自如的。周作人日语的声调多少有些不准确,而鲁迅的日语却没有。

我说过,在《鲁迅日记》里山本夫人的名字是写得最多的,而鲁迅的熟人里有不同的两个山本夫人,一个是上海的山本夫人,还有一个是北京的山本夫人。鲁迅日记里出现的山本夫人,颇大程度上是医学博士山本贤孝夫人。北京西单牌楼刑部街有一个山本医院。同时在这个西单牌楼有一个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鲁迅就是这所师范学校的先生。也许是由于这一缘由,鲁迅就成为经常出入山本医院的患者之一。鲁迅患有呼吸气管的疾病,好像经常到医院去。

虽失和仍恋慕兄弟情谊

谈起山本夫人来信的记事,在《鲁迅日记》里多次出现,而这是涉及这样一件事,由于山本贤孝先生的误诊,致使周作人的儿子死亡^①,周作人以显著地位在《顺天时报》上刊登广告。《顺天时报》是日本在北京发行的日文报纸。山本博士倒并没有发表辩护文什么的,然而被广告激怒了的,倒是鲁迅。关于周氏兄弟的失和,有种种说法,但是我以为这个误诊事故,也就是这个新闻广告事件,至少是成为开始失和的一个原因。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鲁迅其人确实可以称之为义理至贤的人。

但是,周作人对这个应该诚恳道歉的问题,直到鲁迅逝去,从没有责难过,也没有叱骂过。而他对长兄的爱慕,也从没有丝毫的改变。在他的著作里到底是怎么写的不清楚,但在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总是嘉赏鲁迅。

^① 应为女儿。——编者

在日本有不少人认为长兄周树人有名,弟弟周作人也跟着有名。事实恰好相反。

爱罗先珂从日本被驱逐出境,伴随后来成为共同通信社社长和《读者文摘》社社长的福冈诚一,到达北京,成了八道湾周宅的食客。爱罗先珂滞留北京期间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增加了世界语的课程,喊出:“鲁迅在日本和中国,是第一流的作家。”这时不及周作人所取稿费一半的鲁迅的稿费,遽然上涨两倍、三倍。往往是外国人一承认其价值,渐渐本国人也开始承认其价值,鲁迅的作品颇大程度上也有赖于爱罗先珂的推崇。我经常受电话之邀,走访爱罗先珂,为他读鲁迅的小说。我且读且译,爱罗先珂全神贯注地听着。我发现他对鲁迅作品中出现的许多人物,特别是对阿Q,是饶有兴趣的。

终生对日本人的亲密情感

仅仅读了我这里讲的,各位读者大概也会深切地感到鲁迅对日本人是怀着非常亲密的感情的。为什么在中国人里鲁迅对日本人保持那么亲密的感情呢?这大概是由于在留学过程中碰到藤野先生那样日本人的缘故吧。大体上在日本的留学生出现的所谓知日派的中国人,也就是排日派的人物。虽然从日本回国了,可是由于把山本夫人和内山完造这样的日本人作为朋友,所以才对日本人抱着那样亲密的感情吧。顺便说,当鲁迅迁移到上海的时候,是我向内山完造作了介绍的。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要会见鲁迅,4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由于内山夫人是京都宇治人,经常以从宇治寄来的玉露茶,请鲁迅喝。

我在昔日《读卖新闻》上曾以《中国当代新人物》为题,连续一个月,对中国的新人物作过人物评论,其中有“周三人”为题的文章。这是关于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的人物评论,好像这是在日本新闻杂志上最早介绍鲁迅的一篇文章。我不禁为之一声长叹!

吕元明 译

(1976年10月19日《日本经济新闻》)

未被了解的鲁迅

[日本]儿岛亨

精通日语

我从1933年6月开始在上海内山书店工作。当时店里人都称鲁迅先生为“鲁迅样”。下面我想写一点到1936年秋鲁迅先生逝世为止这3年间他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

一到下午，先生总和往常一样，进门来先招呼一声：“老板！”然后就坐在内山完造椅旁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漫谈起来。“老板”这个词本来是商店主人之意，但这里是含有“您好”的意思。

他经常是先同中国的青年或到书店来的日本人叙谈一阵。然后再去翻阅书籍，完后，回到离书店很近的大陆新村的家去。他的日语讲得非常流利，经常用烟嘴吸他爱吸的香烟。当谈话谈得起劲的时候，他的目光更加锐利，闪烁着光芒。总之是常能听到他那爽朗的谈笑声。

我的岳父是在乡下以酿酒为业的，他的儿子，即我的内兄，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独生子特性的人。他在东京上大学时，有一天接到了在上海的内山完造寄去的一封信。内容是“在暑假期间不要只顾贪玩，最好到书店（内山书店）里来，多少帮些活”，并给他汇去了路费。

他非常高兴地从长崎来到了上海。在假期即将结束，准备回国的时候，内山把他叫到跟前说：“你现在就到你伯母家和鲁迅先生家去

做归国辞行去！”本来他不愿去，但他想：去了顶多再说我一通罢了，所以到底他还是去了。

先生多少听到一些他平时的情况，便对他说：“小智（他的名字）！你父亲虽说你不成器，不如你妹妹好，但你父亲决不会把你妹妹接来继承你们的家业的吧！”

他回国之后，立即将这些话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深受感动地说：“真不愧是鲁迅先生啊。他就连我的心事也一清二楚。”还有一次，有位日本的文学家问鲁迅：“贵国的政治、经济都很混乱，国民非常痛苦。如将中国全部交给日本来管，岂不倒可使他们幸福吗？”鲁迅先生听后，立即答道：“那可不行。这在日本看来即使很有利，但对中国却是绝无好处的。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

萤光 映雪

我们在小学的毕业典礼时，总是要高唱《萤光、映雪》这支歌。而且还说“已经完成了萤雪之功”等等许多这类的话，人们对这种行为是给予了极高评价的。

可是，有一次鲁迅先生却问我：“你认为利用萤火虫的光和窗外的雪能看书吗？”我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时，先生哈哈笑了起来，接着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有一位好学的青年，利用萤火虫的光和窗外的雪光，不分昼夜地努力学习，这件事就传开了。他们一位朋友听到之后，就想去看看个究竟，于是，白天就去找他。他心想，晚上他要靠萤光坚持学习，白天准得更用功。当他去到一看，这个青年却在呼呼睡大觉。

他的朋友见到这个情形不免有些生气，心想：“真怪，人们竟能相信这一套胡诌的谎言。”一会儿，这个青年醒来，他的朋友就问他：“听别人说你在不分昼夜地学习，就连萤火虫都要捉来用，可你……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青年回答很有意思，说：“天一黑我就得去捉许多萤火虫，捉到很晚才能回来，所以，困得没有办法，只好在白天睡觉。”

鲁迅先生说：“这只是一个比喻。总而言之，就是要抓紧时间努

力学习，虽然从学校毕业了，但是光靠在学校的学习还远远不够，平时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先生常说：“日本人缺少幽默感，想法单纯而好发火。这是性子急的缘故。”当时，他好像全部看穿了日本在中国所实行的政策。可以说，在中国广阔的风土之中经历了比日本更加悠久的历史历程，日本人今后想要做的事情，中国人是早已经验过了。他们不仅经历过饥饿、疾病、政策等所有情况，并懂得如何对付的政策。

中国人认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果你格外亲热，其中必有缘由，有目的的。对此，日本人的想法虽然也是如此，然而，当时的日本却仗仗力强，认为：“中国算个啥……”其实，中国是在筹划更加高明的对策。鲁迅先生常自豪地讲：“日本人是聪明的，并善于模仿别人，对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愚笨似的，但中国人却具有创造精神。”

写便条也用毛笔

鲁迅先生在填写订书便条时，也用毛笔写。他还用毛笔特意给我写了他爱吟的《潇湘八景》这首汉诗。如今我把他写的这首汉诗裱在轴纸上，珍贵地保存起来了。

诗的内容是：“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落款写着“鲁迅记”。其最后一句“不胜清怨……”可能是最合先生内心所思之处。笔迹清秀，一共写成三行。这虽然是写在美浓半纸型（日本习字用纸）的画仙纸上的小品，但时常挂起来看，足能追怀出先生生前的面影来。

四十几年的岁月流逝过去了，但先生当年的身影还时时浮在我的眼前，好像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样。同时我又感到，除书法家之外，我们同用毛笔写字的生活渐渐地疏远了。那时候，先生不仅在原稿纸上，就连写给书店的便条之类几乎全用毛笔写，而且写得很工整。

订书的规定，是要填写明信片大小的便条，当时岩波文库中与俄国文学有关的书籍较多，如果店里有先生要看的书就直接交给他。没

有的就设法从日本寄来再给他送去。即使快件的小邮包也需要两个多星期才能收到。书到之后，书店就轮流派人随时送到大陆新村先生的住宅去。

许广平夫人听不懂日语。可是，中国话我们又说不好，所以遇有不得已的情况，就只好等面见先生之后再回去。有送给先生需用的书时就留下他的订书便条。在我们给先生送书时，先生经常要送给一些广东的糕点呀，水果等一些稀罕的礼物让我们带回来。

世上有写字好的和写不好的人。有书法家，有外行及知名人士，但在日本，重其名而不重其字的现象则屡见不鲜。中国却相反，人虽无名，但字写得好也能得到很高的评价。几年前听说北京鲁迅博物馆在征集先生的遗墨。我想像我们这些曾和先生最接近的人，哪怕把那些笔记和便条献出来也好，可是手头上却一份也没有了。我们那时要先生的字，随时都能给我们写的，认为何必那样着急？想来真是后悔，就连当时的一张便条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好把这一首《潇湘八景》视为至宝珍藏起来了。

物轻义重的快信

以内山书店为日中文化交流的联络点，曾向鲁迅先生介绍了好多日本文化界人士。可是，有好多寄到书店里来请转鲁迅先生的快信和其他邮件，却是用中国人的名义寄的。总之是以信件为中心的，有快信、挂号信、平信等，因为这是与先生取得联系的惟一方法。

上海人把“速达”叫做“快信”，把“书留”叫做“挂号”，把“手纸”叫做“信”。信封的式样几乎同日本的相同，封面上在写人名、地址的地方有一个红框，通例是收信人的姓名写在红框里。日本人的习惯是在收信人的名字下面写上“样”字，或“殿”字，中国人则写“先生收”或“阁下”，总的意思是一样的。在好多邮件上写的都是“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先生”的字样。中文的“转交”是日文“交付”的意思。

一接到快信，我们就立刻送到先生的家。接到普通信，就等有事时顺便给先生送去，或等先生来时取走，总之是要把这些信尽快地送

到先生的手里。上海虽然是个复杂的行政区域，但在办理邮政业务方面却没有中国、日本、外国人的区别，都可以准确地投递，这是因有在法国签订的世界邮政协定条款的缘故。

接到快信以后，经常在店里举行日本青年同中国青年之间的会谈。信与会谈的内容因与我们无关，加上又不懂中国话，所以就更不清楚了。一封信其分量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给先生的这些信，其内容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可能是有关文学协会的工作呀，商讨有关出版事情呀，以及对作家协会提出的意见等等。通过这些信件，在进行新中国文学运动的交流。这将是伟大中国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而伟大的鲁迅精神将如种子一样，一颗一颗地在大地上生根、发芽。除了我们这推测之外，没有别的什么。

在内山书店的书架上，展示并出售被国民党禁止发行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海上述林》（上、下）等书。这在中国青年当中很受欢迎。国民党的官宪对这些在治外法权庇护下，出售这类书籍的日本人也是无可奈何。我对先生与中国青年的谈话是很感兴趣的，但遗憾的是我听不懂中国话，因此就更想学习中文的会话和阅读。于是请了一位中国人当老师，每周上两次夜校，虽能说一些日常用语了，但一遇到时事或专业用语就又不懂了。开始时学习的决心很大，但后来终于以半途而废而告终。

许广平夫人和海婴

那时的许广平夫人是个留短发，细瘦，朴素的女大学生的打扮。她身穿浅蓝色的布衣，经常拉着海婴（当时三四岁）的手为给先生办事到书店里来。

她语言不多，非常客气。她由衷地信赖内山完造，这并非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偏见所造成的那种虚礼，而是一种非常信任、温祥、放心所形成的态度，就好像出嫁之女回到娘家的那种态度。她虽然不大讲日语，但可以看出她非常关注先生与内山的关系。

海婴同日本小孩一样，他在内山完造旁边的椅子周围或来来回回地跑，或上来下去地玩。等夫人的事办完之后，就拉起他的手，说一

声“走吧”，一起回家去了。

战后，许广平夫人作为中国妇女联合会的代表访问日本时，我在从广岛出发的列车上又见到了她。这次相见，感到同在大陆新村——那艰苦年代的她却大不相同了。她的容貌和态度都很大方，看得出，她内心充满了对新中国建设的喜悦。

鲁迅先生经常同我们以“路，人走的路，日中友好的路……”为话题，说：“从前，无人走过的山野是没有路的。走的人，一个人，两个人逐渐增加起来，就走出路来了，而且越走越宽广。日中友好的路也是如此，互相虽都有长短处，但如果能够跨越过这些障碍，多加互相了解，就能成为友好的路了。”

当时，他说有个好例子。即从先生住的大陆新村到书店的路上，有一块长满杂草的空地，行走的人非得拐个直角绕过去走不可。不光先生一个人从这条路上走，谁都想，要是从草丛里穿过去路就近多了。这块空地是一块私有地，周围有一圈不高的栅栏，但不知何时坏掉了，还是被人搞坏，反正已有人从中穿过去，并从草丛中踏出一条小路来。鲁迅夫妇和海婴也常从这条小路上走。随着先生同内山的友谊逐年加深，先生一家所常走的这条长满杂草的小路，也越来越宽广。

移居千爱里避难

内山完造的夫人美喜因病要转到长崎去治疗。内山也陪她同去。就在内山他们走后，书店出了一件大事。店里的两名中国店员被公安局拘留了，其原因我从来不清楚。

我们马上打电报与内山联系，他非常关心地打来回电，让我们马上妥善处理这件事。这两个被拘留的店员暂且不提，他关心的还是鲁迅先生。如果鲁迅被害，怎么得了！并指示我们让鲁迅先生立刻搬到千爱里他的住处去。我们立刻告诉了鲁迅先生，并决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马上就得搬得千爱里去（因为担心这两个被拘留的人说出鲁迅先生的住址）。直到这两个被释放，我同先生及另一个伙伴 M 君一直都住在一起。

白天我们工作，晚上闲居后，我们代替了内山，陪着先生漫谈起来。先生先从煎茶开始谈起来了。他一边喝着我们煎的茶，一边对我们说：“你们在书店里工作，可以看到许多爱看的书，多好呀，你们现在看什么书呢？”

如何回答先生的问话？我想：根据先生平常的言谈和到书店来买的书，决定先给先生露一手，好让他夸一夸我，于是我回答说，高尔基的《底层》如何如何，卢梭的启蒙思想又如何如何。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这些书的。先生听后立即说道：“像那样的书还是算了吧，你最好还是看一看夏目漱石的书，他的小说很有意思。”先生再三劝我们看一些夏目漱石的小说，原来先生自己也很爱读夏目漱石的作品。以后回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对高尔基、卢梭等吹了一通，却被先生识破，心里很羞愧。

我曾向先生问过：“日本从很早就从中国学到了许许多多的学问呀，宗教呀，文学呀等等，数不胜数，但是以现代的日本同中国的现状来看有没有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的东西呢？”先生回答说：“现在，有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

墨子与中国青年

内山完造是个基督教徒，他既信神，又信人，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和做买卖时就是这样去做的。因此他得识以鲁迅为首的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为知己。

有一天鲁迅对他说：“我说老板呀，你既是个基督教徒，最好读一读中国墨子的书啊。”因此内山就看了一些墨子的书，觉得墨子的学说颇有意义。有些近似基督教义。可是墨子早于基督四百多年，如按年代顺序来排，莫如说基督教近似墨子的学说。关于这方面在《内山漫话》里提过，他说：墨子所讲的兼爱和互利说当中，兼爱应是平等的爱，要像爱自己一样地爱别人，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地爱别人的父母，要像爱自己的家庭一样地爱别人的家庭，要像爱自己的国家

一样爱别的国家。互利是要像对自己有利一样地让别人也得到利益，互相地利益均摊。无论是爱或利益都必须把它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如劝诫人们不要浪费，力争节约，热爱和平和增加生产等，都是非常平易的学说。

最后有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这并不是只要求别人去做到，而应自己以墨子的弟子自任，哪怕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好，也要按照墨子的这些教义去实践，主张有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目前，从中国青年的一些勇为的行动，可以看到墨子主张的自我牺牲精神。在香港虽然有些厌恶中国共产党而逃避到香港去的人也说“共产党员的生活是很好的哟”，在东京有一个曾被打上共产主义烙印的中国青年归国3年后，听说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了。就连那些害怕中国共产党的人都说党员的生活好。这个问题是发人深省的。

英国有名的大僧正也断言，在新中国，道德的根源是共产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英国把自由和自我抑制说成是一辆车子的两只轮。虽然有人说在今日的中国没有自由，但是他们所指的自由，是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我觉得墨子的教义同现代中国的实际是有共通之处的，这和大力提倡鲁迅精神并不是没有关系。

毛泽东的老师

一提到中国，日本人都会想到毛泽东，因为全中国的青年都支持毛泽东。毛泽东也有一位老师。毛主席的座右铭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救中国。以此激励全中国的青年。

这个座右铭正是鲁迅精神的体现。毛泽东的这位老师正是周树人，即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故乡在浙江省绍兴府，1881年他作为周家的长子而落生，正由于他家的不幸才使他的天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可以说这是他的命中注定。

先生离开家乡后，最初立志求学，渐渐地因家中不能再给他提供学费，因此必须找一个免费学习的地方，于是他找到南京水师学堂。

由于先生学习努力，不久就得到留学日本的机会。在日本，先生曾一度立志于医学，要为人们的健康而工作。当他看到那些有着强壮的体格但却非常无知的人们的傻态以后，又转而学习文学，我以为先生的这种见识是对的。

随着革命成功，毛主席称赞鲁迅先生说：鲁迅是站在这场革命前头的旗手。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无论在金钱还是权力，甚至在武力面前从未屈服过，我们要踏着鲁迅的足迹前进。并且高声地向全中国的青年发出了号召：全国的青年们，要发扬鲁迅的精神！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现在的鲁迅纪念馆）停止最后呼吸的时刻，全中国笼罩了哀愁的阴云。当时毛主席为了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毛主席说：鲁迅是现代的圣人。没有鲁迅的精神就不能救中国。我们现在还很年轻，鲁迅就是我们的师表。并向鲁迅先生致哀。

鲁迅先生曾说过，我虽然曾经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感到失望，但是正因如此，我必须战斗。现在促使全中国的青年努力为建设新中国而继续前进的，也是这种鲁迅精神。

战后，我从上海只身回到了日本，但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许多珍贵“礼品”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并鼓励着我。

1977年7月22日

漫谈鲁迅

[日本]内山嘉吉、内山松藻夫妇等

【《朋友》杂志编者按】

今年秋天是中国文豪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作为纪念活动之一，中国将重新编辑出版《鲁迅全集》；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将举行集会，以追忆鲁迅一生的光辉业绩。在日本，也将召开各种纪念集会，并将有许多人士访问中国，探访鲁迅所留下的足迹。

作为了解鲁迅的一环，我们邀请与上海时代的晚年鲁迅有过亲密交往的内山嘉吉（至战败为止在上海经营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先生之弟）、内山松藻夫妇和研究鲁迅造诣很深的神户大学副教授山田敬三先生，对鲁迅进行了漫谈。

山田 今天想请内山嘉吉夫妇随便谈一谈上海时期鲁迅晚年的情况。内山先生在战前去过上海，夫人在上海待了很久吧？首先请谈谈那时的情况吧。内山先生是在1927年第一次去上海的，1928年夏天第二次去上海时，见到了鲁迅。

首次会晤是在1928年

内山 是的。第三次去上海是在1931年，那时在指导版画的讲习会上，请鲁迅先生当了翻译。

山田 就在那时和夫人举行了结婚典礼。夫人是在什么时候同鲁迅见了面的呢？

夫人 书店设在当时的北四川路魏盛里时，1927年10月鲁迅先生第一次来到书店，我在二楼，所以没有见到。那个时候因为身体不好，正在休养，很少在书店工作。

山田 那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什么时候呢？

夫人 那是搬到北四川路底，也就是书店搬到北四川路顶头以后的事情。

内山 1929年书店从魏盛里全部搬到了四川路底。

山田 那么说，那是鲁迅先生来上海两年以后的事情了。首次相遇是怎么一个场面呢？

夫人 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在有事从二楼来到一楼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按鲁迅先生的旨意，许广平先生经常来书店领取“内山书店转交鲁迅”的信件。

山田 那的确是许广平先生吗……。

夫人 记得我的嫂子（内山完造夫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夫人如果好好打扮打扮，本来是很漂亮的。帽子戴得不对劲儿，怪可笑的……”哦！原来那位就是鲁迅夫人。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鲁迅先生的为人，只认为是和书店有关系的人。

内山 鲁迅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家兄转交来信的呢，现在不清楚。我老早就想问一问这件事，家兄一去世就无从搞清楚了。我想许广平先生来书店取信，可能是在以后的事情，书店设在魏盛里时也有曾转交过来信的……。

夫人 魏盛里时期，完全没有注意到。

内山 这样说来，是在鲁迅先生1930年迁居拉摩斯公寓以后吧？

夫人 不对，从住在东滨横路景云里的时候就来书店的。当时由于先生感到身边的安全有危险，才搬到拉摩斯公寓的。1931年柔石等人也被杀害了。

内山 拉摩斯公寓是临时性的住处，是家兄为正在找房的鲁迅先生找到的。因为地点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很近，这样的地点是不会推荐他长久住下去的。

- 山田 实际上在那里住了大约三年。
- 夫人 搬到拉摩斯公寓以后,离书店近了,所以经常来。
- 内山 最初的景云里的住房,离横浜桥很近。住在横浜桥以北的人们,对于由北向南的地方感到生疏,因为要过横浜桥。
- 夫人 那时的事情,掌柜王宝良很清楚,因为他经常去鲁迅住宅送书。
- 内山 在许广平先生写的书里谈到过景云里住房的情况,也谈到了周建人先生的住处……
- 山田 最初住在景云里23号,不久搬到18号,柔石接着住进了23号。拉摩斯公寓的情况最不清楚。大陆新村9号现以鲁迅故居的形式保存着,这次我去看了。拉摩斯公寓,只进了大门,没有到里面去过。听说你们两位去过里面。现在称为北川公寓,屋子很宽敞吗?
- 内山 不知道鲁迅先生租了几间房,我去的那个房间是上楼后走廊顶头的右侧的一个房间,似乎是作为会客室用的。正中间放着一张大桌子,桌子周围放着五六把椅子,窗户面对庭院,是一间亮堂堂的屋子。夫人从隔着走廊对面屋里送来了茶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夫人。这是1931年的事情。
- 夫人 我去过的那个房间的窗户面对大街。因为我要回日本,由嫂子陪伴前往辞行;我去的那个房间比较宽敞。
- 内山 那就是我去过的房间,大概租了两三个房间。在谈话中听鲁迅先生说过,曾给隔着走廊的对面房间的什么人,写了点什么,那就是说,朝他们卧室方向有几间房子里住着别人。
- 夫人 拉摩斯公寓的对面是英国公共学校,校园里有一大片草坪。
- 山田 那里也是租界。
- 内山 是英国租界。在那里,一面向前修马路,一面修建医院、教会和学校,也让中国人进去,借机扩大租界,手法巧妙得很哪!对此,家兄曾说过,日本人笨极了,像修建医院、开办学校等使中国人高兴的事情,什么也不干,一下子就想来个“占领”,哪有这么混账的事情。

鲁迅喜爱夫人

山田 1931年你们两位同鲁迅先生都有过比较亲密的交往,在那以后就离开了上海吗?

夫人 我们俩在8月和9月先后回到了日本。

山田 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鲁迅先生吗?

夫人 没有见过。可是经常给我们寄来各种物品。

内山 贱内比我还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喜爱(笑)。我没有请鲁迅先生写点什么,但是他却给贱内写了两帧条幅。这条幅,原打算在许广平先生来日本参加战后召开的禁止核弹世界大会时交还给她,可是没有来得及;在她回国以后,又把它裱糊好,才寄到中国去的。我们说这就放心了,我们有个复制品就可以了。在那以后不久,就寄回来了经过裱糊的漂亮的复制品。

山田 鲁迅先生在1931年5月书赠夫人五言律诗一首。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在晚年开始写旧诗;前此为止,虽然在青年时期写过旧诗,但以后一直没有写。自从1931年起忽然又写起来了,除了为夫人所作的诗以外,还为另外两个人写过。《赠邬其山》那首“南无阿弥陀”的诗是在那以前或是以后写的,时间上不清楚。总之,忽然写起旧体诗来了。夫人得到的条幅,就是在开始写旧体诗的时期写的。

内山 “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写的。

山田 那首诗是为了悼念左翼作家联盟五烈士而写的,不是在最初时期,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发表的。夫人得到的条幅,就是在开始写旧体诗的最初时间写的。在1931年3月5日又给3个日本人写了诗。

内山 刚看到“大野多钩棘”那首诗时,我觉得这是写第一次和第二次上海事变中,中国遭受压迫的姿态。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才写出了那样的诗句。

山田 那首诗是夫人请求鲁迅先生写的呢,还是没有主动要求,而是在其他什么机缘下……

夫人 那是由于哥哥(内山完造)说：“给她写点什么吧！”才写的。加上离开上海时为我写的那首，前后为我写了两首。离开上海时的那首诗是书录了宋初欧阳炯的诗句。

内山 那首看不懂，很伤脑筋。最近看了别人的解释，才好不容易弄明白了。

鲁迅提倡版画

山田 它同诗不一样，因为那是词，所以不太好懂。关于木刻讲习会的事情，我也读了许多有关文章；在六天的讲习期间，鲁迅先生每天上午一直担任翻译。有多少人参加了讲习会？

内山 共有13人。后来阅读中国人写的文章，是以当时名为周熙的江丰君为中心的。江丰现在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长，并兼任1980年4月成立的版画家协会名誉会长。当时鲁迅派人到江丰那里去了，被派的那个人似乎是冯雪峰。参加讲习会的人选好像是由江丰君选定的。

山田 这样说来，那是培育了草创人才。

内山 都是很优秀的人才。

山田 当时，内山先生是亲自动手雕刻，进行示范讲解，还是也让参加者动手呢……？

内山 当然是进行了实习的。我讲授了木刻时的刻刀角度、鉴定木版能否长期保持原样，和三种刀法技术。当时我只带去了儿童用的三种刻刀，具体地讲解了这三种刻刀的使用方法。

山田 鲁迅先生提倡版画的背景，一是因为版画非常便于表现民众的思想感情，另一是中国也有传统的优秀版画技术。而内山先生在日本搞的版画，是西欧的手法吧？

内山 是的，是的，那是创作版画。也就是说，旧式版画的形态是画者作画，刻者雕刻，印刷者印刷，三者分工，最后能否表现出原画的精神很难保证。中国的传统版画似乎是这样的，日本的“浮世绘”版画也是这样。仔细看一看日本的“浮世绘”，都刻着雕刻师和印刷师的姓名，还有画者的姓名，如歌磨等。其中重要的是

雕刻师。无论雕刻师是怎样刻的,或印刷师的印刷多么出色,那都不是个人的创作。他们只是为了多卖钱而想方设法使之能够大量增加印数,所以被称为复制版画。

山田 现在中国已经重新确立了创作版画的传统了吗?

内山 是的。因为我认为创作版画才是画家的作品,所以在讲习会上也是从这个问题开讲的。

山田 版画有两种,还是我头一次听说。

内山 这连日本人也不知道。所以当画家开始制作版画,就成为创作版画了。日本也是从大正初期由山本鼎、石井柏亭等画家在欧洲看了创作版画归国后,才开始搞起来的。

我想写一篇关于鲁迅先生为什么重视版画的文章,但是苦于资料不全。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每月购买的书目。例如,书价若干、共几卷等,我都进行了查阅。阅读从1912年开始的日记,虽然他对绘画抱有兴趣是从记日记以前开始的,但在日记里首先出现了购买大量拓本的记载。当时似乎也看了日本和欧洲的美术杂志和美术专著。翻阅当时的日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型《新俄罗斯艺术大观》一书,里面收录了苏联的版画——当时这本书定价太高,我买不起,而鲁迅先生却买下了。按照我的想像,鲁迅先生是从这里受到启发的。也就是说,由于看到了这本书收录的革命版画,在鲁迅先生的脑海里展现了版画可能发挥的作用。当然,阅读其他外国杂志,也可能有这样的作品;但从我所接触的范围进行推想的话,我认为是由于看了这些版画——在这以前鲁迅先生已经有了美术革命的想法。

鲁迅先生从仙台医专退学来到东京,准备同周作人等一起创办《新生》杂志。那时,想采用英国画家瓦茨的作品《希望》作为杂志的封面;另外也想使用俄国画家别列斯察金的作品——尸骨堆成山的《骷髅山》。从这里也可看到,用日后的话来说,在那年代里鲁迅似乎已经感到“在中国的未来,看到了阿拉伯沙漠”。《希望》这幅画的画面是,在地球上一个衣衫褴褛、双目失明的女神弹奏着竖琴,琴上只剩下了一根琴弦,其他都已断了。这幅画使人感到无论斗争如何艰苦,遭遇如何悲惨,但美是不会消灭

的。我想不仅在音乐中,文字和绘画中也存在着这个美,正因为这里存在着希望,所以鲁迅先生才打算加以使用。但是这个杂志未能出版。可以设想,鲁迅先生为了中国革命,不断地进行思考,在看到的各种事物中,苏联的新版画对他是一次巨大的冲动。这是我在任何地方尚未公开发表的新看法。

在那以后,鲁迅先生对德国的革命版画也产生了兴趣,曾经委托在德国留学的他的学生徐诗荃邮寄版画,也委托曹靖华从苏联搜集版画。

夫人 在经由内山书店转交的邮件中,有的是从俄国和德国寄来的,鲁迅先生说:“哦!寄来了这个。”就和哥哥一起观赏起来。

内山 家兄在借阅寄给鲁迅先生的这些外国版画集时,也进行了学习。可惜我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版画集。

版画讲习会会场设在购买合作社

山田 作为版画讲习会会场的日语学会,是个什么样的设施呢?

内山 这是家兄了解到有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商店的年轻人想要学习日语,于是就开办了讲习会。郑伯奇担任日语学会的校长,会计由家兄承担。

夫人 使用了日本人购买合作社(北四川路长春路)的二楼。

内山 购买合作社设在从家兄店铺沿四川路南行的左侧即长春路的一角,是三层楼房,现在扩建为四层楼了。日语学会就是使用这幢楼房的二楼开办的。1930年鲁迅先生和家兄一起举办鲁迅收藏的外国版画首次展览会,也是在这个购买合作社二楼的日语学会。

山田 日语学会的教师都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夫人 也有日本人,但我只记得校长郑伯奇先生。

内山 郑伯奇先生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但却操着标准的东京口音,是一位愉快的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把《西线无战事》搬上舞台并担任导演。

山田 那么,1931年的版画讲习会也是在长春路的购买合作社二

楼举办的吧？

内山 不是的。前面提到的江丰君在写回忆文章中也说：“在购买合作社二楼的日语学会开办了版画讲习会。”那是记错了。日语学会在那以后从购买合作社搬到了别的建筑物。据我的记忆，1931年日语学会搬到狄思威路住宅区右侧的一所住宅，那里原来是美国经营的为教育犹太人子女办的学校，后来成了空房，日语学会就搬了进去。印象很深的是当我来到版画讲习会场时，看到那里摆着一些儿童用的小桌椅，青年们蜷曲着身体勉强就座。看来江丰君也是记错了。

山田 是把版画展览会会场同版画讲习会会场弄混了吧。

内山 我想冯雪峰大概是前往江丰君那里进行了联系的。当时上海有一个名为“一八艺社”的艺术团体，属1929年在杭州成立的“一八艺社”系统，上海的办公处设在江湾路。

夫人 就在陆战队司令部后面的一条街上。

内山 有很多日本人居住在那一带，抗日和革命的“一八艺社”就设在紧靠陆战队的一条街上，真是莫大的讽刺啊！……一个房间用于开会和研究活动，另一个房间是卧室，冯雪峰就是到那里进行联系的。

山田 “一八艺社”也是左联系统的团体吗？

内山 它参加了左联。这个团体本来是1929年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创办的，后来在上海也成立了“一八艺社”，大概在1931年3月举办了这个艺术团体的首次展览会，鲁迅先生和增田涉先生曾前往参观。展出的作品有油画、水彩画和版画等；日后我问增田先生：“展出的作品怎么样？”他只是笑而不答，大概觉得展品质量不高吧。

山田 那个展览会的主要组织者是不是鲁迅呢？

内山 鲁迅先生是协助者。在杭州成立“一八艺社”时，鲁迅先生提了许多建议，在举办展览会时，还写了《一八艺社展览小引》。但是，是否把这个《小引》编印在展品说明书里，在杭州引起了一场风波：学校当局下令禁止，而艺社方面则进行了抵制，于是招致了胡一川等数人被逮捕，力群等人被开除出学校。这

些被捕和被开除的人们日后开展了精力充沛的版画家活动。“一八艺社”首次展览会展出了当时上海和杭州版画家的作品，那是一次非常值得纪念的展览会。

山田 当时中国版画界的情况如何呢？

内山 都是在各地分散进行的。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有人在搞，但都在摸索之中。”在广东省有以李桦君为中心的赖少其、谢海若等人。全国各地虽然出现了这样的萌芽，但彼此之间没有横的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下子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组织了。

山田 讲习会的最初印象，从技术上来讲，并不那么高吧？

内山 是的。不过无论如何思想意识走在了前头，但由于素描的根基薄弱，所以感染力不强。在从讲习会回来的时候，我曾对鲁迅先生说过：“不扎扎实实地搞素描，不行啊！”鲁迅先生也同意地说：“是那样的。”

同茅盾夏衍等相识

山田 夫人还记得哪些人呢？

夫人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名为沈雁冰的茅盾先生和名为沈端先的夏衍先生

内山 我在1956年作为出版交流代表团的成员，解放后第一次访问了中国。有一天有关人员说：今天访问文化部，文化部部长是沈雁冰先生。当时我想那就是茅盾先生了。我到文化部一看，夏衍先生也在场，使我有机会同时见到了名为沈雁冰、沈端先的“二沈”。

夫人 我清楚地记得沈端先、冯乃超、郑伯奇、沈起予这四位先生。

山田 他们都是创造社系统的作家。那时，镰田寿先生是内山书店的经理吗？

夫人 那是迁到北四川路底以后的事情，专门掌管财会账目。

内山 我是1931年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时他的弟弟诚一君也在书店工作。我经常同诚一君一起在大街上漫步。他是一位性格开

朗的年轻人,人品很好,也喜欢作画,所以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喜爱。那时来书店的人,还有陈望道、沈钧儒……

夫人 陈望道先生经常来,还有王独清……

内山 此外还有唐有壬、傅彦长。家兄说“邬其山”这个笔名是傅彦长为他起的。

山田 在来书店的人们当中,也有正在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吧?

内山 1955年为了家兄的葬仪去中国时,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我见到了作家杜宣先生和苏步青先生。他们都是和家兄要好的朋友。苏步青先生现在是复旦大学校长。那时,他走到我跟前说:“令兄的逝世令人惋惜。”

夫人 夏桢尊先生也经常书店露面,他是开明书店的。有许多人来书店,由于我不是经常地呆在店里……还有,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鲁迅先生是那么伟大的人物……

内山 由于鲁迅先生是近在身旁的人,所以不觉得他是那样的伟人,而是以亲切的感情进行了交谈。

山田 那正是鲁迅先生的品格。

内山 我称呼他鲁迅先生(这里的“先生”同日本人称呼师长、学者为“先生”的含义不同,是平辈相互间的称呼——译者注)。家兄除非把鲁迅先生介绍给某些人时,是不称呼他先生的(这里的“先生”指对师长学者的称呼——译者注)。他以温厚长者的风度坐在藤椅上,边吸烟,边谈话。最近有人在写文章时提到:“内山书店里摆着一个藤制圆桌,那里设有鲁迅先生的座位。”其实,据我的记忆,在1931年夏季放的是檀木方桌。鲁迅先生坐在椅子上,一面吸着香烟,一面和家兄谈论各种事情。他以“江户人”(明治元年(1868)以前,东京称为“江户”。“江户人”指在江户出生成长或父祖代代久居江户的人,犹如我们常说的“老北京”的意思——译者注)的潇洒谈吐,引人发笑。

山田 鲁迅的一些文章很幽默,在谈话时也是那样么?

内山 鲁迅之为人并不总是那么严峻,而是经常面带笑容。

夫人 一点儿也不觉得那么严厉。

鲁迅每天来内山书店

山田 当时鲁迅的人身安全是很危险的,来内山书店时的情况如何呢?

夫人 脸上毫无黯淡的表情,感觉不到他是正在被通缉的人。

内山 我也那样想。我感到鲁迅先生一经步入书店,好像整个房间顿时明亮起来了。鲁迅先生就座的地方,从书店的门口来看,正好在书架的背后,来买书的顾客是看不到的。

山田 中国警宪不能明目张胆地进入内山书店抓人吧?

内山 是的,因为那里是租界。但是,便衣警宪伪装成看书的顾客前来进行侦察,那是可能的。

夫人 日本领事馆的人也经常到店里来和哥哥谈话。哥哥对(日本)政治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笑)。

内山 因此,家兄的书店列入了两方面的黑名单。但由于具备了哪方面都不能轻易动手的条件,不管是对日本人或中国人,书店都是一个很有趣的店铺。我得知家兄构筑的内山书店这个堡垒,哪方面都不能草率动手,是在1927年第一次去上海时,那是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四个月以后的事情。乘马车从码头前往家兄书店的沿途,中国人街道的民房都架设了铁蒺藜网,直到二楼屋顶,气氛十分紧张,当轮船靠近码头时,为了引起前来迎接的家兄他们的注意,我在甲板上摇动了红绸布;次日,便衣警察为这件事来到书店并对家兄说:“昨天来了一个混账东西,本来打算给他点颜色瞧瞧,后来察觉到好像是你店来的客人,所以没有那样干。”从这个谈话里我知道,家兄得到了相当的信赖。所以家兄的书店也成了中国人自由进出并可以进行谈话的场所。

山田 那是一个“沙漠绿洲”啊!

夫人 哥哥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无论同谁都谈得来,而且好开玩笑。

内山 家兄喜欢同别人谈话。虽然我本人也是同一血统,但不同的

是家兄每当想到什么事情就立刻记录下来,而我不善于写东西的。

山田 鲁迅先生也是以每天来书店谈话作为乐趣的吧?

内山 还有一件事情想顺便谈谈。从北四川路底向大陆新村延伸的大街拐角处,有许多卖大饼油条的摊贩,路过的苦力和车夫在这里买着吃。凡是买吃的人可以免费喝上一大碗白开水;没钱买吃的苦力和乞丐,即使渴得要命也是不让白喝的。家兄看到这个情况,就在店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一张木桌,桌上放着盛满白开水的圆筒型大水桶,打开龙头即可流出开水,谁都可以随便喝。当时上海的住户都是花钱打开水的;家兄每天早晨除打来自家用的开水以外,还灌满了那个圆形大水桶,在炎热的夏天更是如此。这样,一般穷人、苦力和乞丐都高兴地来喝开水。这是家兄从在中国各省过着最低生活的底层中国人共同生活的体验中所想到的事情。

夫人 这件事深受那些人的欢迎,有时也有人留下一个铜板。

内山 傍晚收拾桌子时,出乎意料也发现一两个铜板。对此,家兄说这是过着最低生活的穷人不愿白喝人家开水的表现,也是在长期恶政和天灾中挣扎的最卑贱阶级的人们的道德观。

夫人 哥哥经常说,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内山 当我看到家兄所做的工作时,一方面佩服他的工作方法,同时看到高高兴兴喝开水的苦力们时而留下一两枚铜板,此情此景使我深受感动。没有别的日本人能像他这样了解中国人……不仅在那个年代,在那以后或许也是这样,所以才会发动了那场大错特错的战争。我认为在家兄所做的工作中,这才是十分宝贵的事情,这或许人们并不知道。

山田 座谈到此结束,谢谢。

江流 译

(日本《朋友》1981年2月号)

鲁迅的死和广州的回忆

[日本]林守仁

民国十四年(1925年),鲁迅因对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进行笔诛而离开了教育部;民国十五年(1926年)八月,他又离开了十几年的第二故乡北京而南下。特别是这时的华南,由于国民党的勃兴,在各方面营造出了革新的气氛,有不少人曾邀他南下。

南下的鲁迅,应友朋们之招,先在福建省的厦门大学留过短暂的时间。然而在北京时所想像的华南的空气,事实上和北京的并没有多大变化。他在这里没有住上一年就又继续南下,被聘任为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系主任。但对鲁迅来说,这个久恋之地的广州,也并不是什么能够久恋的地方,转瞬之间,反动的势力席卷华南、华中一带。如李济琛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之时,他的生命就有如风中的灯烛一样的危险。

从这时起,他就作为“反逆者”开始过着地下的生活,过着从未间断的潜伏、隐匿和遁逃的生活。于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①,他就秘密地回到了上海。从此他差不多一直住在上海,直到今天为止。其间,“反逆者”的印记始终没有从他的头上消失,国民政府有时竟至以悬赏索取他的首级,因此他在上海,多半以上是过着隐栖的地下生活。

鲁迅处在国民党接连不断的迫害之下,正像他说的“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这句话,前些日子佐藤春夫先生在报纸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也曾加以引用。它原是笔者四五年前在上海鲁迅寓所直接听他

^① “民国十七年”应为“民国十六年”。

讲的话里的一句,十分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生活的实际情况,既非夸张,也不是他所擅长的讽刺。这样用自己的脚忙于到处逃跑的鲁迅,“为了生活”,也仍然不得不“用手”写作了相当数量的文章。假如他只要不必“用脚逃跑”,他的作品将会多么大量地产生出来,这是无须《大公报》的短评家叹息的。没有给他时间,让他沉下心来,休养身体,使他不再写什么辛亥革命中的“阿Q”,而是写处于蒋介石政权下的第二部《阿Q正传》,不只是中国文坛的损失和吾等爱好者的失望等等,而正是为中国四亿同胞不胜痛惜的憾事。

笔者和鲁迅的结识始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在广东的初会。他迁到上海,又在那里继续来往,直至近年。几年前他在上海希望出《阿Q正传》日译决定版,笔者也从广州来就怀有同样的决心,并在广州时已在《新潮》杂志有所披露。两者偶然一致,于是就于上海在他直接指导之下由笔者完成了这项翻译工作。原文有的地方引用古典和不时出现绍兴土语,相当难译,大约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始告译成。这之间,鲁迅对译文提出意见和讲解语意达五十余次。

当他憧憬着革命之地和自由之天,从北京南下落脚于厦门大学以后,却同在北方时所想像完全相反,南方有南方的军阀,有迫害;所谓国民革命,同他内心所希望和想像的根本不是一码事。用他的解释来形容,即是颇为反动。于是,来到厦门,他立刻就失望了。这样不到半年,他就再次怀着一个作家所应有的新的希望和梦想,投进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广州的朋友们的劝诱,特别是那时同郭沫若一派创造社系统的青年作家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等人在思想和感情上,逐渐接近,也是他此行的原因之一。

然而,实地一瞧,广州这地方也仍然是现实的土地而不是梦中之国。从到达的第一天起,他所体会到的,可以用“幻灭”一词言尽。

反映在鲁迅的现实的眼睛里的广州,乃是一个以独裁代替自由、以群众代替个性、以专政代替平等、以模仿代替创造……总之一切都呈现出言语和事实截然相反,而且燃烧着,乱蹦乱跳和兴奋得无从下手的世界,这是一个同其所爱惜的长年梦想之国离得奇远的世界。

在辛亥革命的幻梦中,阿Q“砰”的一声被枪杀了。但是,现在,鲁

鲁迅似曾怀疑,在这个广州,在广州革命的幻影中,是否“阿Q”的作者本身,也将被当作“阿Q”“砰”的一声被枪杀掉。

鲁迅就是这样到达广州的。笔者在他到这里不到半月之内,访问了这位身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住进大学院内系主任室的鲁迅。鲁迅住的房间,如果在日本,也许会被认为是乡村小学校的杂役室,又窄又脏。他就在这里用着一个61岁左右的龙钟老人,过着几乎是自炊的生活。这就是革命发祥地、北伐军根据地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的宿舍和生活,且不说,这狭窄的房间里还塞满了变成酱黄色的木版印刷的中国古书。

鲁迅说是久未吃到日本饅头了,我便带他走出房间,回到英法租界沙面来,从日本人的店里买了,在珠江畔的一棵老榕树阴里一面吃着,一面听鲁迅的中国文学论和中国革命观。

听着来此还不到十天的鲁迅痛骂广州的那种辛辣刺骨的言论,笔者立刻就想到:“这样,他是不会在广州长久待下去的吧。即便想待下去,也是无法做到的……”笔者这个杞忧果然并不止以杞忧告终。现在记不太清楚了,鲁迅确实是在几个月以后,既不是自己辞职,也不是被撤职,而是不得不逃跑似地摆脱了中山大学的文学系主任室,在接近市内贫民窟的小巷中几乎像地下室一样的一间小房间里隐蔽起来。

鲁迅在隐蔽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每日都深切地感到身边的危险,最后终于逃出广州,来到了上海。

当笔者去广州市内隐蔽的地方安慰他时,他从地下室的窗子里窥视似的望着外面的街道上正有李济琛的反动纠察队的旗帜在向前移动。那时他讲话的神态以及他深刻的话语等等,写起来是很多的。因为给予我的篇幅已经用完,有关个人的回忆只好有待于另外的机会再谈了。

谈鲁迅

[日本]山上正义

鲁迅不是小说创作中的人物,而是当前活着的人。他就是在国民革命的声浪和战乱的街巷中,虽说难于把五尺矮躯托于四百余州之上,但却出色地生活着,并被推为中国文学革命一方首领的周树人其人。

鲁迅,在中国几乎是只以鲁迅知名,在文学青年当中甚至有人不晓得他叫周树人。

在阴暗的北京的天空之下,甚至连使用白话(相当于日本的口语体)都被视为异端和危险。从这样的军阀张作霖的天地,渴望着光明和自由,他应邀前往福建省厦门大学赴任,乃是去年春天1月的事情。^①

由于在厦门也未得到所期待的自由和解放,他便在热烈的邀请下再行南下。去年春季,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②,他那踉跄的身姿又出现在被称为革命策源地广州的中山大学。

在厦门大学只待了不过短短的两个个月。^③预料着广州这地方已进入光明、解放和自由的建设时代,不晓得怀着怎样的梦想和多大的希望

① 去年指1926年,“春天1月”应为“秋天9月”。

② 3月应为1月。

③ 鲁迅从1926年8月26日离北京去厦门,1927年1月16日离厦门去广州,此处说两个月有误。

来到这里。但在他踏上广州的土地不足一个月^①的4月中旬,新军阀李济琛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样,广州除了地处南方以外,也变成了实质上与北京毫无不同的置于一个小军阀统治下的黑暗、血腥、阴郁和令人窒息的天地。

这样,鲁迅的梦想和期待便被彻底地破坏了。我曾经在他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时,在他的私人住处同他谈过几次;并且在他受到军阀李济琛的追踪而仅以身逃出,隐蔽在广州市郊白云山附近的一个民家期间^②,前去慰问过他几次。

我想现在以《谈鲁迅》为题,记述他的谈话,乃是最容易的事情。在此,除了写他的谈话,如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观、对于国民革命和新文学的关系的看法,以及对于国民革命的不信任以外,还想一起谈谈鲁迅其人的文学和事业,因而,定名为《谈鲁迅》。

鲁迅,正像他自己对我说的那样,他是从民国以来15年间未出北京一步^③,同白话文学运动的潮流一起而且是踏着浪尖走过来的人。鲁迅个人过去15年的历史,即是新文学运动15年的历史。

陈独秀和胡适尽管提出了白话文学宣言,但前者忽即转入社会运动,后者则追逐当代的声誉,投进教育界,都走出文学圈子外边去了。之后,鲁迅却忠实地把它担负起来,勇敢而顽强地引导其潮流直至今日。

今天,介绍外国文学,把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的文脉引进白话文中来,乃是一般被认为更新、功绩更大的南方派,即以《创造月刊》为阵地的郁达夫和郭沫若诸君。但是,如果以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也都必须让一步与鲁迅。

鲁迅对白话文学的功绩和地位,应该说是他一人兼具明治、大正文

① “一足一个月”应为“不足三个月”。

② 鲁迅搬出中山大学是出于对国民党右派及《现代评论》派的厌恶和憎恨,并非逃避军阀的追踪。白云楼在广州东堤白云路,并非市郊。

③ “未出北京一步”不确,如鲁迅在1916年12月3日至1917年正月初七曾回浙江省亲,在1924年7月曾去西安讲学。

学史上的逍遥和鸥外^① 二人的特点吧。

尽管陈独秀和胡适勇敢地提倡了白话文学,胡适自己还写了白话诗,印证了他的主张,但是他们二人并没有以其创作使其主张得到具体化。而以作品加以印证,以作品出示世间的就是这位鲁迅。

鲁迅的创作是以《狂人日记》开始的。当然作为处女作从时间上看来,另外也还有一些短篇,但历史地来看,鲁迅乃是以《狂人日记》发出了新文学运动之先声的。

尔后,鲁迅的事业,除翻译外(他同其弟两人介绍了许多日本文学),真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十有五年坚持作了孜孜不倦的努力。

同人刊物《语丝》,作为周刊今已达到 150 期,以《未名丛刊》和《乌合丛书》出版的单行本亦有十数册。

鲁迅个人的创作集有《呐喊》、《彷徨》和《热风》等,从处女作《狂人日记》到成为世界名著的《阿 Q 正传》约四十篇的短篇创作,就是他的收获。

《阿 Q 正传》是他的代表性杰作。它以传记的体裁描写了近于痴愚的一个农民的半生,揭示了阴惨而不可救药的人生的一个片断。这是从《狂人日记》以后其全部作品共同的格调。他自己说过这是最为钦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读他的作品会泛起似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一个片断的感觉。

他的作品是否杰作固当别论,但他在世界知名却是事实。《阿 Q 正传》从世界语开始,已被译成英、法、德、俄五国语言。^② 据称罗曼·罗兰高度赞扬这部作品,使其更为有名。(我也直接得到鲁迅的承诺将其译为日文,此刻已完成一半左右,因系相当长的长篇,并在对话中频频出现山西省一带的土话^③,颇为难译,至今尚未全部完成)

鲁迅的创作知名的除《阿 Q 正传》和《狂人日记》外,还有《孔乙己》、

① 逍遥指坪内逍遥(1859~1934),日本小说家和剧作家,著有文艺评论《小说神髓》,译有《莎士比亚全集》。鸥外指森鸥外(1862~1922),日本小说家和翻译家。

② 《阿 Q 正传》最先被译成英、法、俄等语言是 1925 年至 1926 年的事,当时尚无德译。世界语的译本迟至 1930 年才出版。

③ 作者把绍兴方言误为“山西省土话”。

《不周山》^①、《白光》、《社戏》、《高老夫子》和《在酒楼上》等。

创作之外,作为他的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灭功绩的还有《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巨著,从中国小说的起源说起,直到清末,共分为28篇,32开本,350页,排得满满的,如译成日文将会超过1000页吧。正如鲁迅在卷首所做的“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的豪言壮语一样,像这样系统归纳起来的书乃为先声。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的评论,应待专家来做,并不属于我们加以评论的范围;但我认为光是搜集材料,就不失为一大事业。

至于翻译,特别是关于日本文学的翻译,则评论多于创作,厨川白村的两篇名著《文学十讲》及其续篇《苦闷的象征》等,就是由鲁迅介绍到中国的。作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介绍者之功,应属于其弟周作人氏,以武者小路实笃为开始,从菊池宽、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等直到江马修等,大部分都是由周作人翻译的(顺便提一笔,周作人甚至翻译了《古事记》)。^②

鲁迅翻译的创作作品,无宁说从德文翻译的为多,德国文学的短篇作品借助于他的妙笔译成中文的也占不少。今年夏天,我曾在广州郊外白云路的隐蔽处看到他包围在汉魏丛书和唐宋诗文等古书堆中,以毛笔写楷书,勤苦地翻译德国莱克兰出版社出版的窄本德文短篇小说的情形。^③

鲁迅之通晓德文似从入过日本德国协会和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等开始的,在仙台医专是中途退学的。其退学理由传说有段有趣的插话。据说这是因为鲁迅在学期间,正处日俄战争中间,一天,在学校给学生放映的战争影片中,出现了一个中国人被认为是俄国人的间谍而被日军捉住加以污辱的场面,日本学生们的热烈喝彩,引起他的惊诧和愤怒

① 后改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

② 查《现代日本小说集》中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为鲁迅所译。——编者

③ 应为荷兰佛来特力克·望·蕩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

的缘故。

鲁迅在15年前首创了新文学运动的同时,即闭门不出,以后终于届至今岁15年间竟未出北京城外一步。去年1月18日才前往厦门大学。^①起初订了两年的合同旋即改为1年,后又变成6个月,终于只待了两个月就出现在广州中山大学了。

他从厦门大学初到广州时,广州的文学青年们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态度。报纸的文艺栏充满了“鲁迅来了”、“欢迎鲁迅”的词句。我初见鲁迅,是他在热烈的欢迎声中到达广州,被授予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的要职(对鲁迅说来该是多么应该感谢、而实为麻烦的位置)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事。^②

那是正逢逐渐开始听到青年们对鲁迅失望和不满的呼声之时,我见到鲁迅,也正是鲁迅也逐渐对广州、特别是广州的学生和青年开始感到幻灭之时。

学生和青年们为什么对鲁迅感到失望了呢?

青年学生们所期待于鲁迅的,是要他作一个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大声地议论革命与文学、革命与恋爱,有时又和群众一起摇晃红旗的实际运动的领导者。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鲁迅,却是位有了北京15年的经验,因而立刻就发现了在这高唱三民主义的广州,存在着产生新军阀的萌芽的严峻的人。他是一个既如饥如渴地追求着光明,又在那光明和学生们轻率的鼓噪当中预感到未来的黑暗和压迫的怀疑家。他是一个既不叫又不跳,不得不冷静的观察,发出轻轻叹息的悲观论者。

当我问到先生对广州的看法时,鲁迅回答说:“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无宁说倒是从经常处在压迫和摧残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学生那里,可以看到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语气

① 鲁迅在1926年9月4日到达厦门,1927年1月18日到达广州。

② 鲁迅于2月10日正式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山上正义初见鲁迅是2月11日。

大体上是这样的。

当我问到“能否进行创作”时，他说：“我是教务主任，工作是安排课程，分配教授……”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恍然的苦笑。

时在3月前后。广州的创造社系统的作家、评论家们曾发表过《告世界作家书》^①，日本的《文艺战线》也曾予以转载。内容是极为平凡，既无激烈的词句，又无危险的含意。然而，4月15日，李济琛这个新军阀一度暴露其本性，以清党运动为名，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这群在《告世界作家书》上署名的人们，也竟然极其理所当然地被列为大屠杀的对象。即连仅仅用自己的名字来支持过这一行动的鲁迅，也在一夜之间离开教务主任的职位，潜入地下。^②

在鲁迅潜伏的一家民房的二楼上同鲁迅对坐着，我找不出安慰他的言语。刚好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路上走过去。

靠窗外的电杆上贴着很多清党的标语，如“打倒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等等，在这下面，甚至还由于没有彻底剥光而残留着几天以前新贴的“联共容共是总理之遗嘱”“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意义完全相反的标语。

鲁迅望着走过的工会纠察队说：“真是无耻之徒！直到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给他这么一说，那倒确是些右派工会工人，充当公安局的走狗，干着搜索、逮捕左派工人的勾当。

从鲁迅的评语中，只能感到一种近乎冷峻、阴暗和绝望的东西。我只有默默地听着，而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言语。

从那以后，又同鲁迅谈过几次，现在把他的谈话中还留在记忆里

① 在4月1日《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鲁迅与成仿吾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中英两国人民友好团结，某些措辞较为激烈。

② 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是在4月29日。

的,写在下面:

“中国并没有什么新文学运动,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死灭着。在使用白话都被视为异端的土地上,是不会有有什么新文学运动的。

“在中国是不能靠搞文学吃饭的。在报刊杂志等没有得到发展的中国,就是写了小说也卖不出去。没有哪个书店会出版卖不出去的书。光是写没有出版希望的书,那就只能饿死。

“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也将都是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的东西吗?

“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词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

“据说,我的《阿Q正传》已被译成几国语言,但我尚未见过译本。罗曼·罗兰曾予以赞扬一事,也只是从朋友那里听到过;究竟是怎样赞扬的,我没有读到过他的文章。”

在李济琛的追踪中,隐藏在广州郊外,翻译莱克兰德国小说的鲁迅,从那时几个月以来,离开广州逃往外地的鲁迅,“穿着一领灰黑色的粗布衣衫,面部消瘦而苍黄,须颇粗黑,嘴里含着支掉了半段的香烟,态度从容舒缓,虽不露笑脸,但却自然可亲”。鲁迅现今在什么地方冷眼眺望着中国革命的失败,我是不知道的。

以切身的体会述说着白话文学运动十有五年历史的鲁迅,现在又以其亲身的经历象征着民国十六年(1927年)末的新文学运动的现状——徒以空洞的喧嚣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呼声中消形敛迹而处在有无之中的新文学运动的鲁迅,他现在或许是怀念起寒风凛烈的北京,再次面对着压迫与扼杀,又回到那里去了吧?我祝愿着他羸弱的身体能够得到健康……。

李芒 译

(《鲁迅研究资料》第2期)

与鲁迅谈话

〔日本〕圆谷弘

在上海逗留期间，某社的支社长问我想不想见见鲁迅。我本来就想，在华期间应该了解各方面人士的意向，于是便赶紧去北四川路内山氏的家中会见了鲁迅。

鲁迅，《岩波文库》中也翻译出版了他的选集，所以在日本也很知名。他是所谓左翼作家，也许现在称他为社会批评家更为合适。1881年他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今年56岁。24岁时，他从南京的矿山学校毕业，作为浙江省派出的留学生来到日本。不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以唤醒中国国民的自觉为首要目的，立志于医学和医术的启蒙。但是，他的唤醒国民自觉与启蒙的第一步，因为目睹日俄战争时有关中国人的惨状的电影而幡然转换了方向。他把他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步，印在了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的文艺运动上了。那时候的他，作为要消灭清朝的革命党人之一，出入于宫崎滔天等人之处，为反清斗争而奔走划策。他离开东京回到故乡开始学校教师生活，是在29岁的时候。他的思想与生活的斗争，从那时起进入真正的舞台。1911年10月武昌革命后，南京的革命政府出来统一中国时，他成为教育部的一员，随南京政府迁到北京，在教育部待了15年。他成为京师图书馆馆长，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执教，过着比较安稳的学者生活，同时也继续过着作家的生活。但是，1925年孙文死后，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爆发了与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对立。他作为左派教授而受到通缉，开始了“用脚逃难比用手写文章更忙碌”的生

活。他决不是尖锐的左翼理论家，也不是左派作家。他在少年时代由于父亲的重病而了解到中医的骗人，由于对那些被骗的病人与家属的同情而立志自己成为医生；那以后，受到日俄战争时当间谍的中国人的最后的惨状的刺激，从医生转而提倡文艺，以改造他们的精神；更为了推翻清朝而探考满洲人的古代暴虐史，“以复活被忘却的旧仇来帮助革命的成功”，而从事于文学运动。

清朝倒台后，作为北京军阀政府的公务员而站在教坛上时，他在精神上受到的刺激是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横征暴敛而使中国民族趋于灭亡的现状。鲁迅剔抉腐败的中国社会的旧习，痛骂歪曲的宋儒哲学，与国民革命同步调，来指示青年解放的方向。但是，他的作品是对封建遗物的真实暴露，决不是以革命的文学作品为主。中国国民政府在1924年转而执行容共政策，迫使北京政府左翼化，因此，激进的教授和学生们在这个进步的国民政府的影响下向左转是极自然的事。

他说：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啦，革命的辩证法理论啦，是没有的。包围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形态的东西。不是想不想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乃是中国惟一的现实生活。

打出容共政策的南方国民政府，联合了中国的城市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威逼北京军阀政府。因此，段祺瑞开始对左翼化的知识分子实行逮捕和虐杀极刑。鲁迅受国民党的影响而极速左翼化，因而便受到北京政府的迫害。他从饥饿和子弹的威胁下逃了出来，接受厦门大学的招聘，悄悄地去了福建。但那里是国民党势力范围之外，他受到反动和封建思想的压迫，后又被邀请到广东的中山大学。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因而鲁迅在热狂的气氛中被作为革命战士而受到了欢迎。

但是，他在广东被热烈地当作革命战士而欢迎这一件事，不过是他后半生的暗淡的点缀。他去后不久，国民党便排挤共产党，扫荡一切激进分子。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但他被激进的青年学生作为“革命

战士”而受到拍手欢迎，因此他被看作亲共派的一员。因受反动政府的压迫而一夜间突变的反动新闻报道机关，以恶毒的流言抓住他不放。

国民政府的反动化，遂使鲁迅完全地投向左翼。他说：“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落陷阱”。他自己正在人生道路上正直地行走着，突然从一旁窜出了急速转弯的卡车。他对这样的国民党说了如下的话：

开始，他们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车厢，革命要靠共产党携带国民党才会成功；说鲍罗廷是革命的恩人，要学生们一起向他致以最高敬礼。因此，青年们谁都感动了，当了共产党。但现在，却突然因为是共产党的缘故，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死！旧军阀从开始就不容共产党，并一直坚守这个主义；而国民党的做法，则完全是骗子手的行径！

他也不由得尝到了这个骗子手的毒计！

中国共产党是从实际出发的。扩大苏区，发展党员，都由于他们的实现生活的需要，并不是出自书本和小册子上的理想。正因为这样，苏区民众的忍耐力是强大的，对国民政府的反抗也是强大的。

鲁迅这样说明中国的共产地区的扩大。国民政府为了讨伐这些共产军，投入了莫大的军费，以期彻底地扫荡他们。

不管投入多少军费，共产主义运动必将仍然发展壮大，讨伐实质以失败告终。这样，国民政府便一切以孔子、孙文来掩饰自己的失败。所谓新生活运动，也是为了巧妙地从不间断高涨的中国大众的不满之下脱身而推出的口号。不要跳舞啦，不要抽烟啦，遵守时间，提高道德啦，等等，尽提一些细小的问题以便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转移到其他方向。文艺运动之类，经常反映中国青年大众的不满，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政府镇压之残酷是不用

说了。

据他说，没收、禁止，对作家逮捕、暗杀，是中国政府的常用手段，所谓“文学的自由”这样的东西是几乎没有的。譬如说，要禁止共产党，说俄国是共产党，便连俄国古代作家的东西也立即禁止了。

国民政府是与中国大众完全对立的。作家们要写中国社会生活的普通事情，对政府来说，就立即成了暴露文学、左翼文学。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对官方来说就是坏的。报纸也是这样，政府认为坏的报纸，国民便认为是好的。但是，这样的报纸一一被禁止了。国民党里是没有作家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里没有写得出像样作品的作家。不过，不支持政府和国民党的作家没法生活。首先是作品不能发表。杂志也好，报纸也好，反映现实的作家的作品不让登载。而且，既没有著作权，也没有发行所。

中国的出版，有各自独立的出版所与独立的销售店，不受理外来的东西。因此，假如鲁迅的著作在中国出版，也是没有出售的店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著作在中国仍是最畅销的。但是听说即使在中国最畅销，也几乎收不到版税。他的生活几乎都靠在上海的某位日本人的照顾。

对我下了逮捕令——在中国，下了逮捕令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不能在公开场合活动。跟在逮捕令后面来的，便是暗杀。

黑暗的影子映入他的眼瞳。他回忆起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很多的同志，甚至连逮捕令也没有，就一个一个消失了！对国民政府的愤怒，使他全身沸腾起青年人一样的热血！

谈话又接触到日中问题：

日本与中国关系深厚。即使在留学时，日本人的生活与中国

人的生活也只不过隔了一层纸。相近的地方很多，正因如此，相互的缺点也暴露无遗。要问中国人，就每个人来说，到底对日本的感情怎样？这没什么可谈的。

日本的舆论界要求中国人就对日关系直截了当的表示“是”或“不是”，这是不合理的。

中国没有军备，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备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说日本是敌人不如政府更是敌人。日本方面以为蒋介石是抗日的首领，中国人却认为他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方面给了他很多好处。中国人如果当奴隶就安心当奴隶；现在的中国连奴隶也当不了，有的只是一片混乱。

他反复说了这样意思的话：

中国，旧的不保存，新的不建设。站在中国的彼岸所能看到的，只是阿拉伯一样的沙漠！

日本想用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

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即使对“亚细亚主义”，日本的人民与中国的人民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想法接近。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

但是，这一希望在现状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中国人想撇开“国家”而社会性地生活下去。不管中国的政府崩溃几回，中国人还是毁不了。蒋介石干了很多坏事，因此也不能再坏了吧，随他去吧。即使

其他人掌权，结果也仍是干坏事，那蒋介石掌权还不是一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曾经以热烈的感情站在中国青年大众的第一线的革命战士鲁迅，以被迫受害者的悲伤的神态凝视着中国。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在中国政府的压迫下始终寄希望于将来。

陈福康 译

（《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5期）

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

[朝鲜]申彦俊

鲁迅——中国培育的“东方大文豪”。我虽久闻其名,但一直没有拜见的机会。从他的文章,从他的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似乎是一位“冷酷的人”或是一位“怪人物”。他好像是一位古怪的医生,手拿解剖刀,对遇到的每一个人(当然他们都是患者),连麻醉药都不用,就解剖他们的病灶。他是那样的无情,甚而有些怪诞,可是他的解剖术却相当锐利、大胆而明于理智。他的解剖虽然冷酷无情,但手术刀刃所刺之处,一定会感到疼痛和爽利。对这一位怪人物,笔者出于好奇心,产生了拜见的念头。正值此时,得到朱兄的委托,于5月19日去中央研究院。据说,鲁迅作为宋庆龄、蔡元培氏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是以救援政治犯为目的的团体)的委员,时常到设在中央设计院的事务局本部来,所以我就赶到那里去访问。当我向蔡元培氏询问鲁迅的住所时,蔡氏回答说国民政府已对他下了通缉令(逮捕令),他的住所绝对保密。但是,蔡氏出于对笔者的信任,还是告诉了他的秘密住所。他在北四川路□□□号,借用某位日本人的密室,过着亡命生活。我首先发出请求会见的信函。他回信说“虽然在躲藏,但随时都有遭到横祸的危险”,请用书面写出要讲的话和意见要求。经笔者再一次请求秘密会见,才得到同意22日在秘密住所会见他。这样,笔者才有可能见到很早就想见到的文豪鲁迅。

青服敝履的老农装束

我找到鲁迅先生躲藏的地方，房主日本人某氏夫妇出面接待。走上鲁迅居处的二楼，有一位像佣人似的老人出来迎接。他身上穿的是乡村农民通常穿的棉布衣裤，脚上也穿着布鞋，完全是乡村老农的打扮，青色棉衣已经褪了色。不知是由于很久以前理过发，还是由于习惯，头发很长盖到耳下，上面好像落了灰尘，而且也比较散乱，胡子也没有刮。看来，他对身体是不做任何修饰的。他的寝床，是朴素的中国式样，盖的被子和用的帐子，也都是棉的，甚而他用的碗筷，也都与中国下层平民百姓的生活一模一样，看不出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他的生活，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模样。他不只是用自己的口和笔宣扬无产阶级，而且身体力行，在生活上保持着同无产阶级一样的方式。他从上海各书店得到的著作权酬金每月不下两千元，从欧美各国得到的小说译文的稿酬每月也有三四千元。可以说，他是中国惟一的有这样最高收入的作家，如果以此过豪华生活，相信是不会成问题的，但他却过着同乡村农民一样的生活。据说这是因为他把大部收入，捐赠给了文化运动团体。

他居住的房间，既是寝室、会客室，又是研究、编辑室，甚而兼做厨房。床前放着饭桌，周围摆着七把椅子。其余的就是像城墙一样堆满房间的书籍。他背靠黑压压的书城，坐在我的正面。

他那布满皱纹的前额，瘦瘦的面颊，散乱而灰白的头发，象征着他那波澜迭起的前半生。他的个子不高，好像不足五尺。他的胡须见一次就能记得住，他是中国人中少有的多须者。从外形看，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没有发现有特异之处。这一位身高不足五尺者，就是大文豪鲁迅。

我不是文士

笔者是以中国人谈话的方式，先从赞扬他的文才开始的。他回答的第一句话是：“我称不上文士。只不过偶然拿起笔，写了一些文章罢了，还称不上文士。”

问： 先生是怎样开始写小说的？

答： 我 18 岁时，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当时，英美各国用海军侵略中国的事实，促使我青春的热血沸腾，产生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又退学，转入矿务学堂。那时的想法是，开发矿产是当务之急，比建设海军更为重要。毕业后，又带着只有改良人种形成强种才能成为强国的想法，赴日本去学医学。当时我曾以为，日本的维新，首先是从医学开始的。但是，两年之后，在一次观看电影时，看到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枪杀的情景，就形成了只有提倡新文学才能从精神上复兴中国的认识，从此就放弃研究医学开始写小说。

问： 那么，先生认为文学具有伟大的力量吗？

答： 是的。对于唤醒大众，是最必要的技术。

问： 先生写文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答： 我是现实主义者，只是将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问： 人们说先生是人道主义者，是这样吗？

答： 但我绝对地反对托尔斯泰或甘地那种人道主义，我是主张战斗的。

问： 在中国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作家是谁呢？

答： 丁玲女士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写不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作家之一。

与见到的外表完全不同，他是一位非常健谈的人。他谈话的态度和蔼可亲，就像同孩童谈话似的，纯真而无邪气。他那娓娓动听的话语，使我陶醉，甚而忘了记笔记。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阿 Q 正传》中阿 Q 这个人物的故事。他说，阿 Q 这个人物是以自己的故乡鲁镇的人为模特儿的，其实阿 Q 不仅是中国人的普通相，而且也是其他任何民族中经常见得到的普通相。当《阿 Q 正传》译成英、法、德、俄、意五国语言，受到世界文坛的欢迎时，一些中国的文人却认为这是侮辱中国的作品，甚至把鲁迅污蔑为卖国贼。实际上，现实主义者鲁迅，只不过是用了他那忠实的笔，以冷静无私笔法，如实地揭露了中国人的真相而已。

我还听了他发的杂谈议论。他在谈话中，淋漓尽致地分析了中国

的政局、知识阶级、世界革命等问题。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痛斥了中国知识阶级的软弱无力，尤其是他痛骂了主张民族主义的政论家、文人们。他说：“正如蒋介石已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资产阶级文人的意识已成为无用的梦幻。”他揭露资产阶级文人的没落，强调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表露出左翼文豪的本色。

笔者问到了鲁迅的人生观、世界观。他回答说：“我认为，人生就像走路，一步复一步，在前进中造桥修路，这才是人生要做的事。”

弱小民族的解放呢

当提到弱小民族的解放问题时，他回答说：“只有世界革命完成时，弱小民族才能得解放。”

他的谈话，已经涉及到法西斯主义和苏维埃俄国。

他还向笔者询问了朝鲜的情形。当他听到用朝鲜文写成的书籍在减少，朝鲜的文艺乃至整个文化已经日本化时，他劝我决不要为此悲观。他认为，是日本文还是俄文，都没有关系，他甚至期望中国文字能在中国消失，普及比中国文字更好一些的文字，比如英语或法语。他就这样，一脚踢翻了国粹主义。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我告别鲁迅先生，回家去了。

临别时他特别嘱咐我，希望朝鲜文坛上的哪一位，能给正在筹备中的《中国文坛》刊物写稿，介绍朝鲜文艺的历史及现状。我期望文坛上的有志人士，特为此写出一稿，介绍一下朝鲜文坛情况。用朝鲜文写还是用外国文写都可以，用什么文字写都没关系，只要寄到笔者处，就会转送鲁迅。他也答应给《新东亚》写一篇短文，可是，蒋介石法西斯暗杀团企图谋害左翼作家的阴谋暴露出来后，他只好又亡命到某一个地方。

笔者对文艺是门外汉。不懂文艺的笔者，也无法评论文豪的文艺，只好写这一篇访问记，送给读者，请原谅。

金贞淑 译 崔龙水 校

(《新东亚》1934年第4期)

鲁迅回忆片断

[新西兰]路易·艾黎

我住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对鲁迅并不十分熟悉,但是我倒在几个场合见到过他。他的直观能力、直率态度和精神气质使我印象深刻。有时候我看到他快步走在北四川路,草帽拉下来遮住额头,旧白绸长衫下显露出他那瘦小的身躯,脚步坚定有力。

大约是在1935年末的一个晚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要我陪她到他坐落于施高塔路的家中去,并为她做翻译。她自己过去同他谈话往往是用德语。那时我在日常工作中是说上海话,但是正跟一位满族老师学普通话。她要给“因普列科尔”(INPRECOR),即《国际新闻通讯》写一篇有关长征的文章,但我拿不准碰到刚从长征归来到上海作报告的作家冯雪峰时,他可能讲什么方言。他那天晚上要到鲁迅家去,通过同我的两个义子——一个内蒙古人、一个湖北人平时谈话,我对其他方言也有些接触,这多少有些帮助,可是我对艾格尼丝如此满怀信心地要我担任的角色却毫无把握。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初学者。

那个晚上令人心神激荡,尤其是当冯雪峰讲到张国焘同毛主席和朱德将军从川西阿坝藏族地区的卓克基来到上游的两河口会面的故事时更叫人神往。毛主席和朱德步行前去欢迎,而张国焘却坐在他的马上,像一位国民党将军那样,被骑着马的部下拥簇在中间。我有时被某个字眼难住,冯雪峰就生起气来,怒冲冲地说:“他连这样简单的事都翻不出来!”于是鲁迅就会站起身来,给大家倒茶,说些鼓励话,我们就又接着谈下去。

1936年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木刻展览,我进去参观展品,发现鲁迅正在那里忙着给围住他的年轻人签名。那是我在他生前最后一次看见他。大约在同一时期,曼尼·格兰尼奇因事被宋庆龄派往鲁迅家去,拍了一张鲁迅站在门口的照片,在宋的思想上照顾好鲁迅是居于首位的事。那张照片照得很好。曼尼是《中国呼声》杂志的编辑,他送了一张给我,这张照片我在其后10年左右的时间一直收在我的小皮包内,直到最后丢失。当时以“大风”为笔名的一位年轻女画家郁风,根据那张照片,画了一幅很好的鲁迅头像素描,《中国呼声》当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它。

1936年埃德加·斯诺的《活的中国》一书出版,他非常高兴。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有一篇鲁迅传记,是埃德加·斯诺原先在1935年1月为《亚洲》杂志写的,后边是鲁迅的七篇小说。斯诺在会见鲁迅之后写道:“鲁迅这个人物以他的博爱精神、暖人的同情心和对周围生活的敏锐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敢肯定,他的作品对事物作出的解释会是饶有兴味的。”

这本书的标题页印有一张很好的鲁迅的照片,而这个集子是献给鲁迅的伟大支持者宋庆龄的。献辞写的是:“献给S.C.L,她的廉正不屈、敢作敢为和忠诚不渝的精神是活的中国那些出类拔萃人物的重要象征。”这些话在鲁迅身上也完全适用。

我见到鲁迅情绪较为轻松的一次,是我和一位朋友参加11月7日一次宴会后出来的时候。那是一次盛大的聚会,人们热烈地相互祝酒。鲁迅从来不是个一本正经的人,那天的情绪倒颇像个孩子。他那顶旧毡帽掉到大厅衣架的后面,他因为不知道帽子跑到哪里去了而到处寻找,到后来我们给他找了出来,他一提脚把帽子踢下楼梯,大笑着说:“一顶老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就是个拉黄包车的!”他边笑边跟着大伙走下楼去。

由于鲁迅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就去请教当时可能找到的最好的西医专家。医生劝他彻底休息,于是我跑到江湾去看一家别人推荐的私人医院,并且回来向有关朋友们报告了详细情况。然而鲁迅坚决不去任何医院,说他知道他的病已到最后关头,在当时是绝对无法救治了。他说在这件事上他听从一位当医生的日本老朋友的忠告,说他要做的

事还很多,而且要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对他来说能够让他保持旺盛的精力并充分使用它到最后一刻,定是莫大满足了。

他的葬礼是一件大事。当送葬队伍经过我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二楼办公室窗下时,我俯窗下望,看见当时的日本美女池田幸子也走在队伍当中。我同她先在战争年代的重庆、继而在解放后的北京时常见面,从而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直至70年代她去世为止。在这么多年里她为加强日中了解的事业贡献了力量。她和鲁迅很熟,她的去世切断了同鲁迅的又一联系。

埃德加·斯诺曾援引鲁迅对青年人讲的话说:“要思考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百个穷乡僻壤去旅行,访问将军们,然后再去访问他们的牺牲品,睁大眼睛、头脑清醒地看一看你们时代的现实,并且为建立一个开明的社会而努力吧,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在谈到那个时代的青年时,他说:“正因为生长在一个急剧没落的阶级,他们才更能了解它,摧毁它,并创立起一种明智的社会秩序。”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在1936年10月20日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的。她当时正在双十二事变前的西安。她写了以下一段话:鲁迅之死不仅给我个人带来悲痛,也是民族的悲剧。他并非无目的而活,也不投身于猎取财富、权力和地位。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中,他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影响最大。他体现了为公的精神,而痛苦和斗争的生活却孕育了致他于死命的疾病。他把生死置之度外。

只是到了公布他的逝世讣告时,新闻检查当局才取消了对鲁迅名字的禁令。在上海举行的葬礼是令人难忘的。教师和学生离开了他们的教室,店员离开了他们的商店,工人离开了他们的工厂,穷苦的作家、画家和演员走出他们的藏身之地来为他送葬。孙中山夫人和她的弟弟宋子文都参加了送葬队伍。

鲁迅不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尊重他的学识和精神。在他们的根据地延安,后来建立了第一个鲁迅图书馆;我成了外语部的掌印人,并把我在中国收集的所有书籍都捐给了它。在这以后,共产党人又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数以百计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全国各地去到那里,在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员的指导下学习,这是一所创造了一种富有活力和战斗性的艺术学院。

当鲁迅去世后第二天,西安的朋友们到临潼去的时候,连庙祝——一个没有多大想像力的商人也参加进来同他们一道谈论鲁迅。我听着他的话,目睹连一个偏僻的乡间寺院的主人都知道鲁迅生平事迹的事实,我问我自已:“这一切新闻检查有什么用呢?”

在避暑胜地北戴河,树立着高尔基和鲁迅的两座塑像,这两位不朽人物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当那些风云一时的人物已被遗忘的时候,他们的名字还将活在人们心里。鲁迅仍然强有力地活在我们中间,正像歌颂美国劳工领袖乔·希尔的歌中所唱的那样,“他说,我从未曾死过”,对于鲁迅,人们也可以用这话把他铭记。

我写了下面几行诗以纪念鲁迅:

他死了,人民——
了解前进道路的
相对少数——
像失去亲人一样悲戚;
如今他们的人数
增长何止千百万倍!
对他的怀念
温暖了整个大地,
他的伟大
今朝更胜往昔。
一个人要像他那样写作,
必须对平民百姓充满热爱,
他热爱他们,
毫不含糊。
他心中印着绍兴的景物。

(1981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回首当年忆鲁迅

[捷克]普实克

当1932年秋,我动身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认识一下这个新的,正在战斗着的中国,因为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此一无所知,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她感到莫大的兴趣;我开始在广州,以后又在上海追寻这个新的中国,但是毫无收获,即使在北京亦然如此,我就想,认识新的中国的最好途径也许是新的文学,于是有一天我就走访当时被认为所谓新文学运动主将的胡适教授。这次访问却叫我上了大当,胡适教授表示他对新文学已经一点也不感到兴趣了,言下大有不屑一顾之意。虽然他为我开了一张作家的名单和书单,不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好像其中没有鲁迅的名字。我也记不清第一本鲁迅的书是在什么时候或是怎样到手的,我只知道,以后的几部鲁迅的集子一直是我的朋友——一位年轻的学生王福时带来的。他总是带着严肃的表情到来,把一卷书塞到我手里:“这本书您得读一读!”话毕一笑而别,头一本我到手的鲁迅作品是《呐喊》,这本书真使我惊喜交集,我一下子就开始懂得了周围人们的面貌并理解了他们的灵魂,鲁迅为我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的道路,教导了我如何去爱他们。从《一件小事》里我认识了在街头的人力车夫的品德。当我在乡间闲步时曾经跟一些贫农聊过天,在他们身上我可以辨认出《故乡》中那位沉静而温和的闰土的影子;同时我也能够分辨得出诸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嘴脸来。终于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沉思的,受着苦难的,主要是正在努力着的中国!归根结底欧洲书籍中所描述的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也

许都像五光十色的传奇剧,但是缺乏思想,中国生活中的事件似乎从来没有那种悲剧的迫切性,就像在国内的那种具有悲剧意义的事情一样。一切都是轻描淡写,使人无动于衷!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位作家向人们说出了尖锐而炙热的话来使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与它正面相对。难道人们能够对短篇小说《药》中那个自己的血给人做了药的革命者的悲剧性形象漠然无动么?看了落魄文人孔乙己给凶恶的富翁打断了腿在泥里爬来爬去的样子难道可以淡然处之么?听到《狂人日记》中的绝望的呼喊,说是在历史上写着的除了“人吃人”之外就没有别的字的时候能不毛骨悚然么?读了鲁迅的小说就使人体体会到生活的悲剧是何等的相似,它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紧密相连而处处相通,因为生活到处皆同,生活被蹂躏,被污辱,被践踏,在中国和欧洲是同样的痛苦。人们能理解“明天”中单四嫂子的梦想、希望与痛苦正就是每一个母亲的梦想、希望和痛苦,因为世界上的人道主义和争取人道主义的斗争是一致的。

鲁迅的著作不仅为我打开了一条理解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道路,并且使我理解了它整个的发展过程。透过令人迷惑的陌生的方块字体,我看到了一颗热情而豪放的人民的心,人民的感情以及中国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化的深刻的慷慨悲歌之情。贯穿在鲁迅作品中的慷慨激昂的感情难道在《诗经》,在屈原的诗歌里,在李白、杜甫的诗句和元曲里没有出现过么?

然而鲁迅指出了在中国争取人道主义的斗争战场,指出了在这一斗争中的战线形势,他揭示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不过更重要的是鲁迅把人民的真正面貌刻画出来了,人民的声音传达出来了。鲁迅指出:广大的群众有他们自己的梦想与渴望,他们正尽力争取着一个较好的,有人的尊严的生活,他们跟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有着对生活的愿望。他的作品粉碎了无耻的传统的欧洲殖民主义文学所描绘的图画,出现在那些画幅中的永远是醉生梦死,为了吃一口饭甘心奴颜婢膝地为外国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人。替代那些国内外宣传家人为的粉饰太平的牧歌,鲁迅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生活中的悲剧和正在分裂瓦解中的中国社会的可怕斗争——一面是地主官僚,另一面是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他们心里燃烧着积世的仇恨,渴望着新的生活。

鲁迅对于我来说是一扇通向中国生活之页——中国的新文学，旧诗歌与历史等等——的大门。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本来想研究中国纪年史与通史的，在我搜罗资料的过程中，就接触到了一些民间小说，首先是宋元时期的“话本”，然而使我理解这类文学的钥匙仍是鲁迅的作品：《中国小说史略》与《小说旧闻钞》。我对中国新文学与旧小说的兴趣使我有与鲁迅直接进行接触的愿望，并倾听他对某些特别使我感兴趣的问题的见解。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况且在这里手头又没有自己的记事册，不过我还想起，我是经《文学》杂志的介绍把信寄给鲁迅的，因为那时我经常热心地阅读《文学》和《文学季刊》，并且我知道鲁迅和这份杂志是有联系的。隔了不多几天就来了一封信，背面写着周树人的名字并附来上海的那位日本朋友的地址，当时我是何等的激动！这就说明那位伟大的作家当时在怎样的环境下生活着，他不得不在国民党特务面前对自己的地址保密。当时我已经知道一些特务们的伎俩了，因为我曾经听说关于作家胡也频与其他进步的文化工作者被枪杀的消息。

当我接到从一位指点我理解中国与中国人民的道路的作家那儿来的信，我该是多么的幸福！此后在中国以及后来1934年我到日本去求学的时候，我们的通讯关系一直继续下去。我把鲁迅的信件当作最珍贵的宝物珍藏在家里，这些信中最后一封的日期是1936年，大约是他逝世以前的三个月。那时鲁迅在信中告诉我，他病得很厉害，不过现在好一些了，他打算动身到乡下去，同时他给我寄来了《呐喊》捷译本的序文。事情是这样：当时我决定在回国后把这本书译出来，因为我深信，它将会打开捷克人民了解中国的眼界，就像打开我的眼界一样。

此后，10月份的一个早晨我走进一片书店，正坐在里边的我熟识的教授递给我一份报纸，他只说了一句话：“鲁迅死了。”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晴天霹雳的了，鲁迅死了！中国的朋友写信给我也都谈着这件哀痛的事。另外我脑子里还牢记着郭沫若在东京的追悼会上所说的话：“鲁迅的人虽然死了，他的作品将永世不朽。”

我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就把《呐喊》大约译出了一半，在1937年由布拉格一家进步的出版社出版。这就是鲁迅作品的第一个捷文版。我对自己的翻译并不满意，我在国外待得太久，因此我的语言的丰富与

优美程度远够不上表达鲁迅作品的条件,于是在1950年我重新着手翻译《呐喊》,并且把原来译过的部分完全重译过,《呐喊》的另一部分后来是由克列布索娃博士翻译的,并添上《野草》的译文。这部我们共同的作品于1951年以《呐喊—野草》的书名出版。关于鲁迅的事,我曾在《中国,我的姊妹》这本回忆录里详细地记述过,这部书在1940年初次出版,后来又有《论新中国文学》,第一次用德文发表在1940年,最后还和克列布索娃博士合作写了《鲁迅,新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一文,1951年发表在捷克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新生活》杂志上。以后鲁迅作品的出版就由克列布索娃博士接手,她翻译了除上述的《呐喊—野草》之外;还出版了《彷徨》(布拉格,1953年),《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布拉格,1956年),此外她还用法文写了《鲁迅生平及其作品》(布拉格,1953年)一书。

当1950~1951年间我国第一个文化代表团在中国收集了大量丰富的和重要的书籍资料之后,我们就决定把建立在布拉格的东方学院的中国图书馆以伟大的鲁迅的名字命名(图书馆的匾额由作家郭沫若题书)。我们愿把中国第一位向捷克与斯洛伐克民族发言的伟大作家的名字作为中捷两民族永久友好的象征;我们愿以体现在鲁迅身上的追求真理的严肃精神和对人民的挚爱来巩固我们民族间的友谊。

(1956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

编选后记

本卷收录的是外国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作者中有老师，有作家，有学生，有新闻记者，有医生，有牧师，有相交甚深的朋友，也有一面之交的客人。

编这样一卷回忆录，目的就是想从多角度看鲁迅。从不同角度看鲁迅，往往会有不同的观点，也可能会有独特的发现。

当然即便是外国人，也总是人类，他们对鲁迅的看法，既有与我们不同之处，也有相同和相通之处。我们先验地想来，他们究竟非中华民族，语言文字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对鲁迅一般不会达到像中国人那样深刻的了解。而且因为他们之来中国，是做客，鲁迅对他们不免客套，没有利害冲突，少有思想碰撞，关系也只能停留在表面。鲁迅之去日本，是留学，也算是客人，而且那时很年轻，老师和同学们还不可能预料到他日后的发展和价值。所以我们看这些文章，首先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要透过客套话、表面话看他们对鲁迅的如实的描绘和客观的分析。

总之，异中见同，同中见异，阅读海外人士的回忆文字，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在中国人的回忆录中常常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人看了鲁迅的作品，脑海里形成一个鲁迅的形象，然而见到鲁迅以后，差别却很大——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老人啊。很多位外国人也就有类似的感受。如

一位朝鲜人,从阅读鲁迅作品得到的印象是,鲁迅是个“冷酷的人”或者是“怪僻的人”,是一位手持锋利的解剖刀,不用麻醉就解剖患者的古怪的医生。可是见了面,坐在自己的眼前的,却是一副普通农民的打扮的鲁迅,态度和蔼,谈话风趣。应该说这是鲁迅身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一个看似矛盾实际上内在统一的特点。文字上冷,为人上热。当然,鲁迅对待不友好的人,是断然不会有这样和蔼的态度的。他不可能一味地友好,也有发怒的场面。而外国人与他见面接触的机会不多,交往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们写的回忆录里当然就少有那样令人难堪的场面,而多亲切和睦的交谈,这是不难理解的。

外国作者往往很注意细节的描写,通过一些动作神态来描写鲁迅的性格。这方面他们比中国的回忆录作者更敏感。也许是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士对鲁迅倾慕已久,加上见面次数不多,所以印象格外深刻的缘故罢。读这些文章,我们看到许多位作者都将鲁迅写成一个身体虚弱的人,这是应当加以解释的,乃是因为这些人多是在上海见到了晚年鲁迅。不过,话说回来,同时期中国作者写的回忆录中,就往往不很注意写或者故意不特写他的身体状况。对于鲁迅的身材也极少提及。大概是因为这些后辈出于对先生的崇敬在为贤者讳吧。而外国作者则没有这些顾忌。史沫特莱就这样写:“他身体矮小而又虚弱,穿了一件淡黄色的丝绸长衫和一双软的中国布鞋。他光着头没有戴帽子,剪得很短的头发表像一把刷子似的竖着。”这种太平常的外表挡不住这位女记者和作家对鲁迅的更细致更深层的观察:“在外形结构上,他的面孔同普通的中国人的面孔一样,但这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最富于表情的面孔而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种充满生气的智慧和意识从这面孔上流露出来……他的风度,他的语言,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放射出一种完整的统一的人所具有的那种难以表达的和谐与魅力。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呆子似的局促不安和粗野笨拙。”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回忆录作者一直很少提到的鲁迅身体较弱这一点,我们在藤野先生那篇文章中也可以读到:“这时代(指在日本留学时——编者)也像是不大康健的血色。”

本书收录了鲁迅逝世后他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写的鲁迅的病状经过。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身体其实一直是较坏的,他多少年都是以

这样的弱体和病体在超负荷地工作。因此藤野先生的文章虽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文字也不是很通顺(仅就译文来说),但还是有价值的。后来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同学也曾在回忆文字中做过类似的描述。

内山完造与鲁迅相处时间较长,他对鲁迅外貌的描写也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他更注意于鲁迅的眼睛:“……从日本来的来访者最受感动的却是那双眼睛。真是清澈明亮,炯炯逼人。这是一双非常清澈、锐利、而且充满温情的眼睛。任何人初次见面,都会由于这双眼睛为之敬佩。长谷川如是闲、新居格等都为这双美丽的眼睛而惊叹不已。”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所见略同,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娴熟的文笔写道:“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却以其炽灼而感人。你一见到他,立刻抓住你的便是这双眼睛。这是一双机警、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既富有感情却又卓具理智。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

当然,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也有不如意和误会的时候,而且有些外国人来访问鲁迅,只是好奇地来看看中国的文豪是什么样子,更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怀着友善的心意。

一位诗人和两位记者都曾引起鲁迅的反感。

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见会见鲁迅时,为日军侵华辩护,说假如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后没有安定群众的力量,那么适当的时候能不能把国防和政治像印度那样委托给英国人?鲁迅义正辞严地回答道:“这么做起来就有个感情问题。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同样是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者的痛恨。

两位日本记者在同鲁迅谈话后,发表了访问记,曲解了鲁迅的几句话,当然这样的曲解可以归结为他们没有听清楚或没有听完全鲁迅的谈话。很多人都曾这样解释过。可是,看了全文我们却不能不说,他们那天对鲁迅的总体印象并不好,他们感觉跟鲁迅在一起很不舒服。鲁迅在看了访问记后,很生气,曾在几封给友人的信里指出,两位记者对他的谈话采取了断章取义的错误做法。

因此鲁迅晚年在会见生人方面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对外国人更是如此。上面说到的那个朝鲜人拜见鲁迅时就颇费了一番周折。便是对待本国人,他也很少邀请生人到家中,而是约到内山书店里相见谈

话。

尽管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但一般来说,这些访问者与鲁迅的交往还是在善意的氛围中进行的。他们都或多或少有些收获,至少记录下鲁迅对一些人事的意见,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增田涉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些细节,有一次鲁迅很关心地谈起中国的未来,说:“中国未来,将出现沙漠。”说的时候伴随着长叹。又一次宴请日本的歌人,鲁迅说了中国政治的许多坏话,歌人问他,那么您讨厌生在中国吗?鲁迅的回答是: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尽管鲁迅有些悲观的想法,尤其对中国黑暗的政治制度和可耻的政治家们极为痛恨,但他仍然爱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之说坏话,是爱极而恨。今天重读这些段落,也是相当感人的。

这些会见者根据自己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学识,在回忆文字里对鲁迅有所评价。有的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谈他们对鲁迅作品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

许多人对鲁迅的渊博的知识十分钦佩,在花园庄认识鲁迅的长尾景和写道:“他什么都知道,我想,就是将五个日本博士集合在一起,也不会知道这么多。”特别是日本学者,充分认识到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因为鲁迅有深刻的思想,所以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就如同耸立于群峰中的高山。鲁迅不但精通中国文学,而且也精通世界文学,他不止为中国的读者所了解,在世界文坛上也应该有一席之地。

史沫特莱的一段话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鲁迅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

他具有人类非凡的发展——天才——的各种标志。据我所知,他是中国近百年,也许是好几百年以来所产生的仅有的文学天才。别的作家尽管有天分,有才能,还有少数具有最高的天赋,然而鲁迅却是一个天才。他具有罕见的观察力和用以描绘其所见所知的才能。只消三言两语就像一把宝剑似的锋利而且分明,他的作品往往像一把宝剑。他的观察是那样分明,他的作品是那样锋利和辉煌,他的见地是那样具有革命性。这使我相信,将来的史家倘不研究他的著作,决不能真实地绘出这一伟大的历史时代。我

对于他的一般看法是：他是这一历史时代中一个最具精湛文化素养的人。

本书所选文章采用这样一个标准：作者一般来说都见过鲁迅。但这样一来，就难免会遗漏一两个重要的人物。如俄国翻译工作者华西理，与鲁迅通过信，较早翻译了《阿Q正传》。但每个规则都有例外。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对鲁迅研究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鲁迅研究有过相当大的贡献，却没有见过鲁迅。他就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他也曾写过一篇怀念鲁迅的文章，名为《回首当年忆鲁迅》，写了在中国期间阅读鲁迅著作并与鲁迅通信的经过。

应该承认，这里所选太偏重于日本作者的文字。这当然有客观原因——鲁迅通日语，日本来访者更容易接待。其他国家的作者一定还有不少，这里一定有遗珠之憾。便是日本作者的文字，也不能说精华都在这里了，限于语言学能力，只能从现有的译品中选出这些来，期待着更多的好译笔，将所有海外人士忆鲁迅的文字译出来，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一份完整的资料。

因资料不全，有的作者简介只好暂付阙如。张杰先生帮助解决了几个日本作者的生平介绍，在此表示感谢。

黄乔生